

有话可说——丁石孙访谈录



*Shen's Reminiscence to Qing:
An Interview
with Ding Shisun*

丁石孙

The Oral History of Science in 20th Century China Series
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

丁石孙 口述

袁向东 郭金海 访问整理

CS 湖南教育出版社

丁石孙（1927—）

籍贯江苏镇江。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1944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电机系，次年转入数学系。1948年转入清华大学数学系学习，1950年毕业，留校任助教。1952年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79年晋升为教授。1981至1982年任北京大学数学系主任。1984至1989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88至1991年任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1993年起在中国民主同盟工作，1996年任民盟中央主席。1998、2003年相继担任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从事代数与代数数论的教学与研究，较早在我国提出程序自动化的研究课题。

袁向东（1941—）

籍贯江苏苏州。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数学史的研究和翻译。任《数学译林》副主编。著有《中国近代代数史简编》等。

郭金海（1974—）

籍贯天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1997年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数学系，同年考取该系中国科技史专业研究生，2000年获硕士学位。2003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获博士学位，留所工作。从事中国近现代科技史与中国科学院史的研究。访问整理有《席泽宗口述自传》。

袁向东和郭金海合作访问整理有《徐利治访谈录》。



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
The Oral History of Science in 20th Century China Series

有话可说

——丁石孙访谈录

There's Something to Say: An Interview with Ding Shisun



《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编委会

主 编：樊洪业

副主编：王扬宗 黄楚芳

编 委（按音序）：

樊洪业 黄楚芳 李小娜 王扬宗 熊卫民

杨 舰 杨虚杰 张大庆 张 藜



丁石孙在会议上发言

有话可说

——丁石孙访谈录

主编的话

以挖掘和抢救史料为急务

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经过宗教改革、世界地理大发现、科学革命和产业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市场和近代文明。在此过程中，科学技术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最强大的动力，其影响至20世纪最为显著。

在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中，国人知识结构的质变，第一代科学家群体的登台，与世界接轨的科学体制的建立，现代科学技术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乃至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科技成就的取得，都发生在20世纪。自1895年严复喊出“西学格致救亡”，至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确定“科教兴国”的国策，百年中国，这“科学”是与“国运”紧密关联着的。百年中国的科学，也就有太多太多的行进轨迹需要梳理，有太多太多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

关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可能是格于专业背景方面的条件，治通史的学者较少关注科学事业的发展，专习20世纪科学史者起步较晚，尚未形成气候。无论精治通史的大家学者，或是研习专史的散兵游勇，都共同面临着一个难题——史料的缺乏。

史料，是治史的基础。根据20世纪中国科学史研究的特点，搜求新史料的工作主要涉及文字记载、亲历记忆、图像资

料和实物遗存这四个方面。

20 世纪对于我们，望其首已遥不可及，抚其尾则相去未远。亲身经历过这个世纪科学事业发展且作出过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和领导干部，大都已是高龄。以 80 岁左右的老人为例，他们在少年时代亲历抗日战争，大学毕业于共和国诞生之初，而国家科学事业发展的黄金十年时期（1956—1966）则正是他们施展才华、奉献青春、燃烧激情的岁月。这些留存在记忆中的历史，对报刊、档案等文字记载类史料而言，不仅可以大大填补其缺失，增加其佐证，纠正其讹误，而且还可以展示为当年文字所不能记述或难以记述的时代忌讳、人际关系和个人的心路历程。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失败挫折和灵感顿悟，学术交流中的辩争和启迪，社会环境中非科学因素的激励和干扰等等，许多为论文报告所难以言道者，当事人的记忆却有助于我们还原历史的全景。

湖南教育出版社欲以承担挖掘和抢救亲历记忆类史料为己任，于 2006 年启动了《20 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的工作计划，在学界前辈和同道的支持下，成立了丛书编委会，于科学史界和科学记者群中招兵买马，认真探索采访整理工作规范和成书体例。通过多方精诚合作，在近两年中已出版图书 20 种，得到了学术界和读者的认可。

近年兴起的口述史（Oral History）热潮，强调采访者的责任，强调采访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互动，强调留下“有声音的历史”。不过，口述史内容的“核心”是“被提取和保存的记忆”（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把记忆于头脑中的信息提取出来，方法上有口述与笔述之差别，但就获取的内容而言，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因此，本丛书当前在积极组织从事口述史采访队伍的同时，也积极动员资深科学家撰写回忆文本，

作为“笔述系列”纳入到本丛书中来。

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事业，除科学研究之外，还包括科学教育、科学组织、科学管理、科学出版、科学普及等各个领域，与此相关的人物和专题皆可列入选题。

本丛书根据迄今践行的实际情况，在大致统一编辑规范的基础上，将书稿划分为5种体例：

1. 口述自传——以第一人称主述，由访问者协助整理。
2. 人物访谈录——以问答对话方式成文。
3. 自述——由亲历者笔述成文。
4. 专题访谈录——以重大事件、成果、学科、机构等为主题，做群体访谈。
5. 旧籍整理——选择符合本丛书宗旨的国内外已有文本重新编译出版。

形式服务于内容，还可视实际需要而增加其他体例。

受访者与访问整理者，同为口述史成品的作者。忆述内容应以亲历者的科学生涯和有关活动为主线展开，强调以人带史，以事系史，忆述那些自己亲历亲闻的重要人物、机构和事件，努力挖掘科学事业发展历程中的鲜活细节。

书中开辟“背景资料”栏，列入相关文献，尤其注重未经披露的史料，同时还要求受访者提供有历史价值的图片。这些既是为了有助于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忆述正文的内容，也是为了使全书尽可能地发挥“富集”史料的作用。

有必要指出，每个人都会受到学识、修养、经验、环境的局限，尤其是人生老来在记忆力方面的变化，这些会影响到对史实忆述的客观性，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口述史的重要价值。书籍、报刊、档案、日记、信函、照片，任何一类史料都有它们各自的局限性。参与口述史工作的受访者和访问者，即便是能

百分之百做到“实事求是”，也不能保证因此而成就一部完整的信史。按名家唐德刚先生在《文学与口述历史》一文中的说法，口述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的历史，而是口述史料”。史学研究自有其学术规范，不仅要用各种史料相互参证，而且面对每种史料都要经历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本丛书捧给大家看的，都是可供研究 20 世纪中国科学史的史料，囿限于斯，珍贵亦于斯。

受访者口述中出现的历史争议，如果不能在访谈过程中得以澄清或解决，可由访问者视需要而酌情加以必要的注释和说明。若对某些重要史实有不同的说法，则尽可能存异，不强求统一，并可酌情做必要的说明或考证。因此，读者不必视为定论，可以质疑、辨伪和提出新的史料证据。

本丛书将认真遵循求真原则和史学规范，以挖掘和抢救史料为急务，搜求各种亲历回忆类史料，推动 20 世纪中国科学史的研究！

欢迎各界朋友供稿或提供组稿线索，诚望识者的批评指教。谨以此序告白于 20 世纪中国科学史的研究者和爱好者。

樊洪业

2011 年元月于中关村

	丁石孙序	001
	引言	002
第1章	家世与早年教育	002
	祖父与长孙	002
	“进洋学堂会学坏”	004
	国难与家难	006
	从南洋中学到乐群中学	009
第2章	在大同大学	014
	从电机系转入数学系	014
	组织 T-Party 与接触佛学	017
	关心政治之始	019
	乌托邦读书会	022
	被捕与失学	029
第3章	转入清华大学	040
	报到与入学	040

	补课与教师印象	044
	选学文科课程	050
	清华园解放前后	052
	从留校到要求入党	056
	招收“工农兵学员”	064
第4章	在北大的前期经历	068
	院系调整, 进入北大	068
	学习苏联: 教研室、教学与习题课	073
	1953级和1954级学生	078
	顺利的前五年	082
	从“肃反”到“反右”	089
	下放劳动锻炼	098
	从教育革命到“四清”	103
第5章	“文革”浩劫	118
	“丁石孙是牛鬼蛇神”	118
	从“文明抄家”到连襟自杀	123
	黑帮大院	126
	下放干校	132
	应用数学组, 密码短训班	141
	从赴新疆招生到“批林批孔”	145
	化学分析仪器厂	148
	“文革”结束前夕	149

第6章	出任系领导，赴美进修	154
	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	154
	恢复教学和科研秩序	157
	破格提职，升任系主任	164
	首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169
	赴美进修	174
第7章	北大校长五年	192
	“上下左右前后都要战斗”	192
	从学校食堂开始的改革	197
	管理科学中心和北大方正	204
	难忘的外事活动	207
	没有闹大的学生事件	218
	在政协会上“闯祸”	225
	“六四”风波前后	229
第8章	重返数学界，步入政坛	240
	不当校长后的学术及社会活动	240
	步入政坛前的“预备”与踌躇	248
	从调入民盟中央到出任人大副委员长	252
	附 关于辞去民盟中央主席职务的请求	264
	附录	267
	丁石孙年表	268
	丁石孙主要著述目录	272
	丁石孙文章、讲话选编	274

勾起的回忆	274
哭曾肯成	277
怀念程民德先生	280
怀念曹锡华同志	283
在吴光磊先生诞辰八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	285
数学思想的发展	287
要知科技人员的心	289
高教工作面临新挑战——我们今天怎样做教师	291
北大的精神	293
丁石孙遗嘱	296
人名索引	298
后记	310

丁石孙序

袁向东、郭金海是我的朋友。他们认为我年纪比较大，经历的事比较多，对我这一生是怎么过来的值得写一写。于是，两年多来，他们对我做了系统的访谈，结果就形成这本《有话可说——丁石孙访谈录》。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在访谈中只能凭记忆。因为时间长了，很多事情已经记不清楚了，有些可能记得不准确，所谓“如实”，只是一种理想。但我在口述过程中，力图避免个人好恶，尽量做到客观。我想这本访谈录对我而言是对往事的回忆，也可以使有兴趣的人对我的一生有个大致的了解。

丁石孙

2012年6月

引 言

丁石孙（1927—）是位数学家，从助教、讲师、教授一路走来，做过中国数学会的副理事长；他又是教育家，当过北京大学数学系的主任和北大校长；有人认为他是政治家，因为他后来多年担任中国民主同盟的主席，是一个民主党派的头儿，还是第九、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那已经算是国家领导人了。

上面罗列的头衔，让人联想丁石孙可能是个福星高照的人：自20世纪初现代数学传入神州大地，中国的数学家中哪个有如此令人瞩目的经历。那么，他的人生轨迹到底是一条顺风顺水的直路，还是一条跌宕起伏的曲线？翻看一下他的简历，就知道光鲜名头的背后有条荆棘路，意志薄弱者可能早就丧失了前行的勇气。

丁石孙1927年生于上海，祖籍镇江。因祖父在上海南京路开店，经营有方，家道殷实。

上初一，因不满教国文的老先生“既迷信又腐朽”，毅然另择他校就读。

十二三岁时母亲和祖父相继去世，家道开始中落。整个中学期间，数学成绩平平，高一学平面几何仍觉得难，为应付不会做的题便抄别人的作业。抗战时期日本人在占领区强制学日语，他拒绝学，考试全靠作弊。

在上海读大学期间，组织过T-Party，学过佛学，研读过罗素的哲学，自称数学没有学好。1947年因参与学生运动被国民

党抓捕并被大学开除。之后一度活跃于以大同大学（该校拉丁文名为 Utopia）校名命名的“乌托邦读书会”，成为以后政治运动中被批判的把柄。

1948年考入清华数学系成为转学生，开始走上数学之路。为专心读书，建国初拒绝由民青成员自动转为青年团员。1952年要求加入共产党，因未经入团阶段的锻炼，党支部书记建议他先入民盟；3年后以民盟成员身份在北大入党。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到北大数力系任教，积极参加全面学习苏联的教学实践，在全校报告讲授习题课的经验；他的数学论文在中国数学会组织的1956年论文宣读大会上受到好评。

1957年后屡遭批判，成为名副其实的“运动员”，运动过后他又照样认真工作。1957年反右时期，因开导划为右派的清华老同学，被认为同情右派，事后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1958年下放京西门头沟劳动锻炼，并直言不讳批评教育革命中的极“左”行为。1959年“反右倾”时因“反对教育革命”而被剥夺领导北大数力系自动化小组搞程序自动化的工作。1960年，被当作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出党。1961年，恢复在数力系讲大课。1962年，被甄别平反，恢复党籍，任60级学生的年级主任。1964年完成《高等代数讲义》，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文革”前完成撰写《高等代数简明教程》的任务。“文革”中被批斗、抄家、关进“黑帮大院”（即所谓的“牛棚”）。1968年全家下放江西干校劳动。1973年被派赴新疆招收工农兵学员，“批林批孔”运动中因“污蔑大好形势”遭批判。1974年下厂办学。1975年任新入学的工农兵学员的教学组长。

“文革”后是丁石孙施展才能的时期：纠正数学系长期存在的“左”的做法，为被错误批判和被打成右派的人平反，恢

复和建立良好的教学、科研秩序。任北大校长期间，将竞争机制引入食堂管理，改善了学生伙食；提出从严治校、发扬民主、坚持“双百方针”、干部不越权管事等办校原则；但大的形势使然，“上下左右前后都要战斗”。

校长任上，丁石孙面临北大学子的4次学潮：1984年的熄灯事件；1985年9月18日冲南校门事件；1987年元旦进城游行事件；1989年“六四”风波。建国前参加过学生运动的他，对学潮自有一套看法，读者可在本访谈中细细品味。

丁石孙当校长的功过，自有历史评说。季羨林在北大百年校庆时说，北大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丁石孙。这是一家之说。

1993年，丁石孙的人事关系转入民盟，正式开始政治家的生涯；1996年当选民盟主席；1998年和2003年两次出任人大副委员长。其间一直关注民间办学问题。

我们曾问及他出任北大校长时有何打算，他说：“我这一辈子不曾有过一个长远的奋斗目标，因而对自己的评价是胸无大志，但追求一定要把今天的事情做得最好。”

本访谈录基本按时间顺序编排，通过丁石孙先生的回忆，读者能较完整地了解到建国初期大学毕业的一批知识分子所经历的社会变革和人生的酸甜苦辣。在正文后的附录中，我们选登了他的一些短文和讲话，可能有助于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丁石孙的为人、友情，以及他对数学、教育和知识分子政策的看法。其中最有趣的是他65岁生日当天写的遗嘱——如今他已85岁，看来老天也愿世上多留些光明磊落的人。

袁向东 郭金海

2012年6月于北京



我小时候家里生活相当富裕。祖父大概每月给我父母三百大洋供我们生活。

那时祖父有个旧观念，就是进洋学堂会学坏，所以不让我上小学。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初二已经上化学课了。老师把仪器拿到教室来做制氧气的实验。初三时开始上平面几何。我不会做，觉得比较难，要抄别人的。

第 1 章

家世与早年教育

祖父与长孙

访：非常感谢您接受访谈。访问您之前，我们访问过徐利治先生，出版过一本《徐利治访谈录》。您进入我国数学界比徐先生稍晚，是 20 世纪 40 年代末开始在清华大学数学系读书、任教，1952 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到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任教，20 世纪 80 年代做过系主任，当过北京大学校长，进入 90 年代还出任人大副委员长。我们想请您详细谈谈您的数学人生和从政之路。

丁：那就先从我的家世和童年讲起。我 1927 年 9 月 5 日（阴历八月初十）出生于上海西门路润安里 43 号，取名丁永安，1941 年改名为丁石孙。我祖父叫丁传科，字子盈。父亲叫丁家承，字若农。父亲比我大 19 岁。母亲刘惠先，比我大 18 岁。我有一个大妹妹，叫丁永宁，1928 年 12 月出生；一个弟弟，叫丁永宏，1931 年出生；另一个妹妹，叫丁永容，

1933年出生。我是父亲的大儿子，是祖父的长孙。传说丁姓的先祖是姜子牙。姜子牙有个儿子叫姜丁。丁姓就是姜丁的后代。所以家里有个说法，姓姜的与姓丁的是同族，不能通婚。

我的祖籍是镇江。家里在镇江有房产，估计是祖父买的。地址是宝塔巷同安里，1936年改名宝塔路。我们在上海也有房子，是祖父跟外祖父合资建造的，因镇江古名润州，故名润安里。后来润安里成为外祖父家的独资财产，改名天和里。

访：您为什么改名？丁石孙是谁起的？是自己起的吗？

丁：改这个名字实际很简单。我因休学，没有念完初三，1941年直接考了高一。这相当于跳了一级。当时怕老师发现，不让报考，我想就改个名字吧！其实，丁石孙这个名字在我出生前就有了。我祖父有个哥哥，因其母死得较早，就跟继母一起生活。但他跟继母关系不好，在家不得意，于是出外当了学徒。可惜他没做成什么事，很快就死了。中国有个传统，长子必须有后继的人。但我祖父只有我父亲一个儿子，无法过继给他哥哥，就只有等我父亲生了儿子再过继给他做孙子。所以，我未出生时，就已经确定要过继给祖父的哥哥了。祖父的哥哥名字叫石樵，所以又给我取了个名字叫石孙，意思是给祖父的哥哥做孙子。

访：还有这么一段故事。请问您祖上从事什么职业？

丁：听说我祖上是读书人，做过小官，曾祖父时家境衰落。祖父原来很穷，当过学徒；但他既精明又能干，20岁时已经成了一个杂粮行的经理。祖父的生意主要在上海，他派了很多人到北方各地，包括苏北、安徽，收购各种粮食、糖等运到上海销售。我记事时，祖父已相当有钱。

访：您父亲和您祖父一起经商吗？

丁：没有。我父亲毕业于上海南洋中学，高中学历，国文相当好，字

也写得漂亮，还经常做诗，但不喜欢经商，也没有正式的职业，我祖父看不上我父亲，曾决心不让他学做生意继承产业。记得祖父说他寄望我将来能继承他的事业。我们在镇江居住时，祖父让我每个月给他写封信寄到上海。当时我根本不会写信，每次都是母亲写好，由我来描。

访：您父亲没有正式的职业，那您家里靠什么生活呢？

丁：我小时候家里生活相当富裕。祖父大概每月给我父母三百大洋供我们生活。其实父亲每月花费远不止三百大洋。祖父在镇江还开有分店，父亲钱不够时，就到这个店里去拿。父亲一辈子过得很舒服，并不做什么事。父亲自学过西医。据说，祖母生病时，从上海请来一个西医看病，父亲就从这个医生那里学了一点简单的医术。后来他就在镇江家里的花园中专门辟出一间房子，布置起来，买药品、冰箱等，并免费给亲朋看病。我们小时候生病都是父亲看。

访：看来您童年的时候，因为祖父的供给，家中殷实，衣食无忧。

“进洋学堂会学坏”

访：请您谈谈上小学的情况。

丁：我上学比较晚，大概是在八岁之后。那时祖父有个旧观念，就是进洋学堂会学坏，所以不让我上小学。祖父虽然不让我上学，但却让我妹妹丁永宁上了洋学堂，可能他认为女孩子无所谓。永宁上的是薛家巷小学。

访：您祖父认为进洋学堂会学坏，当时的洋学堂是否有不好的地方？

丁：这倒不一定。祖父之所以这样想，主要因为他是学徒出身，没有读过书，思想保守、封建。我八岁前都待在家里，由父亲教我国文。英文

最早是母亲教的。现在我还记得最简单的 a book 和 a dog 就是跟母亲学的。在家里学习，不像在学校那样正规。早晨父母睡懒觉，让我起床练字，因为没人管着，我就糊弄，所以字就没有练好。父亲有时到上海办事，母亲在家闲着，每晚教我背两句古诗。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就是这样慢慢跟着母亲学会背诵的。母亲懂点英文和中国古代文学。

访：那您母亲是上过学的。

丁：我外祖父比较有钱，请过家庭教师教他的子女。

访：您八岁之后上学，经祖父同意了吗？

丁：这是父亲的决定。因为他自己不想教了。我是在 1935 或 1936 年上的学，进的是一家私塾。私塾先生姓张，教过我父亲，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张先生在自己家里设家馆，一个人既教国文，又教英文，还教数学。进私塾的学生，都是自己买书，还带书桌。当时念的英文书，是开明书店出的《开明英文》；国文就是念《古文观止》，几天教一篇，要求我们会背。我印象中张先生比较开明，不体罚，没打过我。进私塾时，我还不到十岁，完全按照中国传统的规矩，穿长袍马褂，由父亲领着在孔子牌位前行礼、磕头。

访：私塾里一共多少学生？一天上课时间多长？有没有考试、升班？

丁：有十来个学生。学生年龄、程度都不同。张先生一个一个地分别教：年纪大一点，就教得深一点；我年纪较小，就教得浅一点。当时上、下午都上课。每天早上我不吃早饭就到私塾去了。上课一小时后，到门口买个烧饼吃，然后再接着上课。到中午回家吃饭，饭后再接着去上课。

访：您在私塾一共上了几年？

丁：我只上了大约两年。因为 1937 年 7 月爆发的“七七”事变很快影响到江南，镇江一度十分混乱。镇江警察局专门派人保护四户有钱人

家，我们家是其中之一。每晚都会有四个警察巡逻到我们家，看有没有事情。从这点看我们家当时相当有钱、有势力。“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虽然在上海打仗，但镇江的形势也很紧张，我就不上学了。

国难与家难

访：淞沪抗战历时三个月，1937年11月12日结束。日军占领上海后，镇江的形势更紧张了吧？

丁：是的。上海失守后，我们家从镇江分三批逃难。第一批是我小妹妹丁永容随我的一个婶母一家逃往苏北乡下。那是我第六个堂婶婶，我们叫她六婶。第二批是丁永宁与丁永宏跟我姑妈和姑父逃到庐山。姑妈是父亲唯一的妹妹，名叫丁琴南。姑父徐子久，是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生。姑父的父亲是清朝的大官。据说当时姑父的一个同学在庐山有座别墅。逃难时，姑父的儿子徐守仁也在其中。我跟父母是最后走的。那时上海已完全失守。上海的最后一战叫打场保卫战。日本人从海上把打场占领了，抄了上海的后路。我们走的办法是坐轮船沿长江而上，去汉口。我有个二舅叫刘檀源，在汉口做生意。我们到那里可得到他的支持。

访：在逃难途中，您遇到危险了吗？

丁：有一件很可怕的事，险些发生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离开镇江去汉口的前几天，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们，晚上有条省政府的船要从江南到江北送文件，我们一家可以搭这条船逃到苏北去。等到快上船时，父亲认为到苏北也不是办法，就没去。后来得知这条船当天晚上就爆炸了。

访：令人后怕。到汉口以后你们的生活如何？有没有给您留下深刻印

象的事？

丁：我们在汉口安顿下来之后，弟弟、妹妹跟姑父、姑妈也从庐山到了汉口。在汉口的半年里有两件大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件是台儿庄大捷；另一件是亲眼看见武汉空战。苏联派了飞机帮助中国抗日，跟日本飞机在武汉上空打仗，我们在下面能看到双方的飞机，也能看到高射炮击中飞机后的浓烟。

1938年5月，我们离开汉口。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住在那里，没有经济来源。父母、姑妈、姑父带着我们四个孩子从武汉坐飞机到香港，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那时到上海的路，只有从香港坐海轮。我们在香港住了一周左右，买了意大利邮轮的船票回上海。小妹妹丁永容回上海时，因在苏北亲眼看到日本人把六婶的妈妈杀死，受到惊吓，几个月不会讲话。

访：转赴上海后，您家的情况如何？

丁：到上海后，父亲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孩子的上学问题。他先请了个家庭教师，教我们四个人准备参加入学考试。暑期考试时，我考取了南洋中学，也就是父亲毕业的那个学校。弟妹三人考上了位育小学。这年我11岁。

1939年我离开南洋中学，又考取了上海光华大学附中，念初二。这个学校原来的校舍在租界外，被战火毁掉了。只得在租界内的汉口路（当时又叫三马路）证券大楼租了两层楼。当时光华大学和附中都在这两层楼里。在证券大楼上学很有意思，我们在上面上课，能够听到证券交易所里的喊叫声。

1939年这年，我们家很不幸。母亲在11月去世，当时还不到30岁。母亲得的病好像是天花。当时光华大学附中只上半天课，我中午放学回到家里吃饭，听到楼上喊，我跑上去，母亲就不行了。我父亲跟母亲是青梅

竹马，母亲去世，父亲很伤心。母亲的丧事办得很隆重，按传统习惯，在七七那天（去世四十九天）举行一个规模很大的追悼会。在追悼会上，父亲朗诵了他自己花好几天工夫写的祭文，非常感人。父亲古文相当好，他的祭文是模仿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写成的。我们家里过去是母亲当家，母亲去世以后，我们的生活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母亲去世后，父亲很伤心，想从老房子里搬出去，换个生活环境。促使我们搬家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润安里（后改名天和里）的房产这时已由外祖父的弟弟独资经营，我们的股份已全赔给了外祖父的弟弟。基于这两个原因，1940年下半年我们家搬到了威海卫路的威海别墅。这里是新盖的一个小区。我印象中每幢别墅大小不一样。我们家租住的17号是最大的。这是一幢新盖的三层楼房，每层有三大间正房，面积比较大。我们

只住了一层和二层，三层租给了一个姓胡的房客。胡姓房客是一位刚刚结婚的大学毕业生。他的夫人姓秦。这位夫人的妹妹后来嫁给了李政道。当年她妹妹经常到姐姐家里来，因为跟丁永宁年龄差不多，就常同丁永宁在一起玩。我后来跟李政道打交道，就多了这一层关系。

1940年，我家族雪上加霜，不仅比母亲年龄更小的姑妈，还有不到30岁的舅妈都去世了，而且全家的顶梁柱祖父也去世了。此后，我们的生活没有以前富裕了。

1940年丁石孙在上海住所前留影



从南洋中学到乐群中学

访：您提到初中是先在南洋中学读的。能介绍一下在南洋中学的学习情况吗？

丁：当时开的课相当全。记得有数学、语文、英文、地理等。有个数学老师，我印象比较深。他教学时有教应用题，要求用算术列式子，并在式子底下写明你为什么列这个式子。

访：初中一年级就有这样的要求，教学内容还是比较深的。

丁：当时我对国文老师很反感。他是位老先生，让我们念《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之类，他还把孔子说得很神。现在还记得他说孔子是接受上天的旨意写《春秋》，即所谓“端门受命而作春秋”。这位老先生给我的印象，是既迷信又腐朽。我认为这样的学校不能上。于是只在南洋中学初中念了一年就另考入了光华附中。

访：您父亲同意您离开他的母校吗？

丁：我没有征求家里的意见。那时父亲也不太管我。

访：看来您年轻时就很有主见。光华大学附中的教学质量应该比南洋中学的强吧？

丁：也不见得强。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初二已经上化学课了。老师把仪器拿到教室来做制氧气的实验。初三时开始上平面几何。我不会做，觉得比较难，要抄别人的。另外，初三开始学物理，程度也比较高。

访：光华大学附中初三开设几门数学课？抄作业的情况在学校中多吗？

丁：就代数和几何两门。我是抄别人的作业，不是考试，抄作业在当时并不认为是作弊。光华大学附中考试很严格，很少有学生作弊。当时除我之外，班里还有几位同学抄别人作业。

访：光华大学附中考试很严格。那考试时，您的平面几何是怎么过关的？

丁：我一直没过关，总是考四十几分。到上高一的时候，我的几何也不好，凡作业中不会做的题，就抄同学的。

访：您最后却成了数学家，而被抄的人没有成为数学家。您讲过因为休学，没有念完初三，1941 年直接考了高一。

丁：1940 年因为母亲刚去世，我情绪不好，就休学了。1941 年，我直接考上了光华大学附中高一年级。高一还继续念平面几何，程度比初三念的更深；还有三角课，它已从代数里分出来。另外也学物理、化学。因为太平洋战争的影响，我在这个学校待的时间也不长。1941 年 12 月 8 日早上，我照常去上学，还没走到学校，就看到日本兵已经进了租界，在很多马路口架起了轻机枪。我一下子就紧张起来。这天，我实际没上课，上午就和就读于光华大学附中初一的妹妹丁永宁一起跑到南京路（当时也叫大马路）祖父开的店——天福南货店，打电话叫家里把我们接回去。之后，因担心我和妹妹在上学路上出事，家里就让我们到离家比较近的学校读书。

访：那您转到了什么学校？

丁：不去光华附中后，家里请了个大学生给我们当家庭教师。这位教师又推荐我转到乐群中学。丁永宁转到了大同大学附中。我是 1942 年上半年到乐群中学的。乐群中学的名字取自古语“敬业乐群”。它的资历比较老，原来叫敬业中学。抗战爆发后，这个学校被毁掉了，搬到租界地造

了房子，就改名叫乐群中学。乐群中学与光华大学附中差不多，在上海不算好学校。

我在乐群中学从高一下学期一直念到1944年高中毕业。乐群中学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老师，一个是教数学的，一个是教英语的。教数学的老师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他是乐群中学校长的叔叔，老家在绍兴。这个老师长得很难看，家不在上海，一人住在校园里。我们有问题就可以到他的房间去找他。他经常出点难题让我们做。从这位老师那里，我确实受到一些训练。我想这对我后来搞数学是有影响的。

我记得当时上代数课，用的教材是《范氏大代数》。范氏是Fine的音译。Fine是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的创始人。《范氏大代数》影响非常大，培养了几代数学家。后来我到普林斯顿时，看到数学系的楼就叫Fine Hall。那位数学老师出的难题选自一本由霍尔（Hall）和奈特（Knight）合著的《高等代数》（*Higher Algebra*）。我有兴趣做这些难题。

访：看来您日后从事数学工作与这位老师有关。您提到的这本书当时应该很流行。徐利治先生在中学时期就用过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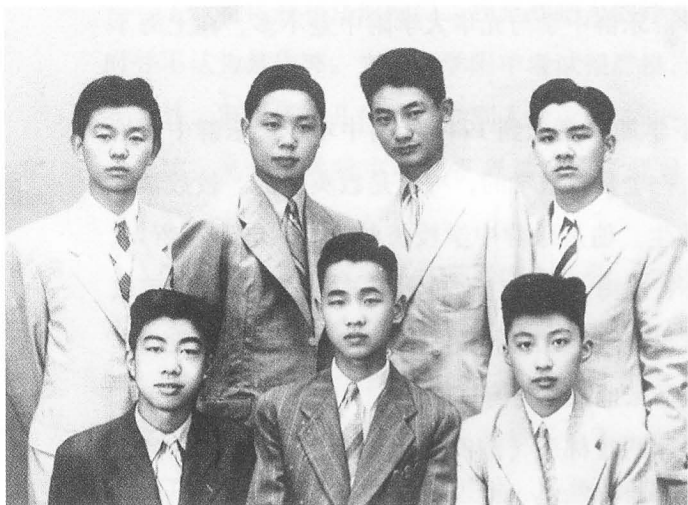
丁：《高等代数》这本书是做参考书，里面的题都比较难。我虽然不是学数学的特殊天才，但做这些难题还可以。如果遇到做不出来的，就去问老师。

访：当时您的数学成绩在班里处于什么水平？

丁：一般。

访：在乐群中学期间，还有令您印象深刻的教师或事情吗？

丁：高二时学校请来一位英语老师，姓谢，叫谢大任。他非常重视发音，给我们上第一堂课时就教发音，而且教查字典。当时已经有些字典注国际音标。从那时开始我养成了一个习惯，碰到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



1944 年中学毕业时与同学合影(前排右 1 丁石孙)

看怎么读音。这一点对我有很大的好处。我的英文发音比较准，就是受谢老师的影响。我记得谢老师自己编了一本英语成语小册子，让我们每人买一本，用心背诵。

我在乐群中学时，日本人已经进了租界，学生必须学日文。学校请了一个教日文的老师。这位老师是中国人。因为憎恨日本，我们对学日文很反感，老师也知道大家不愿学，考试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日文课考试，我全部是靠作弊，两年下来我几乎没学任何东西。现在想来很可惜，学一门外语毕竟是有用的，当时因为出于爱国热情拒绝学习。我在高三的最后一个月，学校专门开了一门课，叫簿记，就是记账。这种课后来就没有了。

当时学校条件大都很差，乐群中学连操场也没有，只有一个乒乓球桌。我上了六年学，没上过体育课，也没上过音乐课。这就使我的成长不完全，直到现在我连简谱都不认识。



我对所学的理论还是清楚的，但是图画得都很脏。每次得的分数都是C。因为一张图常常要画好几个星期，我很难保持画出来的图是干净的。我一想到4年都要画图就很害怕，所以决定转系。

它叫乌托邦读书会。参加这个读书会，害了我一辈子。

我当时并没有念好数学。大同大学的数学教学比较落后，比如在代数方面，连近世代数都没有教。

第 2 章

在大同大学

从电机系转入数学系

访：您 1944 年从乐群中学高中毕业后是主动要考大学的吗？

丁：对，当时可以报考多所大学。每所大学都单独招生。我报了三个志愿：一个是上海交通大学；一个是圣约翰大学，教会办的，像燕京大学一样；再一个就是大同大学，是私立的^①。我没考取上海交通大学，但考取了圣约翰大学和大同大学。记得考试科目有英文、中文、数学、物理等。因为大同大学离家比较近，可以步行上学，所以就选择了大同大学。进大学需要选专业，我家里没有大学生，对于应该选什么系不是很清楚。当时上海电力公司是外国人办的，工资比较高。电机系的毕业生有可能进

^① 大同大学由立达学社于民国元年（1912）创办，以“研究学术，明体达用”为宗旨，以“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为校铭。原名大同书院。1922 年经教育部立案，改名为大同大学。

这个公司，所以我就选择了电机系。

访：当时大同大学在全国大学中处于什么地位？我们知道校长是知名数学家胡敦复。

丁：大同大学在全国大学中并不太差。它不是很正规，没有系主任，很多教员都是从交通大学聘来兼职的。大同大学的校长是胡敦复。他比较知名。但我在学期间一直没见过他。胡敦复兄弟三个。弟弟胡明复是中国第一个在哈佛大学拿数学博士的数学家，可惜死得很早，是游泳淹死的。另一个弟弟叫胡刚复，是浙大物理系教授。胡氏三兄弟是姜伯驹的舅舅，还是胡政光^①的本家长辈。姜伯驹是我的学生，1953年考入北大数学系，毕业后在北大任教，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他父亲姜立夫是数学界的老前辈，在南开大学时是陈省身的老师。胡政光是民盟深圳市委主委，也是大同大学毕业的。他上大同大学可能是因为这所学校是他们家办的。

大同大学是私立大学，办事效率相当高。这所学校原址在租界外，抗战中被毁，胡敦复就在租界内的沙利文面包店旁盖了一幢5层楼，面积不太大，可能不到2万平方米。大学占4层，第5层是附中。大同大学所有的系、实验室，还有附中，都在这幢楼内。当时大同大学有1000多学生。教务处就胡敦复的一个妹妹负责，另有两三个职员。他们几个人就把全校的教务有条不紊地管起来了。

访：您在电机系读书顺利吗？后来为何改学数学了？

丁：我在电机系念了一年。第一学期念画法几何，第二学期念机械制图。我对所学的理论还是清楚的，但是图画得都很脏。每次得的分数都是C。因为一张图常常要画好几个星期，我很难保持画出来的图是干净的。

^① 胡政光，曾任深圳市人大副主任，民盟深圳市委主委。

我一想到4年都要画图就很害怕，所以决定转系。

1945年暑假过后我转到了数学系。当时我对数学并不了解，设想念完了数学系，能当个中学数学老师也很不错。那个时候学数学，被认为是没有前途的。我转系后，就有人问我为什么从一个难考的系转到一个容易考的系。我转入数学系时，同年级的就两个人。除我之外，还有个女同学叫杜融融。同年级的物理系只有一个人，叫陈敏中，他是1998年去世的。这样，我们年级物理系加数学系一共三个人。学校为了省钱，把这两个系二年级的很多课安排跟化学系一起上。所以我在大同大学期间念的化学课程比较多。记得念过分析化学、定量分析，还做实验。但实际上，我根本不需要念化学。我还跟物理系的同学一块学过电磁学。因为学生少，上课就比较自由。有一门课是理论力学，由杜融融的舅舅雷垣教。有时我们三个学生决定下午去看电影，就让杜融融给她舅舅打个电话，说我们看电影，你来了没人上课。这样就停一次课。

访：理论力学是必修课吗？

丁：记不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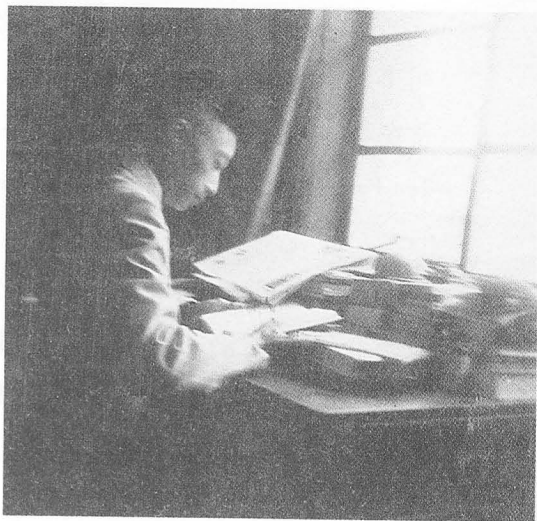
访：当时和您在数学系同年级的只有您和杜融融两个人。杜融融后来怎么样了？

丁：她是天主教徒，解放后不久，《人民日报》点过她的名，说她是国民党特务，被关了一段时间。在大学期间，她曾和化学系的一个同学谈恋爱。解放后，她男朋友去了美国。后来别人跟我说：她男朋友的弟弟从美国来假装跟她结婚，然后把她带到了美国。

访：您在大学阶段除按部就班地学习之外，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人或事？

丁：我在数学系念二年级时，认识了蔡元培的小女儿蔡晔盎。蔡晔盎

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因为交大是汪伪的所谓国立大学，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就要对汪管学校的学生进行甄别。为此交大差不多停课一个学期。这时蔡晔盎就到大同大学借读，和我同学了一个学期。另外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大学一年级要学英文，要求学生每周写一篇作文，当堂做，一个小时内完成。英文作文给我一个很大的刺激，因为每次我的成绩都是 C，而其他同学大都得 A。



1945年丁石孙在大同大学读书时留影

有一次放暑假，我的同学车懋祺到我家。我问他：“你怎么老得 A 呀！”他告诉我，我写的大概是中国英文，不是英国英文，改进的办法是要背一些英文范文。1945 年暑假我就根据他的建议找了一本书，叫 *The Sketch Book*。这是一本很有名的散文集。我每天背一面，坚持了两个月时间。背诵对我的英文水平提高很有好处。大声背诵对解决听力问题也有帮助。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背诵，我觉得看英文资料反应就比较快了。

组织 T-Party 与接触佛学

访：您上大学时，抗战尚未结束，上海是沦陷区。大学生有些什么课外生活？

丁：还是不少的。上大学一年级时，我和几个学生成立了一个组织，叫 T-Party。其中 T 代表 Tea，就是“茶”。当时在大学里，有钱的学生经常在家里办舞会，参加的人要交一些钱，这样的活动叫 Tea Party。当时 Tea Party 比较风行。T-Party 虽跟 Tea Party 的意思相同，但我们反其道而行之，不是跳舞而是讨论问题。

T-Party 这个组织最早由五个人发起，后来逐渐发展到十几个人。五个发起人，除我之外，一个是车懋祺，无神论者；一个叫倪维泉，笃信佛教；另一个姓张，记不清名字了，是基督教徒；还有一个张肇泌，是天主教徒。这几个人都是大同大学电机系同年级的学生。我是什么教也不信。通过张肇泌，我们认得一个匈牙利人，叫 Ladany，是天主教修士，正在徐家汇天主教堂学习。我和倪维泉差不多有一年多的时间，每星期去看他一次。Ladany 会讲英文，很想说服我们信天主教，但最终未果。不过，因为我们谈话用英文，通过跟 Ladany 交往，我的英语水平提高了不少。

T-Party 成立后，我们开始讨论的主要是宗教问题，后来发展成为讨论有神论、无神论，基本没有涉及政治问题。记得 T-Party 举行过一次辩论会，主题是人有没有灵魂。辩论会的程序有点像现在的大学生辩论会。我第一次知道辩论会应该这样举行。还记得当时我站在认为人有灵魂这一边。这些活动现在看起来非常幼稚，但我们当时非常认真。T-Party 还办了个刊物，是手抄的，每人写篇文章，自己抄，然后由车懋祺装订成册，让大家传阅。车懋祺是 T-Party 的主要组织者。我印象中这个刊物办了两三期，但都没有保存下来。我们有时在张肇泌家开会，因为他家里房子大一点。

后来随着学生运动的开展，T-Party 的人员就产生了分化。车懋祺参加了地下党，其他人有的参加了学生运动，有的虽没有参加学生运动，但对 T-Party 也渐渐没了兴趣。后来，这个组织的活动就停止了。

1946年，我和信佛教的倪维泉到一个居士家里学一本书。书名我记不得了，内容是佛教里的唯识宗。我们每个星期去一次，一般是星期天上午去，请居士给我们讲这本书。我记得大概讲了一个学期的时间。这本唯识宗的书大意是把人的意识分成八层，前头六层是人的感官，眼耳鼻舌身是一层到五层，第六层是意志，第七层是自我感觉，第八层是无我。

我当时花了不少时间念这本书，认识到佛教的最高境界是无我。从此我开始信仰佛教。虽然这本书的具体内容慢慢地就忘了，但是我认为读这本书对我的思想还是有影响的。一方面，这为我后来接受佛教的禅宗精神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另一方面，佛教讲究四大皆空，通过信仰佛教我把什么东西都看穿了，什么事情都不计较了。

访：凡事不计较，就能摆脱许多羁绊。

丁：不过，这也有坏处。由于这种思想的影响，我很少啃数学难题。



1945年丁石孙在住所院中锄草

关心政治之始

访：1945年抗战胜利时，您正在读大学二年级。当时学生中有什么反响？

丁：抗战胜利是当年最大的事件。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振奋，高兴得不得了。记得暑假开始时，抗战还没有胜利。一天，我在租界里偶然买到一张苏联文化出版社出的英文报纸，报道美国人在日本投了原子弹，Atomic bomb 这个词就是这个时候认识的。不久，日本就投降了。当时流行一个谜语，用“日本投降”打一个古代人名，这个谜语的谜底有两个：一个是屈原，另一个是苏武。选择不同的谜底反映一个人不同的政治倾向。

日本投降后，美国的飞机就运国民党的军队到各地接收，我们在上海很快就见到了国民党军人。来上海的部队大概是陈纳德^①从之江运来的。对国民党军队的到来，我们一开始很欢迎，大家的情绪也一度非常高。在街上也看到美国兵，开着吉普车。但老百姓的情绪很快就由充满希望转为失望。因为抗战胜利后，人民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并且接收大员大肆贪污。我个人是抗战胜利半年后，对国民党产生了失望的情绪。在这以前，我不关心政治，也不愿意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访：您开始关心政治后，参加过什么活动吗？

丁：我参加过上街卖纪念章的活动，帮助困难学生上学。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学生组织的活动。我们卖的纪念章是象征性的，在街上看到汽车、三轮车，就拦住让他们买，实际是让人捐几块钱。一开始我还感到不好意思，卖了几天，就习惯了。

访：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年，即1946年，国共两党的内战就打起来了。那时学生对内战有什么看法？

丁：学生们对内战大都是反对的。1946年国统区的大学生多次举行以“要和平、反内战”为主题的学生运动。这年五六月份，大同大学学生

^① 陈纳德（1893—1958），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援助中国抗战的美国志愿航空队（又称飞虎队）指挥官。



1946年大同大学学生集会的场景

会组织了“要和平、反内战”集会。当时学生会实际上是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市市长吴国祯到大同大学做过一次演讲。他试图说服学生，不要搞运动，要安心上课。学生会主席何裕民上台跟吴国祯辩论，结果使吴国祯无法讲下去。何裕民是我家住威海别墅时的邻居。他住在哥哥家，就

在我家隔壁。他哥哥家房子外面挂了个牌子，叫什么商行。我一直以为他哥哥是有钱人，解放后才知道他是地下党。暑假以后，何裕民就不见了。1948年，我到北京才又见到他。

学生会还请吴晗做过一次报告。吴晗当时从昆明西南联大回北京，路过上海。吴晗讲的具体内容我记不得了，好像中心意思也是要和乎，反内战。我还参加了欢送和平请愿团去南京的大游行。上海各界推举了几个人，到南京请愿，我们一直送他们到火车站。对那些人，我当时都不熟悉。现只记得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雷洁琼，一个是马叙伦。我作为一般的学生，进不去火车站，就随着游行队伍走到车站外头。我当时的想法和大多数人是一样的，就是不要打内战，希望和平。

欢送请愿团的第二天早上，就看到报纸上报道了下关事件^①。官方报纸说，是受共产党迫害的苏北难民打了请愿代表。大家都知道，事情是国民党特务干的。国民党报纸歪曲事实。对此我非常气愤。下关事件对我的政治态度影响很大，尽管我当时还很天真，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政府操纵打人民推出的代表这样的事实。国民党政府害怕学生罢课，就强迫我们考试。我印象中考场外站着的都是带着手枪的特务。那时特务的服装很有特点。他们穿的都是美军剩下的黄卡其布军服。

乌托邦读书会

访：您在大学期间是不是参加过一个叫乌托邦的组织？这个组织是什

^① 1946年6月23日，以马叙伦、雷洁琼为首的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去南京国民政府和平请愿时，在南京下关火车站被特务袭击，马叙伦等均受到严重殴伤。史称“下关事件”。

么性质的？主要搞些什么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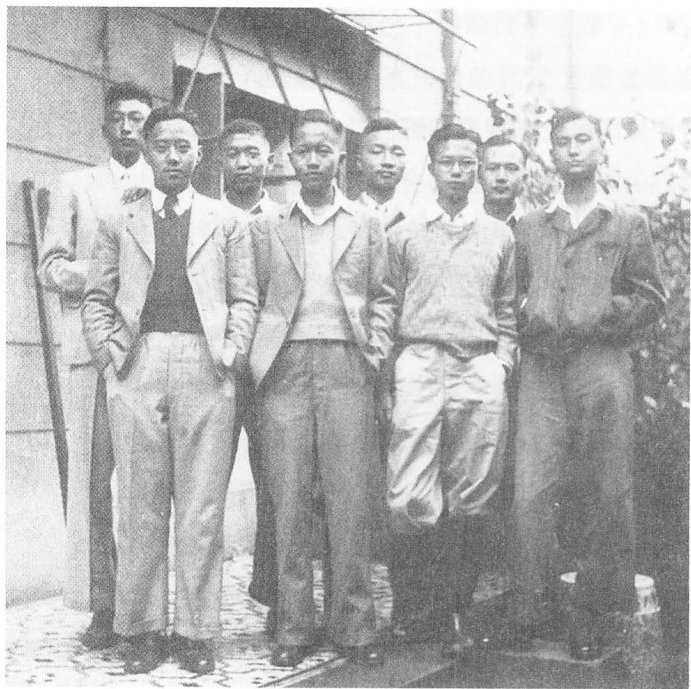
丁：它叫乌托邦读书会。参加这个读书会，害了我一辈子。1946年下半年，大同大学学生自治会被国民党掌握着，那一学期很平静。就在这个时候，我和乌托邦读书会有了联系。这个读书会是我高一两年级的同学组织的。参加的人以电机系学生为主，大约二十几个人。我不清楚他们成立这个读书会的目的，但我知道他们之所以用乌托邦作为组织的名称，是因为大同大学的拉丁文名字是 Utopia，说明这个组织以大同大学同学为主体，并没有特别的含义。解放后，乌托邦这个名字被认为跟托派有关。还有人总把它跟空想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因为我参加过乌托邦读书会，有人就说我政治上有问题。其实这个组织没有任何政治倾向。我不得不再三解释，说只是因为学校的名字叫乌托邦。

访：您怎么和这个读书会联系上的？

丁：1946年下半年的一天，乌托邦读书会在学校里贴了海报，说要讨论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1970）的一本书，叫《宗教与哲学》，希望有兴趣的人参加。我没看过罗素的这本书，就到图书馆借了一本。这本书是英文的。我翻了一下，觉得感兴趣，就参加了这次讨论会。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乌托邦读书会。讨论的具体内容我已经忘了，有些东西我也不太懂。参加过乌托邦的一两次讨论之后，我就发现他们比较推崇英国费边社^①。他们的观点比较接近社会民主党的主张，就是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平等，消灭剥削。乌托邦组织松散，我参加他们的一次活动之后就成为他们的会员了。

访：您还参加了乌托邦读书会的什么活动？

^① 英国费边社（Fabian Society）是1884年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社会主义”团体，由少数具有社会理想的知识青年组成。其重在务实的社会建设，倡导建立互助互爱的社会服务。



1946 年丁石孙(后排左 1)与同学合影

丁：这个读书会起初的活动并不频繁。1947 年，我被选为这个读书会的头。从那以后，它的活动多起来了。

访：您被选作这个读书会的头，说明读书会成员大都认可您的领导才能。

丁：不完全是这个原因。原因之一是那时候学校把我开除了，我在家里闲着，没什么事干。那次选举是在复旦大学的校园里举行的，是乌托邦读书会的全体成员会议，选出了五人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的头是我。五人小组里有沈鹤巢。他是震旦大学法律系的学生，晚上在上海国际饭店打工。还有叶庆澄和其弟叶庆桐，叶氏兄弟是乌托邦读书会的创始人。还有

一个叫钱美丽。她是上海国际饭店的接线生。她的姐姐是电影演员慕容婉儿。慕容婉儿嫁给了电影演员舒适。

乌托邦读书会的这次改组实际反映了内部两种思想的斗争。一种是代表乌托邦早期成员的思想：不太关心政治，甚至远离政治，做一些纯学术的探讨，比如前面讲到的对费边社思想的研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思想倾向是右的。另一种是激进一些的，比较关心现实政治。我正热心于参加学生运动，思想属于后一种。五人领导小组中是三比二，我跟沈鹤巢、钱美丽代表激进一些的思想倾向，叶氏兄弟代表右倾一些的思想倾向。

访：您被选作这个读书会的头后开展了哪些工作？

丁：我们成立了几个小组。一个是政治思想小组，由我负责，定期讨论一些政治思想问题。现在我已不能确切记得讨论过什么问题，但记得念过张东荪的几本书，如《思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等。我们当时的思想受《观察》杂志影响较大。还有一个生活小组，负责人叫姚铭生，是复旦大学学生。这个小组讨论的问题比较杂，有时讨论一些人生观的问题和我们碰到的一些生活问题与家庭问题，有时也讨论看过的电影。当时的电影内容大多是揭露旧社会的黑暗。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小组，叫语言小组。这个小组由沈鹤巢负责。沈鹤巢年纪比我们大，懂很多种语言，也懂很多方言。他似乎对语言学有些想法，想创造一种拼音，能够适应多种方言。他的想法很新颖，吸引了很多人参加。而且，他找到了很多规律，向我们说明这条路可以走得通。实际上，他的想法要实现还差得很远。不过，后来他搞成了一个拼音方案，可以用三位数字把所有音都拼出来。他自己花钱印了个小册子，介绍这个方案，让我们学。有一段时间语言小组的主要活动就是宣传这个方案。当时他想取得有势力的人的支持，还到南京去推广这个方案——是我

跟着他一起去的。从后来的事情看，他有点小聪明，喜欢吹。解放后，他曾到大连教俄文。由于自认为才能在那里没有得到发挥，就又到了北京，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后来因生活问题，他坐过监狱，于“文革”后去了美国。

当时，这几个小组定期搞些活动。由于那段时间我没事干，一个人住一间房子，所以我的家就变成一个活动基地。我还把丁永宁和她的两个同学拉进来参加乌托邦。她的两个同学，一个叫顾方颖，另一个叫蒋涵碧。她们三个外语都学的是法文。那时有人想学法文，于是就又成立了一个法文小组，请顾方颖每周来教一次，一共学了几个月。从这里看，乌托邦读书会的组织是很随意的。这三个人都是学医的，但只有顾方颖一个学到毕业。

访：这三个人后来都干什么了？

丁：顾方颖后来在北医三院当支部书记、妇科主任。蒋涵碧解放后参军到了西南，跟一个老干部结了婚，现在住重庆。丁永宁解放后参加部队组织的消灭血吸虫病的工作。她因为工作积极，受到表彰。1950年，她作为华东区的学生代表到捷克布拉格参加世界学联大会，从此她就离开学校了，没有继续学医。因为这次活动，丁永宁的生活道路改变了。她在布拉格开完会，碰到了我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那时懂外文的人很少。他发现丁永宁懂法文，而法文和罗马尼亚文很接近，就把她要到了驻罗使馆。大使好像找了一个家庭教师，教丁永宁罗马尼亚文。从此她就成了翻译。罗马尼亚国家元首访问中国时，她担任这位元首和毛泽东的翻译。这位元首是文学家，也是党外人士。他回国后写了一本书，谈到了丁永宁。

访：乌托邦读书会一般在什么时候开展活动？

丁：很多活动都是在周六、周日。我们的周末几乎完全被这些活动占

了。当时我们开展活动既不为名，也不为利，讨论的大多是些不切实际的问题，从未打算从这些讨论中得到什么。记得乌托邦读书会还办了个刊物，大概是八开纸的油印小报，半个月出一次，名叫《半月》。我们这些人写了什么东西就登上去。油印小报的负责人叫吕俊民。他是大同大学化工系的学生，相当于主编，还负责刻蜡纸。另外，有一个管印刷和发行的人，叫徐德钊。他们两个负责把小报印好，并寄到每人家里。我家里还布置了一个小型图书馆，大家有空可以来看书。当时这些活动搞得还很像样子，各种琐碎的事情都有人干。

访：您当了头后，乌托邦读书会进入了一个比较好的发展时期。

丁：确实如此。不过，当年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怀疑过读书会是一个有倾向性的政治组织。记得1948年，乌托邦读书会里突然新加入了一个人，叫马星寒。他是谁介绍的，我记不得了。马星寒给我们的印象很特别。他比较穷，好像也不是大学生。由于他从来不谈他的家庭，我们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他的主张比较左倾。我们的很多活动，他都参加，还发表意见。等到解放后，我才知道他是共产党派来的。共产党派他来了解乌托邦是怎么回事，是什么性质的组织，有什么背景。刚解放时，有人在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见到他。打倒“四人帮”以后，他和我取得了联系，当时他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工作。从派马星寒到乌托邦读书会来，可以看出共产党对乌托邦是打了问号的。

1948年，我参加了转学考试，考上了清华大学数学系。大概在8月底，我离开上海到了北平。我离开上海两三个星期后，乌托邦读书会聚会时，参加的人全部被国民党抓了。国民党也不了解它，怀疑是共产党的组织，还抄了我的房子。因我弟弟每天晚上到那所房子去睡觉，特务把我弟弟带走了。读书会的成员被抓到特务机关，差不多关了两个星期。其中有

些人受了刑，坐老虎凳。当时有个别人受刑不过，就乱说。据我所知，沈鹤巢就招了，但招的事情和读书会并没有关系。他说他的一个朋友在苏联驻上海的新闻署工作，于是这个人也被抓起来，吃了不少苦头。

由于乌托邦读书会跟共产党确实没有什么关系，即使用刑也没问出什么，两周后，他们都被放了出来，包括我弟弟。但每两周他们都要到上海警察局做汇报。听说汇报时倒很客气，用开座谈会的方式。后来国民党发现这个读书会真的和共产党没有关系，也就不再管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乌托邦读书会这个组织，共产党与国民党都不喜欢。当时有朋友劝我，不要搞“乌托邦”，这个组织背景可能比较复杂，说不定有三青团在幕后。我没有听他们的，因为后期我当头，并没发现有什么人操纵。这些劝我的进步同学是好意，对我个人是信任的。他们很多人去解放区之前，都来和我告别，相信我不会出卖他们。

访：这次被抓后，乌托邦读书会是不是就衰落和解散了？

丁：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清华大学的许多上海来的学生想回去看看。所以那年暑假津浦路一通，就有一大批学生回上海。我当时是清华大学学生会的副主席，学校就让我当领队。我们乘津浦路通车后的第一列车回到上海。火车一共走了96个小时，四天四夜，人困得不行，也脏得不行，到后来在任何地方倒下都可以睡着。那时火车总停，一停就是十几个小时。

回到上海，见了很多老同学。我在上海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家开了一个乌托邦读书会的全体会议，讨论乌托邦是不是还要继续存在下去。我记得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主张解散。我坚持这种意见，理由是蒋介石已经打倒，我们并没有跟共产党不同的目标，没必要继续存在，以后就是各干各人的事情，用不着再成立什么组织。另外一种，我们过去

也反对过国民党，今天没有解散的必要。讨论的结果，我的意见占了上风，所以乌托邦读书会就此解散。后来，读书会的这些朋友在很长时间里都有联系，但组织不存在了。

访：您和这些朋友后来有过聚会吗？回想当年的活动，一定有很多感慨吧！

丁：有过聚会。1995年，我去上海时跟乌托邦读书会的朋友聚过一次。那年正好是读书会成立50周年，大家谈得很开心。2005年，我到上海时又请乌托邦读书会的朋友吃了顿饭。参加的有叶庆桐夫妇、吕俊民夫妇（从大连赶来），还有姓陈的夫妇（从南京来），以及钱美丽、徐德钊。从这次聚会看，乌托邦读书会的人越来越少了，已经死了好几个。丁永宣^①突然提出，她还记得乌托邦的歌，她唱了一下。这首歌用的是《欢乐颂》的调子，吕俊民填的词。歌词是：

不畏艰苦，不怕失败，同心共建乌托邦。思想自由，即知即行，树立明灯，放光芒。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踏实。策励品德，贡献人群，长期互勉，毋相忘。

参加乌托邦读书会，是我解放前在上海参加的一个主要活动。那时我对《欢乐颂》有比较深的印象，后来很长时间我喜欢听《欢乐颂》与此有关。

被捕与失学

访：您刚才说1947年您被大同大学开除了。能谈谈前因后果吗？

^① 丁永宣是丁石孙的堂妹。

丁：说来话长。首先，要从我进入大同大学学生会讲起。当时学生会每半年改选一次。大同大学的地下党想把学生会的领导权从国民党手里抢过来。我所在的班由数学、物理、化学三个系的同年级学生组成，我被推举为班的代表参加学生会选举。负责组织的同学大概觉得我还比较可靠，我家的房子又比较大，就跟我商量，要在我家里开个预备会。我当时并不知道谁是地下党。一天下午，大概二三十个人，在我家里开预备会，经过讨论拟定了一张新的学生会成员名单。1947年初，学生会改选，这个名单上的人都选上了。

访：改选以后，学生会是否就由地下党领导了？您在学生会任什么职务？学生会组织过哪些活动？

丁：对，改选之后学生会就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了。这一届的学生会主席叫陈广德。事后我了解，他还不是地下党员。有个副主席叫胡宁生，是地下党员。胡宁生后来去了解放区，不久就病死了。学生会里有委员十几人。生活委员是田振邦。他后来也去了解放区，改名林华轩，解放后一直在中联部工作。田振邦当时就是地下党员。我和车懋祺是宣传委员。车懋祺当时可能已经是地下党员了。我负责的工作是出壁报。那时出壁报的办法很原始，先用稿纸抄好，然后贴在大纸上。壁报一两个星期出一期。出壁报的前一天晚上，参与这项工作的同学到我家里来，把几篇文章贴在大纸上，第二天带到学校贴出去。我记得机械系的孟惠荣跟中文系的女同学章聿新参加过出壁报的工作。孟惠荣负责美工，后来转学到燕京大学，解放后在北京钢铁学院工作。章聿新一直在大同大学念到毕业。

学生会有时会组织一些活动，像春游。记得我们去过无锡，游了太湖和鼋头渚。学生会做的比较大的事情是为一些生活困难的同学提供免费午餐。午餐来自美军剩余物资。学生会派人到联合国救济总署领来剩余物

资，每天中午向生活困难的同学发放，差不多每天都有一些固定的同学在那里吃。我想，这可能也是地下党团结同学的一个办法。

学生会经常在学生吃饭时放音乐，基本上都是革命歌曲，学校当局不准，学生会就跟校方发生了冲突。这其实是导火线。大概在1947年5月份，地下党要发动学生罢课。当时在一些大城市，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大同大学的地下党为了配合全国的这个形势，想找个茬搞罢课。学生会在地下党领导下就抓住这个机会宣布罢课。罢课的理由是要改革校政，认为学校太腐败，管得太多，管得不对，吃饭放点音乐也要管。

访：这个理由好像不太充分？

丁：是不太充分。过了几天，学生会决定派四个学生去南京教育部请愿。这四个人以学生会副主席胡宁生为首，还有我一个，另两个人的名字已经忘了。我们乘火车去南京，住在一个杂货店的楼上，估计是地下党的据点。在南京，我感冒了。我们去找了教育部，我印象中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学生还是很客气的。教育部的人还

1947年丁石孙(后排右1)与同学在火车前留影



说了几句好话，安抚我们。当然，我们的请愿没有任何结果。

访：你们从上海回来后，罢课就结束了吧？

丁：回到上海时，学生还在罢课。我们向学生会汇报了在南京的情况。第二天上午，我们几个学生会的人正在开会时，三辆吉普车拉来了一批打手，要对我们动手。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大同大学就一个校门，逃跑很困难。我们只好散在同学们中间。打手们进来把学生会一个办公室砸了，然后到处找学生会的干部。有反动同学认得我们的，就指出来让打手们抓。我混在学生中间，听见人们说某某被打了。也有个别学生起来反抗，大声喊：“同学们看，打手们在打人！”

国民党有一帮复员的空军。这些人身体特别棒，专门充当打手。有一个学生会的干部当时就被打倒在地。等到他们打得砸得差不多的时候，来了两个警察。有一个三青团的人，指着我说：“他是打手，把他抓走。”警察就把我带到江宁路警察分局。警察分局也没准备，把我们带到二楼的一个办公室里关起来。学生会干部大概有 11 个人被抓。到了分局我才知道，学生会干部中的地下党员比较有斗争经验。他们知道这件事情不是警察负责的，就在半路上塞点钱，被放走了。田振邦、车懋祺都没有被抓进来。

访：你们被抓到警察局后，警察对你们的态度怎样？你们吃了不少苦吧？

丁：在警察局里，警察对我们还比较客气。我提出家里还在等我吃午饭，要打个电话告诉家里。他们也答应了。到了下午一两点，同学们知道了我们关在什么地方，就来了很多人包围了这个分局，要求放人。我们在楼上看见一些学生在外面喊口号，还派了代表进来交涉。我小妹妹也跟着我的同学到了警察局的外面。我在上面向她喊：“我今天回不了家了，带本书给我看，带一本郑昕写的《康德哲学》。”国民党并不跟学生直接对

抗，他们采取欺骗的手段，说正准备放人。等到四五点钟，有个人进来通知，要放我们走，让我们一个一个地出来。其实外面已经准备好了。等到我们一下楼梯，两个警察抓一个，把我们装进了警车，从后门把我们拉走了。等同学们发现的时候，我们已被转移到了卢家湾分局。

到了这里，警察就让我们解开裤带、鞋带，关到了地下室里。我们11个人分了6间房，门都是铁栅栏。这个地下室是专关小偷的监牢，脏得不得了。晚上我们没吃饭就睡觉了。每个人给了一条毯子，感觉还不太冷。第二天我们向看守要东西吃时，看守说：这里的饭太差，没法吃，你们每个人出点钱，我们让附近小饭馆的人给你们送饭。到中午的时候，饭馆里的小伙计就送饭来了。

我们通过送饭的小伙计，把我们关在卢家湾的消息传了出去。下午，我们在地下室里听到同学们来了，他们唱着歌，唱的是《团结就是力量》。我小妹也来了。同学们要求放人，还买了很多面包、汽水送给我们。他们还提出一个要求，把我们这11个人关在一个屋里，警方答应了。我们有了吃的、喝的，在一起谈得很高兴。大家估计很快就会被放出去，就商量出去以后怎么干。到晚上11点，警察进来说准备放我们，让我们出去。可又是出去一个抓一个，把我们装进囚车，转移到了特务机关。

访：这些警察够狡猾的。到特务机关后，你们怎么样了？

丁：特务机关设在一所很高级的别墅里。我们11个人被分成几部分关押。我和几个人被关在车库里。车库门打开的时候，我们发现里边已经关着几个我们不认识的人。他们可能是别的学校的学生。车库是水泥地。第一个晚上，我们把被子放在当中，上身躺在被子上，腿放在地上睡觉。车库很小，墙角有一个桶，供人大小便。门上头有两根铁栏杆，站起来可以看到外面有带手枪的便衣走来走去。我们每天被指定由一个人出去倒马

桶，一个人出去拿饭。后来陆续抓来了新的人，最多的时候车库里关了10个人。我们之间不敢说话，因为搞不清关在一起的人是真的学生还是特务。提审都是在夜里，每次他们喊一个人出去。我被提审过一次：有人把我从车库领进一间很漂亮的洋房的客厅，里面坐着一个人，他还比较客气，让我讲一讲罢课的过程。我就把罢课的表面的事情讲了讲。他们大概对我们也有所了解，知道我不是主角。我讲了一个多小时，等我讲完就让我回去了。看来特务对我们是区别对待的。

有个和我关在一起的同学，叫崔秀全，是我们学生会里比较主要的人物。我当时感觉他是地下党员。记得他被提问之后还让他写材料，我就没写材料。那时没有严刑拷打，都是很客气的。我印象中在这里关了差不多五至六天。有一天下午，天快黑了，我们突然被叫出去，眼睛被蒙上，上了汽车。等到蒙眼布被揭开，我们发现又回到卢家湾分局。这时警察就告诉我们，明天家长来接我们。

访：第二天是谁来接您的？放你们之前，警察还要你们办什么手续吗？

丁：来接我的是父亲。在放我们走之前，警察让每个人填张表。我现在已经记不得所填的内容了，只记得其中一条是问出去以后还参不参加罢课。我填不参加罢课。“文革”中，造反派针对此事曾让我交代是不是写过悔过书。我说没有，只有这么一个问题，没让我悔过。回到家的当天晚上，田振邦就来看我，显然地下党消息很灵通。他来看我的目的是了解一下关在里面的情况。

我记得那时父亲怕我出来之后，学生会还要不断地来找我，就决定让我在第二天从上海回镇江老家。其实这时在镇江我们已经没有家了，我就住在我父亲的表弟家里。这个人叫李承璋，我记得在他家里住了差不多有

一个月。罢课到这时已结束。我回到上海才知道大同大学把我开除了。这次一共开除了六七十个学生。

访：被大同大学开除后，您就失学了。您父亲为此事肯定很着急。

丁：当时被开除的学生的家长联合起来，准备跟学校打官司。我父亲他们还开过会，想请律师。当时想请的律师是章士钊。这事后来不了了之，因为牵涉到政治问题。我失学后，父亲不想在上海住了，把家搬到了苏州。我和大妹妹都没跟着走。我不愿走的原因是朋友都在上海。父亲专门为我租了一间房，在吕班路和复兴路口交叉的地方。这之后有一年时间，我在上海独住一间房。我大妹妹已经上了震旦大学，念医学系，住校。我弟弟也回到上海，住在祖父留下来的天福南货店。当时跟我父亲去苏州的只有我的小小妹妹，还有我父亲的一个舅舅。

访：您自己生活，有经济来源吗？

丁：1947年上半年到1948年上半年一年的时间，我的生活比较紧张。父亲对我被学校开除有些意见，认为花钱让我上学，我不好好上。既然已经不上学了，房租又是由父亲出的，生活费自然不好意思向他要了。我自己想办法赚钱。我找了一些临时性的工作，教过一段时间的小学。小学教的是复式班。

访：复式班？我们对它不太了解。

丁：复式班就是一起教两个年级。教这个年级时，让另一个年级的学生做习题。我教的是五年级和六年级。学生有十来个，教了不到一年。当时的收入可以维持生活。此外，我还做过家庭教师，还在正规的中学代过课——这个中学叫育才中学，因高三年级一个老师生孩子，让我代她上三个月的课。我从中赚点零花钱。

我当家庭教师并不是从这次被开除后开始的。大学二年级时，也就是

抗战胜利以后，我第一次当家庭教师。那时是教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这个孩子其实什么也不会，我的任务就是帮他做作业。我不仅帮他做数学作业，还帮他做世界地理、世界历史的作业。当时使用的教材都是英文的。我后来形成了一个观念：大学生做点家教，维持生活，不仅可能，也是有好处的。做家教好像并不影响学习。刚解放时不提倡学生做家教，也不主张学生赚钱。从我的经验看，做家教对学生是个锻炼。

访：您吃饭是自己做，还是花钱买？

丁：我吃饭是打游击。每天上午到父亲在天福店里的办公室去念念书，中午在那里吃一顿饭。下午到几个同学家里做家庭教师，教他们弟弟妹妹英文。同学家一般是不给钱的，而是招待一顿晚饭。有时也跑到亲戚家里吃顿晚饭。就这样，我在上海混了一年。

访：您失学后是否还在读一些数学专业书？

丁：在上海失学的一年里，我基本上没念数学，读的都是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我花时间主要念了两本罗素的书。一本是《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英文书名是 *Our Knowledge of Externer World*。这是罗素早期的一本关于实证主义哲学的著作，我对它印象比较深。另外一本是《西方哲学史》。这本书是我写信从美国邮购的，每天看一段。通过读这本书，我对西方哲学的历史有了个大概的了解，更重要的一个作用是丰富了我的英文词汇。

我还看了冯友兰的《贞元六书》和其他哲学方面的著作。由此，我对宋明理学有了些了解，并对中国的禅宗产生了兴趣。我看过一本书，叫《六祖禅宗》。禅宗实际上是中国化的佛教。我理解它的核心思想是，真理是不能说的，一说出来就不是真理。我记得有个故事是讲一个修道的和尚。师傅问他，月亮在哪里，他用手指天上的月亮，师傅用刀把他的手给砍了。意思是你看到的不是真的月亮。

访：《六祖禅宗》这本书主要讲了什么？

丁：这本书讲怎么继承衣钵。五祖想找一个继承人，把学问传给他。他向大弟子提问。大弟子用几句诗作答：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站在旁边的六祖当时还不是五祖的弟子，是打扫卫生的。他答道：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五祖晚上就把他叫去，把衣钵传给了他。

访：通过这本书，您对禅宗了解到什么程度？

丁：我对禅宗的了解并不深，只是从一些书上慢慢了解它的一些思想。禅宗并不主张人出世，而是主张以出世的思想入世。就是说，你还可以过平常人的生活，但很多事情不要看得那么重。这个思想对我后来有一定的影响。当时我虽然读了冯友兰的书，但对他并没有好感，因蒋介石尊他为国师，我感觉他是御用文人。

访：您被大同大学开除后有没有考虑继续到其他大学读书？

丁：我想过，但没有马上去报考。当时有个教师告诉我，说我不可能再报考南方的学校，因为每个学校都有一个黑名单。1948年，我决定报考北方的大学。我报考了两所学校：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我都考取了；有人告诉我清华比燕京好，所以选择了清华。实际上，我当时并不知道清华在全国的地位。1948年8月我转学到了清华数学系。

访：抗战前北平学生中流行一句口头禅：“北大老，师大穷，唯有清华可通融。”^①言中之意，在这三个学校里，北大老习惯、旧习气较重，北师大最穷，清华境况最好。也许，您选清华还是不错的。您到清华该读四年级了吧。

^① 徐靖方：《北大老》。刊于北大学生会三十五周年纪念筹备会出版委员会编：《北京大学三十五周年纪念刊》。北平：北京书局，1933年，第1页。

丁：尽管我在大同大学已经读过三年级，但当时有个规定，转学不能转到四年级，所以到清华以后又重读了一次三年级。

访：转学到清华是否还需要大同大学出具学历证明？

丁：需要大同大学教务处开一个正式的转学证书。证书要把前三年的成绩都写上。记得我到大同大学开转学证书那天，被一伙三青团的人打了一顿耳光，他们还把转学证书扯坏了。

访：当时三青团打人的事经常发生吗？

丁：经常发生。大同大学的三青团成员一般都拿着打棒球的棍子打人。其中有一部分人是当过空军的复员军人。他们上大学基本不念书。打我的人一边打，一边还说你想转到北平继续罢课！因转学证书被扯坏了，自己也不敢再到学校去，就托同学姚曼华帮我到教务处重新领了一份。姚曼华是大同大学哲学系的学生。

访：转学考试的情形如何？

丁：我当时并没有念好数学。大同大学的数学教学比较落后，比如在代数方面，连近世代数都没有教。所以那时我对群、环、域等概念都不知道。现在回想起来，考试时是考了这几个定义的。我碰巧在去参加考试的途中，坐在三轮车上临时翻看一本影印的麦克达菲（C. C. MacDuffee）有关抽象代数的书时才知道它们的。

访：看来您很幸运！



到清华之后，我才懂得什么是数学，发现自己以前懂的东西太少了，比如连分析方面的“连续”这样的基本概念都不知道，跟同班同学的差距比较大。

记得对段学复批判得比较厉害，说他有名利思想，经常催大家写论文，用论文给人施加压力，认为这是他从美国学来的。

《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给我的触动很大。它主要使我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帮助我反思了解放前自己的思想经历。

第 3 章

转入清华大学

报到与入学

访：1948 年 8 月，您转学到清华大学。您是从上海直接到北平的吗？

丁：我先从上海坐船到天津，再从天津乘坐清华大学派来接站的小面包车到北平。那天到清华时已经是晚上。学生会负责接站的同学给我安排了住宿。过了一两天，我才去报到。

访：您带的行李多吗？

丁：我带的行李比较简单，只有一件，不是皮箱，是可以背起来的包。我记得只有一条被子。到清华后，每当晚上冷了的时候，就把棉大衣盖在被子上。

访：从南方到北方的人一般都会觉得北方非常冷。您准备了御寒的衣服了吗？

丁：我准备了长的棉衣，是一件棉袍。

访：您能否谈谈报到的情况？

丁：全校新生都在体育馆报到。数学系在体育馆里摆了一张桌子，桌子旁只有系主任段学复一个人。当时我还不认识段先生，报到时对他的印象也不深。

访：只有系主任一个人！现在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

丁：当时数学系办公室只有两个人，即段先生和一位职员。

访：报到的程序复杂吗？

丁：比较简单。我把录取通知书交给段先生，他让我从各系贴在体育馆墙上的课表中选课，并把我想上的课记下来。课表上列有课程名称和授课教师姓名。过了两天，我把选好的课告诉他，请他看看选的课是否合适就行了。因为我有转学单，清华承认我在大同大学的学分，我的学分够多了，可以少选一些课。当时清华选课很随便。学校对学生选课只有两点限制：一个是总学分要达到多少，再一个是专业课学分要达到多少。所选的课中，有几门是必念的，包括中国通史。社会科学类的经济或政治要选一门，我选了陈岱孙的经济学通论。这些课我选是选了，但后来没花时间念，还逃过课，到时候考一下就完了。

访：抗战前数学系的学生在科学馆上课。这时候呢？

丁：还在科学馆上课，一楼是数学系，二楼是物理系，就两个系。科学馆的教室很小，各系同年级学生一般一起上课。当时数学系学生很少。我那个年级算是多的，有六七个人，除我之外，还有曾肯成、裘光明、梁凡初几位。比我低一届的只有董怀允和林建祥两个人，比我高一届的记得

有胡潮华。^①

访：您入学后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丁：一般是早晨上课，其他时间自己看书，一日三餐在食堂吃。当时食堂是学生自己办的，由学生成立的膳食委员会管。学校有个总务处跟膳食委员会联系。

访：这跟西南联大类似，也是学生管食堂。徐利治说过西南联大的学生做很多事，包括办食堂、成立膳食委员会。而解放后大学食堂都是由学校办了。解放前大学生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比较强。

丁：对，是这样的。

访：徐利治跟我们说过西南联大有供给贫困学生的贷金，但贷金不直接发到学生手里，而是由膳食委员会保管。您到北平时，清华有贷金吗？

丁：没有贷金。

访：您上清华时要交学费吗？

丁：不交学费。不只清华这样，那时国立大学都不要学费。

访：那时您的生活状况如何？

丁：还是比较拮据的。虽然不交学费，但吃饭要钱。我个人还抽烟，这也要花钱。当时家里跟我断绝了关系，我父亲不给我接济了。他讨厌共产党，说你要闹学生运动，就不给钱。好在我在上海威海别墅的邻居也到了北平，我时常找她接济我几块银元，维持生活。

① 丁石孙此处的回忆跟实际情况略有出入，原因是当时清华数学系学生转系或因特殊情况调动的很多。据比丁石孙晚一届的林建祥回忆，他本人所在的那届学生入学时约 30 人，但二年级时因转系等只剩 7~8 人，三年级是 4 人，到四年级又有两位调国防部门，只剩他和董怀允两人了。丁石孙这届数学系同学共 10 人：丁石孙、曾肯成、裘光明、应制夷、卞国琨、刘铁生、梁凡初、刘燧初、陈德问；其中梁凡初因做团的工作，自己要求晚一年毕业。比丁石孙高一届的共 4 人：胡潮华、钱敏、严又光、曾繁轸；其中曾繁轸又因故晚半年毕业。因此，比起上、下两届，丁石孙所在那届学生算较多的。

访：您跟这位邻居很熟吗？

丁：这位邻居叫张廉瑜，在大同大学念过书，年龄比我大。我刚到北平时基本上没有熟人，唯一认得的人就是她。她已经结婚，丈夫姓窦，我喊她窦太太。后来她离婚了。张廉瑜有个堂妹叫张廉云，是上海复旦大学的毕业生。张廉云在府右街椅子胡同办了一所小学，住址也在那儿。张廉瑜离婚后，没地方去，就跟张廉云住在一起。由于我刚到北平没有其他熟人，就经常到她们那里玩。从清华到城里不方便，每天只有两班校车，早上一班，中午一班。我出来都是乘早上的校车，晚上七点前回去。我慢慢发现，张廉云办的这个小学，是共产党的一个联络点。张廉云是张自忠的女儿，也是共产党员。她大学毕业后，共产党指派她到北京办一个小学。她后来参加了民革。

访：您刚才说您抽烟，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丁：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在大同大学就抽了。我抽烟斗。烟丝是美国的，比较贵。我到清华后，老师和同学因为这点都觉得我很奇怪。比如曾肯成就老笑我抽烟斗，说我很特别。这也不怪他，当时清华数学系只有我一个人抽烟斗，全校抽烟斗的人也很少。不过，不久我就改抽香烟了。一是因为没钱了，二是因为抽烟斗用的烟丝原来是来自美军的剩余物资，解放后也没有了。

访：老电影里好像抽烟斗的非教授、艺术家或资本家莫属。您当时还是穷学生，确实很特别。您到清华时还有没有给您留下印象深刻的事？

丁：入学后体检时，医生说我有肺病。学校就安排我住到了肺病宿舍。这样，我跟同班同学都不住在一起。我记得肺病宿舍在善斋三楼，有的是四个人住一间，我这个宿舍住两个人。肺病学生有个专门的食堂。学校为了尽量让我们吃得好一点，给我们每人每天半杯牛奶，其他同学是没

有的。我们有肺病的学生每周都进趟城，去做治疗。

访：做什么治疗？为什么只给半杯牛奶？

丁：打气治疗。就是用气把肺压瘪。牛奶钱是学校出的。学校为了省钱，每天只给我们半杯牛奶。由于我有肺病，就免了体育课，逃过了马约翰这一关。马约翰工作很认真，身体特别好，冬天穿短裤、短袖。马约翰在体育界很有影响，确实培养了一批体育方面的人才。他英文说得比中文好，儿子、女婿都是搞体育的。现在看，逃过马约翰的课对我不利的。我从中学到大学，没上过一天体育课。

补课与教师印象

访：您在大同大学和清华的学习有什么不同？

丁：到清华之后，我才懂得什么是数学，发现自己以前懂的东西太少了，比如连分析方面的“连续”这样的基本概念都不知道，跟同班同学的差距比较大。这一方面是因为大同大学数学系教学水平不高，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在大同大学没好好念书，光搞学生运动了。所以，我决心花长时间来补课。

访：您补了多长时间？通过什么方式？

丁：一直坚持到毕业以后，有一两年时间。通过自己读书和听课这两种方式补课。我重点读了数学分析方面的书。因为我喜欢抽象，以前对数学分析不感兴趣，没有把它学好。这是我个人学习上的一个很大的弱点。

访：您的论文并不多，但大家认为您有学问。是否跟这一两年的苦读有关？

丁：我在清华安心读了一两年的书，确实对我提高学术水平帮助很大。当时为了好好读书，我连青年团（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都不参加。1948年12月，经过同宿舍土木系的同学何广讷介绍，我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国人民民主青年同盟，即民青。1949年上半年，民青成员可自动转入青年团。当时我拒绝，表示我不入团。清华地下党的领导何东昌的夫人李卓宝为此事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不同意转。我说：道理很简单。我在大同大学参加学生运动，是要打倒国民党。现在国民党被打倒了，我的目的达到了，该专心念书了。李卓宝是理学院的负责人，院系调整之后她任清华的团委书记。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要集中精力念书。

访：据我们所知，1948年8月您入读清华前，数学系师资较为短缺，因为华罗庚、陈省身、赵访熊、杨武之、曾远荣等教授都不在系中任教。您到的时候，情况已有所改观。那时系中共有几位教授？您听了哪些课？

丁：我到清华时数学系在系里为学生开课的只有两位教授，一位是段学复，一位是闵嗣鹤。另有陈省身的岳父郑之蕃为外系学生开课。华罗庚、赵访熊都还在美国。段先生是代理系主任。在他之前，是赵访熊担任此职，系主任是留给华罗庚的。我到后不久，杨武之从昆明师范学院回到系中教初等数论。他讲课的特点是很慢、很清楚。1948年12月13日上午，杨武之上完课后进城，搭乘蒋介石派来接梅贻琦等人去南京的飞机去了上海^①。此后我就没见过他。

访：据杨武之的回忆，清华因为有人提出他坐过“撤退飞机”随梅校长一起离开清华就不再聘用他了。杨武之对此事很伤心，说“我在清华服务

^① 杨武之是1948年12月21日搭乘飞机离开北平的。杨武之先到昆明，后于1949年3月2日赴上海。见杨振汉：《父亲的回忆》。收入清华大学应用数学系编：《杨武之先生纪念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9页。

十六年的成绩似已一笔勾销了”。而且他还说：“我自忖没有做任何事对不起清华，我不觉得我曾经得罪过人，我当然更没有什么事对不起共产党的，唯一的问题可能就是坐过‘撤退飞机’，而事实上我是回昆明接家眷，不是随梅贻琦去台湾的。”^①

丁：他坐“撤退飞机”与政治没有关系，是为了接家眷，怕解放后与家人难以联系。而后来清华的领导人认为他跟国民党跑了，不让他回来。

访：您到清华后，除听了杨武之的课外，还听了哪些课？

丁：听了段学复的伽罗瓦理论，以阿廷（E. Artin）的那本关于伽罗瓦理论的小册子做教材。我印象中他每次上课都带一大摞参考书，讲课时会翻看这些书。因为他的眼睛不太好，翻看参考书时离得很近。段先生的课讲得不太好，很多时候是照本宣科，但板书还可以。

访：一般来说，照本宣科很难把书的精华讲出来。那您学的效果怎么样？

丁：我没有读懂阿廷的这本小册子。它光讲简单的逻辑，没有习题。段先生会给我们留一些，但留得也很少。当时段先生也没有把伽罗瓦理论的实质讲清楚。学完这门课，我对伽罗瓦群的具体例子一个都不知道。过了很多年，我通过自学才把伽罗瓦理论弄懂。

访：您还听了其他哪些课？

丁：我还听了闵嗣鹤的复变函数。闵先生是从北师大毕业的，是傅种孙的学生。当时我们这些学生比较狂妄，不知闵先生的学问有多大，对他讲的课不感兴趣，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事后，我才知道闵先生很有学问，我的看法是错的。在几何方面，我听过吴光磊的射影几何。当时清华

^① 杨振汉：《父亲的回忆》。收入清华大学应用数学系编：《杨武之先生纪念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0~71页。

教几何的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吴祖基，一个是吴光磊。吴祖基是讲师，吴光磊是教员。那时清华教师里边比助教高但比讲师低的职位叫教员。尽管吴光磊是教员，但水平还是不低的。在射影几何课上，他讲过如何从几条简单的公理，推出域的概念。他讲课非常简练，思想非常清楚，逻辑非常严格。学生很容易接受，也很容易记，而且记得很牢。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吴光磊和我都调到北大数学力学系任教。记得1960年，北大组织批判所谓学术权威，经领导研究，批判的对象是吴光磊。一开始大家还不理解为什么要批判他。后来才知道，原来系领导有一个奇怪的逻辑，说吴光磊讲课讲得太好了，太好了就必须批判，批判了才能使他知道怎么再讲得更好。

吴光磊做学问有个特点：学一个东西，一定要学深；懂一个东西，一定要懂透。我转到清华后，大家谈论比较多的是哥德尔（Kurt Gödel, 1906—1978）不完全性定理。有人告诉我，清华园里真正懂得这个定理的只有吴光磊。1972年陈省身第一次回国访问，曾向我问起吴光磊在干什么。这说明陈省身对吴光磊印象很深。我后来又了解到，1947年3月陈省身从上海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筹备处到清华开课后，吴光磊跟陈省身学过半年。应该说，当时真正理解陈省身对几何的主要贡献的，吴光磊是一个。还有一件事能说明吴光磊很有学问。1965年，苏步青主动跟吴光磊提出，下半年能不能到复旦大学讲一学期课。当时复旦大学在几何方面的研究很强。苏步青之所以邀请吴光磊，很可能因为他发现吴光磊懂的几何在当代几何中比较重要。不过，因为“文革”很快就发生了，这件事没办成功。

访：1950年初，华罗庚由美国回到清华执教。跟他一起回国的程民德

被聘为清华数学系教授。您听过他们两位的课吗？

丁：都听过。1950 年上半年，华罗庚开了一门课，叫矩阵几何，讲了差不多一年半。他的助教是万哲先。华罗庚讲这门课的目的是想写一本书，叫《典型群》。若干年后，他跟万哲先就把这本书写出来了。华罗庚讲这门课时有了题目和章节，但书的细节还没有想好，就一边讲一边构思。他讲课经常会讲不下去。遇到这种情况，他就会说我证不出来了，你们证一证。我想这对我们学生是一个很好的培养。通过上这门课，我对矩阵技巧的掌握有一定提高。

访：华罗庚非常熟悉矩阵技巧。他讲的这门课考试吗？徐利治先生跟我们说过，华罗庚在西南联大时不重视笔试，期末凭平时的印象给学生分数。1950 年从美国回到清华任教时，华罗庚已经很有名了。您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华罗庚的情况吗？

丁：这门课不考试。我第一次见到华罗庚的情况是这样的：有一天我到系办公室去办事。那时系办公室很简单，只有系主任办公的一间房子。我跑进去，华罗庚坐在里面。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当时非常得意，因为他只用初等数学方法就证明了射影几何的基本定理，并且只用了一页纸的篇幅。过去人们用了很多高等数学的知识，证出的只是特例。后来我才知道华罗庚只用了很简单的一个公式就证出来了。他的证明现在一般称作华氏定理。

访：程民德开的是什么课？您学得怎么样？

丁：1950 年下半年，程民德给我们开了一门课，讲法国布尔巴基学派的一本名叫 *Uniform Space* 的书。由于他到清华后有一个错误的观点，就是认为数学系的学生水平比较高，就讲一些非常新的东西。于是他就挑了这个法国最新出来的概念讲了一个学期。我也选了这门课，结果什么也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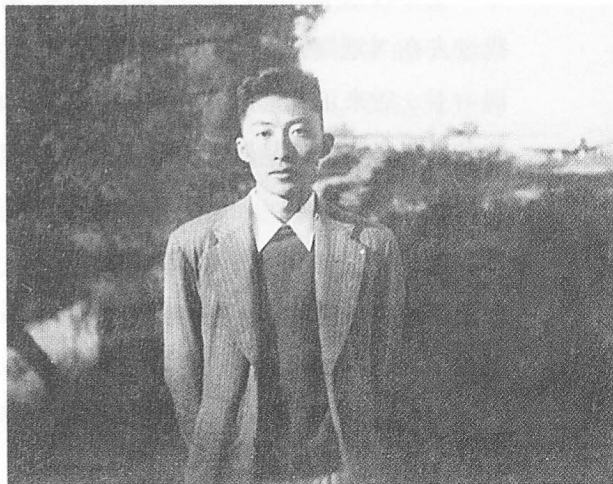
学懂。程民德讲的也不是他擅长的东西，他自己可能也没懂。后来他跟我讲，他把清华数学系的学生估计得高了。

访：1948年初，由于师资短缺，段学复曾聘请北大数学系许宝騄、申又枨、庄圻泰等教授到清华数学系兼课。您到清华后还有北大的教授到清华数学系兼课吗？

丁：还有。1950年段学复要我们学一门代数数论，专门从北大数学系请了一位刚从美国拿了博士学位回来的教师，叫王湘浩。当时清华数学系教授还是比较少，有些课开不出来，只能从外面请人来开课。王湘浩讲课很清楚，讲得很好。每次来讲课，他都在衣袋里装一个小纸条，能讲3个小时。听王湘浩讲课，是我第一次接触代数数论。这门课结束后，王湘浩用口试的办法考学生。可能觉得我回答得比较清楚，王湘浩给我的分数比较高。

王湘浩来之前，段学复给我们讲过他的故事，主要讲他的博士论文是怎么做的。王湘浩在美国的老师是我已经提到过的非常有名的代数学家阿廷。阿廷不但是一个非常好的代数学家，而且讲课很清楚，逻辑极其严谨。王湘浩跟他学代数时，阿廷指定他看一篇文章，一篇很经典的文章。阿廷已经讲过十次以上其中的内容。王湘浩在念的过程中发现这篇文章有错，并可以

1949年丁石孙摄于北京



举出反例。这使数学界非常惊讶。过了两三天，他又告诉阿廷他已经改正了文章中的错误，并说应该加什么条件，这篇文章就完整了。听罢，阿廷就对他说：你的博士论文已经完成了。后来在文献上，这个定理的名字后面加上了个王字。1983年我到哈佛大学访学，碰到王湘浩的师兄，也给我讲了上面这个故事。1952年，王湘浩从北大调到了吉林大学。他非常刻苦，人品也很好。我听说打倒“四人帮”以后，王湘浩年纪大了，用数学的严谨精神研究《红楼梦》，搞得非常好。^①

选学文科课程

访：您刚才讲的都是数学专业课。在文科方面，您提到过转到清华后选了《中国通史》、《经济学通论》。除了这些课程外，是否还选了其他的文科课程？

丁：转到清华后，我专门去听了一堂费孝通的课。因为他是名教授，我过去在《观察》上看过他的文章，也看过他在社会学方面的文章，想见识一下。后来正式选的有哲学系王宪钧开的逻辑实证论。我过去读过罗素的书。逻辑实证论是罗素哲学思想的延续。王宪钧是维也纳留学回来的，他在这方面是权威。他的课我一共选了两年，用的教材是新出的一本英国哲学家艾尔（Ayer）的著作，解放后我们请他到中国来讲过学。记得第一次上逻辑实证论时，王宪钧问我是哪个系的。因为怀疑我听不懂他的课，

^① 吉林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12月出版了王湘浩著的《红楼梦新探》，其中有六篇专题论文，分别是：红楼梦八十回后的史湘云；金玉姻缘与木石前盟；从荣府内争看贾兰和巧姐；暖香坞的诗谜；论薛宝钗；论薛宝钗及薛氏一家。

他就考了我一个问题，问什么叫解析命题。我就回答了。他大概认为我还懂一点，就允许我听课了。

访：选这门课的学生多吗？

丁：除我以外，还有几个哲学系的，总共四五个人。解放后，所有哲学系的人都不念这门课了。因为他们认为在新社会这样的环境下，念唯心主义哲学是没饭吃的。我是学数学的，念哲学是凭兴趣，觉得这无所谓。到最后，这门课就剩下我一个人选了。清华图书馆里有两本这门课的教材。王宪钧全借出来了。他用一本，给我一本。后来上课干脆就不到教室而是到他家里，每周一次。上课的形式也变成了讨论。因为学生只有我一个人，我和他的私人感情很好。

访：这种教师和学生一对一的讨论应该效果不错吧！

丁：效果还可以。1949年暑假后我还选修了法文。当时清华有三个法文老师同时开课，我就挑了一个对学生最严格的老师，叫吴达元。他教学非常认真，要求非常严格。我认为这对学生很好。他的课我上了一年。班上的学生不到20人，除我之外，都是西语系的，主要是法文专业一年级学生。我的成绩在班上非常好，考分经常和一个从越南回来的学生相同。当时用的是英文教材，书名叫 *Complete French Grammar*。吴达元开的这门课实际上是文法课，专门讲法文文法。我学法文的目的是为了可以看法文的数学书。一年念下来，我该毕业了，这个目的也基本达到了。法文与英文的数学名词很多是一样的，就是拼法不同。毕业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即我修法文的学分不被承认。学校教务处认为这4个学分不能给我，因为法文课不只是文法，还有阅读等。吴达元去找清华的教务长周培源，说我学得非常好，不给学分不公平，结果把这4个学分给争来了。

除法文外，我在1949年暑假后还选了一门逻辑课，是沈有鼎开的。

他是中国有名的哲学家。他上课用的教材是卡纳普 (R. Carnap) 的书: *Logic Syntax and Language*。卡纳普是有名的逻辑学家, 认为一种语言由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 Syntax, 就是语法; 还有一部分就是语义。这门课讲的就是语法。记得卡纳普的结论是: 哲学问题最终就是语言问题。由于解放后念哲学的人大都不再念唯心主义哲学了, 选沈有鼎这门课的人很少, 只有两个人。除我之外, 还有周景良。他跟周一良是堂兄弟, 是哲学系的, 毕业后改行搞了地质。沈有鼎上课是下午一连上三小时, 上完课后请我们两个到燕京大学东门外成府路的一个小餐馆吃饭, 边吃边聊。这个小餐馆的有些菜名很怪, 是学生建议的。记得有一道菜叫黄小姐菜。因为学生少, 我跟沈有鼎在学习过程中结下了友谊。沈有鼎在我毕业以后, 有时还找我聊天。他性格比较怪, 教我时还没有结婚, 到五几年才结婚。这时他的年龄已经比较大了。他一度和我住同一幢宿舍楼。

清华园解放前后

访: 清华园是 1948 年 12 月 15 日解放的, 比北平解放早几个月。学生一般对内战持什么态度? 清华解放时情况怎样?

丁: 学生一般都支持共产党, 对解放清华园都比较高兴。记得 1948 年 12 月 13 日, 傅作义的部队在清华园善斋前头的空地上架了十尊大炮。我们知道共产党要打进来了。那天晚上我们都不敢住在宿舍里, 搬到了数学系的教室里。数学系在科学馆里, 房子比较结实, 老师和学生都在那里打地铺。第二天早上, 我们起来发现傅作义的军队全部撤走了。这时清华园成了真空地带, 国民党撤走了, 共产党还没来。傅作义的军队撤到了动

物园。动物园是一条界线，清华的人进不了城，所有的菜、肉都供应不上。有一段时间生活很苦，食堂只有白菜。

当时学校组织了护校队，晚上在校园里巡逻。据说护校队由三个人负责，一个是费孝通，一个是钱伟长；另一个的名字，我记不得了，只记得他后来调到了湖南。这三个人都是民主教授，跟共产党关系较好。12月15日，解放军进驻海淀，清华园解放了。

这段时间我们也不上课。由于闲着没事，我学会了下围棋。不久北平要和平解放了。共产党派了一个军代表到清华，他叫光未然^①。我记得听过他一次报告，主要讲进城之后的政策。12月下旬，我加入了民青。不

1949年清华大学学生乘车到城里做宣传



^① 光未然（1913—2002），原名张光年，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30年代起从事进步的戏剧活动和文学活动。创作有著名组诗《黄河大合唱》，著有诗集《五月花》、论文集《戏剧的现实主义问题》等。

久，我们准备进城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具体的单位是城里的竞存女中。事先我们还做了些准备，练了好多歌，去教这些中学生唱。

访：您说过不认识简谱，学唱歌是不是比较难？你们为了到竞存女中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准备了哪些歌？

丁：我不太会唱歌，就跟着唱。准备的歌比如有《解放区的天》。1949年1月，数学系的学生作为一个分队进城了。我印象中我们住在东单附近，打地铺，白天到竞存女中去宣传。那时没暖气，天气非常冷，我发现衣服不够，也没钱买，就去找张廉瑜借了五块大洋，到东安市场买了一件绒衣穿上。我们在城里待了两三个月，还参加了前门欢迎解放军入城的仪式。解放军进城后，我们就返回学校。之后，学校秩序逐渐恢复正常。那时学校成立了校务委员会，主任是很有名的物理教授、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学校还动员周培源出来当教务长。因为原来的教务长跟国民党多少有一点关系，而周培源此前不问政治，人比较正派。

访：您在清华当过学生会副主席，好像是在清华园解放之后？

丁：是1949年，在清华园解放后不久。当时学生会是一学期改选一次。我不知道地下党是怎么考虑的，把我推出来，让我竞选。从这点看，当时政治上还比较宽松。我虽拒绝入青年团，还是让我出来竞选。1949年春，我被选为学生会副主席。主席是地质系的一个同学。副主席中还有一个是电机系的吕应中。吕应中后来在清华当干部。“四人帮”被打倒前，他还当过北京市委委员。

访：您在学生会主要做过哪些事？

丁：记不太清楚了。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我作为领队在暑假期间带着清华南方来的学生乘津浦路通车后的第一列火车回上海。按照清华大学的安排，我顺路给抢修淮河大桥的解放军送了一面锦旗，代表清华大学

向他们表示感谢。记得送锦旗那天，下大雨，路很不好走。

1950年在清华毕业之前，我作为学生会副主席到上海参加了招生工作。当时还不是全国统一招生，而是华北几十所大学联合到上海招生。联合招生组的负责人是在清华当过教务长的数学系老教授、数学界的老前辈郑之蕃。到上海后，郑之蕃负责联系当地的中学老师，请他们帮忙找考场、阅卷。由于抗战期间在上海育才中学当过校长，他对上海中学的人头比较熟，办这些事很方便。记得招生总办事处就设在育才中学。

访：您在招生工作中主要负责什么？您阅卷吗？考卷是谁出的？

丁：我当时还是学生，没有资格阅卷；主要负责看教室、发考卷。考卷是从清华带去的，不知道是谁出的。

访：通过这次招生您对郑之蕃先生印象如何？他是数学系的老教授，你们在系中应该已经多有接触了。

丁：我的感受是，郑先生平易近人，对招生工作的指导非常耐心，并对那些复杂的工作处理得井井有条，使工作进展极其顺利。他跟我说，根据他的经验，清华招的转学生一般都是学得比较好的学生。我对这句话印象很深。

访：事实也是这样。如抗战前清华数学系的许宝騄、柯召、施祥林、庄圻泰、田方增等优秀学生都是从外校或清华其他系转来的转学生。

丁：由于郑先生教外系的课，我跟他又有年龄上的差距，我转到清华数学系后跟他接触不多。

我虽然不懂他的学问，但通过此后的不断接触，发现他的为人非常之好。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希望郑先生给陈省身写信，劝他回国工作。而郑先生坚决不写。因为他认为陈省身回国就搞不了数学了。关于这件事，我可能是通过段学复知道的。

访：苏步青对徐利治说过，解放初期国内的 20 多个老数学家曾联合签名写信请陈省身回国。陈省身表示婉拒，而且说他已经接受芝加哥大学的聘请。1950 年 1 月 8 日，陈省身在致徐利治的信中说：“近友人又信电促归。弟本无意在国外久居，但怕回国管行政，以致踌躇观望耳。”^① 这些说明郑先生不愿让陈省身回来，陈省身本人也不愿回来。1952 年郑先生退休后，您跟他联系多吗？

丁：1952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清华数学系并入北大，郑先生因年事已高，就主动提出退休。记得他从当年起一直住在北大东校门外的成府镇，跟闵嗣鹤同住一个四合院，闵先生家经常做饭给他吃。随后几年，我和我的同学董怀允作为年轻教员常去看望郑先生。他家里的陈设很简朴，主要的东西是书。我们喜欢去郑先生家的原因，不仅因为他对年轻人很亲切、很热情，更因为我们可从他的谈话中学到许多做人、做学问的宝贵经验。他还经常给我们讲些历史事件，有数学的，也有其他的，有时还讲些古代文学。我们对这些都很感兴趣。郑先生在古典文学方面的修养很深。他每逢高兴的事总要做些诗，并且很愿意讲解给我们听。另外，我们每次去他那儿，都能喝到上好的茶。郑先生晚年因儿女都不在身边，比较孤苦。

从留校到要求入党

访：您是 1950 年从清华数学系毕业的。抗战前，该系是要求本科生做毕

^① 徐利治口述，袁向东、郭金海访问整理：《徐利治访谈录》。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 年，第 229 ~ 23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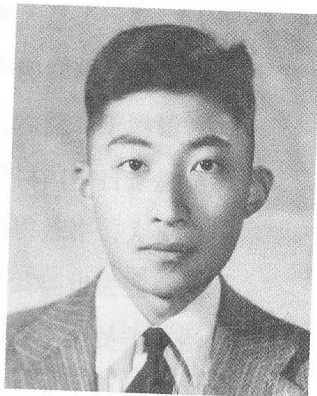
业论文的。您毕业前做毕业论文了吗？

丁：本来说要写毕业论文，但清华园解放后就不要求了。实际上，段学复把毕业论文的题目都给我定好了，是关于环的。我们知道，环里有根，根有好几个定义。段先生要求我把这几个根的等价关系搞清楚。

访：在同年级的同学中，您觉得谁的专业课学得最好？您是不是学得最好的？

丁：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学得最好。曾肯成比我学得好得多。毕业那年，学校发了一个奖，奖的名字已经记不得了，也不知道是谁设的，只记得是奖给学习好的学生。奖金大概是一百元人民币。数学系有三个学生得奖，除我之外，还有曾肯成和殷涌泉。曾肯成极聪明，记忆力非常好，理解力也很强；数学、英文和德文都非常棒。但这个人非常可惜。他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当了华罗庚的助手。华罗庚要求助手听话，但曾肯成的脑子灵活，自己的主张很多，就和华罗庚搞不好关系。我印象中他在华罗庚那里待了一年多，就调到科学出版社。之后又到科学院的外事局工作。他俄文学得非常好。1956年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时，苏联派了一个专家组，帮助我们做远景规划。曾肯成是专家组组长的翻译。由于“狂妄”，他跟翻译小组组长的关系搞得很僵。这位组长的俄文不如曾，一次让曾修改他译的一份文字材料。曾批了六个字：“剪不断，理还乱”，把这位组长气坏了。

后来中国科学院把曾肯成送到莫斯科大学留学。在那里，他有两个问题被抓住了：一个是他向国内订了《文汇报》，中国留学生都到他那里看。《文汇报》受到批判后，他就成了帮助宣传《文汇报》资产阶级观点的



1950年丁石孙大学毕业照

人。另一个是因为他俄文太好了，经常在饭厅里跟苏联学生辩论。这居然成了反对苏联的一条罪状。国内反右运动后期，他被调回国内，被戴上了右派帽子。随后，他到中国科技大学教书。科大成立于1958年，大量教员是来自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的右派。因为右派不少，所以压力不大。他在科大，书教得很好，后来搞密码，也搞得不错。2004年5月，曾肯成因患癌症去世。我去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他女儿从美国回来，要我当治丧委员会主任。我认为这是最后一次为老同学办事，就同意了。那时由于我已当上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白春礼就当了治丧委员会的副主任。曾肯成的一生确实是个悲剧。他是个天才，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才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①

访：我们也略微了解一些曾肯成的情况。他才华横溢，但遇到了很多坎坷，未能尽展其才，确实很可惜！希望您以后能告诉我们更多曾肯成先生的故事。现在我们接着谈您毕业分配的情况。您是怎么留校的？

丁：1950年暑假，我从清华毕业。毕业证书是叶企孙签的名。他当时是清华校务委员会主任。开始毕业分配时，学校让填个表，我填得非常简单，就是服从分配。填完表，我没等分配结果，也没等毕业教育这些活动结束，就回了一趟在苏州的家。

访：从苏州回来，毕业分配的事定下来了吗？

丁：回到学校时，我的毕业分配还没有最后定下来。起初好像要把我分到张家口的一个解放军学校，搞密码。最后的结果是把我留校了。事后我才知道，是周培源为我争的。分到张家口的是我的同学卞国琨。他的遭

^① 曾肯成（1927—2004），数学家，密码学家，是中国科学院数据与通信保护研究教育中心的主要创立者和带头人。该中心是我国最早开展信息安全研究和推广应用的单位之一，是目前为止国内唯一以密码学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单位。

遇很惨，“肃反”、反右运动中都挨了整，“文革”中还挨整，后在“文革”中失踪了。我毕业留校后，从学生宿舍搬到当时的青年教师宿舍，名叫36所，是平房。据说，这里是日本人占领时的马房，后来稍微改造了一下，但还是很简陋。

访：留校后您主要做什么工作？

丁：当助教，主要的工作是改电机系学生的高等数学习题。讲课的教师叫江泽坚^①，年纪比我大一点，业务比较强。当时他可能还不是讲师，而是教员。同时，我做闵嗣鹤的助教，任务是改他所教的三年级的学生的代数论课的习题本。当时做助教要兼管一点系图书馆的工作，这是清华的一个传统。我每周有两三个上午在图书馆值班，管借书。

访：助教要管系图书馆的工作，怎么个管法？您从中有何收获？

丁：一个收获是对图书的分类、编目有了些了解。那个时候系图书馆的管理很简单，系主任过几个星期进一趟城，买些书回来，交给我们编目。另外，我在1950年被选为数学系的工会小组长，负责组织大家学习。除这些工作外，我自己还读读书。那时俄文书不断进来，而且很便宜，我觉得应该学俄文。有个物理系的教员，叫冯康，后来是数学方面的院士。他大概自学了俄文，就教我们。数学系的几个教员都到他那里学。他每周讲一次，讲的办法是拿本数学书，一句句讲解，不讲文法，也不讲语音。这就是我学俄文的入门阶段。学俄文的同时，我也跑到外文系，听俄文文法课。通过这两个来源，我学了俄文，当然极其不正规，到现在有的俄文字母我也念不出来，生活用语几乎都不知道。那时我买了一本俄文字典，对付看数学书没有问题。

^① 江泽坚（1921—2005），数学家，从事数学教育和泛函分析研究。1948至1952年在清华大学数学系教书，1952年到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参与组建数学系。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1950 年华罗庚在筹备成立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时，希望段学复从学生中选几个人给他。万哲先后来就选给了华罗庚。华罗庚希望从我和曾肯成两个人中间挑一个。当时我表示我不愿意到研究所，愿意在数学系。

访：到数学所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念书、搞研究。您为什么不愿意去呢？

丁：不想去数学所的道理很简单。一方面因为我在清华数学系同样有很多时间念书、搞研究；但更主要的是因为清华数学系的待遇高一点，而我毕业时欠了很多债，急着要还债。当时清华数学系工资是 400 斤小米，数学所是 380 斤，每月多 20 斤。

访：当时 400 斤小米大概相当于多少钱？

丁：大概相当于 40 元钱。当时每月在食堂吃饭只要十几元钱就够了。

访：您吃饭通常都是到食堂吗？

丁：36 所有个食堂，是包伙，每人每个月交一些钱。我们自己管伙食：月初把附近卖肉的、卖菜的、卖粮的找来，把一个月要买的東西都定下来。

访：1951 年冬至 1952 年春，随着“三反”、“五反”^①运动的开展，中央在高校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据文献记载，这场运动的目的是彻底打击学校中的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如崇美、亲美、恐美、反共、反苏、反人民的思想），划清敌我界限；暴露和批判教师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如宗派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划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初步确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肃清学校中的贪污浪费

^①“五反”指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现象，树立爱护公共财产、廉洁节约的新风气等。^①在这场运动中，清华数学系的华罗庚、徐利治都受到批判，做了自我检讨。^②我们不清楚清华全校是如何进行这场运动的。具体到数学系，除了批判这两位教师外，还批判了哪些教师？

丁：清华全校的思想改造运动，由校党委书记何东昌领导。数学系的思想改造运动，由系里的支部书记林建祥领导^③。批判会的地点是科学馆里数学系的一间大教室。批判时整个教室坐满了人，批判的主要对象都是岁数大一点的教师；学生和年轻教师是批判的主力军。段学复、华罗庚都是数学系批判的重点。系中岁数最大的教授郑之蕃没被批判，当时他正准备退休。记得对段学复批判得比较厉害，说他有名利思想，经常催大家写论文，用论文给人施加压力，认为这是他从美国学来的。后来，作为思想改造得好的典型，段先生到全校做了一个很长的检讨，把自己骂了一顿，说自己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大染缸里染出来的，所以就带回来这么多的坏毛病。

访：作为系主任，段先生催教师写论文无可厚非，好像不应作为批判的理由。段先生对这些批判有什么反应？

丁：当时数学系的年轻教师对段先生要大家写论文的做法不太理会，但中年教师烦段先生，认为段先生给他们的压力比较大。段先生开始不太想得通，认为催大家写论文是很对的事情，但后来迫于压力，也就做了检讨。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数学系对很多人的批判确实没有道理。我再举个

①《中国科学院》编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上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27页。

②徐利治口述，袁向东、郭金海访问整理：《徐利治访谈录》。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19~122页。

③当时数学系的党员，除林建祥外，还有徐利治、汪志华。

例子，当时学生批判江泽坚，是因为他讲话比较随便，让学生交习题本时说你们谁是“小头目”，把习题本收上来。我们就批他怎么能把小组长说成小头目。

访：清华的思想改造运动有没有全校批判的重点？重点是怎么定出来的？

丁：有。要批判哪一个人，由学校党委定，主要是根据这个人的政治表现，当然也夹杂个人恩怨。记得清华全校批判的重点有潘光旦^①。潘光旦的历史很复杂。在解放前，他基本站在国民党的立场，是反共的。但他对清华是有贡献的。除潘光旦外，还有一些全校重点，文科教授多一点。思想改造主要是给了知识分子一个下马威，但时间不太长，就几个月时间。当时很多名教授都在《人民日报》上做了检讨。后来我了解到，北大对江泽涵批得比较厉害。关于思想改造运动，周总理在这场运动前做过动员报告。思想改造实际上也为后来的院系调整做了准备。

访：徐利治跟我们讲，1951年9月周恩来总理在怀仁堂对京津地区高校教师做了一个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报告。许多大学的教授和副教授都去了，其中包括徐利治和段学复等清华数学系教师。周总理讲了四个半到五个小时。他以切身的体会阐明如何不断学习，改变立场，站到人民一边来。周总理的报告中还举了不少实际的例子，说明旧社会讲话不老实，讲老实话做不成事。经过周总理做报告，大家觉得思想改造运动可以接受，但开展起来以后火力太强了。

丁：我也去听了周总理的报告。他的报告很感人。在这场运动进行过程中，青年教师和学生把握不住度，搞得过了头。

^① 潘光旦（1899—1967），社会学家，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任民盟中央委员、中央常委、昆明支部主任委员。

访：据徐利治回忆，思想改造运动之后，教师、同事间的关系疏远了，来往少了、交流少了，这影响学术研究。同时，老教师对青年教师和学生不敢提要求了。因为青年教师和学生批判老教师时很凶，对老教师的伤害较大，老教师对他们的指导热情随之下降。另外，一些老教师害怕共产党了，对党产生了一种敬畏之感。^①

丁：确实是这样的。但作为年轻教师，我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是批判的主力军成员，并未对共产党产生不好的看法。而且我通过阅读胡乔木写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和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思想发生了转变，产生了要加入共产党的念头。

访：看来这两本书对您触动很大。

丁：《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给我的触动很大。它主要使我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帮助我反思了解放前自己的思想经历。看完这本书之后，我有个想法，认为共产党对中国的事情做了很多客观的分析，最后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而解放前我和我的朋友们实际上是在上海亭子间里议论天下大事，并没有做任何的调查研究，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采取正确的行动，所以觉得有必要彻底否定自己在政治上走过的道路。当然，现在事隔60多年回头来看，胡乔木的书写得非常原则，也不见得完整地反映了共产党的真实。当时我从内心里承认共产党找到了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胡乔木的书在促使我思想转变上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更重要的是，革命胜利之后的现实对我的影响，我看到中国的面貌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

《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主要批判马赫（Ernst Mach，1838—

^① 据2009年12月15日袁向东、郭金海访问徐利治时，徐利治的谈话。

1916)的经验批判主义,也就是我认为逻辑上非常完整的逻辑实证主义。这本书认为这个理论如果在逻辑上推到极端只有唯我主义,只有你自己感觉到的此地、现时的东西可以信赖,昨天的感觉都是不能信赖的。按照列宁的思路来想,我觉得逻辑实证主义有点接近于荒谬,就不再相信它了。

由于思想发生了转变,我产生了要加入共产党的念头。当时对我来讲,加入共产党还有个重大的问题要解决,就是自己能不能做到在一切事情上服从党的领导,比如党不让你搞数学能不能做到?在这个问题上我又考虑了很久。等到我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下决心时,就在一天晚上找了林建祥,向他表示了入党的要求。林建祥比我低一班,那时刚毕业,是数学系党组织的负责人。据我后来了解,他是清华大学理学院的支部宣委。他给我讲加入共产党需要有个从入团开始的锻炼阶段,而我当时入团的年龄已经过了。他建议我先加入民盟。我同意了他的意见。当时数学系民盟的负责人是蓝仲雄。我通过他于1952年上半年加入了民盟,介绍人就是蓝仲雄,当时他在清华数学系教外系的课。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蓝仲雄到地质学院任教。后来,我1955年在北大加入共产党,并于1956年转正。从支部开始讨论我入党的问题,到正式被批准入党,拖了差不多两年时间。原因是我是民盟盟员,入党不能由北大批,要由北京市批。

招收“工农兵学员”

丁:我在清华大学期间,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1951年根据教育部的决定,清华招了一批“工农兵学员”,为他们办学习班,对他们辅导3个月,使这些学员学完从初中到考大学前的主要知识,让他们暑假能够考

大学。有人认为“文革”中招收工农兵学员是新事，其实20世纪50年代初就有了。

访：我们对这件事不太了解。但听徐利治说，1951至1952年清华为想升入大学的高中未毕业的或失学的北京知识青年办过班。清华办这样的班，跟当时南方尚未完全解放，中央要在南方增加大量干部、知识分子，以推进南方解放的背景有关。钱伟长负责数学课程方面的事，徐利治还去讲了课。后来班里的不少学员自愿报名参加了南下工作队。^①

丁：有这回事。徐利治讲的这些学生应为清华招收的“工农兵学员”的一部分。清华当时大概招了9个班的学员，每班三四十人，其中有3个班的学员是从朝鲜回来的志愿军。当时清华临时成立一个组织来管理这批学员，从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各抽了一些高水平的教员来讲课。这些教员的任务是给这批学员补中学的数理化课程。数学系的教授程民德、闵嗣鹤、赵访熊都讲了课。按要求，这些教员必须在3个月内把中学的数理化讲一遍。加之，这9个班的学员程度差别相当大，讲课难度很大。数学系还派了一批将于1953年毕业的高年级学生做这批学员的辅导员。我的任务是负责带领这批辅导员。

访：这批学员学得怎么样？他们毕业后，清华还继续招收“工农兵学员”吗？

丁：辅导结束后，这批人有不少进入大学继续学习。当时大家认为能把这批程度参差不齐的学员教成这个样是不容易的，值得总结经验。我记得有清华教员在相当广的范围里介绍了经验。可能就是根据这个经验，随后有好几所大学办了工农速成中学。目的是用较短的时间，把一些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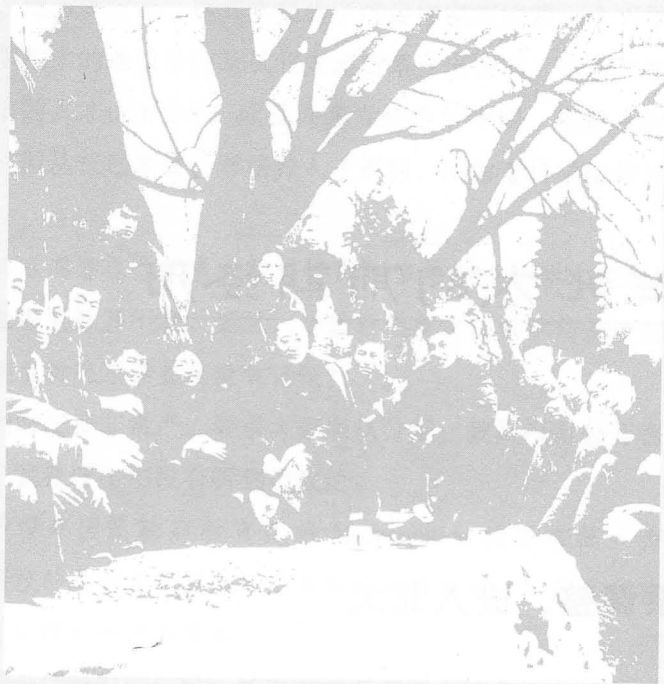
^① 据2009年12月15日袁向东、郭金海访问徐利治时，徐利治的谈话。

农民的文化程度提高到高中毕业水平。后来还有专职的教员教速成中学。

访：当时有些没进大学的学员是否就去了南下工作队？

丁：有一部分去了。当时清华有些学生也自愿报名参加南下工作队。但清华规定理科学生不参加南下工作队，文科的可以去，因为理科的学生将来别有用处。因此，清华去的大都是文科学生。

访：听徐利治说，清华还有个别助教参加了南下工作队。他的一位在清华农学院任助教的朋友就自愿报名参加了。后来这位朋友没有回清华，而是留在广西南宁，做了一所新成立的农校的校长。



院系调整时的口号，是全面学习苏联。综合性大学就以莫斯科大学为榜样。莫斯科大学有力学数学系，北大仿照该系名称将数学系改称数学力学系。

数力系的教师，尤其我们这些助教都非常认真，全部时间都花在教学上。当时在北大各个系中，数力系学习苏联是学得比较好的。

我这一生中很多事情都开了个头，但未等到有结果就不得不放弃。有人问我为什么会这样。他们知道了我的经历，就知道了原因。

第4章

在北大的前期经历^①

院系调整，进入北大

访：1952年，清华数学系和燕京大学数学系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并入北大数学系。当年清华数学系的大部分教师都调入了北大。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丁：1952年上半年后期，就已提出要在全国进行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目标是把综合性大学的工科分出来，综合性大学只保留文学院、理学院。实际上，把综合性大学跟工科分开并不是苏联的创造，这是帝俄的传统，而帝俄又是从西欧学来的。在西欧老的大学系统里，工学院被认为不太重要，认为大学就是文科和理科。当时我们的领导不了解这些背景。在院系调整中，我们办了很多专科大学，成立了所谓八大学院，包括钢铁学院、

^① 本章曾以《我在北京大学的前期经历——丁石孙访谈录》为题，发表于《科学文化评论》，2012年第2期：第85~109页。发表时有删节。

航空学院、地质学院等。这其实是为了满足国家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需要。八大学院中的地质学院是从北大地质系分出去的。地质系在北大的历史很久，出的人才也不少^①。成立许多专科性的学院，虽然一时满足了国家的需要，但从长远来看，对培养人才不利，因为专科学院带有职业培训的性质。

访：院系调整也让原来一些学校历经多年形成的学术传统被破坏了，这对人才培养实际并不利。而且，要重新恢复这些学术传统谈何容易！当时教员和学生对院系调整有没有议论？

丁：当时纪律非常严，要求大家服从分配，教员没有公开发达自己想法的机会。我在学生中没有听到过议论。

访：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将 Mathematics 的译名统一为“数学”后，全国高校的数学系或算学系基本都统称数学系了。院系调整后，北大数学系为什么改称数学力学系？

丁：院系调整时的口号，是全面学习苏联。综合性大学就以莫斯科大学为榜样。莫斯科大学有力学数学系，北大仿照该系名称将数学系改称数学力学系。之所以没有完全照搬莫斯科大学力学数学系的系名，是因为当时北大、清华、燕京3所大学的力学基本都是空白；除周培源外，就没其他人搞力学了。

访：那怎么开力学方面的课？

丁：北大数学力学系让教员自愿报要开的课。钱敏和赵仲哲表示要开力学方面的课。钱敏本来是清华物理系的学生，后来转到了数学系。赵仲哲原来是搞概率的，院系调整时不想搞数学了。另外，周培源把他在清华

^① 俞建章、侯德封、黄汲清、李春昱、张文佑、王鸿祯等著名地质学家均为该系1949年前的毕业生。

培养的已毕业的研究生陈耀松带到了北大数学力学系。这样系里就能开力学方面的课了。

访：我们知道，3校数学系合并后，段学复出任数学力学系主任。当时系主任是怎么确定的？

丁：不太清楚。记得系主任人选和系内人员调整名单是1952年暑假后宣布的。院系调整前，北大、清华、燕京3所大学的数学系主任分别由江泽涵、段学复、徐献瑜担任。这3位中，段先生虽然最年轻，但在政治上最进步。

据我后来了解，院系调整时，这3校数学系成立了一个6人领导小组，由3位系主任和各系1位党员组成，负责北大数学力学系的组建工作。清华出的是段学复、林建祥，北大出的是江泽涵、刘世泽，燕京出的是徐献瑜、吴文达。

院系调整后，清华虽然变成了工科大学，但还要开数学课。因而，数学系还有少数人留在清华^①。当时还提出要加强东北的大学，特别是加强东北人民大学——就是后来的吉林大学，北大和清华都有一些人被调到东北去，去的还是些业务强的。如北大的王湘浩就调到东北人民大学任数学系主任^②。

访：北大数学力学系的教师来自清华、燕京、北大。当时教师间有门户之见吗？

丁：北大数学力学系最初共28个教员，原清华和北大的较多，燕京的较少。我的印象是，3所大学数学系合并后，教师之间的界限就不存在

① 院系调整时，清华大学留下了原数学系的赵访熊、张景昭、张之良等教员，成立了高等数学教研组，负责校中工科各系的高等数学教学。

② 王湘浩调去时，清华、燕京、北大3所大学的数学系已经合并成立北大数学力学系。除王湘浩外，由该系调到东北人民大学数学系的还有徐利治、谢邦杰、江泽坚、孙恩厚。



1952年北大数学力学系部分师生合影(后排左2丁石孙)

了；大家都很团结，有共同的愿望把数学力学系办好。当时我作为年轻教员，对院系调整和3个系的教员合在一起的复杂性，完全没有概念。现在回过头来看，江泽涵的为人和作风对新成立的北大数学力学系教师之间的团结起了很好的作用。按资历讲，自1934年就出任北大数学系主任的江先生，是3所大学数学系中资格最老的系主任。但在院系调整时，他既不当系主任，也不当教研室主任，只是作为一名普通教员教解析几何，而且毫无怨言，始终尊重段学复的领导。这就为北大数学力学系教师的团结带了好头。同时，江先生的为人始终是谦虚谨慎的，对年纪比他轻很多的人都很尊重，为系里营造了很好的风气。

访：您从清华调到北大后，住在什么地方？系里对您的工作是怎么安

排的？

丁：1952 年暑假期间，领导在研究人事调动方面的事情，便组织我们 3 所大学的教员到青岛去玩了一趟。当时山东大学还在青岛，年纪轻的教师住在山东大学的教室里，打地铺；年纪大的找旅馆住。那一次我看到华岗坐在海边看书，他当时是山东大学校长。等我们从青岛回到北京，领导就正式宣布谁到哪里。暑假后北大就搬到原燕京大学的校园里。燕京大学比较小，当时才几百个学生。老北大的人也慢慢从城里搬来。我到北大最初住的是镜春园 78 号，是一些老房子，地势很低，比较潮湿。我和林建祥住一个房间。他是数学力学系的秘书。系里负责的就两个人，一个是系主任，一个是系秘书。当时有个说法，叫“秘书专政”。

访：“秘书专政”是什么意思？

丁：“秘书专政”的意思是真正掌权的是秘书。搬到北大后，数学力学系开始想把我调到新疆，去将要成立的新疆大学工作。有一天，林建祥找我谈话，跟我讲了很多新疆的情况。他虽然没有明说，但暗示我，要把我调到新疆。

访：您愿意到新疆这个不发达的地方吗？

丁：当时我的思想很简单，虽然对新疆完全不了解，但觉得大草原很浪漫，认为去新疆就去吧！后来系里的想法忽然变了，又决定把我留在北大。据说是因为要段学复当新的系主任，段学复就提出来需要我帮他教代数课。代替我去新疆的是清华的另一个教员，叫陈德璜。

访：每个人的人生路上都有些关键的分岔点，段学复的需要把您绑到了北大这艘大船上；如果去了新疆，您以后的命运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陈德璜到新疆后的情况怎么样？

丁：他到新疆后工作还可以，当了新疆师范大学的教授。后来在新疆



1952年丁石孙(左)与同事郊游时蹚水过河

结了婚，成了家。1973年我去新疆招生，见到陈德璜，还在他家里吃了顿饭。

学习苏联：教研室、教学与习题课

访：您说院系调整时的口号是全面学习苏联。北大数学力学系（简称数力系）在机构设置方面是否学习了苏联？

丁：1953年数力系成立教研室，就是学习苏联的结果。现在看来，成立教研室是一件平常的事。但当时我们是第一次听到教研室这个名字，谁也不知道教研室是干什么的。因为系中教员对教研室都不熟悉，数力系就先成立了一个数学分析教研室作为试点。大概这个教研室也是北大最早成立的一个教研室。它的规模相当大，有教授程民德、许宝騄、庄圻泰、

江泽培，讲师陈杰，助教董怀允、吴文达等，主任由业务和领导能力都很强的程民德担任。系里的主要教学工作集中在这个教研室。因为一些年轻教师是在大学三年级时提前毕业的，所以教研室不仅负责教学工作，还负责培养这些年轻教师。

1954年，系里又成立了几何代数教研室，由江泽涵、段学复、王萼芳、聂灵沼、吴光磊、裘光明、吴祖基和我组成，主任由段学复兼任。我在这个教研室负责教代数方面的课。^①

访：这个教研室成立前，您主要做什么工作？

丁：主要是教课，也改习题。1952年，数力系一下子招了一百多学生。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因此教员就不够了，系里让我去讲大课。这一百多学生分三个班：甲班、乙班，还有一个专修班。甲班成绩好一点，乙班差一点；专修班念两年，人少一点，目标是培养大学教师。段学复教甲班，我教乙班，聂灵沼教专修班。我教乙班的高等代数，用的是莫斯科大学的教材。我们自己把它翻译成中文，印成讲义。同时，我还给闵嗣鹤当助教。他给三年级学生开数论基础，我给他改习题。当时我的工作量非常大，教一门课，改一门习题，还翻译教材，俄文还是刚学的。第一个学期上课不久，系里另给我加了一门课，就是为化学系一部分基础太差的学生补中学数学；这部分学生中有我爱人桂琳琳的妹妹桂璐璐。后来段学复病了，我又替段学复代课。那时课很多，但是只要工作需要就干。

访：当时提倡全面学习苏联，特别鼓励学俄文吧？在教学上，是否也要学习苏联？

^① 几何代数教研室后来分为几何教研室、代数教研室。1954年当年或稍后，数力系共设6个教研室和1个天文组。6个教研室分别为数学分析教研室、代数教研室、几何教研室、微分方程教研室、高等数学教研室、力学教研室。参见《北京大学：1898—1954》（校庆纪念特刊）。北京：北京大学自印本，第11~12页。

丁：对。1953年北大为了鼓励教师学俄文，暑假前在全校教师中搞了一次俄文测验，主要测阅读能力，可以带字典。测验结果，数力系有两个人得了一等奖，一个是我，另一个是孙小礼。我们各拿了一百块钱奖金。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北大的教学有很大变化。如北大要求教师学习教学法。而此前很少强调教学法，也不重视去研究怎么把课教好。当时有一本苏联的《凯洛夫教育学》，北大全校教师都在学。我觉得这种学习还是有好处的，比如要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怎么逐步深入地给学生讲概念。同时，教师要完全按照苏联的教学计划进行教学，课前还要备课。

访：解放前，大学并不要求教师备课，教师备课还被认为是没有本事的表演。院系调整后，北大是否有苏联专家指导教学？

丁：当时北大每个系有一位苏联专家，学校有一个苏联总顾问。数力系在1952年当年就有了苏联专家，是位女士，叫贝洛娃，是学力学的。贝洛娃人很好，但水平不见得很高。她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开始教书。她作为系主任的顾问，基本每周和段学复谈一次话，段学复则把她的意见贯彻下去。她还示范怎么上习题课，怎么备课。当时数力系为了便于跟这位苏联专家交流、沟通，培养了四五个翻译，其中包括刚刚毕业留校的孙小礼。这些翻译也做苏联专家的研究生。贝洛娃在北大待了两年，回苏联后跟她在北大教的学生还有联系。大家对她的印象不错。

访：解放前，大学里好像没有专门的习题课，数力系开设习题课完全是学习苏联的结果吧。贝洛娃示范的习题课是什么样子的？

丁：习题课每班不要超过30人。每次上课时出四五个题目。题目是一道一道出的，不是一起出的。在学生做同一道习题的时候，还要挑一个学生到黑板上做。这位学生做的同时，教师不断地提示并修正，给其他同

学做示范。教师也允许其他的同学提建议，并且可以不按教师提示的方法做。如做得不对，再找另外一个学生上去纠正。除了课上做的题目外，习题课还留课后作业。所以在课上做习题的时候，学生要把做好的上星期留的作业放到桌子的边上。教师随时抽出学生的习题本批改。

访：这种习题课的效果好吗？

丁：效果非常好。数力系的教师，尤其我们这些助教都非常认真，全部时间都花在教学上。当时在北大各个系中，数力系学习苏联是学得比较好的。1954年，我在全校做了一个报告，介绍习题课的经验。不过，贝洛娃后来告诉别人，苏联其实并不这么严格执行她说的这一套。而且，完全按照苏联的教学计划进行教学，我们一年下来就发现学生负担过重。学生每周在教室的时间差不多有三十几个小时。1953年暑假，教育部在青岛召开了一次修改教学计划的会议，我跟段学复参加了。会上我们讨论了代数教学大纲的修改问题。

1954年北大成立五十六年校庆纪念特刊所刊数力系学习苏联的情况^①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正在学习苏联的道路上前进。教学计划是根据苏联的教学计划结合我国具体情况而制定的。我们几乎全都采用了苏联教材，教学方式除了讲授和习题课外，从三年级起还要参加专题讨论会、做独立报告、选习专门化课程，以及在教师领导下，进行课程论文

^①《北京大学：1898—1954》（校庆纪念特刊）。北京：北京大学自印本，第11~12页。

及毕业论文的工作。数学力学系特别重视学生独立研究能力的培养。数学力学系的几种教学计划中，都规定要学习以下课程：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数学分析，复变数函数论，概率论，解析几何，微分几何，高等代数，微分方程，数学物理方程，理论力学和物理学。目前开设的专门化课程有多元复变数函数论和常微分方程的分析理论。

访：这次会后，数力系的教学计划有变化吗？此前，系中教师对完全按照苏联的教学计划进行教学有意见吗？

丁：这次会后，系里的教学计划就根据苏联的教学计划结合我们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在这之前，系里包括吴光磊在内的一些老教师其实对完全按照苏联的教学计划进行教学心里并不服气，但大家不敢公开表态。他们认为苏联那套是从德国学来的，觉得苏联的教学计划没有特别之处。

访：数力系学生毕业时写毕业论文吗？

丁：写。这也是学习苏联的结果。苏联大学数学系本科生学制六年，在第四年做一篇学年论文（亦称课程论文），到毕业时写一篇学位论文。数力系要求本科生在三年级写一篇学年论文，毕业时写一篇毕业论文。当时系里学生的毕业论文有相当一批是不错的，水平相当于现在的硕士论文。记得段学复曾邀请已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万哲先到数力系指导毕业生的论文。许以超的论文就是由万哲先指导的。赵嗣元的论文是我指导的。当时系里对毕业论文的要求不十分严格，有导师管就可以了，不安排答辩。

1953 级和 1954 级学生

访：1952 年数力系招了 100 多学生。这一级学生的文化程度如何？

丁：1952 年全国考大学的考生基本都被录取。数力系这一级学生的文化程度差别很大，给我们的教学带来了很大困难。1953 年教育部吸取 1952 年的教训，强调考生的成绩，重视文化程度。不过，那个年代招生经常有起伏，有时强调成绩，有时又强调学生的成分。1953 年的招生刚结束不久，上面又来了新精神，说还是要重视成分，要多从工农兵中招学生。但为时已晚，因为招生已经结束了。这样，1953 年数力系招的学生学习成绩比较好、比较整齐。

访：您教过 53 级学生吗？

丁：我教过这级学生的代数。好像段学复也教了一部分。这级学生的数学分析是陈杰教的。陈杰当这个年级的年级主任，连续教了 3 年。他不仅教书，还管学生思想。陈杰教课不错，这级学生对他印象特别深。他后来调到内蒙古大学去的时候，带了一批他比较熟悉的学生。这批学生在内蒙古大学数学系是属于水平高的。打倒“四人帮”以后，他们纷纷调回了北大。

访：53 级学生有多少？1954 年招生又强调什么？

丁：53 级学生有 100 多人。1954 年数力系招了 240 个学生。这年招生又注重成分。240 人中既有高中毕业生，又有从工人、农民中来的，他们成绩参差不齐，有的成绩非常好，有的非常差。54 级学生在北大数力系发展史上很特殊，其中出了许多优秀人才；而且有 7 人后来当选为院

士，包括张恭庆、张景中、王选^①。

访：54级学生这么多，当时按什么原则分的班？

丁：这240个学生，按照入学考试成绩分成9个班。为了尽量减少分班可能对学生带来的思想负担，系里没有按顺序定好坏班，而是采取如下分班方法：一、四、七班为差班，二、五、八班为成绩中等的班，三、六、九班为好班。我负责一、六、九班，一个差的，两个好的，当这三个班的班主任。教这个年级时，我就发现少数学生表现相当突出。

访：在您印象中，比较突出的有哪几位？

丁：我对九班的几位突出的学生印象比较深，如叶其孝和后来成为他夫人的吴庆宝，张恭庆、马希文等。当时九班有两个天才，一个是小天才马希文，另一个是24岁的老天才。老天才的名字，我已忘记了。马希文懂包括蒙古语在内的多国语言，会拉小提琴、会说相声。^②

访：54级出的优秀人才较多。这主要得益于哪些因素？

丁：一个因素是教师配备得比较强。由程民德教数学分析，江泽涵教几何，我教代数。程民德和江泽涵两位先生教学都很好，教课也特别认真。程民德不但教大课，还对科学小组的同学进行特殊辅导。

访：科学小组是这个年级特有的吗？小组的人选由谁决定？小组是怎么活动的？

丁：科学小组不是54级所特有的，其他年级也有，但不太突出。54级的科学小组共有两个，一个是分析小组，由程民德指导；一个是代数小

^① 另4位是周巢尘、胡文瑞、朱建士、刘宝镛。

^② 据吴庆宝和叶其孝回忆，当时确称马希文是神童、小天才。他在中学时就学完了微积分。华罗庚曾接见过他。大学一年级时编过蒙汉字典。在美国访问期间，为房东写过一首曲子，因而被免了房租。关于老天才，他们回忆可能指蒋巍，他年龄较大，入大学前当过中学老师，也学过微积分，知道的东西比一般同学多些。

组，由我指导。成立这两个小组，是为了进一步培养这年级中成绩好的学生。分析小组里有张恭庆，代数小组里有张景中、杨路。每组有四五个学生，人选由程民德和我分别决定。代数小组相当于一个小的讨论班，每周活动一次。每次我就在《美国数学月刊》（*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Monthly*）上挑一两篇文章，让他们讨论。这些文章都比较简单。我也找一些题目让他们做。这些同学很努力，写了不少小论文。两个小组的活动持续了一年多，后因反右运动中止了。张景中、杨路的思想相当活跃，想法比较多，在反右运动中都被打成右派。后来好几次政治运动批判我，就说我培养了右派。

访：这些优秀人才的成长，还得益于其他哪些因素？

1954年丁石孙与北大数力系师生合影（前排中间戴眼镜的坐者是系主任段学复，其右前排坐者为丁石孙）



丁：跟这级学生入学时政治气氛较好，老师和学生思想比较放得开有关。后来北大数力系有个争论：比较53级和54级学生，一般认为53级学生的成绩比较整齐，但没有出大的人才，当然他们的学习成绩是很好的，但54级就出了很多的人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1953年思想改造还留下一个尾巴，老师学生都比较谨慎。而54级学生入学时的政治气氛就不太一样，所以后来风格就有比较大的差异。当然53级学生也有自己的特点。他们从入学一直到1957年反右运动前夕毕业，4年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政治运动，学习比较正规。

访：你对54级学生中入学成绩较差的学生，是如何进行教学的？

丁：这些学生有少数基础太差，学习非常困难。我在他们身上花了很多功夫。记得每天讲完大课以后，我要给那些基础特别差的学生补课。有些学生差得连教科书都看不懂，我要逐字逐句地给他们讲。其中有些学生慢慢学出来了，但有的学不下去。一班有个学生叫张景文，他刚来的时候，我就拿着教科书逐字逐句地给他讲。后来他学得不错，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搞数理逻辑，并取得一些成就。对教书，我的体会是：教师有热情，会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访：在教书之外，班主任要管些什么事情？

丁：管学生的生活，包括学生谈恋爱。当时有些女学生来找我，问我遇到谈恋爱的问题怎么处理。因为我还没有结婚，当时我自己想想都觉得好笑。

访：那您是怎么应对这种局面的？

丁：我会根据我家人的经验，告诉他们怎么处理。在我没有结婚的情况下，这些学生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明当时师生关系非常之好。

顺利的前五年

访：您在北大的前五年，没有大的政治运动，您的工作和生活都比较顺利吧！

丁：这五年是较顺的，系里对我很看重，除给我安排教学任务外，还指定我当系里的民盟小组长。我还当了系工会的组织委员，加入了共产党，结了婚。

访：你入党是在 1955 年。虽然因为您是民盟成员，入党要由北京市批，而拖了差不多两年，但好事多磨，最终还是入了党。谁是您的入党介绍人？

丁：林建祥是一位，还有一位我忘了。当时数力系党支部的主要成员有来自清华的林建祥、燕京的吴文达、老北大的刘世泽。据我了解，我入党前，数力系党支部看了我的档案，对我的历史做了调查，这包括我参加乌托邦读书会的情况。他们也调查了我在上海的一些朋友。这些朋友中有不少已经是共产党员了。

访：当时在大学发展年轻党员快吗？

丁：不太快，发展党员也不限于年轻人。在我之前，董怀允可能已经入党了。

访：您是 1952 年到北大后就当数力系民盟小组组长的吗？您这位组长手下有几个兵？

丁：对，调到北大后就当了。我的兵都是教授！有江泽涵、段学复、徐献瑜、吴光磊、胡祖焯等，一共七八个人呢！

访：当时系里的民盟小组又由谁管？您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丁：民盟本身有个系统，但在系里由共产党管。林建祥是系党支部书记，直接领导我。我和林建祥住一个宿舍。每天晚上，我都问他，我要做什么？当时民盟的主要活动是学习苏联，而系里年纪大一点的民盟成员认为苏联并不怎么样。我作为小组长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开会说服大家要学习苏联。

访：这些老民盟成员受英美教育比较多，恐怕对苏联不太了解。您说过1950年在清华被选为数学系的工会小组长。在北大，您是哪年当上工会组织委员的？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丁：1953年，我被选为数力系工会的组织委员，负责指导各个工会小组的活动。在20世纪50年代，学校要求工会起党的助手作用。政治学习、文体活动都由工会组织。当时我的直接领导是本系教师、校工会的组织委员胡祖焯。当时数力系的工会活动搞得比较活跃。记得系里曾组织年轻教员和学生举行歌咏比赛，参加比赛的学生很多，老师有陈杰，陈杰在这方面还是有点训练的。我虽然唱歌不行，但作为工会成员也要参加。

访：看来当时的工会跟现在不太一样。如政治学习现在都由党委和党支部组织。现在的工会一般只组织一些文娱活动，给大家发一些福利。您做工会组织委员时参加过学校或市里的大活动吗？

丁：当时和现在是不太一样。1956年上半年，北京市教育工会在前门外的工人俱乐部召开代表大会。这个会开了两三天，规模很大。参加会议的主要是大学、中学、小学的老师，我是作为北大的代表参加的。之前我很少参加北大以外的会，没想到这次会上反映出1956年人们的意见已经很大了，特别是农村的教师生活相当困难。在这个会上，代表们提的一些意见很激烈，以致会开不下去了。中间专门开了一个党员会，让大家以

稳定大局为重，这样会议才得以继续。后来回想，这个会上大家提意见提得如此尖锐，与当时的大环境是有联系的。解放7年了，一些矛盾已经暴露出来。因为我平时跟外面联系太少，对外面的情况不太了解，所以在参加这个会前对这些情况没有意识到。在这次会议上，我被选为北京市教育工会基层委员会的委员。

访：您和您爱人好像是在搞工会工作时认识的？是什么时候结婚的？

丁：在负责工会工作时，我认识了桂琳琳。她1953年从北大毕业，毕业后当了校工会的组织干事，曾到数力系来了解情况。当时她认为数力系的工会工作搞得比较好。后来我们谈了恋爱，1956年3月10日结的婚。

访：当时举行结婚仪式了吗？

丁：我们结婚非常简单。学校给了集体宿舍里的一间房，我们好像也没买任何家具，只是把两张单人铁床拼到一块。婚礼的规模比较大，在俄文楼二楼一个大教室里，来的主要是我教的53级和54级学生。他们一个班一个班地来，很热闹，有的还带了礼物。记得54级学生送了一个很大的

洋娃娃。我花了点钱买了些糖果，他们来了之后，吃点糖果就完了，没有其他的东两招待。记得帮忙张罗这个婚礼的，有数力系的职员黄敏，还有王力的夫人夏蔚霞。夏蔚霞是数力系的图书管理员。她们和我关系很好。我们的结婚蛋糕是夏蔚霞从城里买回来的。夏蔚霞对工作很负责，是对数力系有贡献的人。“文革”期间教授都被打倒

1956年丁石孙与桂琳琳结婚照



了，但她敢于和造反派讲话。因此，数力系的图书资料保管得很好，没有任何损失。

访：当时系里对您很看重。据说，您还当过系里的教学秘书？

丁：1956年暑假，系里让我当教学秘书。因为学生比较多，还让我从助教中找两个人分别帮忙管力学、数学方面的事。我找的管数学的叫章学诚，是1953年从复旦大学毕业的；管力学的叫吴望一，是力学专业的。当时系里行政工作非常简单，一个教学秘书就管了很多事情。不像现在人浮于事，搞得重重叠叠。

访：当时数力系从事行政工作的共有几位？您能否对您管的事举些例子？

丁：当时系里从事行政工作的有系主任、教学秘书，还有一个教务员、一个职员。教务员是姜景熙，职员是黄敏。我担任教学秘书要处理的事情确实很多。比如，学生对物理课意见很大，不愿意做物理实验，认为他们是学数学的，只要把道理搞清楚就行了，做什么实验！为这件事，我专门找了物理系的教授王竹溪，问他学物理不做实验行不行。他说：不行。物理跟数学不一样。我就跟学生讲，你们还是要做实验，学不同的学科，要用不同的方法。

访：王竹溪是知名物理学家。1940年，他跟陈省身、华罗庚在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组织过一个李群讨论班。

丁：关于王竹溪，当时北大物理系的人讲他的科研成果虽然不是特别多，但大家公认他的学问大。很多别人不懂的难题，他都能讲得清清楚楚。可惜在“文革”期间，他在鲤鱼洲得了血吸虫病，死得比较早。

访：除了做系里的教学秘书外，您还有其他兼职吗？

丁：从1953年开始，我还担任《数学通报》的编辑。当时《数学通

报》的总编辑是北师大的副校长傅种孙。他是一位老数学家，想加强编辑部的工作，增加几个年轻人当编辑。他找了我、万哲先、裘光明、钟善基。他的想法很好，在编辑部补充新鲜血液，使《数学通报》更活跃。记得没有给我们发正式聘书。编辑部一个月开一次会。每次都是傅先生先讲一讲，接着大家讨论稿件。我和万哲先、裘光明主要讨论高等数学方面的。钟善基负责中学数学方面的。当时《数学通报》编辑部一般都是征稿，个人投稿的情况比较特殊。我当《数学通报》编辑一直到1959年。当时有些报酬，每月15元钱。我就把这些钱寄给我父亲的二舅，接济他的生活。好像有时开完会傅种孙还请我们吃顿饭，大家都很高兴。

访：在1953年，您的工资是多少？您在清华留校时每月工资400斤小米，大约相当于40元钱，这15元将近您那时工资的二分之一。

丁：1953年，我拿的工资跟在清华时基本一样。每月拿兼职津贴15元，确实很高。傅种孙做事很认真，1957年被打成右派前当过全国高考命题数学组组长。在他当组长期间，我参加过两次高考命题会。当时对高考命题，管得不像现在这么严。会前拿到的通知就讲明开会的内容是出今年的高考题。我记得，教育部领导这个工作的是副部长曾昭抡。在会上，他把去年的高考命题有什么问题，比如太难了，或者太容易了等讲一讲。开完会，就明确谁出哪方面的题，让我们回家想，并不把我们关起来。过几天再开个会，要我们把出的题交上来。当时社会风气比较好，没有人来打听。

访：当时是每人出一张考卷吗？

丁：不是。当时是每人出一道题，出完后，大家拿来看，看谁出的题比较合适，最后由傅种孙汇总。记得我出的是代数题，钟善基出过几何题。1957年傅种孙被打成右派后，闵嗣鹤当了全国高考命题数学组组长。当年我还参加了高考命题，后来就不再参加了。

访：据我们所知，您在北大的前5年间已经开始做数学研究工作了。

丁：1954年，北大开始考虑开展科研工作。我们就在段学复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讨论班。因为段学复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群论，我们就跟他学，搞群论，但没有学太长时间。总之，1954年后北大的工作已经比较上轨道，有教学，有科研，我们已开始做研究。当时我们没有觉得跟国外的先进水平差距很大，看国外当年发表的文章还能看得懂。

访：1956年1月，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会上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8月13日至19日，中国数学会组织了论文宣读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00人，其中约半数是年轻人。在提交给大会的170余篇论文里，青年数学家的成果占了很大的比重。^①您当时也还不到30岁。8月24日的《人民日报》报道说：“许多青年数学研究工作者提出的论文也表现了他们突出的数学方面的才能。他们虽然从事数学研究只有四五年的时间，但他们的论文都达到一定的水平。老数学家在谈到王元、严士健、尹文霖、谷超豪、夏道行、丁石孙等的论文的时候，都认为，这是个中国数学界十分可喜的成绩。”^②您提交了几篇论文？

丁：这次大会是在北大召开的。除了报上提到的这些青年数学家外，陈景润也参加了。记得我提交了2篇论文。当时我没觉得我是突出的，也没有觉得我的报告重要。

另外，有件事值得提一下。我本想提交3篇论文，在1956年暑假前交给了江泽涵，请他把关。其中一篇是对正则空间的乘积空间是否还是正

^① 关于这次大会，1956年第9期《数学通报》所刊《纪中国数学会论文宣读大会》（署名梧）一文做了报道。

^② 《中国数学研究工作发展迅速》。见《人民日报》，1956年8月24日，第7版。

關於拓撲空間的正规性不具有可乘性的一个例子*

丁石孙

(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

我們知道,正规(normal)空間不具有可乘性,下面就是給出一个这样的例子,也就是你提出两个正规空間 M_1 和 M_2 , 它們的乘積 $M_1 \times M_2$ 是不正规的。J. Dieudonné 曾給过一个这样的例子^[1], 他是利用第二類超球體做的, 与他的例子比較, 這裏的例子要简单些。

根據完全正规性(completely regular)的可乘性, $M_1 \times M_2$ 則也是一个完全正规而不正规的例子。

1. 首先我們定义空間 M_1 。

取全体实数作为元素, 对每一个实数定义它的邻域系如下: 有有限个 r 的邻域为 (r) , 即单个 r 所成的集合; 邻域系 τ 的邻域为所有的以 τ 为中心, 以正实数为半径的圆环, 即 $(\tau - \epsilon, \tau + \epsilon)$, ϵ 为任意正实数, 不难看出, 这样的邻域定义了一个拓扑空間, 这个空間用 M_1 表示。

我們用 M_2 代表通常的实数直線, 从定义不难看出, M_2 中的圆环(邻域系)都是 M_1 的圆环(邻域系), 而且如果以 M_2 代表所有圆环所成的集合, M_2 在 M_1 上所引起的拓撲与 M_2 在 M_2 上所引起的拓撲是一样的, 因此 M_2 作为 M_1 的子空間是正规的。

在以下的讨论中, 我們需要同时考虑 M_1 的加点的拓撲, 为了簡便起見, 加不点的点的声明, 簡便的性質都是对我們所定义的空間 M_1 说的。

2. 現在考虑 M_1 的正规性。

取 C_1, C_2 是 M_1 中两个不相交的圆环, 令

$$D_i = C_i \cap M_1, \quad i = 1, 2.$$

D_1 与 D_2 是 M_1 中两个不相交的闭集, 把 D_1 看做 M_1 的子空間, 在 D_1 中我們能选两个圆环 C_1 与 C_2 , 因此

* 1956年12月20日稿。

1956年丁石孙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的论文

则这一问题提出了反例, 说明该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江先生利用暑假专门查了文献, 发现法国著名数学家、布尔巴基学派的主要成员迪厄多内(J. Dieudonné)在1939年得到过同样的结论。

我暑假后回校时, 江先生告诉我迪厄多内已经发表过这篇论文的结果。这篇论文其实不是很重要, 但江先生却非常认真, 专门去查了资料。这次会后, 《光明日报》记者采访了江先生。他说这次会上出现了几位突出的年轻人。我记得他提了四个人, 有两个是北大数力系的, 即我和董怀允。另两个是复旦大学数学系的, 即谷超豪和夏道行, 他们后来都当了院

士。谷超豪是苏步青的学生。夏道行是陈建功的学生。不知什么原因, 他们两个人闹矛盾。夏道行在20世纪80年代去了美国, 一去不返。陈建功和苏步青搞不好关系, 调到了杭州大学。他在杭州大学当过校长, 是在“文革”期间去世的。

除了研究工作外, 1953年我和聂灵沼、王萼芳还完成了斯米尔诺夫(V. И. Смирнов, 1887—1974)的《高等数学教程》第3卷第1分册的翻译工作。这是一本俄文书。当时我们的俄文水平还行, 借助字典翻译数学书没问题。斯米尔诺夫的《高等数学教程》一共5卷, 是写给物理系学生

念的，物理系学生用到的数学知识都包括在内，第3卷第1分册是代数。

访：听您这么一说，就知道您在北大的这前5年过得比较愉快，事业和生活都蒸蒸日上。

丁：确实如此。当时我们这些年轻教师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我看到解放以后政治很快就稳定了，百姓生活也提高了。大家觉得在我们这一代社会主义就能建成，完全想不到后来会经历那么多的曲折。

从“肃反”到“反右”

访：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前，您感觉到政治气氛有些变化吗？

丁：已经有些感觉。“肃反”运动开始前，学校让我们看傅鹰在《化学通报》上发表的文章：《高等学校的化学研究——一个三部曲》。文章中好像讲这么一件事：一个农业专家想培育优良品种，但领导是位工农干部，完全不懂，就认为你这个专家种地就种地，把种子搞各种分类，真是无聊，就很烦他。于是，领导在专家不在的时候把他选的种子全混在了一起。这样，专家多年的工作毁于一旦。傅鹰由这件事发表议论，说没有拿过试管的人不能领导化学科研。^①运动一开始的架势像是要对傅鹰进行大

^① 关于这件事，丁石孙的回忆与傅鹰所述略有出入。傅鹰原文为：“今举一个令人万分痛心的例子。一个农业研究机关中有一位育种专家费了若干年的心血，培养出许多优良品种。一个干部认为这种工作是浪费人民财产的勾当，趁这位科学家出差的机会，将这些品种搅混在一起。他的一举手之劳不但毁坏了多年的研究成果，而且使我国的农业增产可能受了不可估计的严重打击。这类违反革命利益的行为在高等学校中可能不会实现，但是外行人的愚而好自用的危害性却是存在的。”傅鹰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外行领导的不正确见解若化为行动，其危害性不可估量。参见傅鹰：《高等学校的化学研究——一个三部曲》。刊于《化学通报》，1955年，第9期，第515页。

批判，后来并没有搞起来。当时我们从下面看这件事是不了了之。后来才知道上面是毛泽东发了话。

傅鹰的事情过去以后，很快就抛出了胡风的材料。刚开始组织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连胡风是什么人都不知道。毛泽东有批示，我们都相信毛泽东的话，把事情看得很严重，相信这就是一个反党集团。反胡风运动不久，在暑假前就开始“肃反”运动。当时数学界批判四个人，叫“西郊四怪”。其中有清华的施惠同，北大的李同孚和赵仲哲，科学院数学所的孙以丰。这四个人没有什么政治倾向，就是脾气比较怪，和大家来往比较少。他们四个人经常聚在一起，喝点茶，可能也讲了点怪话。当时说怪话就被认为是反革命，这是没有道理的。

访：徐利治说过施惠同这个人很怪。西南联合大学结束后，他和施惠同都迁回北平的清华数学系任教。当时施惠同身体不好，经常卧病。有一次，施惠同生病住在清华的校医院。徐利治和段学复一同去看望他。后来施惠同给段学复写信，说了一句“久病床前无孝子”。段学复非常不高兴，跟徐利治说：你看这个人真怪，难道我们这些去看望他的人都成了孝子？还有一件事能说明施惠同怪。他跟田方增很熟，1947年田方增去法国留学前，他对田说：“老田，老田，等你回国后别忘了在我坟前烧炷香，磕个头。”^①

丁：施惠同确实比较怪。在“西郊四怪”中，我跟李同孚比较熟。他比我早一年毕业，个不高，穿得很随便。因为怪，他不教课，但每月还照拿工资，经常进城到饭馆吃饭。当时大家说他是寄生虫。

“肃反”运动对闵嗣鹤也有影响。当时北京市成立了一个专案组，查

^① 据2009年12月15日袁向东、郭金海访问徐利治时，徐利治的谈话。

获了一个由王明道领导的反动组织。王明道可能是牧师，经常在笃信基督教的闵嗣鹤家做礼拜。王明道被抓后，闵嗣鹤就成了“肃反”对象。我还受组织指派跟段学复一起找他谈过话。这些事情现在看来很可笑，但当时还作为很认真的事来做。“肃反”运动后，闵嗣鹤说话就变得极为谨慎了。在我的印象中，闵嗣鹤学问非常好，人也不错。陈景润开始写论文时，都请闵嗣鹤帮他看。

访：“肃反”运动在北大学生中是怎么个状况？

丁：“肃反”在学生中搞得比较乱。如果学生支部不喜欢哪一个人，就说这个人思想有问题，组织批判，发动学生检举，也要求本人坦白。幸好那段时间比较短，就一两个月，而且主要在假期，基本上没影响上课。现在来看，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肃反”的做法是不好的。群众一旦发动起来，就不好控制。况且，真正反革命的活动，群众是不知道的。“肃反”运动后来也不了了之。究竟找到反革命没有，也不知道。数力系好像没有找出反革命。但这种运动伤了不少人，对党群关系非常不利。

访：1956年1月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随着向科学进军的号角的吹响，全国科学发展的形势很好。而且，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之后，中央出台了“双百方针”，把“百家争鸣”作为发展新中国科学事业的根本方针。全国出现了相对宽松、自由的政治和学术环境。但是反右运动开始后，这种形势一下子全变了。这对我国科学事业影响很大。据说反右运动开始前，北大党委的负责人江隆基出于对北大教师的爱护，提前向他们打了招呼？

丁：这话是对的。北大和清华反右的情况很不一样，北大教师被打成右派的很少，学生很多；清华教师被打成右派的较多，学生少。这可能跟学校里党的领导有关。反右运动快要开始的时候，江隆基在全校党员干部

大会上讲，你们对“大鸣大放”不要稀里糊涂，这是严重的阶级斗争。与会者主要是全校教师党员和学生党员。略有经验的党员在江隆基打完招呼后，说话就谨慎了。

我当时非常幼稚，有点稀里糊涂，没有把反右运动看成很严重的事情，也不太体会严重性在哪儿。有一天，我去参加学生的讨论。因为《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消息说北大学生中有个组织叫百花学社，是反动组织。学生对此不能接受，我也认为《人民日报》所说的道理不够充分。于是，我就从学生会场跑到学校党委去找党委副书记马适安。我告诉他这个结论下得太草率了，学生接受不了；考虑到学生的情绪，应该要求《人民日报》更正。现在看来，我这么做简直是开玩笑，这怎么可能呢？马适安也没说我错，就说研究研究。两天之后，我才知道这个结论是中央下的。从这件事上来看，马适安这个人还是不错的，他没有抓住这件事来整我。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明确指出“大鸣大放”中的很多意见是向党进攻，并不是为党好。北大最有名的右派有物理系学生谭天荣，数力系学生张景中。

访：数力系被打成右派的多吗？

丁：有八九十个右派，主要是学生。当时系里有一个小班，这班学生中，右派比“左”派多。

访：把一些学生打成右派的主要理由是什么？

丁：主要的一条理由是他们对社会不满。有不少被打成右派的学生，念大学前工作过。特别是几个被打成极右派的，在公安部门工作过，了解公安部门中黑暗的一面，到北大后发了很多牢骚。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人政治上并不复杂，实际上是很天真，也比较狂妄。

访：学生被打成右派后还能上学吗？

丁：比较轻的，还可以上学；比较严重的，如张景中就不能上学了，他被发配到新疆劳动。其实，被打成右派的学生多数是有头脑的。但他们在反右运动刚开始时不明形势，也不知道后果的严重性，还一肚子的不服气。有一次，系党总支要段学复、江泽涵、程民德和我4个人去和张景中谈话^①。这次谈话是在他被打成右派之前进行的。我们跟他从上午10点一直谈到下午2点^②，结果也没有能够说服他。当时，系党总支的意思还是想挽救张景中，希望他认个错就过去了，但他坚持不认错。

访：段学复、江泽涵、程民德是系里最有分量的教授，尽管最后没有任何成效，但说明系里对有才能的学生非常重视，想让他转过弯来。

丁：张景中被打成极右分子，后来的经历很惨。他被发配到新疆，干强体力劳动，好在他身体不错。经历了这么沉重的打击，他能够再起来很不容易。1973年我去新疆招生，碰到新疆大学的一个物理教员。他告诉我兵团里有个青年，写了篇数学方面的文章，送到他那里，他看不懂，想请我帮着看看。我看后下了一个结论：这个人可能手头没有资料，提的问题都比较浅，不知道现代数学的研究进展；但这篇文章逻辑性很强，可以看出他受过严格的训练。这件事说完也就完了。一年之后，张景中到北京探亲，顺便看望我，告诉我那篇文章是他写的。他说他是在非常强的体力劳动后，晚上躺在床上凭空想，尽量把大学里学过的东西想出来，写成了

^① 当时党支部是要段学复、江泽涵、程民德和丁石孙一起找张景中、杨路谈话，但杨路未到。参见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72页。

^② 这次谈话可能至下午1点半。参见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74页。

这篇文章。后来，由于有才能，口才也比较好，他在劳改的兵团中当了教员，就把这篇文章送出来了。

听了之后，我发现我当初对这篇文章的判断是对的，也非常佩服张景中。“四人帮”被打倒后，中国科技大学专门派人把他从新疆要到学校当教师。当时我还有点意见，因为我也想去要，但中国科技大学抢先了一步。张景中在北大的同班同学告诉过我：他们做学生的时候，全年级有200多学生，最聪明的就是张景中。如果不被打成右派，张景中后来的数学成就就会更高。

1957年张景中与段学复、江泽涵、程民德、丁石孙谈话内容的摘要^①

首先发言的是段学复先生，他表示了系里对他们两人（张景中和杨路）最近的行动和言论的注意，他们是不对的，希望他们虚心一些，听听别人的意见，好好地想一想，在谈话中再三表示他们对他们二人是诚恳的。接着是江先生谈，他认为他们这样不虚心是不好的，他认为年轻人考虑问题时不应该不考虑历史，不考虑别人意见，不管社会的实际情况，他说这样并不是真正的独立思考。程先生希望他们在政治上划清界限。……张景中谈话的摘要如下：

1. 他的动机是要求自由讨论问题，例如讨论产生三害的原因等，这就是组织黑-思学派与百花学社的原因。

^① 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72~74页。

2. 黑-恩学派的目的不过念些恩格斯的著作，百花学社不是反动集团，在一成立时他们就怕被反革命分子利用，因之没有组织纪律的约束，社不对社员负责，社员不对社员负责，且一切会议是公开的，欢迎同学参加，欢迎党委有人来参加，除去龙英华组织过报告会外，没有什么活动。

3. 《广场》不是百花学社的刊物，为此内部还展开过反宗派主义的斗争，《广场》中每篇文章都是从社会主义立场来帮助党整风的。

.....

7. 谭天荣和他一样，也只是希望自由讨论问题，他的缺点只是有些狂妄而这一点现在已有很大改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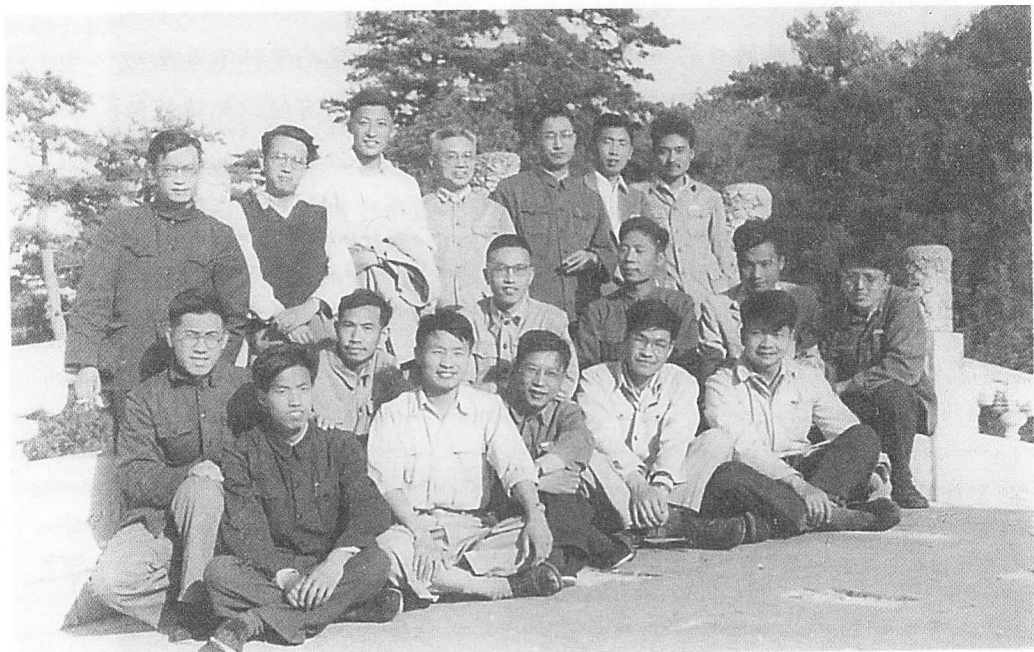
他（张景中）在谈话中，是尽量把事情说得轻描淡写，说他的动机是好的同时坚持他的错误。

在他谈话之后，先生们就问他在今天的反右派斗争中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他的回答是一方面承认在全国范围内有右派，另一方面反复说党委在反右派的同时扼杀了他们这部分人，而不正面回答先生们提出的问题。

他一直坚持他的错误，完全不考虑先生们对他的劝告，谈话从上午十点到一点半结束，先生们对他这样顽固的态度感到气愤。

访：数力系有没有教师被打成右派的？

丁：有，但比较少。一个叫朱德威的年轻教师，当时学得比较好，后来搞地理数学，到了北大地质系。“大鸣大放”之前，别人要他提意见。



1957 年北大数力系部分教师合影(后排左 3 丁石孙, 左 4 江泽涵)

他说:我有老婆和孩子,我不能提,万一出了事会牵连家人。就因为说了这么一句话,他就被打成了右派。

访:真是荒唐!系里的老教授段学复、江泽涵对反右运动有什么看法吗?

丁:他们即使有看法,也不敢说。段先生是“左”派。当时右派最多的言论是党外人士有职无权。所谓的党外人士主要指专家。段先生在一个会上公开说,他是有权的。吴光磊对反右运动很有看法,但说话比较谨慎,别人也抓不住他。

访:在反右运动中,北大的党委领导江隆基也受到了批判,是吗?

丁：对。1957年下半年，陆平调到北大^①，学校开始批判江隆基右倾。这些事情是在学校上层进行的，我当时并不知道。批判江隆基的同时，北大又打了一批右派，叫作补课。因为学校里出了很多右派，党委就觉得教员思想不够好，要更新一批教员，就把1953年入学的一批学生提前到1957年毕业留校，数学系就这样补充了一批教员。

访：1953年入学，1957年毕业，已读满4年，为什么说是提前毕业？难道学制不是4年了？反右运动对数力系的教学又有何影响？划右派的程序是什么样的？

丁：由于学习苏联的教学计划，北大将数力系数学专业的本科学制改为5年^②。这批学生本来应该1958年毕业。反右运动期间，系里的教学不正常，因为划右派，搞运动，占去了很多时间。当时把谁划为右派，要由党总支讨论。因为我是新党员，也不是党总支成员，所以划右派的会我参加得比较少。到底怎么划的，我也不太清楚。当时党委已经发现我有问题了。

访：您有什么问题了？

丁：我有个清华数学系的同班同学，毕业分配到西北工业大学工作。“肃反”运动时，他因为历史稍微复杂一点，挨了整；等到1957年“大鸣大放”，就发了很多牢骚，说他本来没事，别人给他扣了很多帽子。他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把在西北工业大学发的牢骚写在信中。看了他的信，我想应该帮帮他，就给他回了一封很长的信。大意是：知识分子的很

^① 陆平，1957年调入北大任党委书记、校长。此前曾任青年团中央常委兼青工部部长、铁道部副部长。

^② 经高等教育部批准，北大数力系从1953年起将数学专业改为5年制。该系力学专业的学习期限仍是4年。参见《北京大学：1898—1954》（校庆纪念特刊）。北京：北京大学自印本，第12页。

多事情，工农出身的干部不太体会，你不要计较。在反右运动中，这位同学被打成极右分子。他把我给他写的信上交了。西北工业大学找到北大，认为我同情右派。其实，我是好意，想为党做点工作。但北大党委把这件事作为例子，说不要看很多人虽然在本单位反右派很积极，但在其他方面的作为和右派差不多。1958 年夏天，数力系党总支给了我严重警告处分。

访：对这个处分，您服吗？

丁：我心里不服，但不服也得服。而且，你做了这样的事在很多学校被打成右派都绰绰有余，给我严重警告已经是很客气了。我相信在这件事上林建祥帮了我的忙。是不是右派，此后 20 年的处境会很不一样。

下放劳动锻炼

访：您和老同学 1957 年的通信事发后，系里并未立即给您严重警告，其间您的工作受到影响了吗？

丁：受到了一些影响。其实北大党委发现我有问题后，我已在劫难逃。为了改造教员的思想，1958 年北大采取了一个措施，即教师下放劳动锻炼。当时中央的政策是知识分子应与工农结合，被下放劳动锻炼的人，都是被认为多少有些问题的。我是其中之一。下放劳动锻炼的地点在门头沟。为什么选门头沟呢？这大概跟抗日战争时期陆平在那里打过游击有关。当时北大的党委书记史梦兰参加革命前在斋堂镇当过小学教师。他去联系把我们安排在了斋堂，这个地方条件比较艰苦，他可能认为这有利于改造思想。学校公布下放锻炼名单时，安排数力系、图书馆系和中文系的下放锻炼的教师组成一个组，下放到斋堂的达摩村。这个村从门头沟还



1958年丁石孙到门头沟斋堂镇达摩村参加劳动时
与北大同事合影(前排左1丁石孙,左2吴光磊)

要往山上走，在山里。

访：这个组有多少人？

丁：有20人左右，分为4个队，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我是组长。这3个系都有人参加领导小组：数力系是我和邓成光，中文系是张景德，图书馆系是成素梅。学校还有个校工作组负责我们这些人的劳动锻炼，领头的是党委组织部长谢青。数力系的人比较多，住在两个村，即达摩、西达摩。数力系年纪最大的是教授吴光磊。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学校派组织

部长来领队。谢青自己思想负担也很重，觉得他也被认为有问题了。下来不久，他就病了。

访：您还记得第一天下放锻炼的情景吗？

丁：我下放到达摩村。第一天去，就我和邓成光两个人，是打前站的，看看明天大队人马来了怎么住。记得我们两个背着铺盖卷，晚上才到达生产队的队部，还需要自己做饭吃，我们两个都不会。幸好碰到一个乡里的干部，他经常下村里来，会做饭。他让我们买了两斤面，帮着擀了两斤面条，煮了煮放了点酱油吃了。这件事给我很深的印象。

访：下放劳动锻炼主要干什么？生活肯定比较艰苦吧。

丁：我们每天就跟着老乡去劳动，只留下一个人负责做饭。吃的是玉米楂、咸菜、咸疙瘩，生活相当艰苦。刚下去时是一月份，天很冷，劳动很艰苦。我们这些人从来没干过这么重的农活。我们也修过路，北京市商业系统下来一批干部修路，我们也跟着修。门头沟就是一条山沟。我们开始修路的时候，没有什么工具，把石头摆平，就算是路了。我们花很多功夫修的路，后来一场大雨全给冲掉了。1958年夏天，系里把我叫回去，给我一个严重警告处分。当时我感觉无所谓，回斋堂继续劳动，还继续当组长。

我们在门头沟还参加了大炼钢铁。门头沟出煤，按上级的要求，搞了很多小高炉炼铁。我们这些人中抽出一部分专门炼铁。我被抽出来当炼铁队队长。

访：你们恐怕都不懂得炼铁！

丁：我们根本不懂，这简直是胡来。没办法，我们只好派两个教员去学习两周，他们回来就成了技术员。我们修高炉，连耐火砖也没有。据说学校里更乱：因为没有矿石，就把铁门拆下来，把好铁炼成废铁。1958

年这一年从全国来讲，损失相当大。据说，广西很多山上的树都被砍光：当地没有煤，就把树砍下来烧。

这一年搞人民公社，我也是亲自参加的。我们刚从城里下来的时候，还是高级社，但到暑假之后，就成立了人民公社。我印象非常深，有一天晚上，我正跟社员讨论要不要成立人民公社，市委就打电话来要我们立即成立，而且是全民所有制的。当时已经是上面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了。所以只一天的工夫，就成立了全民所有制的人民公社。那天村里的人游行，欢呼庆祝。当时很多东西没想清楚，也不让老百姓想清楚。成立人民公社之后，就宣布吃饭不要钱。也不知道从哪里刮起一阵风，要深翻地，翻地一尺。据说，这样可以丰收。我记得有天晚上，我领了四个人，每人背件行李，带把铁锹，出发去深翻地，走到哪村就吃到哪村。仔细想想，这一年我在农村的生活还是很丰富的，毕竟年轻，吃点苦不在乎。

下放开始时，强调搞体力劳动。过了一段时间，驻地校工作组领导提出来教员不能光参加体力劳动，应该发挥知识和技术特长，搞些技术革新。在此号召下，我们在达摩村的教员，包括数理系、中文系、图书馆系的人，就发挥“优势”干了两件事：一件事是请吴光磊帮助办小学。吴光磊在我们这些人中年纪最大，让他跟着一起干体力活有困难。碰巧村里小学的教员因为年纪大退休了，就请吴光磊接着办小学。这个小学老师就一个人，所有事情都由吴光磊主持，既要教数学，还要教语文。另一件事是，我们抽了个人负责用杏做原料造酒。这个人叫何志强，是我的学生，1953年入学的。他出去学了一下，就在村里空地上开始干。记得他搞了很久也没有造出酒来。学校工作组的想法是好的，想让我们为农村多做一些贡献，但不切实际。我了解这方面搞得更好一些的是化学系。因为山区出核桃，化学系的教员用核桃壳做成了活性炭。当时要我们学习化学系的经



1958 年下放劳动时丁石孙(右)
与达摩村大队长马进爵合影

验。不过，化学系做活性炭后来也没有太大的结果，因为完全没有市场观念，做出来卖给谁、成本有多高都没有搞清楚。

访：通过这次下放锻炼，您主要有哪些收获？

丁：我觉得这一年的生活，对我是很有意思的经历，使我对中国的国情增加了不少了解，让我知道北京郊区还有达摩村这样贫困的地方。从一件事情可以看出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平。达摩村在山区，老乡说我们可以打山鸡吃，还告诉我们，把山鸡的毛拔干净，把骨头砸烂，好吃得不得了。后来我了解到，这个地方还不是中国最穷的，不管怎么说它还是在北京郊区。

1997 年秋，我和张景德、邓成光一起回达摩村看了看。那天中午，清水乡政府请我们吃了顿饭，饭吃得很简单。我记得，这次还有当年在达摩村时把山鸡的骨头和肉一起砸碎了吃的这道菜。我觉得很难下咽，但从达摩村下山来陪我们的人，还觉得这道菜很好吃。可见 1997 年那里生活还很苦。

访：您是什么时候回到北大的？

丁：大概在 11 月份。调我回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北大要把董怀允从数力系调到学校去工作。董怀允在系里是个干部，让我回来顶替他的工作。

从教育革命到“四清”

访：1958年底，全国还在搞“大跃进”，大学在搞教改和红专辩论。您回到北大后，数力系的情况怎样？

丁：当时数力系正在搞教育革命。学生乱哄哄的，贴了很多大字报，提出教学跟科研都要结合实际，批判过去的科研如何脱离实际。而且，学校出现了一些非常奇怪的现象。如让低年级学生为高年级学生定教学计划、编教材，说这样才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就是那个时候，中文系学生编了一本文学史。因为费振刚是支部书记，就让他当头。后来据我了解，学生编的教材，包括中文系的文学史，教师花了很多功夫修改。那时遇到这种情况，我就禁不住发表很多意见，说这是胡闹。

我讲一件最荒唐的事情。1958年底，1957年入学的学生在系里一位总支副书记的领导下，突然宣布他们那个宿舍进入共产主义了。那个宿舍的学生把我们这些人都叫去，把学校的团委书记张学书也叫去感受一下他们的热情。在那种极“左”的情绪下，谁也不敢说一句否定的话，谁也不敢说群众的意见不对。我当时就感觉到，张学书非常为难。他一方面要肯定学生的热情是对的，但他也清楚这是不切实际的。从这件事就可看出当时“左”得相当厉害。

访：这个宿舍宣布进入共产主义有没有标志性的东西？

丁：没有。这个口号提得太突然了。连张学书来了之后，都无法表态。他是北大党委副书记、团委书记。虽然当时我对共产主义没有具体的了解，但心里觉得这件事荒唐，可是也不敢说。

访：到 1958 年底，中央已经发现全国“左”得过了头。1959 年开始，整个风向有点变，要纠“左”，政治气氛变得比较宽松了。

丁：是的，大家的情绪也好了不少。北大提出要整顿教学秩序，逐渐恢复正常上课。当时对我自己来说，有一个重新选择科研方向的问题。因为 1958 年贴了很多针对我的大字报，说我的科研脱离实际；对此我很生气，就下决心不再搞代数了。

访：那您选择了哪个新的科研方向？

丁：我下放锻炼回来之前，数力系已经由程民德组织一批四年级的学生搞控制论。尽管我不懂控制论是什么东西，系里要我领导这批学生搞，我就答应了。当时学生们正在念一本名叫《控制论》的科普书。我跟他们一起念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这本书实际上是一本务虚的书，尽是空话，只提出一些观点，并没有真正的方法。我想，领着学生念这样的书，他们很难得到好处，应该学些实实在在的知识；要理论联系实际，必须要有一些方法，而方法要到成熟的数学知识里去学。因此，我给学生讲，你们不能赤膊上阵，要先学会一些东西。

当时世界上比较时髦的东西是计算机，但计算机的编程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非常烦琐。我就领着学生学编程序。我的想法是设计一种比较接近人的语言的中间语言，给计算机编一种程序，能把中间语言变成机器语言。这实际就是当时美国和苏联都在搞的程序自动化。苏联强调理论，出了一本书，叫《程序自动化》，我就领着学生念这本书。美国人走了另一条路，是比较实际的一条路，设计了一套 FORTRAN 语言。我们比较习惯苏联这一套。当然，这条路苏联人最后也没有走通。搞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要真的把这些东西从理论上搞清楚，就一定要把数理逻辑搞明白，弄通算法论。算法论要定义算法，要给出一个明确的概念，有这个概念是

非常重要的。

访：算法的概念好像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了。

丁：对，是在1936年。所谓算法，简单地说，就是非常机械的一个方法。它不是针对一个问题，是针对一类问题，不依赖具体的问题、具体的数字。算法概念的形成是数学上的一大进步。于是，我就给学生开算法论的课，所选的教材是苏联数学家马尔科夫（A. A. Марков，1903—1979）的《算法论》^①。当时这本书没有中译本。我一边学这本俄文书一边给学生讲。同时，吴允曾给学生讲数理逻辑。他原来在燕京大学哲学系工作，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调到北大的。

访：您领导的这批学生有多少人？程序自动化是当时国际前沿的研究方向。您和这些高年级学生一起做下去有可能给我国的计算机科学及其应用带来好处。

丁：有六七个人，其中有个洪加威后来搞得比较好。很可惜，我们没能沿着这条路做下去，最终放弃了这个方向。

访：这是为什么？

丁：我说过，1958年底我回到北大时，反对过学生参与制定教学计划和编教材，提了很多意见。1959年下半年“反右倾”时，我受到了批判，被剥夺了对这个科研方向的领导权。当时数力系党总支认为我不听党的话，反对教育革命。因此，我被迫离开了控制论组。现在看来，这种批判是有背景的，就是陆平调来了，要批判江隆基，要用他的一批人取代老的一批人。陆平给数力系派来的是吕正操的夫人刘沙。刘沙其实是小知识分子，来了之后做系党总支书记。她发现底下的人都不听她的话，而是听

^① 马尔科夫的《算法论》出版于1954年。

林建祥的。她就组织批判林建祥，同时批判包括我在内的一些教师，把我们所有科研方向的领导权都剥夺了。

访：据我们所知，林建祥这个人很好，是一个十分诚实、本分的人。刘沙要批判他总得找些理由吧？

丁：刘沙抓他的辫子，说他右倾。抓什么辫子呢？林建祥的父亲在什么场合曾把蒋介石的佩剑带回家。就因为这个原因，说林建祥接近于异己分子，说他家里反动，决定把他开除党籍。

访：又是一件荒唐事！

丁：当时的荒唐事很多。回想起来，放弃研究程序自动化这个方向，是我一生的遗憾。实际上，我们搞程序自动化，起步并不晚。1958、1959年世界上也是刚开始搞语言，我们跟世界先进水平差距不大。当时我们念苏联的书，并没觉得困难。况且，我们搞这项研究有很大的优势，因为我们都是学数学的，有扎实的数学基础，并且我领导的这批学生也很强。可是系党总支剥夺了我的领导权，我就一赌气放弃了这个研究方向。1960年我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1962年甄别平反之后，洪加威和另一个学生来看我，我还跟他们讲放弃研究程序自动化是我终身的遗憾。

访：您说1960年您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是有什么严重的“罪状”吗？

丁：一条罪状是说我隐瞒自己名下的房地产。在我很小的时候，祖父为了逃避遗产税，把镇江的房地产登记了我的名字。当时我很小，根本不懂这种事。尽管房地产在我名下，但我并没有经营这些房地产，无从向组织汇报。另一条罪状是说我隐瞒我父亲的罪行。我父亲懂点医，帮别人流产，出了事，被判了刑，但没执行。这事我完全不知道。因为这两条，就把我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出党。

访：您对这种惩罚是什么态度？

丁：我非常恼火。当时我还在北京东郊的国棉二厂搞超声波。系党总支派人到国棉二厂找我谈话，宣布对我的处理决定。我一气之下就在对我的处理决定上签了字。当时我政治上很幼稚，不知道阶级异己分子是什么意思。

访：搞超声波？超声波属于物理学的研究领域，您是学数学的，为什么要搞超声波？

丁：1960年，全国突然兴起了一股超声波热。这完全是彭真他们胡闹，认为超声波可以创造许多奇迹，不管什么东西用超声波超一下，很多不能完成的事就可以完成了。当时北京各行各业都在搞超声波。有很多人认为搞超声波很容易，把水管子压得扁一点，水出得急一点，就是超声波。我不是学物理的，不懂超声波是怎么回事。数力系让我带着学生到国棉二厂去搞超声波。这实际上也带有思想改造的性质。在国棉二厂，我们用超声波超麻秆这类东西，认为用超声波把它们超一下，就可以用了。当时我们还超纤维不太好的棉花，认为超一下，它的纤维质量就提高了。

访：当时你们没有表示怀疑或觉得奇怪吗？

丁：没有。领导让我们超，我们就超。

访：您被开除党籍后还教课吗？

丁：1960年暑假前，我们从国棉二厂回到学校。系里有一段时间不让我上课，只让我给我以前的学生张恭庆改习题。据张恭庆后来讲，他经常挨系党总支的批，说对我太客气了。

访：当时数力系党支部由谁负责？

丁：刘沙和我的一位留校的学生负责。刘沙当书记，这位学生当副书记。

访：1962年您就被甄别平反，恢复了党籍。这距1960年被开除党籍大约两年，时间不算很长。

丁：在我甄别平反、恢复党籍这件事上，桂琳琳起了很大的作用。1961年暑假，桂琳琳带着我的大儿子丁诵青回上海。当时因为心情非常坏，我就没有一起回去。桂琳琳在上海做了一件事，就是把我的所谓“罪状”——我的房地产问题和我父亲的问题的前因后果都了解清楚了。桂琳琳认为我受处分的依据是不符合事实的，相信我对这些事情确实不知道，而不是隐瞒。于是，她在上海写了份详细的材料，回到学校交给了校党委。

我们反映问题的时机正合适。当时刚开过七千人大会，学校党委正准备给1960年以来的冤假错案甄别平反。我们的材料交上去不久，学校党委就决定要重新审查对我的处分。当时数力系党总支书记刘沙生病，学校派来了代书记，叫陆元灼。陆元灼也是位女同志，由她来处理这些遗留问题。她了解了有关情况，找我谈了话，最后研究决定给我甄别平反，恢复党籍。从1961年暑假开始，系里就恢复我讲大课，继续教代数。1962年，数力系还让我当60级学生的年级主任。

访：这意味着系里又对您重用了。当年级主任顺利吗？

丁：不算顺利。我当年级主任时，60级学生情绪很大。原因是1960年政治气氛比较“左”，北大招生主要看成分，不大重视成绩。由于学生成绩参差不齐，给教学带来很大的困难。1961年学校整顿教学秩序，对学习成绩有严格要求，学习太差的学生要处理。当时数力系就出现了一种情况，即“三大面积”。所谓“三大面积”就是学生大面积不及格、大面积留级、大面积退学。这件事对这级学生影响相当大。因而，他们对系里很有意见，发了很多牢骚。

作为年级主任，我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安抚他们，稳定他们的情绪，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当时我虽然恢复了党籍，但过去的政治运动使我懂得了对待成绩不好的学生一定要慎重。我对学生的态度可能在以后的运动中被提到阶级立场的高度来评价。所以当年级主任时，我非常小心，在工作中紧紧依靠学生党支部。当时60级学生党支部书记，是高年级留下来的一个学生，叫周寿松。在一年的工作中，我跟他配合得很好。周寿松毕业后分到了浙江，据说死得比较早。

访：当年级主任不顺利，对您的情绪影响大吗？

丁：尽管我已经甄别平反，恢复了党籍，但当时我的情绪非常坏。这不仅是因为当年级主任不顺利，主要还是因为经过几年的折腾使我非常灰心。记得1962年系里找我，问我想搞点什么研究。我的回答非常干脆，说再也不搞研究了。同时，我还讲一定把书教好，争取把我的高等代数讲义出版。等到书出版以后，我要离开北大。当时我对问题的看法比较简单，认为我的遭遇是北大造成的；其实不是，这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政策造成的。

另外，我的情绪不好跟我的学生郭悦成也有关。郭悦成是数力系专修科学生，大学只念过两年。他人很聪明，学得非常好，1954年毕业后就留在系里的代数组。1958年，他被借调到内蒙古大学，1962年回到北大。当时他情绪非常坏。原因是这样的：他的家族过去很有钱，在上海开了个很大的百货公司，叫上海永安公司。解放后，他的父辈就跑到美国去了。1956年他父亲死在美国，留了一份遗产给他，大概有几万美元。当时他是共青团员，不知道是否该要，就请示系党总支。系党总支可能还请示了校党委，最后认为这个钱他应该接受。他按组织的意见接受了这笔遗产。可是，他借调到内蒙古大学时，正值反右后期，内蒙古大学就把他批了一

通，并开除了他的团籍。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他认为自己没有错，是组织让拿的。内蒙古大学的领导就不理睬这一点。这在他的心理上留下很大的阴影。他认为共产党说话不算数。

1962 年他回北大，我发现他完全变了，变得灰心丧气，对搞数学全无兴趣。我问他想干什么。他说想回上海，跟爱人团聚，到上海干什么工作都可以。到上海后，他没再搞数学，只在一般的学校里教教书。就因为政策不一致，把这么一个有才华的青年毁了。“文革”以后，我还给他写过信，说他想搞数学我可以帮助他介绍适当的工作，但他仍然很灰心。以后我就没再见过他。

访：政治因素毁了郭悦成。很可惜！

丁：还有我提到过的赵嗣元也主要因为政治因素的影响，后来被埋没了。赵嗣元在数力系读书时成绩很好，他毕业时，我建议系里把他留下来任教。但留校后，他认为共产党很多事都不可靠，不发表论文。反右运动期间，数力系有人贴我的大字报，说我对赵嗣元这样一个思想落后的学生这么看重，并和程民德都想争他。由于系党总支认为他政治上不可靠，两年后就让他离开了北大。

访：1959 至 1961 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全国出现了严重的粮食短缺和饥荒，现在一般称这三年为三年困难时期。在此期间，您的生活受到的影响大吗？

丁：从 1959 年下半年，吃的东西就很少了，好一点的香烟也买不到。当时我抽的是没牌子的烟，6 分钱一包，质量很不好。到 1960 年下半年，供应我们的粮食定量也减少了，我由原来的定量每月 31 斤减为每月 27 斤。

更严重的是，外面什么东西都买不着，只靠 27 斤粮食，加点大白菜

等蔬菜。当时很多人浮肿。我家里有杆秤，每顿吃多少米都要量一量，以免月底没吃的。有一次我骑车到颐和园，发现一个小铺里卖几分钱一碟的果酱，很高兴。但他们一次只卖一碟，每天我就去买好几趟。有一次，李舜伟^①从情况稍好的上海回来，带了两个肉罐头。中午吃饭时我们打开一个，这就是一顿极好的午餐了。当时丁诵青在幼儿园吃饭。我们去看他，给他带过一个蛋糕。他拿到手就赶紧往嘴里塞。还有一次把他接回家，给他吃一个白薯。他把烂的都吃得干干净净。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的生活相当惨。当时学校里所有的晚自习，所有的体育课，全都取消了。那段时间，很多人因缺乏营养，身体浮肿。为解决浮肿的问题，政府给高级知识分子每月发一斤白糖、一斤黄豆。当时讲师已经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所以我每月也可以领到这些东西。当时有一句玩笑话，就是把把我们这些讲师以上的人叫作“糖豆”干部。

访：1961年情况是否有所好转？

丁：到这年一二月份，北京百货大楼开始卖高价糖果和高价点心，糖果五块钱一斤，比平时贵十倍。饭店这时也开始卖高价菜。据说这是陈云的主意。从这以后，我们的日子好过了一点。因为我们的工资还算是高的，钱我们是有的。1962年下半年开始，学校比较强调科研，当时同调代数是比較新的数学分支，我在段先生组织的讨论班上讲了它的一些基础知识。

访：自1964年起，全国又开始了比较大的政治运动，即“四清”运动。当时您下到农村搞“四清”了吗？

丁：去了。“四清”之前，是在1963年，我有一段时间参加了万哲先在数学所组织的一个讨论班。因为要到农村去搞“四清”，半途退出，很

^① 李舜伟，桂琳琳的表弟，毕业于上海医学院，1958年到北京协和医院工作。

可惜!

访: 这个讨论班讨论的内容是什么? 有谁参加?

丁: 参加者主要是万哲先的学生。北大数力系去参加的就我一个人。这个讨论班主要念 1955 年谢瓦莱 (Claude Chevalley, 1909—1984)^① 发表的一篇文章《李型单群》。1956 年我们曾试图念这篇文章, 但因政治运动停顿下来了。到了 1963 年, 万哲先认为这篇文章非常重要, 就组织人念。这次也是因为政治形势没有念完。我这一生中很多事情都开了个头, 但未等到有结果就不得不放弃。有人问我为什么会这样。他们知道了我的经历, 就知道了原因。由此可见, 频繁的政治运动对学术研究和经济建设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访: 您什么时候去搞的“四清”? 下到哪个农村? 搞“四清”的情况, 您还记得吗?

丁: 1964 年 1 月, 学校派一些人到农村搞“四清”。我被派到怀柔县张各庄公社。和我在一个村里的有数力系的一位老师, 叫周民强, 他比我年轻一点。我们到的时候, 村里已有一批北京市的干部。数力系跟我一批下去搞“四清”的, 还有姜伯驹、林振宝等, 他们在另外的村子。我们在“四清”中主要依靠当地的党支部, 做得比较文明, 也没有乱批斗人。到五六月份, “四清”并没有搞出什么名堂, 但上边说还要继续搞下去, 让我们这些工作队员到县城集训。大概 6 月份, 我们来到怀柔县城, 住在县委招待所。当时怀柔县城就一条马路, 根本没有像样的铺面。

这次集训长达 3 个月。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 因为原定的学习任务快完成的时候, 桃园经验出来了, 又需要继续学习。虽说是学习, 实际上没

^① 谢瓦莱, 法国数学家, 主要研究代数数论、代数几何和李群, 是布尔巴基学派的创始成员之一。

有太多的事情。我们经常出去转一转。那里的西瓜很便宜，5分钱一斤。我的工资比较高（107元），经常出钱请大家吃。当时力学专业毕业的学生武际可在怀柔县城的“四清”办公室。我们晚上没事，就走到他那里闲聊。这样，我跟他就比较熟了。

访：集训结束后，是回校还是继续搞“四清”？

丁：集训是1964年9月份结束的。结束后人员重新分配。我被分到朝阳区三间房。当时，北大又来了一批教员。北京市的人也不是原先在一起的了，从房管系统下来一批干部。我在三间房当了工作队队长。我的顶头上司是市房管局副局长，这个人倒不错。记得姜伯驹在三间房旁边的一个村，叫定福庄。这时“四清”按照桃园经验的办法来做。我是工作队队长，跟房管局副局长之间有一个联络员，这个人就是北大哲学系教员汤一介。当时我们工作队开全体大会或者队长会，都要跑到通县县城去。

访：您是什么时候从三间房回到北大的？

丁：1964年11月。大概在10月份，我听说北大也来了“四清”工作队，队长是中宣部副部长，叫张磐石。北大“四清”的目标是批陆平。这时聂元梓就已经跳出来了。11月份，我突然接到通知，要调我回学校，但没说明理由。我把工作交给汤一介，背上行李包，骑了辆自行车回到北大。第二天，我去数力系的工作组那里报到。工作组给我的答复非常奇怪，说其实我可以不回来，让我先回家休息。过了几天，我才知道就在调我回来之后，毛主席的关于社教（社会主义教育）的“二十三条”发表了。“二十三条”表面上是纠“左”，实际上是针对刘少奇的。“二十三条”第一次提出社教运动的目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尽管我不知道背后的东西，但从字面上理解好像是打击面要缩小。到“文革”开始后，我才知道“二十三条”是针对刘少奇的。

据说社教期间，数力系贴了我不少大字报。当时专门设一个房间贴大字报，是对内的。我没去看，不知道大字报的内容是什么。学校的社教最后是草草收场。社教中把陆平批了一通。后来彭真出面，召开了一个国际饭店会议，把学校总支以上的干部和社教的积极分子集中在一起，重新澄清是非。

访：您参加这个会了吗？

丁：我没参加。据说，会上给在社教中受到批判的人恢复了名誉。国际饭店会议在北大的历史上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后来听说背后支持这次会议的人是邓小平。

访：在“四清”结束到1966年“文革”开始这段时间，您是不是比较安定，一直在教课？

丁：不太安定，有一阵忙着给数力系搬家。1965年上半年，北大在十三陵附近建了分校，我们把那里叫200号。200号从1960年开始修，当时的规划非常宏大。陆平做报告时的描述很动人，说校园背后是山，面积很大，要在校园里修铁路。1965年建好的有一幢办公楼，几幢宿舍楼，还有一个食堂。学校决定数力系和无线电系先搬过去。我负责数力系图书室的搬家，从安排如何搬，到书架和书的编号、捆书，我都参加了，记得捆书捆了很长时间。1965年暑假，一年级新生就到了分校。

访：分校的设计标准高吗？

丁：很高。每层楼都有热水，教师可以在本楼层打开水，也可以洗澡。

访：当时由西郊北大校区到分校交通方便吗？

丁：不方便。但北大每周往分校发班车，周一把我们送去，周六再接回来。我们这些教师在那里很舒服。我有一间房。每天下午5点打乒乓

球，有时也爬山。那里空气很好，也很安静。记得1965年我有一段时间没课，跟两个年轻教师下到石景山特殊钢厂联系实际。这两个人，一个是尤承业，一个是詹汉生。他们都是学几何的，后来跟我做过辅导员，帮我改学生做的习题。我们住在那里，吃在那里。当时首都体育馆正在盖。我们回校时，从特钢坐公共汽车到首体，再换332路公交车。

访：1964年春节，毛泽东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他发表了很多关于教育的看法。有一个观点是“现在书多得害死人，近视眼成倍增加。现课程多，砍一半”^①。北大数力系的课程受到毛泽东讲话的影响了吗？

丁：影响很大。记得当时毛泽东说大学的课程可以砍三分之一，比砍一半要少一些。1965年底，教育部为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就调了一批各门各类的人到上海来讨论。我去参加了，住在衡山饭店。按照砍三分之一的要求，我们重新修订各科的教学大纲。当时抓得很紧，要求1966年暑假后就要实行新大纲。教学大纲修订完以后的任务，就是重新写教材。我接受了写一本《高等代数简明教程》的任务，内容要比原来的教材少三分之一，并且要在1966年暑假前出版。现在回想起来也很有意思。毛泽东要求把大学的教学内容砍三分之一，我们就毫不犹豫地执行了。

访：后来您按时完成这本书的写作任务了吗？

丁：完成了。由于时间紧迫，我只能用剪刀加糨糊的办法，从1953年我和聂灵沼、王萼芳翻译的斯米尔诺夫的《高等数学教程》第3卷第1分册中挑选内容，自己再添点东西，把前后的内容连接起来。1966年2月，初稿完成。高等教育出版社准备出这本书，他们审稿抓得很紧。当月我又到了上海，住在华东师大的一座小洋房里。审稿的人有华东师大数学

^①《毛主席在春节座谈会上对教育革命的指示和学制研究简报》。北京：中国科学院档案：1964-1-75。

系主任曹锡华、北师大的刘绍学、吉林大学的谢邦杰，高等教育出版社还去了个编辑。记得审稿前后用了两周时间。在这两周里，我一边审稿，一边根据大家的意见做修改。编辑随即进行编辑加工。两周后，稿子就可以付印了，效率非常高。

审稿完成之后，我回到北京继续上课。大概四月份，高等教育出版社通知我，他们准备将这本书拿到日本的图书展会上展览，让我认真校对一下。我认真校对了两遍。这本书刚出版，“文革”就开始了，所以我没看到新书。我第一次见到这本书，是在1971年。当时我刚从江西干校回来，在学校图书馆见到这本书。图书馆的人告诉我，这本书在海淀中国书店当废书在卖，我就去买了一本。1974年，总参三部要我们给他们培训一批搞密码的干部。他们送来的学生一般都是高中毕业，课要从高等代数讲起。北大数力系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段学复。他建议总参三部的人去找高等教育出版社，把我写的这本书的底版要来。总参三部利用这个底版印了一批书，给他们的学员使用。

对这本书，我还是有点伤心。因为我花了很大力气，结果它没有起到应该起的作用。“四人帮”打倒后，大概是1978年，教育部又想重新修订高等代数教材。我当时有点气愤，拒绝参加这项工作。最后是在这本书的基础上，由王萼芳、石生明稍作修改，改名《高等代数》出版。1988年，这本书获得高等学校教材一等奖。我虽然没有参加修改，但后来这本书每次得奖，他们都把奖金分我三分之一，因为这本书的底子是我打的。

访：尽管这本书没有如您所愿，起到应该起的作用，但此后经过修改在大学高等代数教学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样的结果应该令您欣慰。



我听说有个斗鬼合，就和教研室的人从我们住的16楼跑去看。没想到路上有人喊“丁石孙是牛鬼蛇神”。

在黑帮大院，各人的待遇不一样。陆平和彭珮云没吃很大的苦头，但有的人就不同了。管我们这些人的是生物系低年级的学生，虽然他们年龄很小，但在晚上收完工要把我们集合起来训话，经常还要挑出一两个人来骂一顿。

当时华罗庚认为我们推广正交设计是跟他唱对台戏，所以他到处说邓东皋的不是，因为邓东皋是系里的头。

记得“文革”结束前的一个春节，北大给每家分了一只骨瘦如柴的鸡，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

第5章

“文革”浩劫

“丁石孙是牛鬼蛇神”

访：“文革”是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遭遇的最大的政治浩劫。北大是全国“文革”的中心。据我们所知，您在这场政治浩劫中没能幸免于难，受到了不小的冲击。我们对您受冲击的具体情况不太了解，您能详细谈谈吗？

丁：可以。1966年5月25日下午，我从石景山特殊钢厂回到北大，发现学校已经很乱了。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在大饭厅贴了一张大字报，即“五二五”大字报，点了三个人的名字：一个是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另两个分别是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党委副书记彭珮云。大字报的题目好像是在这三个人的名字后加上“究竟在干什么”^①。

^① 这张大字报的标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什么？》。参见《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三家村”黑帮分子宋硕陆平彭珮云负隅顽抗妄想坚守反动堡垒》。《人民日报》，1966年6月2日，第1版。

当时我并不知道大字报的背景，后来才了解到这张大字报是毛泽东派曹轶欧到北大找人写的。聂元梓对陆平不满，知道曹轶欧有背景，就组织了七个人写这张大字报。^① 这张大字报贴出来之后，又引出了许多大字报，有同意的，也有反对的。

晚上12点，北大有人到我家里通知桂琳琳，说校党委要召开党员干部大会。来北大召开这次会议的是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当时李雪峰没有搞清这张大字报的背景，在会上代表华北局表态，说陆平是个好同志。他讲话之后，学校的意见就一面倒了。据说学校开了许多讨论会，进行了很多辩论，压倒多数的人认为陆平是对的。但一个星期后，情况突然变了。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聂元梓的大字报的全文。当时我在北大昌平分校，听到这个广播后，非常吃惊。我们都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李雪峰在此之前已经表了态。

访：据说是康生把这张大字报的底稿直接送给毛泽东的。毛泽东指示这篇文稿可以由新华社全文播发，在全国各报刊发表。6月2日，《人民日报》不仅全文发表了这张大字报，还发表了题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这篇文章称北大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说北大的党是“假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党’”，号召群众起来将之“彻底摧毁”。^② 不知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这张大字报时是怎么讲的？6月1日之后，北大就更乱了吧？

丁：记得广播里讲，毛泽东说这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月1日

^① 曹轶欧为康生的妻子。这七个人包括聂元梓、宋一秀、夏剑彘、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

^② 《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见《人民日报》，1966年6月2日，第1版。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北大第一张大字报与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之后，整个学校领导机构就瘫痪了，党委已经不起作用。那时候在昌平分校的人比较少，就数力系和无线电系两个系的师生。数力系的一些学生开了各种不同的批判会。系中有些人自认为是“左”派，就煽动学生起来批判右派。

访：您是不是属于被批判的右派？

丁：我被认为是属于右派。当时受到批判的主要是系党总支的领导。在分校搞了几天的批判会后，数力系的人就回到了校本部。回到校本部后，我受到了批斗。6月18日，北大开了个非常坏的会，搞了两个斗鬼台，把所谓的坏人拉到台上去斗。这在全国影响很坏，很多地方模仿北大。其中一个斗鬼台是由数力系在哲学楼门口搞的。我听说有个斗鬼台，就和教研室的人从我们住的16楼跑去看。没想到路上有人喊“丁石孙是

牛鬼蛇神”。随后就有几个人冲过来拉住我往哲学楼跑。

访：这是不是有预谋的？这些人都是数力系的吗？

丁：没有预谋。那个时候组织上很乱，逮住谁，就是谁。他们都是数力系的学生。

访：您被拉到哲学楼后挨批斗了？

丁：对。那时有些“左”派教员支持这些狂热的学生，给他们出主意，否则他们不会斗我。这些学生把我拉到哲学楼后，就从厕所里拿了便纸篓扣到我头上，记得那是用铁丝拧成的。然后把我拉到台上，喊了几句没有什么实际内容的口号。喊完口号后，就拿墨水往我头上倒，弄得我脸上、白衬衣上全是墨水。当时刘少奇已经在北大派了工作组。工作组实际是不同意这么搞的，但也不好跟群众作对，就等我在台上站了一会儿后，把我喊下来，给我端了盆水，让我把脸稍微洗一下。等学生散了，工作组的人说：“你回去吧。”

访：被批斗时，您发火了吗？他们批斗您的时间长吗？

丁：当时发火就要倒霉，所以我干脆什么都没说。批斗我的时间并不长，不到半个小时。记得在校本部“革”了几天命后，数力系的人又回到了昌平分校。7月1日，陶铸到北大讲话，我们在分校听了有线广播。陶铸当时是中宣部部长，在党内排第四号。在讲话中，他说文化部部长的文化水平不能太高。陆定一是大学生，所以不行。他说他自己是中学生，看来也是不够格的，应该是小学生才好。我们听下来觉得他的报告总体比较温和，但他可能也吃不透形势。这次讲话之后没几天，他就被打倒了。

访：数力系的人是什么时候又回到校本部的？

丁：我不记得确切的时间，应该是在7月1日之后。那时系里的学生认为应该回到校本部“闹革命”，所以就决定所有的人，包括教员都回去。

于是，我们就坐了火车从南口到清华园。等回到校本部，数力系的学生没地方住，当天晚上就住在大饭厅里。教员们都各自回家。不久，学生的住处就解决了。

访：数力系回到校本部是怎么“闹革命”的？

丁：每天开小组会学习。那时好像没有什么批判会。记得在7月份，学校用巴黎公社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文革”领导小组，以聂元梓为首。各系也开会，要成立系“文革”领导小组。就在开会的时候，宣布我们这些人没有选举权，不能参加群众大会，把我们打发到食堂打扫卫生。我无所谓，我早就没有选举权了，觉得去劳动也没什么关系。就在那天晚上，我的同学董怀允承受不了压力，自杀了。当时是“文革”初期，死了人还认为是件大事。晚上10点钟，通知我立刻搬行李到18楼去住。我当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这是怕我们像董怀允一样自杀。我在18楼大概住了1个月，后来有人认为我跟教员住在一起太舒服了，又让我搬到学生宿舍。

后来整个的情况就比较乱了，开始进行大串联。因为北大是“文革”的发源地，第一张大字报就是在这里贴的，外地学生一批批到北大来参观。学生宿舍要挤出地方让外地学生住。北大买了很多被子发给他们。我住在学生宿舍，每天劳动，干打扫厕所一类的活。我后来才知道陆平和彭珮云住在29楼，只要来一批学生，就要把他们两个喊下来一次，让他们站在花坛上示众。那时来的外地学生很多是中学生，有的什么都不懂，经常把他们两个当作动物一样拉出来展览一下。记得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过好多批到北京来串联的学生。

到1966年10月，我发现学校里的学生一天天地减少。因为那时是互相串联，北大的学生陆续出去串联了。实际上，一些学生并非专心串联而

是借这个机会去旅游。年底有一天，一位没去串联的学生找我，说这里没人管你了，就让我回家了。

从“文明抄家”到连襟自杀

访：“文革”期间，有不少知识分子都被抄了家。您的家被抄过吗？

丁：我不止一次被抄家，应该有两三次。那时抄家比较文明，不拿值钱的东西。抄家的人拿走东西时，还让我看一下。我第一次被抄家是在1966年八九月份全国刮起破“四旧”之风的时候。那时所谓的“四旧”要全部清除掉。有一天下午，学生押着我从学校宿舍到我在中关村的家，要看看我家里有什么“四旧”。这些学生比较守规矩，说：“我们不动你的其他东西，就看看你的书什么的，是不是有些属于‘四旧’。”然后就在我家里抄了一通，把床底下、抽屉里都翻了。

访：您的家那时在中关村的什么地方？这些学生翻到“四旧”了吗？

丁：我住在中国科学院23楼，就在中关村。它最早是中国科学院跟北大合作搞原子能研究时建的楼。我调到北大后先住在德斋。后来萧树铁要结婚，系里就让我让出来，另分我一套在健斋的房子。之后，又搬到中关村23楼。“文革”期间，我就住23楼。当时我跟大家开玩笑，说我的房子越住越小。

这些抄家的学生只翻到一套《红楼梦》。我家里有不少马列主义的书，他们抄完家后感到很奇怪，就问：“你这么一个人，书架上怎么几乎都是马恩列斯毛的书？你的‘四旧’呢？”

访：最后他们只拿走了这套《红楼梦》？

丁：除了这套书外，还有少量的业务书和一包信件。这些东西再也没还回来。我觉得最可惜的是那包信件，因为其中有些是我在上海时，我的女朋友写给我的信，它们对我有保留价值。

记得这些学生押我回家的时候没有带口袋，没法带走在我家抄的信件和书。他们就让我在家待着，等他们晚上来取。下午我一人在家，没有什么事情。当时，我和在北大幼儿园工作的一位姓王的老太太是邻居，关系处得不错，合用一个卫生间、一个厨房。我管她叫王老师。王老师带着一个外孙女一起住。她女儿在唐山工作。就在这天下午，王老师家过去的佣人刘姥姥来看她。王老师解放前是军阀的姨太太。刘姥姥原是王老师的丫头，陪嫁来到她家做佣人，王老师的外孙女也是她带大的。解放后王老师的条件差了，刘姥姥就去别处另谋生路。但因跟王老师感情很好，她每周还来看王老师。刘姥姥看到我一个人待在家里，样子很可怜，告诉我不怕，好好休息，并给我做馅饼吃。她说她解放前是给人家当丫头的，是无产阶级，红卫兵来了由她对付，要我一定吃了馅饼再走。等晚上学生快来了，她还说你赶紧吃。这次吃馅饼是我一生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之一。

访：“文革”期间，不少人都会疏远遭到批判的人。而刘姥姥不但没有躲着您，还安慰您，为您打抱不平，实在难得。难怪您对这件事印象如此深刻。

丁：还有一次抄家是在1967年四五月份，跟我的连襟、桂琳琳的妹夫孟宪振自杀有关。孟宪振清华大学毕业，是学无线电的，后来留苏。自杀前，孟宪振在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工作。由于他的能力和业务都很强，又是党员，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和物理所都对他很重视。有一天中午，我在家吃过饭后，发现门口有一张纸条，是孟宪振留给桂琳琳的，希望她下午6点钟到他家里去一趟，商量桂璐璐生孩子的事。我看后递给了桂琳琳，

就去劳动了，没在意。

6点桂琳琳到她家时，那里已经一团糟了。因为孟宪振失踪了，物理所的人到处找不到他。晚上七八点钟，香山派出所的人通知有人在香山上吊了。

从后来发现的情况看，孟宪振自杀是计划好了的。法医解剖了孟宪振的胃，发现里边有氰化钾。孟宪振是又上吊又服毒，下定决心要死。实际上，他并没有什么大问题，科学院也没有开会批斗他，只是有群众质问过他。

访：群众质问什么呢？

丁：之前，科学院派他去过英国。他在英国通过美籍华人买了些仪器。有群众就说他里通外国。他觉得说不清楚，认为这下完了。自杀前，他一直很顺利，没受过什么挫折，一遇到挫折就承受不了了。孟宪振自杀后，物理所的人就到我抄家，想查明毒药——氰化钾是从哪里来的。

访：这些人抄家时，是说来抄毒药的？

丁：没有说。他们乱翻一通后，发现没有，就走了。

访：孟宪振自杀，是“文革”期间的悲剧。如果他闯过了这个难关，后来可能很有发展前途。

丁：很有可能。顺便讲一下，清华大学物理系著名教授孟昭英是孟宪振的父亲。“反右”时，孟昭英被划为右派。^①“文革”时就更倒霉了，孟昭英的大儿子孟宪振自杀，小儿子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精神失常了。之后，小儿子的媳妇就跟他离了婚。当时他们已经有了个儿子。孟家被政治运动搞得家破人亡。

^① 孟昭英 1955 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因划为右派，1958 年 6 月 21 日被撤销学部委员职务。20 年后，即 1979 年 7 月，恢复学部委员名誉。

黑帮大院

访：1966 年底，您被放回家后是不是就比较自由了？

丁：是的。因为学生都出去串联，没有人管我，我也不用到学校开会。记得 1967 年的春节，我们过得还比较愉快，买了很多菜，改善了伙食。那时工资还是照发的，钱并不缺。可是好景不长，1967 年春季里有一天，系里来人通知我要继续去劳动。第二天我到系里，看到大概有十一二个人参加劳动，其中有系总支书记陆元灼，还有程民德和几个右派。陆元灼是 1961 年陆平从铁道部带来的。她人品比较好，没有架子，经常找我谈谈话。我在前面讲过，她到数力系后对一些有问题的人进行了甄别，1962 年恢复了我的党籍。有一段时间因为陆元灼生病，程民德代理过系总支书记。

访：参加劳动的右派有哪几位？你们的劳动任务是什么？

丁：一位叫程庆民，是党员，当过系总支宣传干事。他人比较好，书也教得不错。反右时，他参加了学生的一次会。后来有人揭发说他同情学生，帮助右派出谋划策。还有一个是我提到过的朱德威，跟桂琳琳在北大同届毕业。

我们这些人的劳动任务，就是拆洗被子和缝被子。外地很多学生串联到北大后，学校买了很多被子给他们用。这些用过的被子都要我们拆洗干净、缝好。被子真是很多，也睡得比较脏。一开始，我们都不会缝被，陆元灼教我们怎么缝。我就是那时学会缝被子的。“文革”以后很长时间，我们家的被子都由我来缝。我们劳动的地点在红二楼和红三楼之间的一个

食堂里，这个食堂有口很大的锅，我们就在锅里洗被子，然后拿出去晒干、缝起来。那段时间过得也还算愉快，没有人管我们。生活也很有规律。每天住在家里，在家里吃饭，到上班时间去干活。

访：“文革”期间，全国许多地方打派仗，北大也打派仗，这影响到你们劳动了吗？

丁：1967年1月发生上海风暴，造反派开始夺权，打派仗。北京的群众分成两个派系，一个是天派，另一个是地派。那时几乎所有的大学、机关单位都分成两派。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政治观点不同，但实际上反映了长期积累的人事纠葛。北京的所有派别或属于天派，或属于地派。尽管它们并不都叫这两个名字，同一体系内的派别可能没有组织联系，但它们会互相支援。大概在1967年下半年，北大出现了井冈山和新北大公社。人数多的是新北大公社，属于天派，以聂元梓为首；井冈山属于地派，周培源被推为“寨主”。那时北大就比较乱了，造反派都忙于打派仗，没人管我们这些被打倒的人了。等到1968年初串联停止后，我们也不用洗被子了。

访：据说，“文革”期间，北大造反派间的武斗很厉害。有时进攻的一派，举着门板往前冲，防守的一派用石头砸。这特别像古代的攻城。太可怕了！

丁：是这样的。还有的用皮带做弹弓。更厉害的是活活把人打死。有时打派仗也很滑稽。譬如晚上，一派在地上撒了很多黄豆，由于光线暗，看不见，另一派冲过来，就滑倒了。

访：到什么时候又有人管你们了？

丁：到1968年上半年，记得有一天学校突然通知我第二天带铺盖卷到煤厂集合。煤厂就在现在校医院旁边，是烧锅炉堆煤的地方。第二天我

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干什么。到了之后，首先看见的是一帮学生把朱光潜当作开玩笑的对象，让他背毛主席语录。他背不出来，学生就打了他几个耳光。当时朱光潜的年纪已经比较大了，看起来很可怜。等我们这些人都到齐后，被带到昌平一个叫太平庄的村子。那儿是1965年历史系开门办学的地方，离200号不太远，有历史系盖的一些房子，还有一些地。我们就住在那儿种地。

访：种了多长时间的地？

丁：不到十天，又让我们回学校，但不让回家，而是把我们关进了黑帮大院。黑帮大院就是所谓的“牛棚”。这时北大已经有了“牛棚”，在民主楼和外文楼之间，以这两栋楼为两堵墙，再用泥巴把另外两边也垒了起来，里面有十几间平房。季羨林写的《牛棚杂记》的“牛棚”就在这里。这些平房是1950年代盖的。当时因为学生增加了很多，教室不够用，盖这些房子当作教室。我们就被关在这些平房里，每个房间差不多住二十几个人。

访：是谁搞的黑帮大院？里面总共关了多少人？你们在黑帮大院干什么？

丁：黑帮大院是新北大公社聂元梓他们搞的，大概关了200多人。我们在那里主要是劳动。陆平、彭珮云当时也都被关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参加劳动。管我们的人有工人、学生，还有“左派”教员。每天有人带我们排队出去，在校园里干各种活。吃饭就在黑帮大院里边，搭了席棚，有人从食堂里把饭送来。“牛棚”里的大部分人，有事可以给几个小时的假。比如让回家拿件衣服什么的，个别问题比较严重的不允许外出。

关在黑帮大院的人，一部分是“文革”初期被打倒的，还有一部分是打派仗时被抓住的井冈山派的人。管“牛棚”的人最痛恨这些俘虏，经常

把他们拉出来打；对我们这些“死老虎”倒是不太管。我印象中，干的时间比较长的活是到仓库里把器材摆整齐，像钢管什么的。干这种活要两个人一组，和我一组的是当年清华同年级的同学汪永铨。他是无线电系的系主任，手比较巧，很会干活。负责管我们的工人，每天把要干什么活、怎么干讲了，就没事了。我们两个干活非常认真，跟那个工人的关系很好。仓库里的活不太重，干活时也比较自由。另外，我和汪永铨的铺位挨着，晚上睡觉时可以说点悄悄话。

在黑帮大院，各人的待遇不一样。陆平和彭珮云没吃很大的苦头，但有的人就不同了。管我们这些人的是生物系低年级的学生，虽然他们年龄很小，但在晚上收完工要把我们集合起来训话，经常还要挑出一两个人来骂一顿。他们在管理黑帮大院时，像电影中集中营里的法西斯，跟你说话时满脸笑容，趁你不备突然打你几个耳光，或突然罚你跑几圈。

访：这就是当时改造人的方法？

丁：实际上，不管这种斗争搞得多么激烈，对人的思想、心灵并没有真正的触动。我们这些人在里边劳动时间长了，一切都习惯了。最有意思的是，居然有人在里边谈恋爱、搞婚外恋。所谓的“思想改造”是没有效果的。

访：在黑帮大院，除劳动之外，你们还干些什么？

丁：晚饭之后，有时要求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有的工人看你不顺眼，就打你几下。有的人被学生叫出去，挨一顿揍。

访：白天干完活，晚上还挨揍？

丁：对。被打的人还不敢说。当时我们都互相知道这一点。我在黑帮大院时，也经常被学生叫出去，但没挨过揍。这些学生是向我调查一些事情。记得有个叫周铎的人在黑帮大院被打得很厉害，遭遇很惨。在北大读

书时，周铎是调干生，对社会上的很多事情了解得比较清楚。反右时，他在西语系开了个控诉会，控诉所谓共产党监狱里的黑暗。可能因为他嘴巴比较硬，不认错，认为自己讲的是事实，就被打成极右分子。“文革”期间，我看见他时就发现他精神已经有了问题。因为他精神有问题，黑帮大院里负责管教的学生就老拿他开玩笑。他们问他问题，他不知道怎样回答；叫他做什么事情，他也做不好。晚上，我们经常听见他被打得大喊大叫，后来就死掉了。周铎反右时被整得精神失常，“文革”期间被活活整死。

生物系的党总支书记胡寿文也挨了很多揍。他跟我同一届在清华毕业，是潘光旦的女婿。可能是因为他过去在群众运动中整过一些人，学生对他意见比较大。他后来告诉我，有一个晚上，学生在黑帮大院里宣布要处死他。两个红卫兵带了长矛，把他带到外头，说要一下捅死他。他做好了死的准备。但红卫兵并没有杀他，而是吓唬他，完了就放他回来了。“文革”之后，他又做了生物系的总支书记，重新掌权。由于对“文革”中反对他的学生很反感，他下决心把其中留校的学生赶走。我劝他不要太怪学生，这些学生也是受害者，要对他们团结，对他们太厉害没好处。由于对“文革”中整过我的人，我都是团结的，有人说我的手太软。“文革”中，数力系曾有个低年级的学生打过我耳光。“文革”后，他的单位来调查。我说在当时的形势下他打我，是可以理解的。

访：黑帮大院是什么时候解散的？里面死的人多吗？黑帮大院解散后，你们干什么去了？

丁：1968年十一前后，大约存在了半年时间。里面死的人很少。北大在“文革”中相比外地可能还算是文明的。黑帮大院解散后，我们回到各自的系里，集中住在一起，不准回家。当时我不知道已经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数力系除了进过黑帮大院的人，又添了一个人，和我们关在一起。

这个人叫卢崇飞，是我的学生。他一进来，我感到很惊讶。因为他给我的印象一直很“左”。卢崇飞的历史比较复杂，他爸爸是国民党军官。系里把他隔离起来审查，是有人看见他在毛泽东像上画了叉。因此，他被定为现行反革命。

清理阶级队伍时，北大的打击面相当大，死的人比较多。我们住在29楼时，数力系有个年轻教员，叫陈永和，从4楼跳楼自杀。他1952年考进北大，读专修科，两年毕业后和郭悦成一起留校，深受程民德赏识。记得陈永和喜欢打桥牌，打牌时常聊聊天，他随便说了点什么，反右时被打成右派。当时还死了一个从美国回来的教授，叫董铁宝，是搞计算数学的，业务很强，英文也好。他在美国军事部门工作过，回国时带回来很多美国的机密材料，对国家是有贡献的，国内搞计算数学的人都很重视他。但“文革”中，他被扣上了“特务”的帽子。他想不通就自杀了。“文革”中，数力系教员中自杀的一共有4个人。刚才说了2个，还有前面提到过的董怀允。1965年北大召开国际饭店会议时，董怀允作为组织委员，是特邀“打手”，站在邓小平一边。“文革”中，邓小平挨批，董怀允不知道自己的下场如何，经受不住打击，就自杀了。

另外，还有一个叫张景昭的女教师自杀。她是教外系课的，全系表扬过她课教得好。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她做过美军翻译，“文革”中就因为这点事把她打成了反革命。她想不通就自杀了。北大化学系有个副系主任，也是因为做过美军翻译而被打成反革命自杀的。这位副主任死后第二天，他的夫人跳了北大校园内的红湖，也死了，很惨！北大才三千教员，受审查的就有一千人，自杀的人也太多了。

1969年初，上面决定把六十三军派的军宣队撤走，换了8341部队的人。这样北大在政治上发生了变化，收缩了打击面。

8341 部队的人来了之后，发现像我这样的人，根本查不出来任何问题，历史上的事情都做过结论。管数力系的大概就是个小排长。他发现我没什么问题，但也不敢给群众泼冷水，就暗示我做个深刻的检讨。管我的两个学生，老是问来问去，好像我还有什么问题没交代。我不知道他们到底要了解什么。他们实在不耐烦了，就告诉桂琳琳，说是想搞清楚卞国琨来北京时，我是否见过他。我这才明白。于是，我明确告诉他们，我没有见过卞国琨，卞国琨来时我已经没有自由了。这样，我就解放了。

访：卞国琨是您提到过的清华同学吗？

丁：是。他跟我同班同学，毕业后分到军事单位工作，后被开除军职，到西北工学院工作，反右时被打成右派。有人说“文革”中他来找过我，可能是想要些粮票。但我未见着，因此时我已被看管。1969 年上半年，于“文革”初期停止的党组织活动又恢复了，我们又有了正常的党员身份。以后这段时间比较平静，北大的武斗也停止了。

下放干校

访：“文革”中，全国很多单位的干部都下放去了干校。北大教师下干校是什么时候？您也去了吧！

丁：1969 年的第四季度，林彪发出了一号命令，就是要战备，北京人要疏散，要求我们在一周内搬到江西鲤鱼洲。北大有两千多人下放江西，只有老弱病残或被认为政治上特别可靠的留下。数力系主任段学复就没有去。

访：为什么选择去鲤鱼洲？

丁：鲤鱼洲这个地方是工宣队和军宣队去找的。那时大概中办（中央办公厅）的干校在江西，他们在附近给北大找了块地方。实际上，北大在1969年第三季度就决定在鲤鱼洲搞干校，并派了一批人打前站，到那里做准备工作。我们快要动身时，从江西传来消息，说打前站的死了几个人。死的人有物理系、化学系的，名字都记不得了。死的原因是：鲤鱼洲全是荒地，他们吃菜要乘船通过鄱阳湖去买。在买完菜回来的路上，遇到风浪，他们认为菜是国家的财产，不能受损失，舍不得把菜扔掉。结果船翻了个底朝天，有几个人爬上船底。晚上湖里特别冷，他们冻得受不了，有的就落水被水冲走了。化学系有个职员也在这条船上，很幸运地活了下来。

访：这个职员能活下来真是万幸。死了几个打前站的人，是否使您觉得鲤鱼洲是个不祥之地？

丁：有一些。但我还是去了，而且是全家三口一起去的。走的时候，我们把衣服全装了箱子，没有准备再回来。在北京的亲属也认为我们不会再回来了。我妹妹丁永宁全家和桂璐璐还到火车站送我们。在车站发生了一件偶然的事：我妹妹的两个孩子刘迅、刘卫东也一起来送站。刘卫东才四五岁，在车站上跑丢了，大家都急着去找他。本来有很多离别的话要说，因为这个小插曲没有来得及说，这倒冲淡了我们离别时的伤感。

我们乘火车到达南昌站已是下午。当时北大在南昌有个办事处，负责接待来往的人。办事处的人很快把我们送到鄱阳湖边。我们乘了一条很小的船去鲤鱼洲。这条船篷子很矮，人根本站不起来。同船的人中，有我的老师王宪钧和他的两个儿子。王宪钧四十几岁才结婚，他的两个儿子都比较小，才十一二岁。他夫人是北医三院的大夫，记不清是什么原因没有来。

在船上，我根本想象不出鲤鱼洲是什么样子，等上了岸，才发现完全

是一片荒地。那时天已经黑了。我们住的房子是个特别大的草棚，可以住几百人。草棚四周的墙还没砌好，只有一个房顶。棚子里边有很多柱子，柱子间钉上木板，可以在上面睡觉。

访：这里的生活条件够艰苦的。

丁：确实很艰苦。而且，鲤鱼洲根本没有什么东西买。买菜要坐船到周围的农村去。买个冬瓜回来，就是一天的菜了。

访：一般的干校都是按连队编制分成连、排、班。你们在鲤鱼洲干校，也是这样的吧！

丁：也是按照部队的规矩，搞成连队编制：党委机关是一连，物理系是二连，化学系是三连，数力系与技术物理系合编为四连。我们的主要工作是种水稻。每个连有一个种菜班，我就在种菜班。

访：种菜很讲究施肥，您挑过粪桶，给菜上过粪吗？班上有多少人？

丁：挑过粪桶，也给菜上过粪。种菜班的人很少，只有几个人，班长是我的学生、出身比较好的石生明。我们不跟大队一起行动，比较自由。过了不久，干校从各个系抽了点教员，在鲤鱼洲成立了小学。校长是教务处的一个干部，叫孟广平。丁诵青就进了这个小学。因为老师都是大学教师，教学质量还不错。丁诵青在这个小学读了一年多。因为大学老师讲课讲得比较快，所以他 1971 年回到北京，就跳了一班。小学本身也是个连队，也有种菜的，丁诵青在小学里干的活也是种菜。

当时我们一家分在三个连队。只有每两周放一天假时，才能聚在一起。通常放假这天，上午我们到附近的一个小镇买点糖果，给丁诵青吃，中午回来，又各自回各自的连队吃饭。如果我们两个大人的连队的菜比较好，可以打完菜，把孩子叫来一起吃。好在过了一段时间，工宣队讲一家人都在这里应该让团聚，并给每家分一间草房。这样，我们一家三口才

住在了一起。这间草房很简陋，江西多雨，雨天连床上都漏湿了。我们买了很多塑料布，搭了个棚子挡雨。

访：您能回忆一些数力系其他教员在干校的生活细节吗？

丁：可以。记得为了照顾一些老同志，连里找一些比较轻的活让他们干。比如让程民德喂牛，他跟牛住在一起。廖山涛什么农活都不会干，年纪也稍微大一点，就让他养猪。这两个老同志都非常认真。当时马希文还编了一个相声，内容是教授养猪、放牛，就是讲的廖山涛和程民德。这个相声在干校很受欢迎，后来还被拿到北大演。当时姜伯驹是做馒头的。和姜伯驹一起干活的炊事班长是郭仲衡，曾在波兰留学十年，是学力学的；这个人也很老实，后来评上了院士，现在已经去世了。还记得鲤鱼洲的土很怪，一下雨路就滑得很，在这里走路是一关。一些老教授雨天不敢在路上走，只能沿着田埂走。当时我们体会不到他们的难处，还觉得他们娇气。

干校的伙食条件很差，能吃一次肉卷，就是美味佳肴。当时有个教员一口气吃七个，一个至少有二两多，于是这个人就得了个外号，叫“七笼”。教员中有些农村来的，特别是南方农村来的，很会干水田里的活。比如，有个教员叫林源渠，身体特别好，干活谁也干不过他，插秧谁也没他插得快。所以我们就送他一个外号，叫“三猛”，即“猛吃、猛睡、猛干”。

现在回想起这些细节，还觉得很有意思。尽管这一阶段很苦，但大家都过得还算愉快。干校大部分人都是教师，知识分子成堆，可以发点牢骚；工宣队和军宣队毕竟人数少，我们基本处于无人管的状态。

访：除了农活，还干其他活吗？

丁：记得1969年底或1970年初，领导决定抽调北大化学系的一部分

人跟清华的一部分人，到德安修建化肥厂。1970年四五月份，桂琳琳就跟三连一起去了德安。有一次丁永容来看我，在我这儿待了大半天，帮我把箱子里的衣服拿出来晾晒一遍，把脏衣服全给洗了。

南方种庄稼，一年两季，最忙的时候要数夏天，叫“双抢”，即抢收抢种。因为南方经常下雨，收割晾晒要抓得很紧，晚上我们都睡得很少。我跟丁诵青睡一张床，蚊帐里经常进来大量的蚊子，要起来打。“双抢”之后，大概是夏天刚过，化学系的军代表回到鲤鱼洲办事，碰巧看见我。他比较关心我们的生活，就对我说，你的两地分居问题我给你解决一下，你干脆跟我去德安。那个军代表姓范。我们都喊他老范。他让我整理一下行李，下午跟他走。我征求丁诵青的意见。他说鲤鱼洲有很多小朋友，他不走。所以有一段时间他就一人留在鲤鱼洲。由于从小经受过很多考验，丁诵青的独立生活能力很强。

访：德安的情况如何？

丁：德安当时有两个连队，北大一个连队，清华一个连队。他们还按工种来分，盖房子的是泥瓦匠，还有木工。张孝文那时是木工，后来当过清华大学校长^①。因为有人带了小孩来，还临时办了个托儿所。桂琳琳当过一段托儿所所长。

访：住宿条件比鲤鱼洲有改善吗？

丁：比鲤鱼洲好些。工厂为解决夫妻分居问题，在附近买了一些房子。因为是花了六千元买的，大家就把它叫作六千号。从六千号到工厂，只需翻过一个山头。这些房子过去可能是教室，我们用水泥袋和竹子，把它隔成一些不到十平方米的小间，每间住一家人。房子之间根本不隔音，

^① 1988年10月至1994年1月，张孝文任清华大学校长。

讲话邻居都能听得见。那时我正好有两个木头箱子，就摆在我的床边，作为桌子。

访：您是和大家一起修建化工厂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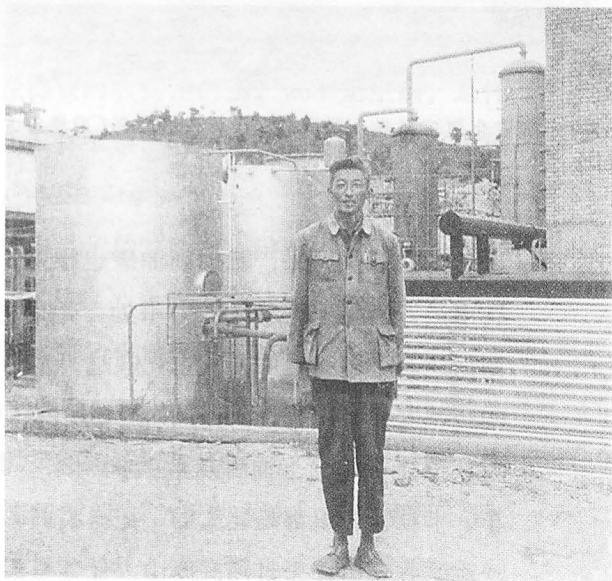
丁：我到德安，开头是和大家一起盖厂房。不久，领导考虑到化肥厂盖完后需要一批工人，就提前派人到附近的农村招工人。新招来的工人编为第三连。因为我是学数学的，不懂化学，三连成立后，我被分到三连当司务长。三连食堂边上有一间小房子，是我的办公室，里边还有张床，可以睡觉。

访：司务长要解决好吃饭问题，不容易。您主要干些什么工作？

丁：主要任务是买菜。每天早上，我推个两轮车大概走两三里的路到城里买菜。那时我穿的衣服破破烂烂，当地的人说我根本不像个知识分子。如果哪天能买到豆腐，我就很高兴，大家喜欢吃。所以，有空的时候，我就跑豆腐房，跟他们说点好话，请他们抽烟。他们高兴了，就卖给我一些豆腐。

当司务长有个好处，可以经常到南昌去买东西。有时我和二连的司务长搭个卡车就去趟南昌，偶尔在那儿能买到糟鱼，一坛子一坛子

1971年丁石孙在江西德安化肥厂劳动时留影





1970 年德安化肥厂部分人员及家属游庐山时合影(后排右 3 丁石孙)

的，大家都很高兴，能买到油渣也很好。我想方设法让大家吃得好一点。在南昌，落脚地是北大的办事处，旁边有个刀削面馆，我有时去吃一碗。南昌还有个野味餐厅，我也光顾过，是为了解解馋。

德安离庐山很近。1970 年 11 月，厂里组织我们去庐山玩。我和桂琳琳就提前写信把丁涌青从鲤鱼洲叫来一起去玩。去时乘坐的是厂里的卡车，卡车和司机都是北大的。记得我们一家人在仙人洞前合了影。除了这一次，我还单独去过一次庐山，任务是买肉。我想庐山是旅游胜地，东西可能多些，结果一无所获。1970 年春节，想改善伙食，我买了条狗。那

年春节三连吃上了狗肉。

访：1970年庐山会议之后，许多干校就撤销了。北大在江西的干校是何时撤销的？

丁：庐山会议召开时，我们并不知道，只看到那段时间飞往庐山的飞机很多。等庐山会议结束后，我们才知道会上批了陈伯达，批了天才论。那时我们还不了解这实际上是针对林彪的。

1971年，我的印象是在夏秋之交，北大干校撤销。我是最后一批离开德安的。我们走时，德安化肥厂还没完全盖好。最后一段时间，我们就吃得很好了。据说，在鲤鱼洲干校的人吃得更好，因为他们养猪，走之前把猪都杀掉吃了。北大的人在鲤鱼洲两年，把那里建得相当不错，盖了砖房，修了路，拉了电灯，还能做冰淇淋，生活比较舒服。

我离开德安大概是9月。我们一家三口是分3批离开江西的。丁诵青是跟着中学从鲤鱼洲走的。桂琳琳因为感到身体不舒服，以为病了，所以稍早一点回去，先到了上海。我在德安时收到她的信，说不是生病，是怀孕了。后来我和桂琳琳商量，因为没什么事，决定把孩子生出来。这个孩子就是丁干。

在我走之前，我们剩下的这些人去了趟井冈山，游览了黄洋界，玩得比较仔细，坐卡车来回走了6天。9月底，我们一家三口在北京团聚。当时我们都很馋，专门去了趟全聚德，要了半只烤鸭，好好吃了一顿。

记得我在鲤鱼洲时，做过一件傻事。有一段时间我只能领20元的生活费。有一天军宣队通知我，要把扣发的工资发还给我，大概有八九百块钱。由于我对扣发工资很生气，当场就跟军宣队的人讲，这些钱我不要，全交党费。其实，那时的账目管理非常混乱，这些钱我不领，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等到丁干出生，家里的钱一度非常紧张，生活很苦。这时我才



1971 年丁石孙与德安化肥厂部分人员、
家属游井冈山合影(后排右 1 丁石孙)

想到，如果有那八九百块钱，情况会好一些。

访：离开北京去干校时，您说过没有准备再回来。这次回京，一定很有感触吧！

丁：我回到北京时，林彪已经出事了，就是“9·13”事件。有一段时间，林彪的事情没有公开。国庆节时，新华书店的橱窗里还挂着林彪的照片。10月10日左右，17级以上干部到工人体育馆听报告。我们根本没想到林副主席会出事，觉得事情太奇怪了。因为那时纪律很严，当时桂琳琳还没有资格去听，所以我回到家里也不敢说。

林彪事件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震动。由于它的影响，我的思想开始发生转折。在这之前，尽管“文革”搞得乱七八糟，自己也吃了很多苦，但总以为自己错了，没怀疑过毛泽东。历次政治运动，包括反右、“文革”，总是很真诚地检查自己。林彪事件以后，我才想，毛泽东也犯错误了。这个弯转得太厉害了，因为林彪做接班人已经写进了党章。

还有一个情况需要讲一下。从干校回到北大，我感到不适应。在江西时，虽然比较苦，但比较自由，心情还比较好。从江西回来，我发现学校里的人说话都很谨慎，不像我们在江西时比较随便——可以经常发点牢骚，批评这个批评那个。而且，1970年北大招了一批工农兵学员。这批学员有个任务，叫“上、管、改”，就是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要批知识分子。回到学校，我们发现日子不好过。据说上课时，有的学生水平很低，听不懂高等数学，就站起来拍桌子，说：“你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唬人，故意让我们不懂。”这样，学校里的人胆子变得非常小。

应用数学组，密码短训班

访：1971年回校后，您有教学任务吗？

丁：刚回北大时，因为数力系只有1970年招的一个班的工农兵学员，包括我在内的多数教员没有教学任务。1972年，数力系成立了一个应用数学组，专门搞数学应用。我参加了这个组，段学复也在里面。根据任务，这个组又分了许多小组。我和几个原来学概率的年轻教员组成一个小组，到棉纺厂去推广正交设计。

访：还记得这几个年轻教员的名字吗？你们推广正交设计，是为了解



1972 年丁石孙在北大

决什么问题？

丁：一个叫刘婉如，是 1952 年入学的，还有一个叫汪仁官。另外，可能还有一两个是科学院数学所的。正交设计主要解决在多种不同方案要做实验的情况下，如何安排可以使实验次数做得较少的问题。

这种办法是日本统计学家在 1960 年代初搞出来的，在理论上比较简单，也比较实用。

访：1972 年，华罗庚建立了“普及双法小分队”，这个小分队主要在全国普及优选法。当时搞应用数学好像比较流行？

丁：对。我们推广正交设计时，华罗庚正在普及优选法。优选法更简单，只考虑一个因素，叫单因素的选择。比如生产时，优选法只考虑多少温度适合生产一种东西，不考虑别的因素。而在实际生产中，常常涉及多个因素，优选法是不大好用的，但正交设计可以解决多因素的问题。

当时华罗庚认为我们推广正交设计是跟他唱对台戏，所以他就到处说邓东皋的不是，因为邓东皋是系里的头。我们不管他，继续推广正交设计，跑东郊国棉一、二、三厂，写讲义，介绍关于数理统计的基本知识。数理统计这套东西，我在大学没念过，毕业以后也没接触过。当时是一面学，一面写讲义。可惜这些讲义现在都找不到了。

访：正交设计跟您以前搞的学科的特点不一样。您是怎样看待这样的经历的？

丁：它还是有好处的。我过去搞的都是决定性的理论，因果关系都是决定的；而统计是非决定的，结果不一定确定，是随机的，有多种可能性。这对我最大的好处是知道了该怎么考虑随机问题，熟悉了不同的思想方法。

访：你们推广正交设计最后有效果吗？

丁：没有见到效果。当时我们想通过推广正交设计，不用棉花而是用麻秆做出纤维来。可是当时只停留在纸面，没有实验，最后不了了之。

访：纸上谈兵，很难有好的效果。华罗庚普及优选法还是有些影响的。

丁：华罗庚是大人物。中央对他普及优选法给予了肯定，加之他的名气大，不论到哪个地方都予以重视。但他普及优选法，很难说有真的效果。

访：您刚才提到应用数学组根据任务不同又分了许多小组。除了您这个小组外，还有什么小组？

丁：应用数学组还有一个搞光学仪器的小组。当时江青要拍电影，想我国自己生产电影摄影机，而要生产出拍摄的清晰度很高的电影摄影机，就需要设计很复杂的镜头。负责生产任务的东北光学仪器厂来找北大数力系、物理系的人，希望帮助他们设计这种镜头。数力系参加这项工作的有姜伯驹、张恭庆、石生明。我们两个小组在一个办公室，有时在一起聊聊天。据说解决这个问题要列出方程，方程数目非常多，变量也非常多，相当复杂。这个组搞得很不错。因为姜伯驹、张恭庆专业都很强，他们想了一些好办法。

访：我们知道，北大数力系在“文革”结束前为总参三部办了一个密码短训班。您能回忆一下办这个班的经过吗？

丁：总参三部跟数力系在 1950 年代就有过联系。我记得 1954 年，他们送来 4 个人，都是解放军，在我的班上上课。这 4 个人一直学到反右以后才走。当时因为他们都是党员，所以在 54 级学生的党支部里做负责人。

那时总参三部之所以要派人到数力系学习，是因为他们认为数力系开的概率统计课对他们有用。破译密码就是统计你不懂的符号出现的频率，然后猜这个符号代表什么意思。福尔摩斯探案就用过这个办法。在破案的时候，福尔摩斯发现一些奇怪的符号，他就统计哪个符号出现的次数比较多。比如，在英文里出现最多的是“e”，他就假定这个符号代表“e”，然后再看看和这个“e”联系在一起的是什么，慢慢把这句话的意思破译出来。最早搞密码的就用这个办法。20 世纪 50 年代总参三部认为数学对他们有点用，也是因为这一点。

而到 20 世纪 70 年代，电子通信发展速度非常快，用过去的办法不行了。国外这时用线性移位寄存器来加密。总参三部的人发现，国外编密码用的数学知识已不是概率，而是代数了。我们还在推广正交设计的时候，总参三部的人开始跟段学复接触。大概在 1974 年，总参三部正式找段学复，希望北大能给他们办个培训班，教授所需的代数知识，为他们培养一批密码方面的人。1974 年这个班成立，我参加了其中的教学工作。

访：看来，这次您又回到了代数这个老本行。

丁：是的。这个班有三四十个学员，大多是 1960 年前后的高中毕业生，基础还可以。他们叫我丁教员，这是按照部队的规矩对老师的称呼。他们很尊重老师，对我们态度非常好。那时我又开始重新学习一些东西，因为有些要讲的内容我原来也没学过。记得我边学习边给他们讲线性移位

寄存器，后来还写了一本这方面的书。除代数外，我还给他们讲过组合数学。在我当学生的时候，组合数学就指排列组合，我们把它看成游戏，觉得好玩。到20世纪70年代，组合数学已经发展成一门很重要的学科。这主要因为人们逐渐发现它有很多用处，跟实际联系得很紧密。那时也出了一些组合数学的书，我就花了点功夫念。我教这批学生有一年多的时间。他们1976年毕业，毕业时还做了论文。

访：他们的论文做得怎么样？

丁：他们做毕业论文，就是写一篇小文章，题目由我们指定。有的人做得比较好，其中有一个叫陈宝馨，是1960年的高中毕业生。短训班结束后，又过了两年，她到北大来进修。那时我正在开代数数论的课。她跟着我招的研究生赵春来等人一起听课。她学得很好，后来去了总参三部的研究所。这批学生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了总参三部的骨干，有的还当了将军。他们告诉我，那时学的数学知识对他们很重要。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有的学员还回来参加了。

从赴新疆招生到“批林批孔”

访：您提到1970年数力系招了一个班的工农兵学员。之后，还招工农兵学员吗？

丁：自1970年至“文革”结束，每年都招。那时没有统考，招工农兵学员相当麻烦，要一个一个招。1973年学校招生办派我去新疆招生：7月份去，9月份回来，历时3个月。新疆地方很大，有时要费很长时间才能找到一个学生。那次我还招来一名维吾尔族学生。

访：具体是怎么招生的？

丁：首先，是地方政府推荐。然后，招生的人到那个地方跟被推荐人谈一次话。在我的印象里，数力系自 1970 年起招的工农兵学员普遍文化水平较低，大都没有培养前途，在系中学习 3 年，毕业后改行的很多。1973 年招来的学生比过去两届的成绩好一点，因为我参加招生的这年，对被推荐的人进行了考试。但他们仍然是参差不齐，平均水平只相当于初中毕业，到毕业时大多也达不到大学水平。

访：在新疆，您除了招生，还有其他活动吗？

丁：我在乌鲁木齐还有些熟人，经常跟他们聊天。如新疆大学的党委书记史梦兰原在北大当过党委书记，是个老革命，过去在门头沟打过游击。他到北大前曾在人民大学当系主任。那时的党委和现在不一样，实际是机关党委，管党团工会。史梦兰这个人能力不太强，但人品很好。新疆大学有我教过的北大毕业生，我们有时也互相拜访。

我发现新疆有些说法很怪。比如吃西瓜时，他们就说“我们把这个瓜宰了”，很有意思。新疆的羊皮质量比较好，我买了两张带回来给桂琳琳做了件羊皮大衣。这东西现在没人穿了，沉得很，而当时还解决了点问题，因为桂琳琳要下工厂，等公共汽车的时候比较冷。

我还到过伊犁，它在北疆，地理条件非常好，每家在街边都有果园，种着苹果。我住在伊犁招待所，跟四川大学的两个人在一起。有一天，我们听到广播，讲白卷英雄张铁生的所谓“事迹”。从此，招生的办法全变了，被推荐的人无需经过考试了。

记得从新疆回京，是通过亲戚走后门才买到卧铺票的，回到北京已是 9 月下旬。我从新疆带了 2 麻袋葵花子和 4 个哈密瓜，当时这些是非常好的东西。我们给刚 1 岁多，还没长牙的丁干吃哈密瓜，他很高兴。我们还

请李舜伟夫妇在国庆节那天到家里来吃饭，用哈密瓜招待他们。

访：您从新疆回来后，没有多久，“批林批孔”运动就开始了。这次运动对您有影响吗？

丁：这次运动是1973年底开始的，当时叫“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的矛头实际指向周总理。林彪倒台后，当时周总理想改变过去“左”的做法，并且采取了一些措施纠正“左”的错误。如让万里出来当铁道部部长，整顿铁路；让李先念抓财政。赵紫阳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到了四川。李先念对管财政还是有经验的。我记得听李先念做过一个报告，说到要提公务员的工资。提多少，我不记得了，可能也没有真提。李先念说提公务员的工资，就提高了公务员的购买力，从总体上来说国家是上算的。我觉着这说法很新鲜。周总理的整顿措施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毛泽东非常害怕会否定“文革”，所以要搞“批林批孔”。把林彪和孔子联系到一起批判，这非常牵强，一些材料我看了都觉得好笑。

在数力系，“批林批孔”运动是围绕所谓桥牌俱乐部展开的。桥牌俱乐部是由系里一批单身和已经结婚但两地分居的教员组成的。他们晚上没事，就经常聚到31楼，找个房间打桥牌。参加的人员主要有姜礼尚、石生明，还有汪仁官，可能还有盛森之。他们一边打桥牌，一边聊天。主要因为闲着没事，我也经常去，但不打桥牌，只聊天。不知因为什么，有人说桥牌俱乐部是反动组织，要进行批判。打桥牌的人的主要问题也就是发牢骚，对两地分居不满意，当时解决两地分居问题非常困难。

桥牌俱乐部的事情把我也卷进去了，在全系批判。我的所谓错误主要是跟他们谈了一些新疆的情况。比如，我说史梦兰这个老头很可怜，有时我到他家去，他跟我诉苦，讲新疆冬天特别长，有时地很滑，去食堂吃饭或出去买点东西都很困难。他说年纪越来越大，在这里很苦，很想调回北

京去。我还说了一句话：当时的报纸上一般都说“形势大好”，但新疆的报纸上是说“形势越来越好”。我就和他们开玩笑说，现在不是形势大好，而是形势越来越好。这样，就给我扣了几顶吓人的帽子，说我污蔑大好形势，搞“西北串联会”等。

运动搞了两个月，规模不大，贴了点大字报，在系里开点名批判会，最后要求我们写个检讨。搞到春节，这个运动就完了。之所以收场，我的理解是因为国家的形势越来越坏，不得不收场；如果再搞下去，国家的经济就崩溃了。

化学分析仪器厂

访：1974 年春节“批林批孔”运动结束后，全国的政治形势似乎有所好转。您是不是就正式教课了？

丁：1974 年没再搞运动，政治形势确实有所好转。这一年我开始给 1973 年招来的学生上代数课。这级学生跟 70 级的不同，他们希望学些东西，听课很认真。那时要求理论联系实际，不能光在课堂里上课，要下工厂。当时我负责 73 级的教学，下到温泉北京化学分析仪器厂联系实际。我带着学生在那里住了差不多半年，上午上课，下午劳动。我和学生被分配到各个车间干活。

访：您具体干什么活？

丁：我干的是车工。专业性强的劳动我不会干，只能在车床、刨床上跟着师傅干点活。我感到在工厂里还算舒服，只要好好劳动就行，没有人来批判我。

访：在工厂里上课，学生有作业和考试吗？

丁：有，但都很少。考试时也不敢让谁不及格。

访：这半年里，有给您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事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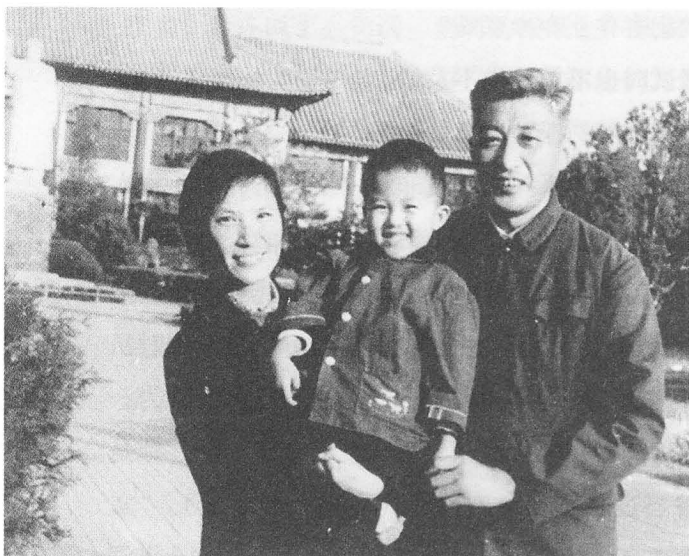
丁：有这样一件事。一次，数力系一位一度非常“左”的行政负责人到厂里检查工作。在我宿舍里，她跟我聊了很长时间，最后她哭了。她是老北大1951年的毕业生，毕业后被派到苏联留学，拿了副博士学位。她谈到1958年回国时，除老北大的人，系里大多数人她都不认识。她对从清华和燕京来的人的看法，是从“红专辩论”的大字报上得来的，认为一些党员变质了，所以在政治运动中积极批判了一些人。“文革”前，她是副系主任；“文革”中，曾当过系革委会副主任（主任是段学复）。“文革”中她也挨了批判，才发现自己原来的很多看法有问题，认为自己伤了很多不该伤的人。而且由于各种运动，她的业务也耽误了。

这次交谈后，我改变了原来对她的印象，感到她人不错。过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很多人像她一样，属于认识问题。“文革”后她下决心搞专业，后来搞得不错。打倒“四人帮”以后，系里的权力转移了，段学复当系主任，我当副系主任，她跟我仍然保持了很好的关系。在运动中，会有很多假象，有的人整人是品质问题，有的属于认识问题。

“文革”结束前夕

访：“文革”结束前一两年，也就是1975和1976年，您在数力系主要做什么工作？

丁：1975年数力系又进来一批工农兵学员，我开始担任这批学员的



1975 年丁石孙与家人合影
(左 3 丁石孙, 左 2 丁干, 左 1 桂琳琳)

教学组长。当时教师和学生中的党员合编为一个支部,许忠勤是支部书记。支部书记相当于现在的辅导员。我是支部委员,还有一个学生当支部委员。我这一年的精力主要花在这个班上。尽管我只教一门课,但作为教学组长,政治学习都和他们在—起。因此,我跟这个班的同学比较熟悉。

其中的欧亚非和孟实华,后来还都跟我有联系。当时学习气氛稍微好一点,学员上课比较认真,但基础差别很大。我教他们代数,是从初中代数教起的,还包括分数的加减法,非常简单。那时学生已在学校里上课,也到学校的仪器厂参加些劳动。

访: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全国人民都很悲痛。数力系学生的反应怎么样?

丁:周总理逝世那天,我到学校的仪器厂去看学生,他们哭成一片,非常伤心。我的情绪也很糟。当时我们都觉得,国家的希望系于总理一人,总理一去国家就没希望了。后来几天,我们经历了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动人场面。接着是“四五”运动,很多学生都去了天安门广场。后来追查

时，大家都说不知道谁去了。我们和学生关系很好，很多事情都互相帮助。“四五”运动之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有一天突然通知我们到清华去开会，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毛泽东说，清华有人反对迟群、谢静宜，反对他们就是反对毛泽东本人。

1976年的大事很多。朱德、毛泽东也在这年相继去世。朱德去世在社会上的反应比总理去世小得多，可能大家觉得朱德已经很多年不管事了。毛泽东去世，北京搞的规模很大的悼念活动，我们都去了，从东单到西单、天安门广场都是人。这么多人开追悼会，我感到，有的人没有悲痛的感觉，嘻嘻哈哈，吃了很多东西，瓜子皮、糖纸扔了满地。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央由华国锋主持工作。我感觉到从此中国要有大的转向，但没料到会这么快。

访：您是什么时候听到打倒“四人帮”的消息的？

丁：1976年10月6日。当时桂琳琳到湖南去开门办学，家里就我一个人。数力系的教员吴文达把我叫到一边，告诉我“四人帮”可能垮台了。十三公寓附近的居民看到晚上来了几辆卡车，把很多文件运走，并且看守很严。因为梁效^①在十三公寓办公，有人就猜测可能出事了。10月8号，事情全清楚了。“四人帮”垮了，梁效跟着就垮了。梁效大概由二三十人组成，北大的居多。10月10号以后，报上公开了这件事。我记得发表了一篇社论，虽没说“四人帮”的事，但调子整个变了。再到后来，我们还搞游行，打着标语走到天安门广场，庆祝粉碎“四人帮”。紧接着学校里开展运动，揭批“四人帮”。群众自发贴了很多大字报，吸引了不少人去看。

^① 梁效，是“两校”的谐音，“文革”期间成立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

访：打倒“四人帮”后，北大实际主持工作的是谁？

丁：黄辛白。他原来是教育部的，1976 年“三结合”到了北大。那时吴德还没来。因为北大属北京市委领导，所以黄辛白要听市委的。我们对他极为不满，认为他揭批“四人帮”不彻底，不敢让群众敞开地批。有一次在办公楼开大会，我还上台批了黄辛白一通。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有为难之处，后来跟他接触多了，才知道他人不错。

访：“文革”结束前夕，您的生活状况是不是有所改观？

丁：没有太大的改观。当时全国经济几近崩溃，大家的生活都很困难。记得“文革”结束前的一个春节，北大给每家分了一只骨瘦如柴的鸡，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



那时在校工作组的领导下，数学系的党总支已经被夺了权。系里准备成立一个揭批“四人帮”的领导小组，有意让我加入。我表示坚决不干。

周培源说：“丁石孙跟我说过三次不要提他，我觉得这人不错，我就提他。”

像我这个年龄，再想自己搞出什么大的研究成果是不现实的。我的优势在于基础比较扎实，我可以学习一些新的东西，教给学生，而我的学生可以在我的基础上学习更新的东西。这样，中国的数学慢慢就上去了。

第 6 章

出任系领导，赴美进修

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

访：打倒“四人帮”后，大的形势是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您能谈谈北大数学系^①的情况吗？

丁：1977 年北大出了很多揭批“四人帮”的大字报。跟“文革”初期一样，在北大设有大字报栏，外面又有很多人来北大看大字报。上面派来了工作组。这时数学系主要批判两个人，说他们执行“四人帮”的路线。这两个人一个是前面提到在 1958 年领导一个宿舍的学生进入共产主义的总支副书记。他 1952 年考进北大数学系，是农村来的，一直当学生干部。另一个是戴新民。戴新民是个高级干部，因为犯错误，“文革”前下放到北大的。

^① 1969 年在陕西汉中的北大分校成立了力学系，从此数力系的力学专业实际已分出成为独立的系。之后，数力系一般被称作数学系。

访：戴新民犯了什么错误？

丁：据说她犯的也不是太大的错误，可能是泄密。她刚到北大的时候管留学生，相当于留学生办公室主任。“文革”期间，到数学系当总支副书记，经常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她并不是两面派，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

访：对揭批“四人帮”，您的积极性高吗？

丁：比较高。因为我觉得多少年来“左”的东西终于有机会把它揭开了。有一次，我在全系大会上发言，谈了“四人帮”的“左”倾路线对数学系造成的破坏。后来在工作组召开的会上，我也发了言。我过去不是什么干部，政治地位很低，这两次发言，包括我在底下对“左”的东西的批判，并没有什么目的，只是想发泄一下长期被压抑的情绪，说完就完了。没想到这两次发言改变了我的面貌和整个生活。

访：两次谈话真的对改变您今后的人生轨迹起了很大作用？

丁：对。那时在校工作组的领导下，数学系的党总支已经被夺了权。系里准备成立一个揭批“四人帮”的领导小组，有意让我加入。我表示坚决不干。一个礼拜天晚上，盛森之专门到我家来动员。他是1953年入北大力学专业的，1973年“批林批孔”时和我一起挨过批。他是党员，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很积极。他说是代表一部分群众来找我的。经过他的说服，我同意参加领导小组。

访：盛森之是怎么说动您的？

丁：他并没说什么特别打动我的话，只是说这几年我的表现他都看在眼里。盛情之下，我就答应了。记得这个领导小组是1977年初成立的。邓东皋是系总支委员，被推举为组长。我当了副组长。还有个姓黄的副组长，他也是系总支委员。领导小组承担的一项主要工作是平反冤假错案。

我记得，这时胡耀邦已经当了中组部部长。他对平反右派是立了功的。

访：领导小组是怎么平反冤假错案的？

丁：我们把数力系在 1957 年被打成右派的人员的材料拿出来逐个讨论。从材料看，反右派是很荒唐的。因为从很多材料中，我们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为了查右派的档案，我们还从中国科学院调来了一个叫黄槐成的干部。他是数学系教员石青云的丈夫，毕业于北大技术物理系，是调干生，年龄比较大，很正派，政策水平也比较高。他在数学系平反右派这项工作中还是起了作用的。我当校长时，把他调到了校办当主任。他帮了我不少忙。

平反右派在数学系阻力比较小。因为原来系里的八九十个右派大多是学生，时过境迁，跟现在系里的人的关系不是那么密切。在平反右派的同时，我们基本解决了林建祥的问题。1952 年院系调整后，林建祥任数力系党的书记。1956 年前，他的工作相当出色。当时数力系的工作在全校是数得着的，特别是对知识分子政策掌握得好。在他的领导下，数力系重用了业务比较强的年轻人，还形成了尊重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良好氛围。而当时北大有些系用的是业务不太强的党员，年轻教师跟教授的关系也比较紧张。我觉得要改变现在数学系的面貌，必须给林建祥平反，把他的问题说清楚，让大家知道他做的是正确的，这样才会慢慢地把大家的思想集中起来。因此，我花了很大的力气给他平反。

访：在给林建祥平反这件事上，你们遇到阻力了吗？

丁：因为当时还没有批判“两个凡是”，阻力很大。不过，这时周林被派到北大。他对平反冤假错案有决心，胆子也比较大。我专门为林建祥的事到校党委找到周林，向他讲述林建祥的主要情况，取得了他的支持，我的心里就有底了。

应该说，在为林建祥平反这件事上，我采取的措施对数学系产生了较深的影响。我不是简单地为他平反，而是把从1952年开始他执行的政策在系里的主要干部中进行认真讨论，让大家评价究竟对不对。结果，不仅为他平了反，而且从根本上搞清了是非，拨乱反



打倒“四人帮”后，丁石孙在家中工作

正，比较彻底地纠正了“左”的错误。事后来看，这个做法是对的。十几年来批判林建祥的积极分子的思想转过来了，全系人员的思想得到了统一。

恢复教学和科研秩序

访：揭批“四人帮”的领导小组好像不是行政领导班子？

丁：对。领导小组只是代理系党总支的工作，领导运动。系里行政上负责的还是原来的革委会。到1977年底，北大考虑成立行政领导班子。至迟在1978年初，数学系重新恢复系主任制度，把段学复请回来当系主任，让我当副系主任。在这之前，系里已恢复了党总支，原领导小组组长邓东皋当总支书记，兼任副系主任。

访：打倒“四人帮”时，由于“文革”的冲击，数学系的正常教学、

科研秩序实际已经不复存在。面对这样的现实，新领导班子上任后主要抓了哪些工作？

丁：打倒“四人帮”后，国家的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正轨。北大也开始恢复教学和科研秩序。这花了很长时间。首先，恢复“文革”中被取消了的教研室，包括代数、几何、数学分析、高等数学等教研室。做这件事碰到相当大的困难。过去每个教研室负责上什么课是固定的。比如高等数学教研室，专门管外系的基础课。1978年恢复教研室时，很多课没有教员愿意上。大部分教员都觉得自己荒废了很多时间，要抓紧搞科研，上课的任务分配不下去。每学期开始时，我都要到老师家里求他们上课。有的人看我的面子答应了，但也有一些人不答应。我想这样挨家挨户地说，不是办法。于是，就请系里教师讨论，想恢复工作量制度。我开了很多座谈会，商量工作量怎么算法。苏联是计算工作量的，但算得太细。通过座谈讨论，最后大家在工作量定多少合适的问题上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那时工作量定得比较轻，是每位教员一学期每周要保证上4小时的课，2小时的辅导。

我们还考虑到教员已经荒废专业很长时间，需要重新学习，就建立了学术休假制度，规定教员每工作4年可以有1年学术休假。当时北大只有数学系实行了这种制度。我们把休假与工作量结合起来一起搞，得到系里教师的广泛支持。大家都觉得平时多上点课也是应该的，因为4年之后可以休息1年。学术休假制度一直延续到我当北大校长时。

高等数学教研室专门教外系的基础课。这个教研室的教员教课多，搞科研的机会少，成果少，评职称比较难。我就采取一个办法：把给外系上的基础课分到各个教研室，让高等数学教研室的人有平等的机会搞科研。之后，意见就少了。这样，系里的教学秩序逐渐恢复了正常。

其次，为了加强研究工作，成立了北大数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是程民德。研究所在管理体制上与系行政平行，都由系党总支领导。我们坚持研究所不能完全独立。所里的人数占全系人员十分之一，人员不固定，一个人最多在所里待两年，就要回到系里。每两年由系里推荐谁进研究所，谁就有两年时间在所里集中搞研究，不用在系里开基础课。

现在回过头来想，数学系在恢复教学和科研秩序过程中重视制度建设是正确的。还有一件事情对数学系也非常重要，就是如何对待一批红卫兵与工农兵学员。这些人大多是造反派，在运动中伤过人。老教授对他们很反感，希望把他们从系里清除出去。系里老师普遍认为这批人没有学问，书也教不好。在对待工农兵学员的问题上，我们非常慎重，认为他们固然有很多缺点，但如果简单地把他们赶走，他们就变成了对立面；这批人年龄还很轻，应该给他们一次机会。因此，我们最后决定对他们采取帮的办法，允许他们两年内不教课。

同时，系里给他们订了教学计划，让有经验的教员给他们补课。他们尽管也是数学系毕业，但并没有上够4年，而且学的是初等数学。在补课过程中，有些人就主动提出要走，因为他们发现根本念不懂。如果不采取补课的办法，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到底差到什么程度。最后，数学系的工农兵学员超过一半的人主动提出要调走，也有少数人提出愿转做行政工作。有些工农兵学员在做行政工作方面能力很强，工作干得很好。比如，系里的办公室主任就是工农兵学员。也有少数人考上了研究生。

数学系在对待工农兵学员的问题上没有伤和气，我觉得采取的办法是妥当的。我们不仅不歧视他们，而且尽量帮他们，让他们自己体会书是自己念不下去的。数学系的工农兵学员和我关系都很好。我没整过他们，尽管过去挨过他们整。有些系工农兵学员的事情处理得就不如数学系好，工

农兵学员不服气，影响了团结。

访：据我们所知，“文革”后，除了工农兵学员，北大数学系教师也有调走的。

丁：我想，有些人大概考虑到自己日后在其他地方更有发展，就主动走了。萧树铁调走是因为清华大学要成立数学系，向北大数学系点名要走的。当时清华点了三个人：萧树铁、我、林建祥。当时我已经是系主任了，没有去。

访：“文革”后北大数学系是什么时候开始招生的？

丁：第一次招生是在 1978 年。1977 年时，系里还比较混乱，老的教科书已不适用，由哪些老师上课也没有安排好。在这种情况下，我说我们晚一年招生。因此，1977 年数学系就没有招生。恰好这年丁诵青考大学。他原本想报考北大数学系，但由于我们没招生，就报考了清华校办的数学短训班（学制 4 年）。1978 年招生后，我提出系主任必须上课。我在二教阶梯教室讲高等代数，数学系、力学系、计算机系 3 个系的学生有 350 人来听课。

1978 年，我还到上海开过一个教育部组织的会，讨论数学课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修改。因为数学系的课程设置还和 20 年前一样，所以对课程怎么更新讨论得比较热烈。过去数学系的课程，基础课有 3 门，叫“三高”，即高等代数、高等几何、高等分析。这时候大家觉得应该有新的东西代替这“三高”。当时比较强调抽象代数、拓扑学，还有泛函分析，觉得这 3 门课也带有基础性，比较适合当代的数学现状。这个会是在宝山钢铁厂附近开的，全国数学界的代表人物，比如苏步青等老一辈数学家都参加了。年底在上海又开了一个会，讨论重新写教材。这个会我没参加。为什么不参加这个会？因为我过去写过好多教材，也出版了，但由于“文

革”，有的就没有用，对写教材我有点伤心。北大数学系去参加这个会的是王萼芳，她在清华比我低三班。王萼芳领回来的任务，是把我原来写的《高等代数简明教程》扩充一下。这本教材影响较大，因为很好用。王萼芳拉了石生明，一起来做修改工作。

访：1978年我国恢复招收研究生。据说，您和聂灵沼合招了代数数论方向的研究生？

丁：是的。聂灵沼是老北大的，毕业后搞过一段代数数论。我没搞过，只在大学里念过一学期的代数数论课。聂灵沼搞代数数论是捡起他过去搞过的东西，我是从头开始。有一段时间，我和聂灵沼两人合作搞代数数论。

访：当时有没有特殊的原因促使您搞代数数论？

丁：决定搞代数数论，是我数学研究生涯中的一个大的转折。之所以要转，跟1977年暑假曾肯成在黄山开的一次会议有关。曾肯成曾受总参委托，办了个短训班，班上的学生毕业时都写了论文。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让学生做毕业论文汇报。曾肯成邀请我参加，商量代数以后搞什么方向。当时我们感到，原来搞的东西太抽象，这几年跟总参三部搞密码，发现为抽象而抽象不行，应该有个目的。代数的很多抽象命题是从数论产生的。我们应该从根本的东西搞起，不应该浮在上面。从这时开始，我决定搞代数数论。

访：这次会议的规模大吗？有其他人也决定搞代数数论吗？

丁：会议规模不大，除曾肯成外，参加者还有中科院数学所的万哲先、冯绪宁等。曾肯成和万哲先跟我的感觉不一样。会上明确提出搞代数数论的，就我一个人。曾肯成决定搞密码，后来他不仅破译密码，还设计密码。

访：您和聂灵沼一共招了几个研究生？

丁：两个，赵春来和张良诚。他们都是北大数力系62级的学生，那

时我教过他们。1968 年他们分配了工作，先劳动一年，然后去教中学。来北大读研究生前，他们一直在中学教书。他们读大学时，只念了 3 年，深一点的代数都没有学过。考研之前，他们自学了一些课程。这两个学生考前都来找我，问我要考什么课。我说不考代数数论，考抽象代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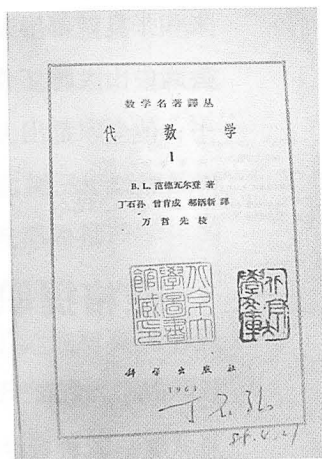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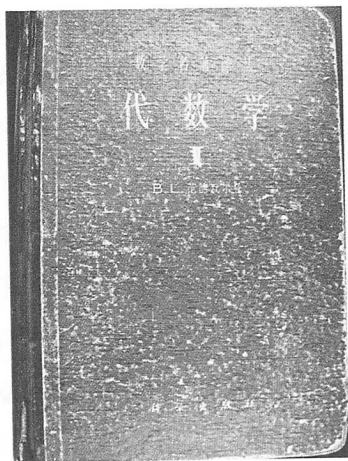
访：抽象代数也可以叫近代代数吧。

丁：对。最早的代数是中学讲的解方程，都是关于数字的计算。到 19 世纪，就引进了不是数字的运算，19 世纪 50 年代有了群的概念。之后，人们就发现对这种东西的运算，虽然不是数字的运算，但比数字的运算更重要。1930 年出版了一本书，叫《近世代数》，是用德文写的。作者可能不是德国人，是荷兰人。这本书代表了一个阶段的开始。因为从它开始就认为代数不只是研究数的运算，而是研究代数结构。这样，代数研究的对象就变了。20 世纪 40 年代末我到清华数学系读书，学的就是这本书。那时刚刚开始一个新的潮流，近世代数已经变成代数的主体。这本书一共出了好几版。记得到 60 年代，它出到第 5 版，这时它的名字改了，把近世两字去掉。第 5 版是我和其他几位同行译出来的^①。我让赵春来他们念的就是我翻译的这本书的上册（当时下册还没译出来）。

访：您给研究生开了哪些课？

丁：打倒“四人帮”以后，很多东西都要从头做起。当时系里招研究生相当仓促，给他们讲课的人很少，也不知道该讲什么。当时我们发现有一门课很重要，过去国内没有人讲过，叫交换代数。我就在北大边学边讲这门课。开这门课我主要参考一本新出的英文书 *Introduction to Commutative Algebra*，作者是阿提亚（M. F. Atiyah）和麦克唐纳（I. G. MacDonald）。

^① 这是指丁石孙、曾肯成、郝炳新译，万哲先校的 B. L. 范德瓦尔登（B. L. Van der Waerden）的《代数学 I》，1963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丁石孙、曾肯成、郝炳新译，万哲先校的 B. L. 范德瓦尔登的《代数学 I》

访：看来，您此时的重心不是自己搞研究，而是去学些新的专业知识，并教给学生，意在培养下一代数学人才。

丁：对。1981年，我又开了这门课。来听课的人非常多，大概有60多人。除了我自己的研究生外，还有系里别人的研究生，也有科学院数学所的、中国科技大学的。记得其中有科学院数学所的李福安、李克政等^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来听课呢？这主要是因为自1978年起很多地方开始招研究生，但新的课还没有开出来。我认为研究生听课的范围广一点有好处。师傅带徒弟的办法有很多局限。

访：这些学生的学习效果好吗？赵春来毕业后又考了您的博士，后在北大数学系当了教授。张良诚毕业后去哪里了？

丁：由于我教课非常认真，他们的学习效果还可以。1981年，赵春

^① 李福安、李克政分别是万哲先、曾肯成的学生。

来和张良诚都毕业了。我和聂灵沼就决定把赵春来留下来念博士。张良诚去到中山大学工作，后来到美国念了博士，现在在美国一所小的大学教书；他全家都出去了。

破格提职，升任系主任

访：“文革”之后，全国恢复了职称评定，有的单位还破格提拔了一批人才。北大数学系的情况如何？

丁：1978年北大决定破格提几个副教授。数学系提了两个，一个是姜伯驹，一个是张恭庆。因为很多年没有提职称了，这件事在北大引起很大的反响。

访：对这次破格提升副教授，数学系采取了什么办法？

丁：先是征求了段学复、江泽涵等老教授的意见，最后由学校决定。

访：看来老教授的意见很重要。

丁：当时我家住在四楼。为了破格提职称的事，江泽涵曾亲自到我家跟我说姜伯驹的情况，认为应该升副教授，要我给予支持。破格提拔这两位年轻人后，大家反响都很好。

从1979年开始，由于学校秩序比较正常了，数学系的职称评定也就比较规范了。系里提升副教授的工作由我主持，当时我还是讲师。系里组成了一个学术委员会，由委员投票，评得比较严格。那时风气比较好，大家都能保密。当年数学系提了一批副教授，做得比较公正。外系也有人对我讲，数学系搞得好。

副教授提完后，紧接着就是提教授。这时我就退出了系里的评审工

作，因为涉及我了。提教授由学校学术委员会来评；由周培源主持，当时他是校长。我听说数学系提出了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钱敏。这次我们两个都是由讲师破格提教授。

钱敏是个不一般的人。他本来是清华物理系的，等念到三年级突然转到数学系，1949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我记得当时助教都要批改学生的作业。他懒得改，就把我和卞国琨等四年级的学生找来帮他改，并招待我们吃花生米。教了一年书后，他觉得没意思，就不教了。他对英文有兴趣，重新考大学，进入北大英文系一年级学习。老师发现他的成绩远超过一年级，就让他上三年级。记得他重新上大学后，我还去看过他。他住在红楼旁边的平房里，条件比较差。当了一年学生，他觉得太苦了，就通过人介绍，到燕京大学数学系教书。

就提教授之事，钱敏有一天来找我，说我做的研究工作比较少，应该让他先提。我答应了他。作为副系主任，我参加外事活动时，时常有机会见到周培源。我跟周培源说过三次，说数学系推荐了两个人，钱敏应该排在我前头，这次不要提我。后来化学系的黄子卿在校学术委员会开会时讲，周培源在数学系要提两个教授，那我也要在化学系提两个教授。最后，数学系只提了我一个，黄子卿在化学系也只提了一个。

访：数学系是通过什么程序把您和钱敏提出来参加学校的教授职称评定的？钱敏对这次评职称有意见吗？

丁：主要是通过征求系里教授的意见。这次钱敏只提了副教授，很有意见，当场就把提为副教授的聘书扯了。他的意见不是针对我而是针对学校。因为他知道我愿意让给他。我还听说，有人给周培源提意见，说他不应该先提干部，干部容易得到好处。周培源说：“丁石孙跟我说过三次不要提他，我觉得这人不错，我就提他。”黄子卿没当过干部，不能体会当

干部的困难。他有时指着周培源说：“BY^①，在上级领导面前，你就是 Yesman，根本没有个人意见。”

访：当教授之后，您的待遇好多了吗？

丁：比打倒“四人帮”后稍好，但比“文革”时期好多了。“文革”期间，我一度每月只能领到 20 元的生活费。“文革”后，我的工资有 120 多元，算比较高的，但连冰箱都买不起。后来总参给我们发放津贴，我才攒够了钱，买了冰箱。曾肯成就笑我说，你的冰箱是总参送的。1982 年我到美国访问后，工资照发，国家每月还发给我 410 美元的生活费，哈佛大学教授格里菲斯（Philip Griffiths）单独给过我两次钱，我的经济状况才有明显好转。

访：您当教授时间不长就当系主任。当时是学校指定的还是通过民主选举选出来的？

丁：通过民主选举。1980 年下半年，段学复提出辞去系主任，给学校打了报告。他说，从 1946 年回国，开始在清华当系主任，后在北大，总共当了 30 多年，现在年纪大了，该退了。他经常开玩笑说，他在清华是“代代代系主任”。1946 年清华数学系主任是华罗庚，但在美国没有回来，清华就请赵访熊代理系主任。后来赵访熊也去美国访问，段学复是代理赵访熊当系主任。^②

① BY 为周培源的英文名缩写。

② 事实是，1946 年由于数学系主任杨武之患病滞留昆明，清华大学聘请赵访熊代理系主任。1947 年又因杨仍不能返校，而赵将赴美休假一年，清华决定聘请正在美国的华罗庚任系主任。华未应允，推荐段学复担任。之后，清华聘段代理系主任，但将系主任职位留给华，并于 1948 年 2 月 18 日给华寄发了聘书。1950 年华返国后，因清华元老周培源和少壮派教授钱伟长等的反对，清华未聘华为系主任。参见郭金海、袁向东：《清华大学聘华罗庚为数学系主任始末》。刊载于《中国科技史料》，2001 年，第 22 卷，第 4 期：第 368～375 页；徐利治口述，袁向东、郭金海访问整理：《徐利治访谈录》。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 年，第 227～228 页。

段学复的辞职报告，学校同意了。当时学校改革的气氛很浓，数学系要民主选举系主任。学校对选举没有干预，系党总支也没有提候选人。全体教职员酝酿候选人，然后投票选举。记得选举是在1980年底进行的，我得票相当高，95%以上的人选我，我就当选了。段学复很高兴，到我家里跟我爱人说我们的代数专业成为“行政专业”了。这话是指“文革”结束前系里长期是分析专业比较强，并占统治地位，而代数专业的地位并不高。

访：您当系主任后，肯定要搭建新的系领导班子。副系主任是怎么产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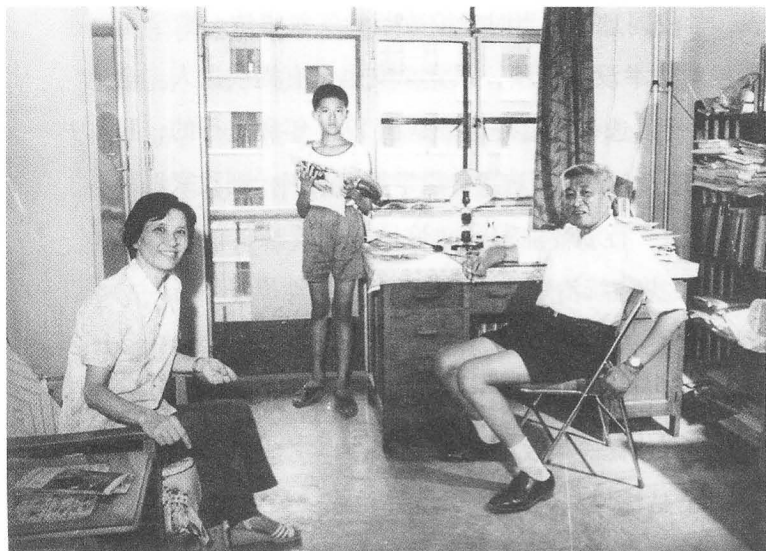
丁：当时的办法是系主任由选举产生，副系主任由系主任提名。我提了两个人做副系主任，一个是沈燮昌，另一个是吴兰成。吴兰成是1953年入学的。沈燮昌1952年入学，是新北大第一届毕业生。沈燮昌毕业后去苏联留学，大概1959年回国，拿了副博士学位，业务搞得还可以。他分管科研，吴兰成分管教学。我们这届新班子从1981年开始工作，此后数学系的工作就比较上轨道了。

访：您上任前，数学系只解决了一小部分人的职称问题。普遍地提职、提级是在您当系主任之后。按照“文革”前的提法，是要求又红又专。您是怎么处理这个关系的？

丁：我强调业务。当时有个想法是一定要非常严格，要全系的教授讨论。

访：是想把学术之外的因素排除掉，是吗？

丁：但没有完全摆脱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当时有个留苏的教员，在莫斯科大学留过学，是数学专业的，要提副教授。我觉得他的业务不行。可是有几位教授为他打抱不平，一定要提他。他们的资格都比我老。尽管我跟他们争论，但争论不过。这样，我也没有办法。最后经过教授投票，这



1981 年丁石孙在家中(左 3 丁石孙, 左 2 丁千, 左 1 桂琳琳)

位教员还是被提为副教授。

访：1981 年，教育部评出全国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导师，您名列其中。您知道评的经过吗？当时为什么要评博导？

丁：1981 年教育部评博导，是一件比较大的事情。我不太清楚评选博导的原因。这件事提出之后，我就反对，因为我认为，评博导根本没有必要，教授就可以带博士。但反对也没有用。记得 1981 年暑假前后，教育部就从全国一些高校找一批人来评博导。每门学科成立一个评审组。我在数学评审组，这个组有 20 人左右，负责人都是一些老先生，里面有苏步青，我在里边是年纪轻的。我们在北京开了好几天会，评定全国有哪些人有资格当博导。最后，要评定评审组中的这些人谁有资格当博导。评的办法是自己评自己，在组里投票，过半数就当选。这样，我就当了全国第一批博导。我这个方向——代数数论，除我以外，聂灵

沼也当了博导。

访：除您之外，还有其他人出来反对评博导吗？

丁：没有。我现在想，我当时的想法是对的。但教育部已经决定，反对是没有用的。这些年来，因评博导而闹矛盾的单位不在少数。

首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访：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中国开始逐渐将国门敞开。“文革”结束后，中外学术交流活动渐趋活跃，有不少国外学者来到中国。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跟外国学者接触的？

丁：1977年。这年暑假前，教育部给北大下了个接待美国中学数学教师代表团的任务。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很多是美国教育协会会员，他们来华的目的是考察中国的中学教育。北大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数学系，系里让我和钱敏负责。钱敏的英文比较好。因为当时揭批“四人帮”的任务比较重，我起初不愿意干。但我爱人动员我干，说做这件事很好。于是，我就和钱敏一起去干了。当时我非常穷，没有西装，唯一一件稍新的衣服是的确良卡其布中山装。我就穿着这件衣服参加了接待工作。

我和钱敏跟旅游局的一个干部当翻译和导游，陪代表团跑了好几个地方。按照安排，我们要去上海，因为天气不好，就去了南京，还去了广州。代表团成员做了几场报告，我们负责翻译。这是我第一次接待外国学者。记得代表团团长叫贝克尔（Becker），他在大学里教教育学。以后很多年，我跟他都有联系。

1980年，美国教育协会要在伯克利召开每四年一次的年会。我们收

到了参会邀请信。教育部决定派由五人组成的代表团去参加，经费由教育部出。

访：您还记得这五个人的姓名吗？

丁：除我之外，还有华东师范大学的曹锡华、北京师范大学的丁尔生、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位姓曹的数学编辑、华南师范大学的曾如阜。这五人中，我是第一次出国。曹锡华早年在美国留学，丁尔生在苏联留学，学数学教育。当时中国还没有直接到美国的航班，要到日本东京转机。我们在东京等了两三个小时才乘上转旧金山的飞机。因为有时差，到旧金山的时间差不多是我们离开北京的同一天上午。

访：这也是您第一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吧？能谈谈开会的经过吗？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事？

丁：是第一次。我在飞机上碰到了华罗庚。他有两个人陪同：一个是他的助手，一个是他的儿媳妇。华罗庚心脏不好，带着一个氧气袋，他儿媳是医生，帮助照顾。华罗庚是会议特邀的，有专人到机场来接他。

我们从机场到旅馆有点波折。当时北大数学系有人在伯克利进修，行前电话约好到机场来接我们。但由于我没说清楚，他误以为我们第二天到。我们下了飞机无人来接，幸好在飞机上遇到的一个香港人告诉了乘车路线。我们就坐机场小公共汽车先到伯克利附近，再打电话终于找到了那位接站人。他借了一辆大一点的汽车，把我们送到之前订好的旅馆：Mariot Inn，是一个连锁店，相当高级，但离开会地点相当远。

访：这个旅馆的住宿费贵吗？

丁：当时我们把外汇看得很重，习惯上要把美元折合成人民币，觉得什么都很贵。所以，我们五个人只要了两间房，要求旅馆在一间房里单加一张床。当天晚上，几个中国学生请我们到他们住处吃饭。时差弄得我们

非常困，根本不想吃东西。第二天早晨也不敢到餐厅去吃饭，因为不知道是什么价钱，最后硬着头皮去点了一些最便宜的早餐。

访：除了开会，学校还给您安排别的任务了吗？

丁：来美国之前，北大校办主任文重找我，说物理系一个教师，叫高崇寿，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研究。有一天，高崇寿从实验室回到家门口时突然倒下，医院检查发现是脑出血。文重让我代表学校去看望他。我认识高崇寿，但不熟。到美国的第二天，会还没开，我就找了北大数学系在斯坦福大学进修的马希文，让他开车接我去看高崇寿。我去的时候，他神智还不清楚，不认得我，在床上乱喊乱叫。他的头盖骨都掀掉了，用塑料罩上。斯坦福大学对这个事情很重视。美国有一条法律，如果你在家门口摔倒，不管什么原因，你都可以告他们没有把门口的路修好。由于高崇寿所住医院的脑外科水平很高，他的手术做得很成功。

访：开会的情况怎样？

丁：会议一共开了四天。我们每天早上乘班车去，晚上乘班车回，中午在会场附近随便吃点东西。华罗庚在会上做了报告，讲优选法。一般中午没事，我们就去看看北大的一些进修教师，聊聊天。

会议期间，中国留学生举行了一个欢迎会，欢迎华罗庚和我们几个人到美国。没想到这个欢迎会很不愉快，一个台湾来的学生站起来骂共产党，说你们搞四个现代化，对什么是四个现代化根本不懂，怎么搞得成呢？我想华罗庚以他的身份跟这个学生争论不太合适，我必须站起来发言，反驳他。由于考虑到正面跟他吵架也降低了我的身份，我就讲：国民党的时代，我是经历过的。国民党在国内的统治，你是不知道的，我是知道的。我把当年国民党在大陆如何腐败说了一些，接着讲共产党虽然有些事情不懂，但可以学习。

访：华罗庚对您的讲话持什么态度？

丁：他很满意，认为我既不失身份，又批驳了那个学生的狂言。我们在欢迎会上的反应，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初大陆知识分子的心态，对问题想得比较简单，满怀信心。现在想来，那个学生讲得也有点道理。我们对四个现代化确实不太懂。

访：开完会，你们就回国了吗？

丁：没有马上回国。我们五个人到斯坦福大学参观，我又去看了一下高崇寿，这时他已基本恢复正常。在斯坦福大学，我还去拜访了一个美籍华人，叫钟开莱。他的数学水平相当高，但脾气比较怪。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许宝騄教过他。我给他带了一本江泽培他们编的《许宝騄文集》。没想到钟开莱跟我大发牢骚，说许先生搞概率统计是世界著名的，你们不该只出选集，而应该给他出全集。我说我回去可以跟学校讲讲，为许先生出全集。我还说许先生的论文有一部分是用英文写的，发表在国外的杂志上，希望有人把这些文章翻译成中文，稿费可以由北大出。钟开莱听后非常高兴。后来我把这个事情促成了。因此，钟开莱对我的印象很好，我跟他也一直保持比较好的关系。不过，他说起话来总爱说“我们美国人”如何，很多国内去的人对他的印象并不好。

访：钟开莱很有才华，徐利治跟我们讲过他有“傲上性格”。在西南联大时，他先是做华罗庚的研究生，因跟华罗庚吵架而转到许宝騄门下。所以钟开莱对许先生非常感激。^①

丁：钟开莱在西南联大时，有个故事。他不但数学好，而且中文、英文也好。有一次，钟开莱和闵嗣鹤都想参加庚款留学考试。他们的专业考

^① 徐利治口述，袁向东、郭金海访问整理：《徐利治访谈录》。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76~77页。

试应该都没问题，差别就在中、英文考试怎么样。钟开莱考了英国和美国的庚款留学考试，结果都通过了。而闵嗣鹤估计中、英文考不过钟开莱，就找他请他让出一个名额。钟开莱同意了。因为美国斯坦福大学校园比较漂亮，也比较大，有公共汽车，钟开莱就选择到这所大学留学。闵嗣鹤最终通过了英庚款留学考试，到英国牛津大学留学。

访：你们在斯坦福大学还见到其他著名华裔数学家了吗？

丁：还遇到了丘成桐。当时他已经搞得很好。那时到美国的中国代表团还很少，他听说有个中国代表团是数学方面的，就来和我们联系，请我们吃了顿饭。我们在美国教育协会年会上了解到美国数学会即将在密歇根大学开暑期年会，就决定多待几天，去参加这个会议。

访：事先需要有美国数学会的邀请吗？

丁：我们跟他们联系了一下，参加的手续比较简单。这次会议有很多分会场，你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去听。华罗庚也参会了。我们住在密歇根大学的学生宿舍，很便宜。有一天下午，我去看华先生。我发现他的钱也很少，跟他的儿媳妇和助手住在一起。见到我，他就说正在想一道代数题，还没想出来，让我也想想。那时他已经70岁，仍然很勤奋，即使到国外开会，也不停止思考问题。

会后，曹锡华邀请我们一起去看望他的姐姐。他姐姐在洛杉矶定居，有两栋房子，对我们招待得很好，完全不用我们花钱。她还请一位司机开车拉我们出去玩，游了迪斯尼乐园。迪斯尼乐园离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又称斯塔芭芭拉）分校不是很远，大概两个小时的车程。圣巴巴拉分校有个著名的美籍华人数学家，名叫樊畿，他邀请我们到他家去。

访：樊畿是抗战前北大数学系的学生，数学成就比较高。1947年中央研究院筹办首届院士选举时，北京大学提名他为数学方面的院士候选

人。他已于 2011 年去世。

丁：樊畿资格比较老，和陈省身差不多，在北大数学系毕业后留校做过教员。我们去看他时，他差不多 70 岁了，身体相当好。他没儿女，家里就老夫妻两个。他买了一座小山，在上面种满了果树，作为他的爱好，也是为了锻炼身体，他经常上到树上剪枝。后来樊畿捐了一笔钱，支持中国学生到美国去学习。为这事他给我写过一封信。在樊畿家，我们碰到两个从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来的访问学者，戴宗铎和冯绪宁，都是万哲先的学生。我们一起在樊畿家吃的中饭，下午去看了她们租住的房屋。她们招待我们吃了顿自己包的饺子。

赴美进修

访：1978 年后，我国加快了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和进修人员的步伐。当年 6 月 23 日，邓小平做过重要指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留学生的管理方法也要注意，不能那么死。跟人家搞到一块，才能学到东西。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现在我们的格格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大学的水平，一方面派人出去学习，这样也可能有一个比较，看看我们自己的大学究竟办得如何？……今年派三千出去，怎么选派，派到哪里，要订好计划。”^① 他的讲话虽然只针对派遣留学生说的，但对我国此后有计划地派

^① 《邓小平同志谈清华问题时关于派遣留学生问题的指示》。见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 年以后》。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365 ~ 366 页。

遣人员到国外学习、进修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全国掀起了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和进修人员的热潮。您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82年申请到美国哈佛大学进修的吧。您能谈谈进修的经历吗？

丁：到1981年，我国派出学习的人就比较多了。系里最早出去的有张恭庆和姜伯驹，他们出去开阔了眼界。1981年，北大开始酝酿这样一种意见：是否派些50岁左右的骨干出去学习？因为这些人水平都比较高，学习回来以后对学科发展作用也许更大一点。我也参加了学校的讨论。有一次，我跟北大的自然科学处处长聊天，说你派年轻的出去固然是对的，但他们回来后掌不了权，左右不了学校的发展，应该派一批青壮年出去。最后这个意见被接受了，我和一批跟我年龄相仿的教师被派出去进修。

访：当时北大教师出国进修，是学校帮助我国外的接收单位还是自己联系？

丁：我是通过格里菲斯帮我联系的。1982年陈省身在国内面向研究生组织了一个暑期讲习班。他请了一些在国外搞得比较好的人到北大讲课，其中有哈佛大学教授格里菲斯。我是系主任，认识了这些人。有天晚上，我到友谊宾馆找了格里菲斯，跟他说北大准备出钱让我到美国进修一年。当时他虽然才40多岁，但已是哈佛大学资格比较老的教授，还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他答应帮我联系。过了两三天，他就把哈佛大学数学系的邀请函给我了。我决定11月份去哈佛。

访：您是系主任，到美国进修期间，系里的事情由谁负责？

丁：去美国之前，北大免去了我的系主任职务，由两年前去美国进修并已回国的邓东皋接任。我记得在我走前，有个教员很直接地跟我说：你回来不要再当系主任，因为别人已经当了。我真心地对他说：“我绝对不会再当。”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觉得很多年没有安下心来搞业务，这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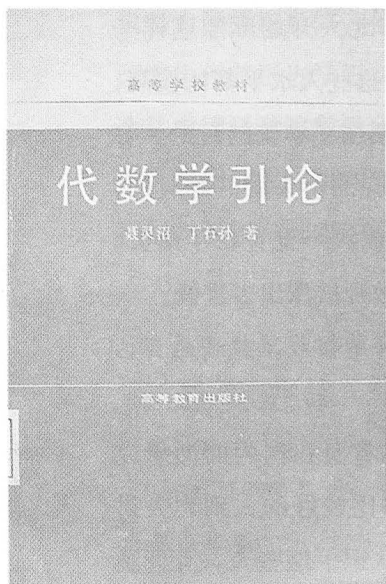
可以安心学点东西，搞点研究。我走之前，把回来后要教的课都安排好了。那时我跟聂灵沼合写了一本《近世代数》^①。我打算回来教近世代数，让他先教第一轮。

访：从系主任的岗位上下来，您的心情如何？

丁：想到从此可以摆脱行政工作，我的心情很轻松。出国之前，教育部给我们讲了一天课，内容是怎么办手续等的事。我大概是11月上旬走的，跟我同机赴美的有化学系的华彤文。他年纪比我稍小一点。我去以前，跟一个在哈佛大学进修的北大生物系的教员联系了一下。他正好要回来，说他租的房子离哈佛很近，可以让我接着租。

有个美籍华人，叫王浩。他到中国来时我接待过几次。他工作的洛克菲勒大学很特别，没有学生，请的教授都是水平很高的。学校对请去的人没有任何要求，不让上课，也不用带研究生。因为被请去的人已经有名了，可以随意搞研究。王浩跟我说，我可以在洛克菲勒大学住四天。

到美国的第二天，我便去了洛克菲勒大学。我到这所大学的招待所一查，有王浩给我订的房间。管理人员给了我两把钥匙，一把是大门的，一把是房间的。房间条件很好，早餐可以到一个房间去随便取。10点钟我



聂灵沼和丁石孙合著《代数学引论》

^① 此书后以《代数学引论》之名，于1988年出版。

去看了王浩，跟他随便聊聊天。改革开放以后，他到中国讲过几次课，想把中国的数理逻辑搞上去，但来了之后很失望，因为哲学系没人搞数理逻辑。王浩对我印象比较好，也许因为我还懂一点数理逻辑。我在洛克菲勒大学期间，北大数学系的一位正在纽约进修的研究生陪我游了世贸大厦。

访：您离开洛克菲勒大学就直接去哈佛大学了吗？

丁：对。纽约到波士顿不远，坐飞机大概 50 分钟。那时美国有一小时一班的飞机，像公共汽车一样，上了飞机才买票。这种飞机叫穿梭机。到了波士顿，格里菲斯派他的一个学生到机场来接我。这个学生是丁诵青的同学，叫吴宪。他就住在格里菲斯家里。那时已是 11 月份，美国的学校 12 月 16 号就放假。所以我不必去听课。

访：您对哈佛大学数学系的印象如何？

丁：这个系的机构非常简单。系里有个系主任，叫芒福德（Mumford），数学相当好，拿过菲尔兹奖；还有两个秘书，一个是主要秘书，还有一个次要秘书。主要秘书叫梅利萨（Melissa），很能干，我有很多事情都通过她办。梅利萨不但是系里的秘书，还负责几个教授的事情，相当于几个教授的秘书。我觉得国外这种制度比较好，秘书没有决定权，只是把具体事情做好；不像我们搞几个副主任，谁都可以做主。

访：入校您办了哪些手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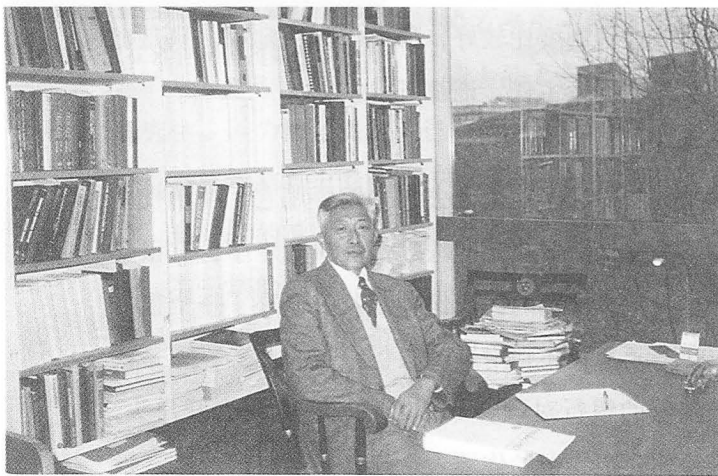
丁：首先办了一个学校的身份证。这个证去图书馆要用它，在学校办很多事都要靠它。其次办了医疗保险。美国的医疗保险叫蓝十字，有很多种，根据出多少钱，确定享受什么层次的医疗保障。我大概办了一个很一般的医疗保险，一年交 500 美元。我还到附近的银行开了个户头，那是我第一次用银行的取款机。美国的银行对顾客非常客气，有人要去开户头，他请你坐下，有专门的人给你介绍，帮助你填表。这些在当时的中国还没

有，我感到很新鲜。

梅利萨还给了我两把钥匙，一把是办公室的，一把是系图书馆的。我可以随便去办公室或图书馆看书。系图书馆 24 小时借书，手续很简便，给管理员说一下，就可以把书借到家里。哈佛大学有系图书馆、理科图书馆，还有学校的公共图书馆。这些图书馆都不太挤，看书很方便。书库旁边就有桌子。图书馆里有沙发，学生可以在上面看书，即使睡觉也没人管。系图书馆里头有不多的几间办公室，一般是比较重要的教授才有办公室；出办公室门就是图书馆。

有一天，我正在系图书馆看书，一间办公室的门打开了，走出来个老教授。他跟我打招呼，问我在干什么。这个人是伯克霍夫（G. Birkhoff），搞应用数学的，在美国的影响很大，资格老，但对数学方面的新东西不太熟悉。我在大学时念的代数书就是他写的。他一说名字，我就说在大学念过他的书。他之所以在哈佛大学数学系这么重要，是因为他的父亲曾经当

1983 年 4 月 2 日丁石孙在哈佛大学伯克霍夫的办公室



过系主任，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系里就在图书馆里给了他一间办公室。我结交了这位老先生，对我有很大的好处。他经常出差，一出去就一两个月。他主动让我用他的办公室，既方便又舒服。

访：您很幸运，一到哈佛就结识了伯克霍夫这样的朋友。

丁：除伯克霍夫之外，我还交了一个朋友。这个人是从苏联出来的犹太人，也是访问学者，名字叫韦斯费乐（Weisfeiler）。他刚从苏联出来，当时苏联可能已经开始允许犹太人离开。他的数学非常好，懂的东西极多。我经常请教他一些问题，也跟他聊天。我从他身上感觉到，他对苏联痛恨到极点，对共产党国家怀有很大戒心。

访：您住的地方如何？房租多少？对美国的生活适应吗？

丁：我住的地方，是一栋两层楼并带阁楼的房子。一楼房东住，二楼和阁楼向外出租。一楼和二楼是两个门进出。我们进的门是打开门就上楼梯。二楼和阁楼一共租给5个中国人，每人一间。我住一小间。二楼有厨房，有个大客厅，可以吃饭，里面有公用的冰箱。我们5个人来自不同的单位，有清华的，中山大学的，还有中国科学院的。住在这里的一个好处是离哈佛大学数学系很近，走路只要10分钟。记得我的房租是每月170美元。政府给我们每月410美元，每月由大使馆寄来。

时间不长，我就逐渐适应了美国的生活。我发现到超市买东西很方便，自己做饭也很便宜。我们几个人每星期五一起到附近超市买东西，包括牛奶、面包、挂面、米等。

访：您说格里菲斯单独给过您两次钱，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您的经济状况。他为什么给您钱？

丁：因为格里菲斯认为我很可怜，钱太少了，在美国当研究生也不止这点钱。记得他一年里从他的科研基金里给了我两次钱，每次1000美元。

他对我特别好，差不多每两周就请我到他家吃饭。我到他家只有 5 分钟路程。格里菲斯年薪大概 6 万美元，但还是比较穷的。原因是他老婆在上大学，而且是上医学院，学费很贵；两个女儿，一个上小学，一个上中学，都是私立学校，也很贵。哈佛大学一个教授供 3 个人上学，经济情况就比较差了。他请我吃饭都极其简单，一般就一个菜，青菜或扁豆炒肉，吃点米饭。他自以为这就是中国饭。经常跟我们一起吃饭的还有吴宪和吴宪的弟弟吴健。从格里菲斯的生活状况可以看出，美国的名教授，也不过是中产阶级，并没有很多钱。

访：您在哈佛大学数学系主要进修什么课程？

丁：我在哈佛发现有个搞数论的专家，叫马祖尔（Mazur），下学期要讲“椭圆曲线的算术”。我就准备听这门课。当时系里有一个台湾大学来进修的，叫张海潮，搞代数几何。他可能是在美国拿的学位，这是第二次来到哈佛。我和张海潮差不多同时在哈佛待了一年。这个人很热心，给我介绍了一本椭圆曲线的入门书。我在元旦之前差不多用一个月把那本书念了一遍，并做了习题，为下学期听课做准备。

过了 1983 年元旦，新学期开学，我开始听马祖尔讲椭圆曲线的算术。他是很有名的数学家，工作做得相当不错。他的课讲一学期。美国大学一门课就讲一学期，3 到 4 个月的时间，每礼拜一次，每次讲 3 小时。美国人讲课的方式跟我们很不一样，讲得没我们细。比如讲证明，不详细讲，只讲大意。这种讲课方法不错，启发学生自学能力。我回国之后，就想把我们的课程压缩。

美国老师上课也很随便，有时就在桌上一坐，穿衣服也不讲究，几乎没穿西服的。这跟日本很不一样。我上课还是很规矩的，认真记了笔记。上半年我一个礼拜听一次课，其他时间就看看书，有时到图书馆借点书，带回家看。图书馆管得很松，自己到架子上去取，要借走，在本上登记一下。复印

机就放在一个小房间里，自己去复印。进修的人有一个免费的复印数量。

访：当时有多少学生听这门课？他给你们留习题吗？

丁：听课的人很少。选课的学生加上旁听的一共七八个人。马祖尔没有留习题。我想应该找点习题来算算，增加点感性认识。我就跟他提出这个想法。他告诉我系里有个年纪比较大的教授，叫泰特（J. T. Tate）；泰特的一些计算方法，很巧。泰特的名字，我是知道的，他是世界上很有名的教授。马祖尔还说泰特有个学生，叫西尔弗曼（Silverman），懂泰特的计算方法，在 MIT 教书。有一天，马祖尔帮我找来西尔弗曼。西尔弗曼把他老师的计算方法给我复印了一份。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泰特。他说你按这个办法去算吧。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了格里菲斯，说我要到机房上计算机算。这要开个上机的户头，要交上机费。格里菲斯这个人比较好，说国家给我的钱太少，帮我开了个一千元钱的户头。

访：您那时会用计算机吗？

丁：还不会，需要学。系里有个研究生经常去机房计算。他把一本关于怎么编程序的书介绍给我。但学习编程序，光看书还不行，要实践。数学系的计算机房是一个有 20 多台终端的大房间，有勤工俭学的学生在那里负责指导。他教了我一次我就懂了。学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光看书不行，还要动手做。这个学期，我一面听课，一面计算。

这个学期于 5 月份结束。9 月，新学期开始后，我又选了两门课，一门是椭圆曲线，由 MIT 的西尔弗曼讲；还有一门代数几何，是格里菲斯的学生开的课。这两门都是基础课，讲比较基础的知识，也都比较容易，我也听得比较轻松。我觉得格里菲斯的学生讲得很好。代数几何虽然非常抽象，但他讲得很直观，把一些概念都说清楚了。

访：在上课之余，您参加了一些学术活动或做了一些访问吗？

丁：1983年5月放暑假后，有人介绍我到加拿大参加一个数论方面的讨论会。张罗这个会的是美国的一个教授，叫里姆（Richm）。我写了封信给他，表示我要参加，并说我的钱比较少。他很快给我回信，不光免注册费，还提供生活费，我只负责路费。讨论会在加拿大多伦多附近的 Mac Master 大学召开。会议请了一些专家做报告。我去了两个礼拜，住在学生宿舍，一个人一间房。在会上，我认识了几个国外的数学家。其中一个叫弗勒利克（Fröliach），水平较高，人也相当好，是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他年纪比我大，二战期间当过兵，当完兵之后念的大学。

这次会议还组织了旅游。我印象比较深的是看到了尼亚加拉大瀑布。这个瀑布位于美国和加拿大交界处，面比较宽，是个湖，湖的一半处有很高的落差。我们在加拿大那边看，比在美国这边看得清楚。开完这次会，我有一点体会，就是一个人的饮食习惯很难改。因为两个礼拜时间吃的都是西餐，到后来实在不想吃了。有一天晚上，我下决心到中国餐馆去吃饭，在那里吃了碗榨菜肉丝面，觉得好吃得不得了。

在1983年，我还访问了美国的几所大学。一所是麻省州立大学，它在哈佛大学旁的一个城市。这所大学之所以请我去，是因为他们学校的一位老师跟我同在哈佛大学数学系听课，请我去做报告。这所大学有一位我国的老数学家，资格比段学复还老一点，叫程毓淮。程毓淮看到一个中国人来做报告，非常高兴，就请我住在他家里，还请我听了一场音乐会。我以前虽然没见过他，但他的名字我是知道的，因为段学复经常提到他，并在1952年当北大数力系主任后写过好几次信请他回来任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家里吃的早饭，是非常典型的中国早餐，比在北京吃的还典型：有煮得非常好的稀饭，还有几种咸菜。这说明他虽然在国外多年，但还保留着中国的生活习惯。

我还去了南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过去我接待过这所大学的一个代表团。他们知道我到了美国，就请我去。这所大学不是一所很好的学校，但有个特点：所有的建筑都是无障碍的。残疾人进教学楼、去厕所全无障碍。我对这一点印象很深。我当北大校长后，邓朴方找过我，让北大为残疾人开个班。我说从南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情况看，我们做不到，这要花很多钱。我在这个学校做了一场报告，在一个熟悉的教授家里住了两个晚上。每天早上，他照常去上班，告诉我冰箱里有鸡蛋、牛奶，让我自己做早饭吃。

访：美国人接待客人一般都比较简单、随便。除了这两所大学，您还去了其他大学访问吗？

丁：离开南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我去了伊利诺伊大学。这所大学的数学系主任是搞数论的，请我做了一个报告。他在陈景润成名后出了一本书，叫《筛法》，其中有一章专门讲陈景润的工作。1950年华罗庚回国前就在这所大学教书，陈景润也来过这里。这位系主任在家里请我吃饭，跟我讲了一些陈景润的笑话。

访：什么笑话？

丁：他说陈景润特别爱讲“你是我的老师”。陈景润在这之前也跟我说过这种话。

访：陈景润是与众不同的。“文革”中，他在大街上走路时经常手里举着一本《毛主席语录》。

丁：我还去了耶鲁大学。它在波士顿附近。我是坐4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去的。这种长途车有个名字，叫灰狗（Grey Hound），车子很高，行李放在底层。我到耶鲁大学，是因为北大数学系的石生明在这里进修。耶鲁大学有个很著名的代数学家，叫雅各布森（N. Jacobson），曾到北大访问，跟我认识。在耶鲁大学，我大概待了3天。雅各布森把我安排在学校的双

馆住宿。这所大学是个老牌学校。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它有个古籍图书馆，放了些很古老的书。这个图书馆造得比较特别，窗子都是大理石磨薄了做的。这样紫外线不会太强，有利于古籍保护。

耶鲁大学保留了英国传统的一些做法，学生分在每个学院（College）里，学院只管学生生活，包括住宿等一些事情，教学则由系来管。这样整个学校是两个系统，对学生管理比较严格。耶鲁大学没有校园，也没有围墙，差不多是个小城镇。我住的所谓宾馆，也是个孤立的房子，晚上去的时候一个人也没有。我开门进去空荡荡的，里边也没人管我。

另外，我去了布朗大学。当时北大有人在那里进修，我就住在进修教师的房子里。布朗大学的华裔教授招待了我。美国数学会就在布朗大学边上，管事的只有一个老太太。她负责管理全美国的数学会会员的事情。我去看了一下，他们效率很高。数学会有个出版社，人也很少，你要出本书，给他们一张录有书的内容的软盘就行。

这两所大学都是美国的老牌大学，老牌大学都在东部。美国有个说法，这种大学叫常春藤大学，因为这些大学墙上都爬满了爬山虎。

访：在哈佛大学数学系，您与格里菲斯关系很好，他对您帮助也很大。通过与他的接触，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丁：我想，通过跟他的接触，使我更坚定地认为：我们国家的老的数学家不要急于出论文，要学习新东西把学生教好，使中国数学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说起这点，要讲到西德年轻数学家法尔廷斯（Gerd Faltings）^①。

^① 法尔廷斯生于1954年，1978年获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学位，后于哈佛大学从事一年博士后研究，获聘为乌珀塔尔大学（University of Wuppertal）教授。1985至1994年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1986年获菲尔兹奖。1994年起任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数学研究所所长。关于法尔廷斯的情况，可参见陈燕美、王姿月访谈，余屹正整理：《有朋自远方来——专访 Gerd Faltings 教授》。刊载于《数学传播》，2003年，第27卷，第4期：第24~27页。

1983年六七月份，他解决了一个数论的难题，叫莫代尔猜想（Mordel Conjecture）。这个猜想大概有70多年历史了，它的解决引起了数学界的重视。尽管那时正在暑假中，不论在哈佛大学，还是在MIT，都举行了报告会，讲法尔廷斯的工作。人们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我也参加了一些报告会、讨论会。

尽管格里菲斯跟法尔廷斯不是同行，但他很关心这个问题的解决。有一次礼拜六，我在他家吃晚饭，他就发表了一通看法。大意是：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也就是1945年，因为希特勒排犹，再加上战败，数学从战前一流水平降到底层。当时的德国数学家对此有清醒的认识，知道自己已落后得很厉害。他们知道改变落后面貌急不得，短时间是赶不上的。从1945年到1983年，等于花了两代人的努力，才出了一个法尔廷斯。我认为当时德国数学家做的是对的。他们看清自己的落后，下决心要培养年轻一代，认为靠自己这一代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是不可能的。

访：格里菲斯对德国数学家的做法怎么看？

丁：他认为当时德国数学家的做法有远见。而且，他认为中国数学家应该从法尔廷斯这个实例吸取一点经验，急功近利是不可取的。他说，中国数学家应该做两件事：一件是学习，学习世界上先进的方法和理论；另一件是教书，好好培养学生，让后来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在他看来，中国水平好的数学家要抓紧学习，把学到的东西教给年轻人，让年轻人一步步往前走。我觉得他说这话，确实是为中国好。

格里菲斯为什么跟我说这些话呢？实际上，我想他对我在哈佛大学数学系的做法非常赞成。我在那里并没有急着做论文，而是老老实实在地听课，上机计算，做基础性工作。他虽然未明说，但我能感觉出来。

访：您有什么具体的考虑吗？

丁：我的想法很简单：椭圆曲线中国人不懂，我在哈佛大学一年把它学会，回国之后我就开椭圆曲线这门课。回国之后我就这么做了。赵春来他们后来就沿着这条路继续往前走。我认为，我这个决定是对的。像我这个年龄，再想自己搞出什么大的研究成果是不现实的。我的优势在于基础比较扎实，我可以学习一些新的东西，教给学生，而我的学生可以在我的基础上学习更新的东西。这样，中国的数学慢慢就上去了。现在赵春来他们懂的东西比我要深得多了。我觉得，这就是我对中国数学的一点贡献。

我当了北大校长后，教育部找我谈过一次话，让我发表对中国数学的看法。我主要说明要改变大家对中国数学的看法。这个看法就是，认为有陈景润、华罗庚等，中国的数学已经不错了。实际上，我们跟世界先进水平差距非常大。我把格里菲斯的看法也讲了。我说老的数学家不要急于出论文，要教好学生，像德国那样花两代人的时间，使中国的数学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教育部把我的谈话发表在一份简报上。这份简报各大学和研究机构都能看到。有人同意我的观点，有人则大骂。

访：有人大骂，是主要指责您反对做科研，发表论文吗？

丁：有些人是这么认为的。其实，我并不反对做科研，发表论文。因为根据科学研究的规律，好的论文只有在发表一定数量论文的基础上才能出现，所以不能要求只有重要的论文才发表。

访：您在哈佛大学进修期间还有没有留下印象深刻的事情？

丁：在哈佛大学进修期间，我第一次参加了一生中比较重要的政治性活动。有一天，中国驻美大使馆突然打电话给我，让我去一趟。我不知道什么事，就买了机票，去了趟华盛顿。大使馆有个公使衔参赞接待我，说全美华人协会要在波士顿开个会，在台湾和大陆各邀请一个人参加，促进海峡两岸的交流。他说到时候台湾也会来个人。这个人叫沈君山。沈君山

是台湾的高干子弟，当过台湾大学物理系主任，后来当过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我在大使馆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大使馆派人带我出去玩了一下。我是第一次去华盛顿，记得这次参观了航空博物馆，玩了几个钟头，下午就坐飞机回波士顿了。过了几天，全美华人协会秘书长潘毓刚通知我，说陈香梅请我吃饭。

访：抗战期间，陈香梅加入中央通讯社昆明分社，采访过美国“飞虎队”的陈纳德将军。1947年她跟陈纳德结为伉俪，成为历史上一段佳话。1949年他们夫妻两人迁居台湾。陈纳德去世后，陈香梅移居美国华盛顿，成为颇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

丁：全美华人协会要召开这次会，就是陈香梅提议的，实际目的是要协助解决两岸问题。北大知道我在波士顿，就打电话告诉中国驻美大使馆让我去。陈香梅请我吃饭时，我见到了沈君山。他年纪比我轻一点。在饭桌上，陈香梅、我、沈君山都讲了话。我该怎么讲话，大使馆没给我具体指示。我就一般地讲讲加强两岸交流有好处，我们各有长处，要互相学习。

沈君山好像是住在全美华人协会会长家里。当时的会长叫李耀之，是MIT的退休教授。第二天开会时，沈君山没来。据说他当天晚上收到台湾的电报，不让他参加，所以一早就坐飞机走了。这说明当时台湾对跟大陆的联系还管得很死。

访：也就是说，这次全美华人协会的会议最终搁浅了。还有其他留下较深印象的事吗？

丁：我对波士顿的两个地方印象很深：一个是哈佛大学的玻璃花博物馆。它在数学系对面的小楼里，陈列了好几百件玻璃标本。这些标本是德国的父子两人做的。他们能把玻璃做成各种样子，就到哈佛大学生物系用玻璃做了很多生物标本。博物馆虽然不大，但很精致，色彩极丰富。有熟

人到哈佛大学，我会带他去看看。我有工作证，只要花一美元就可以领人进去参观，这是别的学校没有的。另一个是肯尼迪图书馆。它在海边，很漂亮，实际上是肯尼迪纪念馆，里边有很多肯尼迪的照片。墙上还贴着很多肯尼迪的语录。这些语录有的很深刻，说明肯尼迪很有思想。我从这里才知道，最受美国人尊重的总统不是罗斯福，而是肯尼迪。他最受美国人尊重的一点，就是非常强硬。肯尼迪的强硬表现在处理古巴导弹危机这件事上。二战以后，苏联人的影响越来越大。美国人普遍的一种心理就是要以强硬的态度对待苏联。

访：您是什么时候结束进修离开哈佛大学的？

丁：1983年11月底离开哈佛大学，接着到美国国家数学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伯克利数学所”）待了一个月，之后才回国。我到这个研究所是作为陈省身的客人去的。

访：伯克利数学所坐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园内，但独立于加州大学的管辖。陈省身当时是这个数学研究所的所长。^①您在哈佛进修期间，跟陈省身联系过吗？

丁：1983年10月，陈省身来过哈佛大学数学系。当时这个系要开个会，按照我们的说法，这个会相当于一个评审委员会的会议，评这个系办得好不好，陈省身是评委之一。那次，陈省身到我的办公室，说南开大学提出让他回去办一个数学研究所。这个事情我事先是知道的，南开大学想把他拉回去。他来谈话的目的，是想让我回去当他的副所长。另外，他邀请我12月份去伯克利的数学研究所访问。

访：您当时答应陈省身到南开大学当副所长了吗？

^① 张奠宙，王善平：《陈省身传》（修订版）。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8～163页。

丁：没有。当时我心里想，陈省身完全不了解国内的人际关系。我一个北大的人到南开大学去管数学研究所，人都不熟，没人会听。这个事我不能干。11月底，我到了伯克利。有一天中午，陈省身请我到饭馆吃饭，大概是想问我能不能到南开大学当他的副手。这时，我已经知道回国要当北大校长了。所以没等他说，我就告诉他当校长的事。他也就没再提南开大学的事。

访：据我们所知，伯克利数学所是1981年成立的。您去时，它的情况怎样？

丁：我去的时候，这个研究所正在设计，房子还没有造好，临时借用了一些房子。我在那儿做了个报告。陈省身之所以请我做报告，主要是找个理由给我点钱。

访：陈省身给您多少钱？在数学研究所有些什么活动？

丁：大约是200美元。我去伯克利，主要想见见朋友，认识一些人。我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见了项武义、伍鸿熙等华裔数学家。他们两个都是伯克利分校的教授。记得伯克利后边有个小山，很多人的房子都在山上，房子越高，就表示这个人越有钱。陈省身住得相当高，可以看到海，项武义住得低一点。

我在伯克利期间，正赶上陈省身得沃尔夫奖。这个奖是以色列人设立的，授予一些有重大成就，但没机会得菲尔兹奖的人。陈省身对得这个奖非常得意。我在伯克利至少参加过两三次宴会，庆祝他得奖。有一次在项武义家里，一些华裔教授庆祝陈省身得奖，参加的数学家有田长霖。他这时还不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我对这次家宴之所以印象比较深，是因为那天刮大风，早晨开始全都停电。在美国很少有停电，到吃晚饭时，电还没有来，我们就在项武义家摸着黑吃饭。当时陈省身想调解杨振宁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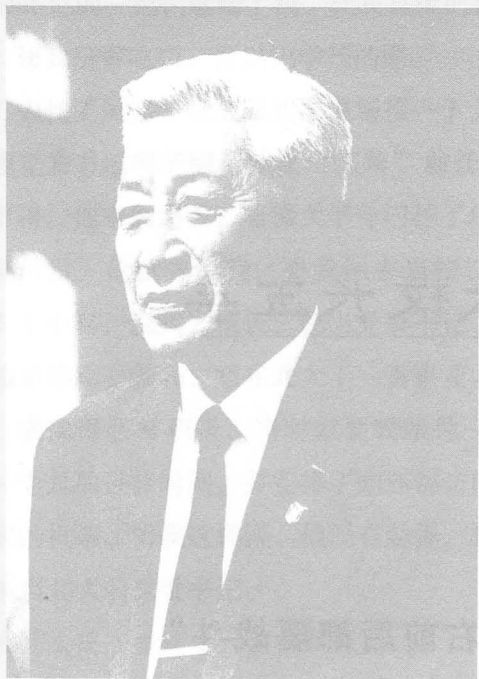
在圣巴巴拉期间，1983年12月17日
丁石孙(右)与樊璣在太平洋边合影

车去了一趟圣巴巴拉。我去看了樊璣，她去看了一位历史学家。我们大概在圣巴巴拉待了两三天时间。记得我是1983年12月30日离开旧金山，31日回到北京。离开以前，就在我住的地方，北大有十几个教员聚餐送我回国。从1982年11月到1983年12月，我在美国待了一年零一个月。这是我一生中过得最愉快的一段时光：没有任何负担，专心念书。过去，我还没有专心念一年书的经历，当想安下心来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总被各种政治运动打断。我本来设想从美国回来就安心搞数学了，没想到还会当校长。

李政道的矛盾，在这次家宴上，大家一起讨论了怎么解决这个矛盾。

访：您回国前还去过什么地方？您是什么时候回国的？对在美国进修，您有什么感受？

丁：我跟当时在伯克利东方研究所进修的袁明相约，坐火



我跟当时在美国的北大的一些教员说：“我回去要准备上下左右前后都要战斗。”我虽然不能预料回去当校长的具体困难，但知道中国的改革的难度很大。事后我感到我对困难的估计还远远不够。

我刚当校长时，有学生很生气地给我打电话，说食堂饭菜不好。有的学生还专门给我寄几张饭票，要我亲自去吃一吃。还有学生打电话，把我骂一顿。我说解决问题要从制度上下手。

我真想把北大办成一个思想自由、学术活跃的大学。为此我付出了很多努力。

第 7 章

北大校长五年

“上下左右前后都要战斗”

访：您是什么时候知道要当北大校长的消息的？

丁：1983 年 10 月。在这之前不久，我在哈佛大学数学系收到我爱人的信。她说现在北大正在酝酿校领导班子。教育部、人事部、中组部在北大搞了一次由副教授、副处长以上的人参加的民意测验，事先没有提任何候选人，让大家任意填写校长、副校长人选，不记名。然后，教育部有专人把票收走。我爱人也参加了投票。不久，有人告诉我，北大有位领导要到哈佛大学来访问。北大并未告诉我有这件事，我也不知道谁来。有一天，我跑到哈佛大学的办公室去问这件事，想了解来人的访问日程。办公室秘书说：“你来得太好了。”因为北大的客人来的时候是礼拜天，没人办公，他正愁没人帮助接待。于是，他让我到机场去接一下，并事先把教职

员会所 (Faculty club) 的一把钥匙给了我, 让我直接把客人送去。他还说有几顿饭没人陪, 让我陪着吃饭, 可以记学校的账。

我没有汽车, 去找了吴宪, 让他跟我去机场接一下。到机场我才知道来的人是北大代理党委书记项子明。他在“文革”前任北京市委秘书长, 是彭真很得力的干将。他来的那天, 哈佛大学专门挂了中国的旗子, 以示重视。到教职员会所后, 他就告诉我, 要我回去当校长。他跟我聊到很晚, 差不多聊了3个小时, 说我当校长, 他当党委书记, 两个人合作, 并谈了很多想法。他显然雄心勃勃, 想在北大干一番事业。他的年龄比我大一点, 身体很好, 表现得非常积极, 当时就要我跟他一块回去。我说不行, 因为我还有一个月的进修时间, 并安排了到西部访问的计划, 也已经买好去西部和回国的机票。听我这样说, 他没有勉强。当时他完全没想到回国后并没有让他当北大的党委书记。

访: 项子明为什么没有当成北大党委书记?

丁: 据说是得罪了彭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时, 彭真说项子明是叛徒, 不能用。彭真为什么说项子明是叛徒呢?“文革”前, 彭真搞了个写作班子, 地点在畅春园。“文革”中, 项子明顶不住压力, 揭发说这个写作班子是反毛泽东的, 这对彭真很不利。项子明就成为彭真眼中的叛徒。对我个人来说, 项子明没有当党委书记是件好事, 因为他党龄老, 主意多, 如果他担任这个职务我有很多事不好办。

访: 在您之前, 北大校长都是被任命的, 并不是民主选举的。您当校长这次是北大第一次民主选举校长。这次民主选举, 把您——一位屡遭政治运动冲击的学者, 推上了世界著名学府——北大的校长职位。您在美国时, 是否听到一些人对您要当校长这件事的反应? 您知道自己回去要当校长这个消息后, 对做校长有哪些方面的考虑?

丁：1983年12月我到伯克利后见到的华裔数学家，比如项武义、伍鸿熙等，知道我回去要当校长，都很高兴，认为这是中国改革的标志，并跟我说中国能起用一个毫无背景的人当北大校长，表明中国以后有希望。

当时我对回去怎么当这个校长考虑得比较少，但意识到这个校长不好当，会得罪很多人。我跟当时在美国的北大的一些教员说：“我回去要准备上下左右前后都要战斗。”我虽然不能预料回去当校长的具体困难，但知道中国的改革的难度很大。事后我感到我对困难的估计还远远不够。

访：您是什么时候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的？

丁：1984年3月。我从美国回来后，情绪比较乐观，认为前途非常美好。但一直待到春节后，组织上也没找我谈话，我搞不清楚是什么道理。事后才知道，彭真不同意项子明当北大党委书记，要重新找书记。一直到3月份，北大才开了个范围很小的会。会上，何东昌代表教育部宣布我当校长，王学珍当书记，项子明当了顾问。我的前任校长是张龙翔。

据我了解，事前事后都没人跟张龙翔、项子明谈话。当时的干部政策，对有的人非常慎重，对有的人就很草率，很不关心。项子明和张龙翔都是政治上非常积极的人，这件事对他们打击很大，因为他们毫无思想准备。我觉得我自己有一点做得不大好，就是没有拜访一下张龙翔。他是我老师一辈的人，并且长期在学校工作。

访：在何东昌宣布您当北大校长的会上，说明校长的产生经过了么？您在会上表态说：“不要希望我有三把火，中国的事情不是三把火解决得了的。”^①是这样的吗？

丁：何东昌没有说明校长的产生经过。我确实是这样表态的。记得我

^①《精神的魅力——教育家丁石孙访谈录》。刊载于《百年潮》，2006年，第9期：第4~10页。

的发言很简短，大意是说：我对学校的工作没有经验，希望大家给我3个月学习的时间。在这3个月里，原来怎么搞的，还怎么搞。我还说，一般的说法，叫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大概没有三把火，一个理由是，我在北大工作了这么多年，火气早没有了。同时，我也认为中国的事情比较复杂，不是靠三把火能解决的。我只希望能够做到下一任校长接任的时候，比我现在接任的时候条件要好一点。这就是我的目标。

访：有不少领导上任时都定有远大的目标。在这点上，您跟他们很不一样。

丁：我这一辈子不曾有过一个长远的奋斗目标，因而对自己的评价是胸无大志，但追求一定要把今天的事情做得最好。

访：这表明您比较务实，没有把自己估计得很高。不过，孤掌难鸣，您作为一校之长要把今天的事情做得最好，也需要有得力的干将。在您那届校领导班子中，有哪几位副校长？你们之间配合得好吗？

丁：有陈佳洱、朱德熙、沙健孙、张学书、谢青。后4位是和我同时上任的，其中朱德熙、沙健孙负责文科方面的事务；张学书兼党委副书记，管人事；谢青管后勤。陈佳洱是理科副校长，是我后来物色、由上头批准的。当校长期间，我跟这些人的关系都不错。我们这届领导班子非常团结。

访：您为什么挑中陈佳洱？

丁：我上任时，重要岗位的人选基本都定了，就缺一个理科副校长。我就到各系去了解谁合适。当时陈佳洱是技术物理系^①副主任，搞原子能的。他们系的党总支书记向我推荐陈佳洱，说他比较合适，人比较正派。

^① 北大技术物理系成立于1958年。

陈佳洱原来不是北大的，是吉林大学（原东北人民大学）来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北大没有门户之见。

访：您当校长后待遇比以前提高得多吗？

丁：工资比当教授时高一点，有了专车。最明显的一点是，由于总要接待人，我把北京的饭馆都吃遍了。到法国访问时，由于我的校长身份，招待方请我吃过正规的法国饭。很多人说当干部要吃亏，我认为这话有点不实在。我不花自己的钱，吃遍了北京的饭馆，怎么能说吃亏呢？

访：您当校长后用过几位秘书？

丁：3位。每位秘书来的时候，我都说你当我的秘书不要想在我这儿

1984年邓小平(左5)接见陈省身(左6)及夫人(左4)
时丁石孙作陪(左2)(左3何东昌,左7胡国定)



得到好处，不要打着我的旗号做私事。

访：他们不给您当秘书后都去了哪儿？

丁：一个当了科技部副部长，一个在北大当教授，还有一个去美国拿了个经济学博士。

访：这么说，您的秘书后来都发展得不错。



1985年9月10日胡乔木(左)于我国第一个教师节到北大视察，由丁石孙陪同

从学校食堂开始的改革

访：您走马上任后主要抓了哪几件事？

丁：花时间最多的是改革学校食堂的管理办法。当时北大规定学校食堂不能盈利，哪一个食堂有多少人吃饭，学校就给补多少钱，一个食堂有哪些系的学生吃饭也是学校指定的。这样做，食堂早涝保收，没有积极

性，饭菜质量不好，学生意见很大。我想学生吃不好饭会影响学习，决定彻底改革食堂管理办法。后来北大的食堂在北京市的高校里是首屈一指的。

访：对一所大学来说，办好食堂对安定学生的学习极其重要。您上任时北大有多少个食堂？有学生向您反映食堂饭菜不好的问题吗？

丁：有七八个。我刚当校长时，有学生很生气地给我打电话，说食堂饭菜不好。有的学生还专门给我寄几张饭票，要我亲自去吃一吃。还有学生打电话，把我骂一顿。我说解决问题要从制度上下手。

访：您是如何下手的？

丁：最主要的是引进竞争机制，同时改善食堂硬件。在我上任前，北大有个经济办公室，成立后没发挥什么作用，我就让它负责食堂管理。这个办公室有位马云章，“文革”期间任化学系的头，和我一起下放鲤鱼洲，后又到德安。我又从力学系把邓成光调到这个办公室。邓成光是数力系1952年入学的学生，我说服他来搞行政。

访：您为什么调邓成光搞行政？

丁：我选人搞行政一般都选业务不太强的，这样的人比较容易动员。我之所以选邓成光，也因为他比较踏实。这样，经济办公室就有两个人了。他们对学校食堂饭菜质量做了调研，帮我发现两个问题：一是没有竞争机制；二是设备很差，大师傅劳动强度很大。于是，我们就引进竞争机制。办法很简单，就是饭票各食堂通用。学生可以随便到哪个食堂吃饭，学校根据饭票的多少给食堂补贴。这样，饭菜质量就提高了。有一点我印象很深，过去一个食堂维修，要停伙，要让别的食堂帮忙解决学生吃饭问题很困难。现在机制一改，情况完全改观。同时，我们还规定卖给学生的饭菜不能有利润，但如果在学生的饭菜之外，再做点别的，就可以有利

润。食堂有小炒，学生想吃得好一点，可以去买。也容许教员在食堂点菜，承包宴会。因此，各个食堂都有了积极性，还把做好的饭菜推到外面卖。

访：食堂设备差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丁：如蒸馒头的笼屉太高，大师傅放上、拿下很费劲。我立刻找管财务的人，买可以升降笼屉的机器。后来买了一个小的起重机，解决了食堂的机械化问题。另外，负责食堂管理改革的，除经济办公室的两个人外，还有总务长张启运。他原来是化学系的，经常修实验室，修得很精。我就从化学系把他调来当总务长。张启运当总务长给了我很多帮助，在抓食堂这个问题上，他也帮了不少忙。我们前后用了差不多一年时间，使食堂管理走上了轨道。之后，学生就没意见了。

访：除了改革学校食堂的管理办法，您上任后还做了哪些事？

丁：还做了一件错误的事，并且碰了个很大的钉子。这就是我没有履行我说的三个月不做任何决定的话，而是做了一个轻率的决定：合并北大一附中和二附中。北大本来就一所附中，是市重点中学。因为北大教工子弟有些考不上附中，我的前任就找了块地盖了房子，办了二附中。二附中是我当校长前一两年办的。二附中校长是原来数学系的党总支副书记，叫马树孚。我认为一个学校办两个附中，并且在两个地方，财力和人力都是浪费，就决定合并这两个附中。

我虽然征求过附中一些教员的意见，但对复杂性估计不足。这个决定一出台，就捅了马蜂窝。一附中的教员强烈反对，理由是一附中是市重点，二附中是一般校，把两个附中合并，就降低了一附中的水平。有孩子上了一附中的教职员也反对，担心影响教学质量。尽管反对的声音很大，一附中的教员也坚决不让二附中的学生进一附中的校园，但最后两个学校

还是在形式上合并了，让马树孚当合并后附中的副校长。

访：您合并两个附中是出于财力和人力的考虑。效果到底怎么样？

丁：合并半年后，就又分开了。何东昌在合并后找我谈过一次话，说你了解不了解北大一附中和二附中属于两个系统，一个是重点校，一个是一般校。你把它们合并，等于把一附中这个市重点中学取消了。当时我碰到北师大的校长，他也劝诫我不要碰附中。因为他曾试着将北师大的三个附中合并，结果没搞成。附中牵扯到北大教职工的切身利益。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教训，使我明白合理的事情不一定能办成，办事前一定要把情况摸清楚。

访：您决定合并两个附中时，群众有没有议论您本人？

丁：当时有人认为我的决定是为了便于我的小儿子丁干上初中。第二年，即1985年，丁干差4分，没考上一附中，就上了二附中^①。一附中校长请我的邻居问我愿不愿意让丁干上一附中，他自己不敢问我，知道我很讨厌这种事。我说该多少分录取就多少分录取。

访：看来，您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

丁：我上任后由于没有经验，还做了件傻事。1985年，教育部要求我们搞岗位责任制。我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跟人事处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规定了处长的责任是什么，科员的责任是什么，搞得很细。事后证明这完全是做虚功。我没有行政经验，教育部要求做什么，我就认真去做。事后我才明白，对行政工作无法定得很细，因为这是脑力劳动，那些规定无法落实，也无法检查。即使在检查中发现了问题，你也无法开除或处分任何人，中国的人事制度就是这样的。所以定这些东西，完全是虚的。

^① 丁干也是在北大二附中读的高中，后考入北大地质系。

访：其实您当校长后，推行了很多改革，多半是成功的。据我们所知，1985年您改组了学术委员会，就取得良好的成效。

丁：这是一项比较重要的改革。当时我发现学术委员会的委员平均年龄太大，他们大多是“文革”前的教授，至少七八十岁了。年龄大的去年轻的，一般看缺点比较多。而当时北大很需要提拔一批中青年教员。于是，我就考虑改组学术委员会。改组时我画了条杠杠，65岁以上的就不参加学术委员会。卡65岁，我是经过测算的。

访：您把65岁以上的人去掉，遭到非议了吗？学术委员会分几个层次？

丁：就去掉65岁以上的人这件事，我事先和党委通过气，王学珍和张学书都支持我。学术委员会分好几层。最基层的在系里；然后是文科一个，理科一个，这是第二层；再就是学校一层，是最高一层。学校一层的学术委员共有十几个人，被认为是学术水平比较高的，既有文科的又有理科的，另有党委书记参加。我是校一级学术委员会的主席，成员中我记得有厉以宁。文科学术委员会的主席是朱德熙，理科学术委员会的主席是陈佳洱。

1985年改组学术委员会后，北大提了一批教授、副教授。这年评职称，做得比较公正、严格，是北大历史上较好的一次。在评以前，我把各级的学术委员会委员找来开了一次会，要求他们不能散布会上讨论的内容，一定要做得公正、严格。那次参加会的人严格遵守纪律，后来就不太行了。

访：为什么不太行了？

丁：原因是，我们搞得很严格，而别的学校搞得不那么严格。很多教师跟我讲：你搞得严格，吃亏的是北大。他们在北大评不上副教授，而他们的学生在外边已经评了副教授。要参加学术会议，人家不管你的学问大



小，只管职称，实际上是我害了他们。我不得不承认这话也有道理。这种事靠一个学校顶不住。对此，我有点灰心。后几届北大评职称就不那么严格了。

访：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推行这种改革确实非常困难。

丁：我当校长后还有几件事值得提一下。一件事是规定教师到 65 岁一定退休，院士也一样。

访：教师中反对的多吗？

丁：不多。规定 65 岁退休，也是经过学校党委讨论决定的。之前，北大没有关于退休年龄的规定。另一件事是我上任后把力学系的教员王肇明调到外事处当支部书记。王肇明和邓成光一样，也是 1952 年入学的数力系学生，她“文革”前当过系里党总支委员。我刚当校长时，外事处内部问题非常多，不团结。外事处分两部分，一部分管外事，一部分管留学生。这两部分的人不团结，经常吵得不可开交。调王肇明去是要她把里边的人际关系搞好。我还调了沈鹏当修建处处长。他上任后干了件好事：

为了节省煤，把烧暖气的煤中的大块和小块分开使用。由于节省了煤，北大冬季供暖时间比北京市早半个月，结束晚半个月。这样，得感冒的人少，校医院的药费就减少了。

另外，1984 年暑假，中关村四十二楼附近的一批平房，因为地势很低，有天晚上下过大雨后进水。平房的居民都是北大的教职工。他们一大早就到我家门前喊，情绪非常激动，让我去看看。我到那里发现房子比地面低一尺。我顾不得脱皮鞋，走进去看到一户居民家里有个老人坐在床上，水快到床面了。

丁石孙任北大校长期间留影



我心里很难受。这时王学珍也来了。我们商量说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管后勤的同志要找个机器抽水，我说要研究个彻底解决的办法。这件事情，我做得是认真的。过了两天我去看了一下，还是解决了一些问题。

访：当校长后，您提出过办校原则吗？

丁：1986年暑假王学珍住院做痔疮手术，有一段时间学校党委常委会是我主持。有两次常委会专门讨论办校原则，我记得提了六条或七条原则。其中一条是从严治校。因为北大一贯工作效率比较低，也比较松散。二是发扬民主。当时提出对不同的事情应该采取不同的民主形式。如对学术问题不能全校讨论，由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对生活问题，要在教代会上讨论，要发动全校的教职工参与。三是要坚持“双百”方针。我同意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认为学术问题不能有任何框框。考虑到当时有一种议论，反对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我就提出坚持“双百”方针。四是干部不能越权管事。我自己也是一样。如有人向我抱怨他的住房条件太坏。对这样的事情，我很少当场表态，总要跟管住房的干部商量，征求他的意见。再如学校的招生工作，不归我管，我绝对不给负责招生的干部写条子。我不能越权，越权的后果就是人家不管事了。

访：现在一些大学提出要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您当校长后，北大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吗？

丁：提出过。在这件事上，学校党委常委会上还有争论，因为有些同志提出前边要加社会主义的定语。这个争论不好办，我也不敢说不加社会主义。最后朱德熙提出，提口号不能太长，讲世界一流大学就可以了，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当时朱德熙不是常委，是作为副校长列席会议的。

访：对于提出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现在有些人是持批评态度的，认为这不切合实际。当时有人反对吗？

丁：当时很多人反对。其实，反对的人也不是恶意。有人向我指出，我们的经费离世界一流差得太远，提这个口号纯粹是空话。当时我也觉得这个意见是对的。北大的经费连一个亿人民币都不到，而世界一流大学是好多个亿的美元。但我认为提出这个口号有它的意义，也就是说北大的目标应该放在这里。比如说，一般的科研成果北大多得很，但不应该满足于此，应该追求有独创性的、有世界影响的科研成果。我认为每个系都应该这样要求自己，不要稍取得一点成果就沾沾自喜。我的想法是取法乎上，就把这作为目标，当然短期不可能达到。提这几条原则学校行政方面是支持的，事先我和王义遒等人聊过。党委的同志不太同意，但他们也不便反对，因为这些话在原则上没有错。

管理科学中心和北大方正

访：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是目前国内最有名的商学院之一。据厉以宁说，光华管理学院的历史要从1985年北大成立经济管理系和管理科学中心算起，而管理科学中心的成立跟您密不可分。而且，这个中心的办学方针，是您和厉以宁、陈良焜、王恩涌在您家的小会客厅内决定的。是这样的吗？

丁：对。当时我提出成立管理科学中心，是为了帮助厉以宁，让他躲开经济系，有自己的发展空间。1957年划右派时，厉以宁属于右派边缘人物，1958年跟我一起下放到门头沟劳动锻炼，“文革”开始后又跟我一起关在黑帮大院。“文革”后，他在经济系受排挤，有些人认为他是搞邪门歪道，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厉以宁想入党，在系里的党支部就是通不过。

我当校长后，别的领导跟我说：对厉以宁要控制使用。他会画画，如果办展览，可以用他。但当时赵紫阳很重视厉以宁，长时间让他住在中南海。中央认为他可以入党。胡启立曾打电话过来问：“厉以宁为什么不能入党？”

访：中央过问后，厉以宁入党了吗？管理科学中心属于什么性质的机构？

丁：入了。中央一过问，情况就变了。管理科学中心是学校领导的跨学科的学术性机构，跟系的地位类似。当时我有一个看法，成立系需要有比较成熟的条件，如教学计划要很清楚；但中心不需要，能搞研究就可以。这个中心的研究范围比较宽泛，包括管理、经济等各个领域。中心的人员来源也很广，各种人才都要。它成立不久就有了十几个人。中心的主任由我当；副主任有两个，一个是厉以宁，另一个是陈良焜。^①

除管理科学中心外，我当校长期间还成立了四个中心，其中包括人口中心、环境科学中心。现在北大环境科学中心，非常热门。^②在我之前，张龙翔校长曾提出成立几个中心的设想。因而，在北大成立中心不是我首先提出的。我当校长后成立这些中心的大目标，是想突破北大的框框，改变系里原来的传统。

访：北大方正是您当校长后成立的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办得很成功，北大方正已成为我国计算机行业中的一个知名品牌。请您回忆一下这个公司成立的经过。

丁：成立北大方正是我1986年做的一件事。之前，北大跟山东潍坊的华光公司合作，利用王选发明的汉字排版系统，生产汉字排版印刷机已

^① 陈良焜原为北大数学系教授，研究经济计量学。管理科学中心副主任还有王恩涌，是北大地理学教授。

^② 北大环境科学中心成立于1989年5月4日。

有多年。1986年已经做到华光四型机。有一次我问起卖出这么一台机器，北大能得到多少钱。他们说卖出一台机器，华光公司给北大一万元钱。我记得当时一台机器至少卖十万以上，或者更多。我觉得这对北大不公平，因为潍坊的公司也不会生产机器，只是从日本买来机器，安装上王选的汉字排版系统。我就提出：“为什么我们不自己搞？”王选的重要发明是信息压缩技术，这项技术就是把包括大量字型字号的信息进行压缩。而只有把各种字型字号的汉字储存下来，才能印报纸。

当时要把王选发明的这个系统固化，做到芯片上，国内还做不到，要到英国去做。我们和英国的公司联系，他们答应为我们做，还负责保密。这样，学校就出钱派王选到英国去，把他的系统固化，拿回来。很快北大自己办了一个公司，开始不叫方正，叫北大新技术开发公司。我考虑王选不会做生意，就跟有关同志商量，把王选的工作跟公司的工作分开，给王选成立一个研究所，负责研究开发；公司负责生产销售。

我在学校里挑选了两个人筹建公司。一个是无线电系的技术员，叫楼滨龙；另一个是数学系的总支副书记，叫黄禄平，是学计算数学的。记得我专门和楼滨龙谈过一次话，因为当时要动员教师出来开公司难度相当大。我有一点很明确，就是出来开公司的人一定要跟学校脱钩。你挣多少钱学校不管，但你能不能再保留国家公职人员身份。公司的水电费也要跟学校明算账。我跟他们讲：“你们要学游泳，就要跳到水里去。”我印象中公司开始时没有招工人，干活的都是大学生和研究生，整个技术水平比较高。

访：公司成立后，北大和潍坊华光公司中断合作关系了吗？

丁：我们把潍坊华光公司抛开了。但由于华光这个品牌由我们跟这家公司共同拥有，我们不能再用华光这个名字，于是就有了方正这个品牌。它是怎么想出来的，我不知道。一开始，方正没有办公地点，就在北大附

近零散地找了些小房子。我去看过，里边也没有什么机器，只是看到很多人在忙着写字，因为很多字体要靠人写出来。记得当时市场相当大，从中央级报纸到省级报纸，甚至地市级和县级报纸都要上激光排版系统；楼滨龙到处去推销。

访：北大方正崛起后，跟北大脱钩了吗？

丁：我说要它跟北大脱钩，但实际并没有。当时我就感到，像方正这种公司，所有制不清楚；但另一方面，北大也没有向方正注入资金。方正启动的时候，向北京市的一家公司借了几十万元做本钱。方正的产权归谁所有，始终是一个问题，这一点我当时就看到了。

难忘的外事活动

访：当北大校长后，您参加的外事活动一定很多，有没有令您印象深刻的？

丁：有几次外事活动，我至今难忘。一次是我当校长后第一次接待外宾。那是1984年下半年，我接待的是日本首相中曾根。他到北大演讲，还找学生开了个座谈会。当时胡耀邦强调跟日本友好，所以我们跟日本的关系比较好。由于是第一次接待外宾，中曾根的地位又高，我很紧张，坐在前排不断回头望，生怕我们在礼仪上出错。

不久，我接待了西德总理科尔和日本的池田大作。池田大作是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日本公民党的后台。创价学会是宗教团体，有群众基础，群众主要是家庭妇女。池田大作比较重视中日友好。我们对他的接待规格比较高。他到北大不是第一次了，以前周培源接待过他。周培源也去过日



1984年丁石孙(右)接待到北大访问的西德总理科尔

本，到过创价大学。他们为了提高自己的声誉，要授周培源名誉博士学位。但周培源认为创价大学地位太低，就没有接受。池田大作来时，有人就提醒我，说可能要授予我名誉博士。池田大作比较鬼，事先不说。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大型宴会上讲话时，他突然宣布创价大学要授予北京大学校长名誉博士学位，参加宴会的王震表示感谢。当时我没说话的机会，这事就定了。但他没说什么时候授，我就尽量不理这件事。

访：后来池田大作有没有跟您联系，确定授予名誉博士的时间？

丁：大概在1985年10月，创价大学来信，说要在11月或12月授予我名誉博士，邀请3个人：我跟夫人和一个随员，往返机票由他们出钱。尽管我不想要这个博士学位，但木已成舟，我只好去了。随员我带的就是前面提到的外事处支部书记、副处长王肇明。我印象中到日本住进宾馆时，已经到了吃晚饭时间。我们换了衣服，正准备去吃饭时，有人来通知要给我们换房间。他们说我们只管去吃饭，一切他们都会办好。饭吃得很

好，陪我们的是一个干事，池田大作没来。等吃过晚饭，我发现他们给我换到一个总统套房里，有五六间房，很大。我过去从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搞不清楚接待的规格为什么如此高。第二天才知道，池田大作犯了心脏病。作为政治家，他不希望外界知道他病了，他住院也是保密的。后来我想，换房间大概是池田大作的意图。他借换房子这件事，来掩盖他生病。

接待我的人告诉我，池田大作住在医院里，不能出来接待我，但希望我到医院看他一下。而且，我不能对其他人说到医院看他，他住的地方是保密的。记得是一辆汽车把我从医院的后门接进去的。池田大作和我讲话时，好像身体很好。第二天电视里就播了一条他接见我的新闻，借以说明他没病。第二天，创价大学就授予我博士学位。这所大学很不正规，仪式很随便，没戴博士帽，也没穿博士服。他们的一个校长告诉我仪式很短，我只能讲十分钟，幸好我有说短话的本事。我还记得，《光明日报》的一个记者打电话问我，要不要发消息，我说不要发，所以这件事就没有见报。我说，我拿这个名誉博士，不是我的荣誉，而是创价大学借我抬高他们的身价。

访：您对创价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实际并不看重。后来还有没有国外大学授予您名誉博士学位？

丁：有。1988年5月，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授予我

1985年创价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丁石孙(右)在日本与池田大作合影



名誉科学博士学位。那次赴美的旅行很不顺利。不顺利主要表现在我到金山下飞机后，发现我带的两个箱子找不到了，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幸好授予名誉博士学位要穿大袍子，里边的西服不成样子也看不见。

仪式结束之后，校长请吃饭时，告诉我箱子的事他去想办法。之后我到伊利诺伊大学访问，接待我的是外事处的一个中国人。我告诉她第一件事是要买一套西装，她想让她爱人陪我去。我怕外国人领着去的地方太贵，我没有这么多钱。我说这里有中国的访问学者，让他们带我去。下午，我买了西服。这样，至少出去像点样子。

伊利诺伊大学有超级计算机，我就参观了这个实验室。在这所大学，

我前后待了三天。由于美国学生对中国的改革很有兴趣，外事处的那个人希望我在学校的广播电台里回答学生的问题。我就坐在播音室里，接听学生打来的电话，然后回答问题。当时我感到北大校长在国外影响还比较大。

访：最后您的箱子找到了吗？

丁：我买好衣服的第二天，接到通知说我的箱子找到了。箱子已经快散架了，还好，衣服没掉出来。离开伊利诺伊大学后，我去了哈佛大学；来接我的是丘成桐，还有哈佛大学数学系主任。他们把我接到一个很高级的宾馆。哈佛大学

1988年丁石孙(左)接受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名誉科学博士学位后与该校校长合影



邀请我的不是数学系，是文理学院。有一天，文理学院院长请我吃饭，他了解到我儿子儿媳都在波士顿，就请他们一起来吃饭。

离开哈佛大学，我又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在那里见到了李政道。他请我到他家里去坐了坐。我过去的学生洪加威也在纽约。我给他打了个电话表示问候，但表示没有时间去看他。然后，我从纽约又返回华盛顿。北大原来的外事处长正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当教育参赞，他请我吃了顿饭，记得这个饭馆的特色菜是螃蟹腿。我到华盛顿时，驻美大使韩叙也在。他夫人邀请我到大使馆里做个报告，介绍国内的教育情况。大概大使馆已从国内了解到我这个人有些问题，不便正式邀请，但他们又很想了解国内的情况，最后是由韩叙的夫人个人邀请的。

离开华盛顿后，我又飞到西部，访问了加州大学几个分校。第一个分校是圣巴巴拉，这个学校就是樊畿所在的学校。我到樊畿家里看望他。他表示年纪大了，想把个人的藏书捐给北大数学系。他说有一个问题，把书直接捐给北大不能减个人所得税。我告诉他，我认识亚洲基金会的人，让他把书捐给这个基金会，由这个基金会再转给北大。这样，他就可以少交个人所得税了。樊畿的书就这样到了北大。北大数学系专门安排了一个房间存放，写着这是樊畿的捐书。

离开圣巴巴拉，我回到伯克利。加州大学总校的校长在家里请我吃饭。席间他说想办一个环太平洋大学校长会议，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支持。在伯克利，我还做了件事，就是和美国人进行了一次谈判。美国人说他请我们到美国一般都是一年，而我们请他们到中国一般都是一两周。谈判之前，我就知道要谈这个问题。我跟他们讲：两边情况不一样，我们来一趟路费很贵，来这里是想学些东西，所以在这里时间就长一点。那次谈判还比较成功，把问题解决了。在伯克利，我顺便去拜访了陈省身。



1988年5月23日丁石孙(右)到陈省身家中拜访

这次，我还到温哥华访问 UBC（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加拿大的一所名校，在那里访问了四五天。温哥华非常漂亮，气候也好。我出国前，听说北京想修轻轨铁路。因为轻轨要穿过北大，很多教授反对；有人说轻轨对北大特别是北大的实验室影响很大。我在温哥华专门去坐了他们的轻轨，看看它影响到底有多大。我还记得 UBC 有个教员向我介绍，说他们大学的很多学生毕业前一年，要到公司实习一年，便于毕业以后找工作。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UBC 尽管是很有名的大学，但把学生找工作看成很大的问题。

这次访问时间比较长，将近 20 天，也很紧张，跑了很多城市。我回来大概是 6 月份了。可能因为出访比较累，我回来的第 3 天就发烧，得了急性尿道炎，住进了北大校医院。待了半天后，由于高烧不退，被转到北医三院，两三天后就慢慢恢复了。

访：后来环太平洋大学校长会议办成了吗？

丁：办成了，是 1989 年 5 月 10 日至 13 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我

去参加了。开会的地点在亚洲基金会，参加这个会议的有3个中国人。除我之外，还有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台湾大学校长孙震。会议日程安排了校长发言。事先我在北大找了些教授座谈，请他们谈谈环太平洋地区经济和文化的情况。我在座谈会的基础上，准备了一个发言，主要讲环太平洋地区经济文化差异很大，我们怎样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合作。我先写了个中文稿子，然后请英语系的教授译成英文。那天我就念稿子，大家反映还比较好。那次会上，大家关心的重点是中国的学潮。他们主要问我中国学潮的发展前景。根据离开北京时的情况，我讲学潮可能很快就会和平结束。我谈得比较乐观，没想到没几天事情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

访：关于1989年学潮的事先放一放，还是继续谈您当校长时的外事活动。1985年您作为中方团长组织召开了中日大学校长会议。我们对这个会议不太了解，您能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吗？

丁：1985年三四月份，教育部通知我要开个中日大学校长会议，让我跟教育部的一个处长先去趟日本，跟日方商量一下这个会怎么开。去日本是4月份，由日本文部省接待。我们除跟文部省协商确定第一次校长会在中国开，还访问了东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我当校长前早稻田大学已跟北大建立了联系，有一对学中文的夫妇到北大访问过，这次由他们做翻译。在这所大学，我们看到了孙中山留学时的成绩表。

回国后，我就准备开这个会。我是中方团长，请文重当大会的秘书长。文重是周培源当校长时任命的北大校长办公室主任。我当校长后，他几次找我，说校办主任他当了很久，位置太低了，应该当学校的秘书长，让我到常委会上说。文重是老北大的，是地下党员。通过我的努力，他终于如愿当了秘书长。

中日大学校长会议在香山饭店开的。文重很有能力，会议组织得很

好。这个会议是友好性的，不是学术性的；像个神仙会，大家随便谈。当时我想，应该让年轻人加强联系，在大学里开展中日友好活动。参会的日本大学代表团团长是庆应大学校长，他的资格很老；李鹏当时是国家教委主任，接见了日本代表团。这次会上确定校长会一年一次。第二次在日本举办，中方团长是清华大学校长高景德，我也去了。1985 年暑假，教育部还通知我担任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团长再访日本，出席了第一次日中大学校长恳谈会。

访：您当大学校长后，出访过欧洲吗？

丁：1986 年学校组织了一个 4 人代表团到欧洲访问，我对这次外事活动印象也很深。除我之外，参加者还有学校原党委书记王效挺、社会科学

1985 年 7 月 14 日日本召开第一次日中大学校长恳谈会时与会者合影(前排左 7 丁石孙)



处处长苏志中、研究生处干部张丽霞。这次出访路线很长，时间上分为两段。前一段是受欧洲几所大学的邀请，我们的活动全由他们接待；后一段是德国（西德）学术交流中心（DAAD）邀请我访问西德的几所大学，这个中心是个比较有钱的国际学术交流机构。

我们第一站是东德的洪堡大学。这所大学的校长是东德的中央委员，地位很高。我们在东德待了四天，参观了波茨坦。二战欧洲战事结束时，波茨坦会议在这里召开。我们看了会址，还听了音乐会。在东德的第二天，发生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泄漏事故。我不太懂，不知道危害有多大。但从东德的报上知道，当时他们很紧张。

在我们的日程中，是要访问西德的柏林自由大学的，最方便的行程是从东德直接到西德。但为了照顾东德人的感情，我们没有直接去西德，而是先去了荷兰——荷兰的莱顿大学要跟北大签订一个合作协议。之后我们才去西柏林，访问了柏林自由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实际上是西德的洪堡大学，它跟北大的联系已有好几年。我们在西柏林看见那里的物资比较丰富，百货公司里的商品多得很。

访：西德和东德之间的柏林墙很有名，你们参观了吗？

丁：我们在东西两边都参观了柏林墙。西柏林的人告诉我们，东德人冒着生命危险，用各种办法逃到西德来。西柏林有个展览馆，专门展览东德人逃到西德的办法。我们看了以后，口头上不好说，但心里明白双方竞赛结果实际已经出来了。

我们到柏林自由大学访问的目的，是签订一个交流协定。双方谈判协文本怎么写时，一直谈不拢。在我们的印象中，西柏林跟西德是两回事，是一个很特殊的区。休息时，一位翻译（是个中国人，在西德当教授）提醒我们：谈不下去的原因是对方坚持西柏林是西德的一部分。后

来，我们在协定文本上写上根据中国跟西德的文化交流协定，对方就同意了。

离开西柏林，我们到了汉诺威。这是西德的一个州，负责接待我们的是州政府。我们在那里玩了几天，看了欧洲一些小镇居民的生活，参观了莱布尼茨纪念馆，还观光了德国的皇宫。他们的皇宫比我们的故宫要小。我们发现德国土豆比较多，他们说大概是从哪个皇帝开始，把土豆从国外引进作为主食的。吃的方法也没什么特别：把土豆做成土豆饼，放点肉末，再煎一下。离开汉诺威，我参观了著名的格丁根大学。他们向我介绍他们数学研究的情况，介绍情况之后，他们发现我懂德文；因为尚未翻译，我已经听懂了大半。

访：这次访问的最后一阶段，是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单独邀请您访问西德的大学吗？

丁：对。他们3个从汉诺威先回国了。德国学术交流中心派了一个女大学生做向导。我先到海德堡参加了海德堡大学建校600年庆祝酒会。当地负责接待我的是个数学家，叫多德（Dold），是世界知名的拓扑学家。在那里，我又见到了柏林自由大学校长。他也来参加这次的庆祝酒会。

接着我去了慕尼黑，待了4天，由慕尼黑大学校长接待我。其间正好碰上啤酒节，校长陪我在街上喝啤酒。他们喝啤酒用的都是很大的杯子。我还是第一次这样喝啤酒，一下喝一大杯。

1987年，我又出访了莫斯科大学。这次跟我一起去的有文科处处长吴同瑞和俄语系主任。那时的一般做法是，校长出访总会带几个人，大家轮流跟着去。到达苏联的日期是8月31日，莫斯科大学的一个副校长到机场来接我们。9月1日，我们参加了莫斯科大学的开学典礼。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就知道莫斯科大学盖了一幢很大的楼。大楼第一层有个大

厅，挂着世界知名科学家的照片，其中有祖冲之。我在大楼里参观了一天，又跟接待我的那位副校长谈判两校教师互访的问题。由于他们算得很精，我们谈得很苦，整整谈了一下午。当时莫斯科大学的校长是苏联科学院院士，学物理的，他请我吃了顿饭。苏联是一长制，校长负责，党委书记的地位不高，有的甚至是大学生，管的事也很少，就限于工青妇。

在莫斯科待的4天，我们参观了克里姆林宫和红场。我印象深的是克里姆林宫的大炮很大。在红场，我们瞻仰了列宁遗体。9月4日，我们乘火车去圣彼得堡——当时它还叫列宁格勒——访问，由列宁格勒大学接待，该校的外事处长全程陪同。列宁格勒比莫斯科现代化。记得我到的当天晚上，外事处长来陪我们吃饭。他带了一瓶葡萄酒，说祝贺我的生日。我很吃惊，问他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他说从我的护照上知道的。这样，我在列宁格勒过了我的60岁生日。

我们参观了冬宫，它的面积很大，里边有很多名画。冬宫的旁边还有个夏宫，风景也相当好。我住的宾馆，门口就是那条著名的涅瓦河，可以看到解放冬宫的巡洋舰。列宁格勒有极昼现象，初夏有“白夜”。4天后，我和北大的另两个人分开：他们去基辅；我应华沙大学邀请，从苏联坐飞机到了波兰华沙。

当时波兰的经济已经相当困难。我大概早晨8点就到了，可接待我的副校长到中午才把我送进宾馆。他先把我请到他的办公室，一边聊天，一边吃早饭。他之所以一直磨到中午，是为了省半天的宾馆钱。这位副校长在我面前说了很多对政府不满的话，使我很惊讶。

最后一站是法国，好像是法国教育部请的。到了巴黎，他们安排我住进五星级宾馆，给的生活费也很高。我在法国参观了几所大学。他们的大

学，像巴黎第六大学、第七大学，都各有特点。我也参观了一些巴黎的名胜古迹：凡尔赛宫确实漂亮，是个很大的公园，里边有很大很好的草坪。罗浮宫是个展览馆，当时还没扩建。巴黎市内塞纳河穿过，有香榭丽舍大街，街上有很多咖啡馆，很有意思。

几天后，我到了法国南部的马赛，由那里的一所大学接待。马赛是个渔港，海边有很多卖鱼的。马赛有一处相当于古罗马的斗兽场，像大戏台一样，很多石头都破裂了，是个很古老的地方。我还去了一个小城市，是吉卜赛人的首都。他们说，到某年某月全世界的吉卜赛人都要派代表来选举他们的领袖。

访：您当大学校长期间的外事活动真不少。您对出国访问坚持什么原则吗？

丁：我尽量把出国访问压到最低限度。我认为可能对北大有好处的活动才去。我记得有一次，开罗大学请我。朱德熙对我说埃及是古文明国家，很多古文明的遗迹只有那里能看到，但最后我还是没去。因为我认为开罗大学学术地位不高，去一趟对北大没有太大好处。基于同样的原因，澳大利亚请我，我也没去。对出国访问的费用，我能不报销的就不报销。财务处处长曾跟我说，大概很少有校长像我这样。对这点我觉得很奇怪，出国大都是人家请我去，不要我出钱，我怎么好回来报销呢？

没有闹大的学生事件

访：您当校长的时候，北大不太平静，经常有学生闹事，向学校提出各种要求。我们对此只略有耳闻，实际并不了解具体情况。孔庆东说北大

学生对几点熄灯都要闹一闹。^① 您能详细讲讲吗？

丁：可以。1984年发生了熄灯事件，这是我当校长后，北大的第一次学生运动。过去北大学生宿舍晚上不熄灯，有很多学生到十一二点还不睡觉，在听收音机或洗衣服等，影响别的学生休息。在一次校长办公会上，我们议了这件事。有人提出部分学生晚上不睡觉，搞得大家不得安宁，应该11点熄灯。我知道这件事很敏感。北大学生自由惯了，突然让他们改变作息时间，恐怕会引起不满。为慎重起见，我叫沙健孙开了两个座谈会，听听学生的意见。有一天，沙健孙告诉我，座谈会开了，多数学生支持熄灯。他认为可以实行。所以我们就决定晚上11点熄灯。

实行熄灯这天晚上，数学系的干部打电话到我家，说学生闹起来了，一会儿就要到我家里来。我想在中关村的家里给围住就不好办了，赶紧骑自行车到办公室。因为怕半路上碰到学生，我绕道中关村，从西门进了学校。我当时住中关村的四十二楼。学生没搞清楚我住哪座楼，他们包围了四十三楼。看到这种情况，桂琳琳就在我家阳台上喊：“丁石孙不在四十三楼，在这里。”她还跟学生们讲，她不怕他们闹，“文革”时比这厉害得多。丁干这时年龄还小，看到这么多人，觉得很好玩。

学生发现我不在家里，就没劲了。这一天晚上，我睡得很晚。第二天开了个教职员会，我讲了话。会没开完，何东昌到北大来了，坐在我的办公室里。我开完会，把学生闹事的情况给他讲了。他听后才放心：熄灯事件没闹大，也不是政治事件。我让沙健孙给学生做了些工作，事情就解

^① 丁石孙任北大校长时，孔庆东为中文系学生。孔庆东说：那个时代北大学生比较狂，号称八千精英，觉得好像国家的责任都在我们肩膀上一样，有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劲儿。因为狂，所以要求高，经常闹事，几点熄灯要闹一闹，包子不好吃也要闹一闹。学生老师向学校提出各种要求。参见《精神的魅力——教育家丁石孙访谈录》。刊载于《百年潮》，2006年，第9期：第6页。

决了。

访：您做过班主任、年级主任、系主任，应该对做学生工作有些经验。当校长后，您还亲自去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吗？

丁：1984年，我应校党委组织部的要求，给学生讲过一次党课，有几百人听。当时学生的思想有点虚无主义，对共产党不相信。这次党课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说服学生相信共产党。在党课上，我没有讲大话、空话，主要是结合亲身经历，讲解放前怎么相信了共产党，解放后怎么加入了共产党，以及改革开放后共产党又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我当时主要是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证明共产党是值得相信的。

访：这次党课成功吗？

丁：比较成功，至少没有引起学生反感。我讲的也是我的真实思想。当时我确实对改革开放的复杂性，对后来的曲折，对可能的困难没有充分的估计。我的讲话充满了信心。现在来看，我当时的讲法过于简单，过于乐观。记得讲完党课不久，我的一个在《人民中国》日文版当编辑的老同学车懋祺来找我，要给我写篇报道。我把讲课的录音带给了他。他把录音整理出来请人译成日文发表了。

访：您的坦诚，在处理学生事件时起了作用。之后又遇到过别样的学生事件吗？

丁：1985年9月，北大学生由于对我们国家的对日政策不满，闹得很厉害，贴了很多大字报。那时胡耀邦想跟日本搞好关系，准备邀请3000名日本学生来中国访问，引起了学生的反感。再加上电视台在播《四世同堂》，激发了反日情绪。当时王学珍作为中央委员到中央参加全会，不在学校，只有我来面对学生。

我在大会上讲，希望同学们顾全大局。我说：我是经历了抗日战争

的，从个人感情上，我对日本人的痛恨比你们要强得多。我的小妹妹亲眼看到，我的一个亲戚被日本人一枪打死。你们对外交政策不能感情用事。我的讲话虽然把学生的嘘声压下去了，但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学生还是闹，并扬言要在9月18日上街游行。

9月17日晚，我召开学生干部会，希望他们劝说学生不要上街。但学生的的情绪还是非常激动。有的学生贴出大字报，说第二天要在图书馆前集合，上街游行。当时北京市领导很紧张，因为学生一上街就变成北京市的事。副市长陈昊苏到北大来，拉我到学校的广播电台发表讲话，讲话的稿子是他给我准备好的。

9月18日早晨，我在办公楼听说学生已涌向南校门。当时南校门已经关了，学生被堵在校门内。究竟是谁下令关的，至今我不清楚。有些学生干部站在铁门上做工作，希望同学不要冲出去。经过几个小时的僵持，学生终于散了，但校园里并不平静，贴了很多大字报，把我骂得狗血喷头。有张大字报，把我的讲话跟吴德“四五”时在天安门的讲话比较，说我已经堕落成了吴德。最终这个事件没有闹大。

阻止学生出去时，学校准备在校内开个大会，让学生把他们的想法讲讲。当时没人敢主持这个会，怕学生情绪太激动，控制不了局面。这时我认识了校研究生会主席张乃武，他说他主持。当时学生聚在南门准备冲出去，五四广场就在开这个会，把很多学生吸引过来了，减轻了南门的压力。

访：对学生要冲出校门、上街游行这件事，北京市领导很紧张。您也一样紧张吧！

丁：我对这件事不是很紧张。当时整个国内形势没那么严重，中央抓学生工作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李鹏，代表国务院；一个是胡启立，代表党

中央。事后他们把我和王学珍找到中南海谈了一次话，主要是强调要把善后工作做好，把学生的思想和情绪稳定下来。当时中央比较重视北大学生闹事，政治局专门开会研究过，让我和王学珍列席了会议。这是我唯一一次参加这么高层次的会议。

访：在这次政治局会上，您和王学珍发言了吗？政治局领导对北大学生闹事是什么态度？

丁：在这个会上，轮不到我们发言。胡耀邦是总书记，主持了会议。李鹏和胡启立汇报了这次北大闹事的情况。当时我觉得胡耀邦对学生游行好像并不赞成采取强制措施，因为当李鹏和胡启立汇报学生因校门关闭没出去时，胡耀邦就问：“你们干吗关校门？”他是冲着我和王学珍问的。胡启立赶紧把话头接过去，说是为了避免出更大的事。我感觉胡耀邦比较开明。

访：这次学生事件对北大有影响吗？

丁：影响相当大。因为这件事，很多家长不大敢让子女考北大。他们认为北大学生不安分，学校管得不好；清华比北大好，对学生管得严。这使我们心里有点窝火，但也无法去澄清。1986年二三月份，北大要派一批干部到各地区去招生，让我在动员会上讲话。我觉得这是个机会，就讲了一通。主要意思是说，北大学生的特点是政治上关心国家大事，要招生的干部下去宣传北大学生的政治热情。我讲话之后，下面就有人猜是不是上面有新精神，其实没有。我只是借此机会把北大正面的东西讲一下，为北大正名。我想不能因为学生搞运动，就把北大说得一塌糊涂。

访：据说，一年多后的1987年元旦，北大有几千学生包围过您的办公楼^①？

^① 《精神的魅力——教育家丁石孙访谈录》。刊载于《百年潮》，2006年，第9期：第8页。

丁：提起这件事，要从1986年说起。这一年是知识界思想比较活跃的一年，背景是即将召开中央全会，要对过去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做出决定。知识分子希望这个决定能对过去“左”的东西做出结论。总的说来，会后发表的文件跟很多人的期望值有距离，特别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各种想法。1986年年底，北京市出台了一个关于游行的条例，内容是允许游行，但必须向公安局申请。出台这么一个条例，本意是不希望游行，但又不能明说。当时北大学生想利用这个条例，申请合法游行。

1987年元旦这天，北大部分学生到城里游行。下午，有学生打电话到我家里，说有同学被公安局抓了，听得出来他们情绪非常激动。我不知究竟出了什么事，放不下心，吃过晚饭就去了校党委办公室。这天正好王学珍的女儿结婚，在家里请客。有人告诉我确实有些学生被抓。学生游行时，警察在路上泼了很多水，路面结了冰，很滑，有些学生摔倒，被警察抓了。

大概晚上8点钟，我在办公室听说学生要包围办公楼。这时王学珍不在，党委副书记郝斌在。时间不长，就有三四千学生把办公楼包围了。这时我想，如果学生冲进来就更乱了。于是，我下到办公楼东门，让人从楼上放下一个话筒，我手持话筒跟学生对话。当时气氛非常紧张，郝斌立刻跟市委通了电话，说办公楼已被包围。

访：还记得您跟学生的对话内容吗？

丁：我要他们冷静。我说有人被抓了，我们去交涉；把我围起来没用，我只有腾出手来才能做事。我刚讲完，有学生大声喊：“不要听丁石孙的话。他用的是缓兵之计。”这时楼上有人下来跟我讲，市委准备放人。我一下子心里有了底，就大声说，谁说我骗人，站出来，我从来不骗人！

听我这么一说，学生安静了，这时是晚上 8 点多钟。我让他们 11 点再来找我，听答复。这样，学生慢慢散去了。

访：在这之前，您肯定没有骗过学生，否则学生不会听您的话。

丁：对。学生散去后，我和郝斌跟北京市委联系，了解清楚被抓的学生有几十个，分别关在四个分局。我们商量决定派人去接，但不敢让校园里的学生知道，怕他们跟去把事闹大。随后，我们打电话通知车队，把汽车开到校外，让学生干部到校外集合上车，分几路去接被抓的学生。记得负责接学生的有校办主任黄槐成。

据说，被抓的学生在公安局里还是很受优待的。警察请他们喝茶，吃点心，看电视。他们被接回来时，已经快 12 点了。11 点时，有个别学生到办公楼来听答复。我说接人的车已派出去了，还没回来，但他们依旧等着。这次事件就这样平息了。

不久，我到京丰宾馆参加民盟代表会议的小组会。我对参会的人都不熟悉，很多人问我这次学潮的情况。我说，学生要去游行，绝对不是少数人煽动，而是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如果是少数人煽动的话，就说明我这个校长无能。我掌握学校的领导权，都煽动不起来，他们怎么能煽动起来呢？

这次学潮之后，胡耀邦下台了。那时我的情绪很坏，因为市委经常把我们找去开会，市委书记在一次会上还点了我和王学珍的名。他说，你们书记跟校长一定把学生带好，要负起责任。我听了这话很不高兴，但也不好顶他们。我只好说，我们只有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其实，那时北大并没有闹得太厉害，闹得最厉害的是中国科技大学。

在政协会上“闯祸”

访：1988年您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当时是民盟推荐的，还是北大推荐的？

丁：可能是民盟推荐的。这时我已是民盟中央常委。1957年反右运动后，我跟民盟几乎没有任何联系。1986年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高天找我，让我参加一点民盟的活动。他告诉我，他看中了我 and 清华大学校长高景德——高景德也是民盟盟员。这年年底，民盟开了一次代表会议，我跟高景德在会上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此后我跟民盟有了比较多的联系。北大也有可能推荐我当政协委员：王学珍是党中央委员，书记和校长要有个平衡。记得高景德和我一起当选为政协委员。那一届北大在民盟组的政协委员还有中文系王瑶和化学系的邢其毅。

访：您当政协委员后参加了1988年3月召开的七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您还记得参加这次会议的经过吗？

丁：记得一些。在这届政协开幕前，民盟开了个会，参加会的人是全部的盟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高天主持会议，让我上去讲话。我说我毫无思想准备，记者来采访我才知道当上了政协委员。在学校里人们并不太关心谁当了政协委员。我讲话的调子比较低，说我尽量反映一点老百姓的情况和意见。那时我不大清楚政协委员能起多大作用，但知道不可能起太大的作用，所以我的调子比较低，也没把当政协委员看成很重要的政治待遇。

参加这届全国政协会议的民盟组委员住在国谊宾馆。教育经费不足是

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记者专门采访了我和高景德。我们两人都说教育经费不够。我简单地算了一笔账：教育部给多少钱，文科学生一人多少钱，理科学生一人多少钱，这些钱是远远不够学校支出的。我们两人共同的想法是：校长赚不来钱，多招一个学生，就要赔多少钱。

在这届政协会上，钱老（钱伟长）代表民盟做大会发言。1987年下半年，费老（费孝通）就让我负责准备这个发言稿，内容是谈教育问题。为此民盟组织了一个班子，成员主要是民盟的人，记得有张毓茂，有吴修平的侄子（当时的福建民盟的秘书长）和黄景钧。我从北大找了两个博士生参加。准备这个材料前后花了一两个月时间，我也抽时间参加过几次讨论。当时我的一个主要想法是：不能说共产党的官员一定不重视教育，也不一定说共产党的官员是在说谎，只是口头说重视。我们要找出教育经费总是落实不下来的原因。

访：在这届政协会上，有没有令您印象深刻的发言？

丁：王瑶的名言“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就是在这次会上讲的，千家驹的大会发言引起了轰动。最初他是在小组会上讲的，大家都认为他讲得好，就让他到大会上讲。两次讲的内容一样。千家驹说他的发言是在从深圳到北京的火车上想出来的。

访：千家驹的发言主要讲了什么？

丁：他讲了腐败问题，也讲了教育。他的发言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并没有夸张。我们在小组会上听他讲时，没想到反响会如此强烈。他的口才很好，讲话有鼓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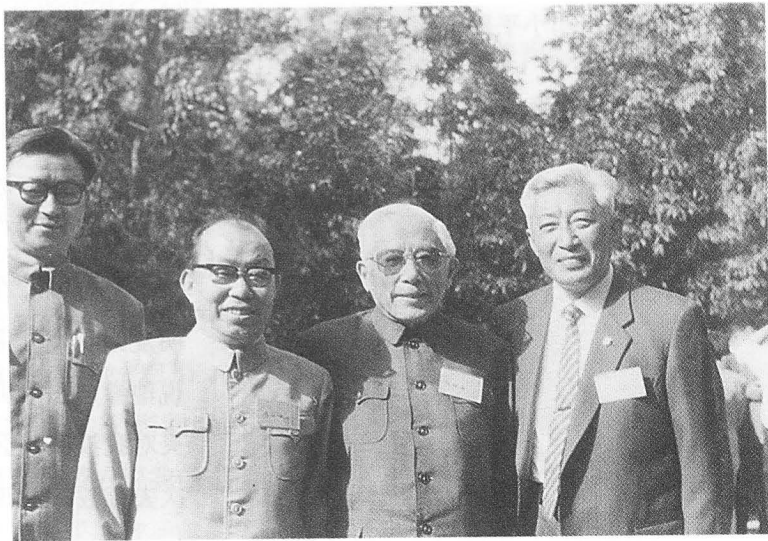
访：您在这届政协会议上发言了吗？

丁：在民盟组最后一次会议上发了言。我在民盟组除了北大的人，对其他人基本都不熟悉，所以一直没发言。最后一次小组会来的人不多，大

家的话也讲得差不多了，我说我讲一点。我讲的内容也很普通。我说：现在做思想工作的理论水平比建国初期高得多，但为什么效果不如过去好？主要在于行为。我之所以加入共产党，主要并不是因为我在理论上对党搞得很清楚，而是因为我看到周围的共产党员真正为别人办事。我当了校长，有一点和过去不一样，就是能接触到一些上层人士，也不是地位很高的，就是学校一级的。我过去想，校领导党性都非常强。等到我当了校长，才知道这些领导对利益、名位等考虑得很多。我最后讲了一句话，让当时的领导不高兴。我说：很多领导觉得现在年轻人的思想有问题，个人考虑多；实际一些老同志、老革命也不见得觉悟就很高，没有私心。老同志应该扪心自问。

访：您的发言反响大吗？

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丁石孙(左4)与周培源(左3)、马适江(左2)合影



丁：我觉得自己讲的都是些大实话，没想到会有什么轰动效应。小组秘书曲伟把我的发言记了下来，当晚寄到报社，第二天《中国青年报》就登了。第二天早上我到学校时，报纸已经到了。我的发言发表后，很快在学生中传开了，引起了强烈反响。学生们认为我为他们说了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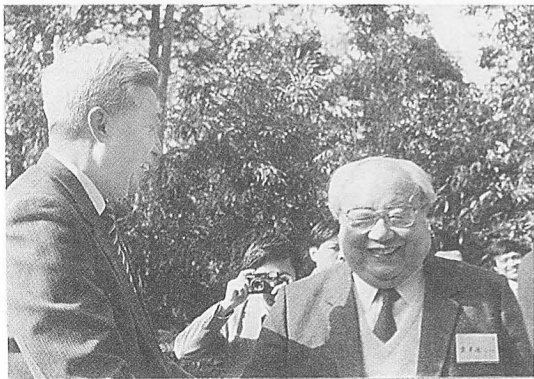
1988年“两会”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发言，报道得比过去都充分。即使如此，我的发言跟千家驹的发言都未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了两天，有人传说赵紫阳在内部对我们两人的讲话都有很重的批评，把一个说成是哗众取宠，把另一个说成是耸人听闻。有人说我闯了祸。

访：这说明您的发言确实使一些领导不高兴。

丁：1988年暑假期间，国家教委认为学生不大稳定，在北戴河办了个学习班，让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参加。学习班时间不长，快结束时，中央领导接见我们，其中有邓小平，记不清是否还有赵紫阳。接见完要合影，这时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我被安排坐在第一排，别的校长都坐在第二排。邓小平还跟我握手。看来他们是有意这样安排的。我没什么特别的表示，邓小平跟我握手就握了握。

过了暑假，统战部突然通知我，说部长阎明复要请我吃饭。那天在统战部，吃饭的人连我一共4人，有阎明复，还有一局局长孙楠、孙公麟。在吃饭的过程中，阎明复跟我说，中央是信任我的。他说他参加了中央的一些会，发现中央对我没有什么意见。这是我第一次去统战部，我搞不清楚中央为什

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丁石孙(左)与费孝通合影



么要让阎明复请我吃饭。事后我把这件事跟邓小平和我握手联系起来，才意识到这些是中央的表态。大概中央觉得对我在政协会上的发言批评重了，我并不是学生闹事的后台。

“六四”风波前后

访：1989年，北京发生了“六四”风波。北大学生是这次风波的主角之一，我们想了解您在这次风波前后的经历。

丁：1989年4月中旬，胡耀邦去世。听到这个消息，北大学生就动起来了，当晚就有学生到天安门广场去悼念。胡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我去参加了。追悼会结束后，就有个北大学生跪在大会堂台阶上，要求接见，要求跟中央领导对话。从4月中旬到5月初，学生一直在闹，学校也没办法。学生会也不听学校的。

4月26日，北京市委开会，我去了。市委副书记汪家镠跟我们传达了“四二六”社论，说学生运动是一场动乱。我听完这个传达，非常着急，情绪很激动。我跟汪家镠说：这个社论发表出来对学生是个刺激，效果不好。汪家镠说只能做工作，让上面改调子不可能。

这天我回到北大时，学校里已经相当乱了，管学生的干部朱善璐也控制不住局面。当天晚上，学生扬言第二天要游行。学校党委要开常委会，研究如何按社论的精神做学生的工作，打电话让我参加。由于我的情绪相当不好，早就想到如果学生受到刺激，就会采取过激行动，就说我脑袋疼，无法去开会。当时我爱人说我的态度太坏了。从这件事看，北大党委的干部比较正派，也比较了解我。他们如果想整我一下，完全可以借此告

我一状。

访：4月27日，学生上街游行了吗？学生不满主要针对哪些方面？

丁：去了，影响相当大。后来我听说，北京市还动员了很多警察，想阻止这次游行，结果没有成功。很多警察听到学生的劝说，就让开了路，这也反映出警察的态度。当时学生不满的原因，一个是物价上涨，一个是腐败。学生游行回来，就宣布罢课。总之，那几天学校的秩序全乱了。

对学生罢课，我有个错误的估计，认为持续不了很长时间。当年我在上海搞学生运动，也罢过课。根据我的经验，时间一长，学生就累了，就想回来上课。到5月初，我想做做学生的工作，希望他们复课。通过高天，征求了阎明复的意见，看他能不能跟学生接触一下。5月3日，阎明复通知我去统战部，对我说他对上头的动向也不清楚。他看我比较积极，就鼓励我跟学生接触一下。

5月3日，是北大校庆的前一天。这天，数力系1952年入学的学生返校。我从统战部回来后参加了他们的聚会，简单讲了几句话。我说：有一种说法，认为年轻人只关心他们自己，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这几天学生的表现，充分说明年轻人是有希望的。

访：为了让学生复课，您直接面对学生做工作了吗？

丁：我虽然想做，但还是比较慎重，没有直接面对学生，而是让罗豪才、王义遒跟学生接触。结果他们没谈成，学生根本不听，因为学生的不满并不是针对学校。5月4日下午，我正在参加环境科学中心的成立会，突然有人通知我，说中办给我打了电话，让我赶紧回电话。从电话我得知，明天赵紫阳在中南海要跟我谈话。第二天，我去了之后知道被找去谈话的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许嘉璐。

访：赵紫阳主要问学生运动的情况吗？

丁：他主要想让我们说说学生运动的前前后后，想搞清楚学生的要求到底是什么。我们就把了解的情况如实说了。我印象中赵紫阳比较温和，没有发表太多意见，也没说不同意“四二六”社论。我以为跟赵紫阳谈话后了解了中央的态度，并不清楚他和邓小平的意见不一致。5月5日下午上班时，我就到党委办公室，找王学珍、郝斌，讲了赵紫阳找我谈话的经过。这些情况说明当时我看问题比较简单。

5月10日，我离开北京到美国旧金山参加环太平洋大学校长会议。13日会议结束后，我去伯克利拜访陈省身。陈省身告诉我，北京的学生已经绝食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很吃惊，就在他家里给学校打了电话。电话是陈佳洱接的，他肯定了绝食这件事。因为我在美国，什么事也做不了，也不知道事情会怎样发展，但我想到了，绝食这种做法，很可能导致事情激化。在伯克利时，有很多中国学生来找我，让我说说国内学生运动的情况。我说不出什么，因为我在国内时还比较平稳，没想到几天就发展成这样。

我访问的下一站是洛杉矶。离开伯克利的头天晚上，在美国定居的我的一个老同学孙良方和他的夫人钱宁，邀请我到他们家去一趟。钱宁是政治上很活跃的人，《科技导报》就是她创办的。他们的儿子开车把我接到他们家里，主要是想从我这里了解国内的情况。我就随便说了说，完全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后来那么严重。

我到洛杉矶时，国内形势已经非常紧张，到了要戒严的程度。很多记者要采访我，也有很多中国学生要找我。北大一个叫王丽真的校友，怕我不了解情况说错了话，就拉了几个朋友，把我藏到了郊区的一幢别墅里。我在那里休息了一天，外边的人找不到我了。晚上王丽真和她爱人回来了，给我做了晚饭。我简单吃了点稀饭，就去了宾馆。第二天得知中国驻

美领事馆被中国学生包围了。

我在洛杉矶一共待了三四天。一天，有人来找我，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中国留学生要派个代表团回国，支援学生运动。他们说这个活动是得到领事馆支持的。这批回国的学生，要选几个代表让我接见。代表中有一个学生我是认识的，叫丁健。当时要我发表意见，让我非常为难，因为我觉得自己对国内的情况很不了解。我只能说希望他们回去后，把情绪平静下来，使问题平稳地解决。

访：您是怎么认识丁健的？

丁：他原来是北大化学系学生会主席。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事，他冲到校长办公室要找我谈话。我对秘书说事先没约好，现在不见。他大为恼火，认为校长的架子太大了，回去给我写了封信，把我大骂一通，说明我在办公室，竟不接见他。我当晚亲自写了封回信，跟他说明我每天的工作都按计划安排；如果随时打乱我的计划，我就没法工作。我必须科学地安排时间，这不是架子大小的问题，而是工作方法的问题。丁健对我的信反应比较好。他后来跟我讲，我的理由是对的。由此我跟这个学生熟了，他有事情还到我家里找过我。

访：这个代表团回国支援学生运动的结果如何？

丁：到北京被拘禁了，后来被遣返回美国。

访：离开洛杉矶，您又去了什么地方？是否有媒体采访您对国内学生运动的看法？

丁：去了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和夏威夷。在丹佛市，一天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校长邀请我和几位北大同事到他家做客。饭间，他说非常抱歉，有记者要采访我关于中国的学生运动的事。他请我体谅他的困难，他不能得罪记者。我不好驳主人的面子，就到了另一个房间接受采访。记者的问题

主要是学生运动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我说：因为已经离开中国两个星期，我说不出什么。根据两周前我的了解，学生的要求也就是反对贪污等。我想这样的学生运动会以和平方式结束。第二天当地的报纸刊登了这次采访。

到夏威夷的当天，接待的人告诉我，当地新闻记者要在第二天早晨采访我。第二天吃完早饭，我就到了旅馆大厅。有个记者向我提问中国的学潮怎么样。我又是讲我出来的时间比较长了，对国内情况了解很少。根据我出来之前的情况，学生的要求就是反腐败，对政府提出了一些批评。我说：其实学生的要求很正常，只是我们不太习惯罢了。

对这次采访，我以为就登在地方报纸上，说话时没太注意。一天晚上我回到旅馆时，服务员告诉我北京来了电话，让我半夜回个电话。我定了闹钟，在半夜给陈佳洱打了电话。他问我究竟在夏威夷说了什么话。他说我跟记者讲的话，被拿到美国之音上播放了。当时学生很困难，因为我肯定了学生的动机是好的，他们感到很高兴，就在北大校园里放美国之音。这个讲话反响很大，有的学生甚至喊：“丁石孙万岁！”但政府非常恼火。陈佳洱主要跟我讲，我的讲话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

访：您从夏威夷回到北京后的情况怎么样？

丁：6月1日晚，我回到北京。当时北京已经戒严，赵紫阳已经靠边站了。来接我的有桂琳琳和物理系教师陆果。在20世纪70年代，陆果跟我是邻居。他之所以来接我，是怕我一下飞机就被学生包围，因不了解情况再说错话。6月2日，我在学校里休息一天，把情况了解得比较清楚了。

6月3日，按照原定的计划，樊畿等我回来授予他名誉教授称号。这天，北大在图书馆的一个小会议厅里举行了授予仪式。在仪式上，我已经听到学生会在校内放《国际歌》。学校里的人告诉我，放《国际歌》就标

志形势已经很严重了。晚上，我在香山饭店请樊畿吃饭，回来的路上要过一些军事单位，很多军车把路堵了，无法通过。我的司机比较有经验，没直接往北大开，而是往城里开，绕道把樊畿送到友谊宾馆。

晚上回到家里，我就休息了。睡觉当中，我接到我妹妹的电话，她说木樨地开枪了。大概夜里3点钟，北大三四百教员聚在办公楼，其中有少数从城里回来的学生，要求见校领导。这些教员很激动，从办公楼打电话到我家里，要我赶紧到办公楼，代表学校对发生的事情表态。记得说话比较多的是无线电系的教授西门纪业，他做过我的邻居，跟我比较熟悉。

访：您去办公楼了吗？您很难表态吧？

丁：我骑着自行车去了办公楼。他们看到我，情绪很激动，说怎么可以对学生开枪呢！学校对这个事情应该表态，明确表示反对。有个别刚从城里回来的学生说确实开枪了。当时我非常为难，跟他们说：你们要求我表态，反对政府这种做法，表个态是容易的。但我如果说了这话，就是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就当不成校长，管不了学校的事。当前最重要的是保护学生，要了解北大有多少学生受伤，赶紧送去治疗。现在救人最重要，不要过分激动，希望他们先回去。我还说学校一定派人进城去弄清情况，等到早晨8点有什么情况，我再告诉你们。我这话一说，他们觉得还是合理的，就陆续走了。

访：当时教师和学生的的情绪都非常激动，要控制这种场面很难。

丁：控制这种场面确实不容易。在群众情绪激动的情况下，跟群众对立起来没有好处。说实在的，当时我说的话要抓毛病，也是可以抓的，因为上头可以认为我的立场不分明。当时还好，我讲的话没有录音，也没有人向上头反映。事后听说清华大学校长在类似的场合立场非常坚定，说他支持政府，学生非常生气，打了他两个耳光。

访：教师和学生散了之后，您对接下来的工作是怎么安排的？

丁：我去了党委办公室，几个书记都在。我要求校办派几个干部，派几辆汽车，每辆车带两个学生，进城看看北大的学生究竟有多少受伤。我跟几个书记说，先回家休息，明天上班再来处理善后的事宜。

访：据说，“六四”风波之前，有北大教师拦截军车？

丁：有些教授去了。有人告诉我，王选自己挂了个牌子，上写北京大学王选^①，走到西郊，劝说解放军不要进城。

访：“六四”风波之后，您的境遇如何？

丁：有很长时间，校党委有事不找我了，因为上头对我产生了很大的怀疑，认为我是学生的后台。其实我的所作所为，都在桌面上，我说的话都是公开的。我觉得自己在政治上还比较天真，没有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本来在“六四”风波期间，我可以到意大利去参加一所全世界最古老的大学的九百年校庆，而且机票已经买好，签证也已办好。但我想学校出了这么大的事，我要把事情处理好，就没有出国。

“六四”风波之后，教育部决定提前放暑假，让学生回家。大概在8月份，教育部在北戴河开了个会，每个学校去两个人：校长和党委书记。会议要求大家对“六四”风波表态，每个人都要发言。我不愿意正面肯定中央的做法是对的，就检讨自己对事情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对学生罢课有些经验主义；根据自己的经验，推断学生罢课不会持续太久，没有估计到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后果。我检讨自己政治上比较简单，做了一通自我批评。这个会开了不到一周。我回到学校时，学生都回家了，校园里人很少。

^① 据王选的一位大学同学说，他事后当面问过王选，王选回答说自己并没有挂什么牌子，只是手里拿了一个能表明身份的证书。

吴树青出任北大校长

原校长丁石孙任满回系任教

新华社北京 8 月 23 日电（记者李京华、张宝瑞）56 岁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树青今起任北京大学校长，原校长丁石孙因任期已满回数学系任教。

吴树青在此任前是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今天在北大的干部会上把任命书交给了吴树青。吴树青表示，我来到北大深感责任重大，在学校党委和全校教职工的支持下，我一定要做好工作。丁石孙在会上发言说，外校同志来到北大工作是件好事，能够带来宝贵的经验和外校的优良传统。他说他离任后将继续留在北大数学系任教，一定把教学工作做好。

62 岁的丁石孙从 1984 年起任北大校长。今年 3 月，他曾给国家教委写信，提出任期已满、不再连任的要求。

与此同时，原北京市体委主任林炎志调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42 岁的林炎志曾担任过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等职。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王学珍主持了今天的学校干部会。

成都采取措

新华社成都 8 月 23 日电
者李南岭、成建）成都市准
稳步推进住房制度改革。下
作将在完善现有政策的基础
照以下几种办法进行：继续

1989 年 8 月 24 日《人民日报》
刊发的任免北大校领导的消息

好，请让我辞职。后来，教委副主任朱开轩亲自到我家劝我继续干。

访：“六四”风波之后，何东昌到北大宣布批准您辞职的决定。何东昌对您是怎么评价的？您也讲话了吗？

丁：何东昌到北大宣布决定时，说了我一些好话，肯定我在北大做了一些好事，但讲得很抽象。在会上，我讲了一些客套话。我说：当了 5 年校长，由于能力有限，工作没做好；我是历史乐观主义者，相信后来的校长会比我做得好，会把北大办得更好。这样，我就结束了校长的工作。记得第二天报纸还登了消息。

8 月下旬，何东昌找我去教育部。何东昌和滕藤两人跟我谈话。他们没说我有什麼错误，只说你不是要辞职吗，现在可以辞，教育部批准。谈话很简单，我说我很高兴接受这个决定。回来后，我的情绪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我跟桂琳琳说教育部终于同意我辞职了。我让她晚上做顿红烧肉，吃得好一点。

访：“六四”风波之前，您提出过辞职？

丁：1988 年，我给教委主任李铁映写过两封信，说我已经干了 4 年，身体也不

访：辞去校长职务，是您人生一个阶段的结束。辞职之后，您对自己在校长任期内做的工作有何感触？

丁：我确实感到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我真想把北大办成一个思想自由、学术活跃的大学。为此我付出了很多努力。如当时我觉得由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北大文科的教条主义太厉害，就想通过研究方法论等途径突破这点。但在当时整个大环境下，没有做到。我的很多措施也没有实现。如1985年我对职称评定抓得很紧，但在后来几届的职称评定中，我就坚持不住了。当了5年校长，我能够得到安慰的，就是我离开北大这么多年，北大的多数人还对我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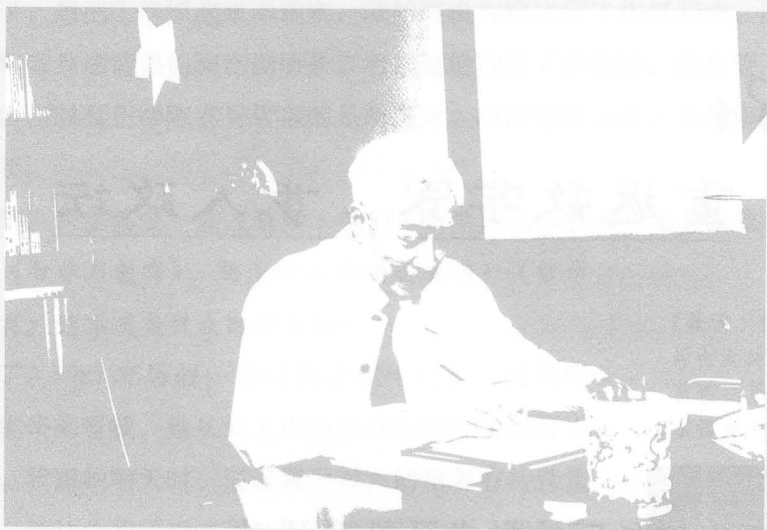
1989年9月，我就没什么事了，有时跟桂琳琳一起骑自行车到处转一转。有一次，我在紫竹院碰到北大一个教政治课的老教员，叫陈哲夫。因为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应该为陈独秀翻案，他在“文革”中受到过激烈的批判。这次他看到我，为我流了眼泪。中文系的严家炎也专门到家里看我，来安慰我。实际上，我对不当校长无所谓。

访：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季羨林说在北大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一位是被称为“北大之父”的蔡元培，另一位就是您。他对您的评价很高。您当校长期间，北大哪一年发展得最好？

丁：季先生是在报上发表的这个评论。他把我抬得过高，让我受宠若惊。我觉得1988年，北大的工作表现得比较突出，各项指标都达到了一个高峰，教师和学生的情绪也非常高，这一年恰好是北大建校90周年。当年新闻电影制片厂要拍一部叫《北大素描》的电影，讲述北大整个的情况，后来拍出来了。里边有我两个镜头，一个是我坐在校长办公室，讲北大的历史；还有一个镜头，是让我从家里走到办公室，并且要在雪地里拍。导演的意思大概是表明北大今后的道路还有很多困难。

访：您不当校长后，北大对您是怎么安排的？

丁：回数学系教书。我找了数学系主任李忠，告诉他从下学期开始可以安排我的教学工作。我的组织关系又转到了几何代数教研室。回到教研室后，要对党员在“六四”中的表现做鉴定。教研室支部给我做的鉴定出乎意料的好，说我“立场坚定”。“六四”这个时期就这样过去了。



当时海外华裔数学家陈省身、丘成桐都认为中国可以办。中国数学会里有两种意见：一种赞成，一种反对，但反对的人较少。

我是盟员，又当过北大校长，做接班人比较合适，但我有些犹豫。

会上有一件事出乎我的意料。在介绍主席台上的人员时，念到我的名字，会场上响起了很热烈的掌声。掌声的热烈程度和提到江泽民时的差不多。



第8章

重返数学界，步入政坛

不当校长后的学术及社会活动

访：不当校长后，您回到数学系教书。系里和几何代数教研室给您怎么安排的？

丁：让我给研究生上课。我开设了交换代数这门课。1993年，我又开设了一门新课，叫类域论。类域论是数论里非常重要的内容。我开这门课的一个目的是想借讲课把这个理论搞清楚，因为我过去没有系统念过它。这门课讲了一年，每周一次，一次3小时。类域论是我在北大教的最后一门课。

访：除了在北大教课，您还参加过哪些跟数学有关的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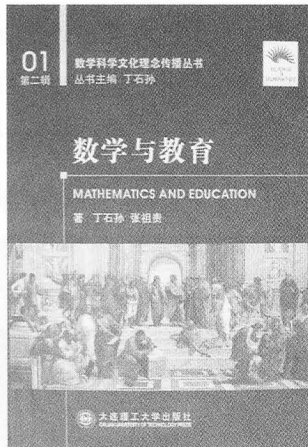
丁：1990年，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搞数论年，我去讲了椭圆曲线这门课。南开大学对我照顾得很好，让我住在为陈省身盖的一栋楼里。当时

陈省身又提出让我当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副所长，我不好拒绝，就答应了，但只答应帮他管管图书。由于我在这个研究所没有任何熟人，谁都指挥不了，想把工作抓起来不现实，就始终没有把这项工作抓起来。除我之外，陈省身还请姜伯驹当副所长。后来姜伯驹私下跟我讲，他也管不了什么事。当时真正帮陈省身管事的是胡国定。胡国定留过苏，当过南开大学副校长。

访：您主编过一套《数学·我们·数学》丛书，其中有您跟张祖贵合著的《数学与教育》。您为什么要编这套书？《数学与教育》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写的？

丁：1987年暑假，当时我还在当校长，我的学生孟实华来看我。她从北大毕业后分配到湖南教育出版社。我跟她聊天时，说起数学对人的培养有特殊重要性。她认为我的想法很好，希望我写本书。我随口答应了，说写本《数学与教育》。后来她从这本书想到出一套《数学·我们·数学》丛书，《数学与教育》作为其中的第一本。^①由于我很忙，没时间写，就找了孙小礼的学生张祖贵合作。我讲想法，让他去写。他写完一章就跟我讨论一次。因为他不太理解我的一些想法，我对他写的文稿不太满意。后来这本书再版时，我决定重写。这时我比较有空儿，对这本书

《数学·我们·数学》丛书后由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图为丁石孙和张祖贵所著《数学与教育》



^① 这套丛书最终共出版9本：《数学与教育》（丁石孙，张祖贵）、《数学与文化》（齐民友）、《数学与思维》（徐利治，王前）、《数学与经济》（史树中）、《数学与创造》（张楚廷）、《数学与哲学》（张景中）、《数学与社会》（胡作玄）、《数学与军事》（汪浩）、《数学与语言》（冯志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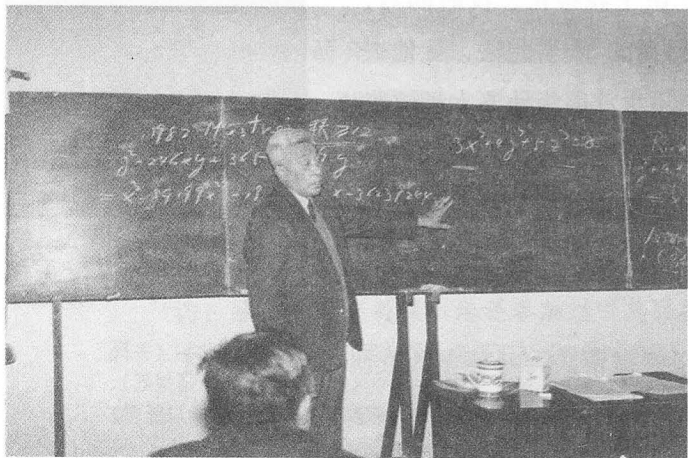


做了较大的修改，重写时张祖贵已经去了美国。

孟实华通过我，认识了数学界的很多人，找人出了些题目，组了10本书稿。1990年，我在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时，利用空闲时间，把这些稿子审读了一遍。因看稿子时间过长，我的眼睛出了问题，看东西时似有游丝在飘。开始我没太在意，过了两三天才到南开大学校医院找眼科医生看。医生说问题很严重，是眼底出血，让我马上到眼科医院就诊。眼科医院得出了同样的诊断结论，让我马上住院。当天下午，我就回到北京，住进北医三院。医院给我做了几次激光治疗。大夫说，我的运气不好，结疤正好在黄斑区。如果再靠旁边一点，对视力影响就不大。从那时起，我左眼的中心视力就基本没有了。我的右眼还可以，看东西就靠一只眼睛了。

这套丛书完成后，孟实华还想再编一套《走向数学》丛书来普及数学知识。我推荐冯克勤和李忠任这套丛书的主编。1990年秋，孟实华以开编委会的名义请了我，还有程民德、王元、齐民友等人在长沙开了两天会，还去参观了岳麓书院和国防科技大学。

1990年2月8日丁石孙在吉林大学讲学



访：1988年至1991年，您担任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其间，您参加过不少中国数学会的活动，也代表中国数学会参加过国际会议。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事？

丁：我任副理事长期间，中国数学会

讨论过是否申办国际数学家大会的问题。^①当时海外华裔数学家陈省身、丘成桐都认为中国可以办。中国数学会里有两种意见：一种赞成，一种反对，但反对的人较少。王元的态度不是很坚决。杨乐支持办。我是反对的，认为中国还不具备办会的条件。大家对我的话比较重视，没有人明确反对我。不过，我也不是坚决反对办。有人说我们办成国际数学家大会的话，中央会提高对数学的重视程度；张恭庆、姜伯驹等一批较年轻的数学家的工作也是可以的。后来我转变了态度，大家统一了看法，决定申办。^②为了申办成功，我们把一些国际数学界有影响的人物请到中国参观，让他们了解中国有条件办好这个会。记得以前有一届大会的秘书长是格里菲斯，我还专门写信邀请他来中国看看。2002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国际数学家大会。

还有一件事，我印象比较深。1990年要在日本召开国际数学家大会，理事长王元说他的英文不好，让我代表中国数学会去参加这次大会，他去香港参加亚洲数学家大会。跟我一起去日本的还有石钟慈和谷超豪的夫人胡和生。我们3个人和台湾的2个人组成中国代表团先到神户参加世界数学家联盟大会，然后到京都参加了世界数学家大会。这次数学家大会有3000多人参加，规模相当大。日本政府非常重视，皇太子出席了开幕式。

1991年，中国数学会召开代表大会。理事会每3年一届，在这次大会上要换届。我和王元都退下来了。过去，中国数学会的理事长长期由华罗庚担任，改革开放后他才退下来，由吴文俊接任。吴文俊立下个很好的规矩：理事长只当一届，而且定了年龄界限，一般不超过60岁。

^① 丁石孙任副理事长的这届中国数学会理事会共有4位副理事长，即丁石孙、石钟慈、伍卓群、严士健，理事长为王元。

^② 1995年，中国数学会正式向国际数学家联盟提出主办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申请。

访：您还参加过其他国际性的数学活动吗？

丁：1991年初，我收到泰国珠玛隆功大学的邀请，去参加一个为期两周的“物理与几何”讨论班。这件事是1990年在日本参加国际数学家大会时，香港数学会会长跟我说定的。在珠玛隆功大学，我住在学生宿舍。香港数学会会长和我同天到达。当晚他请我和另外几位中国人去吃了泰国比较有名的鱼翅和燕窝。这个讨论班很松散，请了一些西方学者，还有新加坡、韩国学者，安排大家做一些报告。这些报告的水平并不高。我也做了报告，简单介绍了椭圆曲线，实际上听懂的人很少。

讨论班结束时，组织者举行宴会招待参会人。举行宴会的饭店很大，所有服务员都穿着旱冰鞋，行走非常快。这种情景我是第一次见到。离开珠玛隆功大学前，我和泰国教育交流协会的人进行了接触，算是我为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做了点事情。

访：您对泰国有何印象？

丁：泰国给我的印象并不好，交通拥挤，空气污染，有点像解放前的上海。春节前我从泰国回到了北京。春节后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有个活动：一是庆祝陈省身80岁生日，一是研讨21世纪的中国数学。我去参加了。最后举行了一个大型宴会。在宴会上要介绍来宾，当介绍到我的时候，出乎意料地有经久不息的掌声。我想，这代表了当时人们对我的看法。

1991年下半年，我收到陈省身的邀请，请我去伯克利数学所访问两个月。陈省身当时已经不是所长，第二任所长是个代数学家。差不多同时，又收到格里菲斯的邀请，请我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访问。^① 格里菲斯比较客气，没有规定时间，说我访问多长时间都可以。这时国内形势开

^① 格里菲斯时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所长。

始变得宽松，因为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谈话。

访：伯克利数学所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怎么样？

丁：条件不错。研究所给我一间办公室，还可以到计算机房上机。在这里，我学会了使用电子邮件。我每天到所里看看书或者复印点资料，周末出去玩玩，生活相当安定。当时北大数学系的应隆安和原来系中的一些人在美国，如马希文、赵春来的同班同学王庆仁、唐守文等。所以，这次我在美国并不寂寞，有时还和陈省身聊聊天。当时朱德熙也在美国，我去了之后才知道他得了癌症。

访：您是什么时候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

丁：1992年4月初去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有很多房子可以租给来访的学者住。格里菲斯的秘书给我租的是最简单的一种，房间比较大，有冰箱，有卫生间可以洗澡，很方便。一切事情秘书事先都帮我办好了，包括证件、图书、办公室、计算机等。这个研究所给我的印象是环境非常好，人很少，极其安静；偶尔可以碰到一两个来做研究的世界著名数学家。有人说这个研究所的管理办法是无为而治，什么事都不干预你，就给你提供条件。研究所有个食堂，你去要几个菜，给你记账。每顿饭有五六个菜，点两个菜也就花五六美金。格里菲斯在那里很舒服，专门设有所长住房。他请我到他家吃过几顿饭。有一次在他家里吃饭，碰到泰特。他是我20世纪80年代访问哈佛大学时认识的一个有名的代数学家。这时他已不在哈佛大学。美国的很多教授年龄大了以后，就到一个小一点的学校，过点轻松的日子。

我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待了差不多一个月。在此期间，MIT数学系主任本尼（Benny），请我到波士顿去玩几天。他搞应用数学，是我1983年认识的朋友。他请我去看了他的新房子：房子是他自己设计，自己盖

的。美国一些有名教授，有时很愿意做些体力劳动，这是他们的一个特点。林家翘是本尼的老师。我在波士顿期间，林家翘夫妇来看我，请我吃了顿饭。林家翘搞力学出身，从清华出去的，是我老师一辈的人。我在清华时经常听到段学复提到他的名字。他在应用数学方面的工作很出色，是MIT应用数学的创始人；在那里他的地位相当高，被称作学院教授（Institute professor）。这次赶到波士顿的机会，我还回哈佛大学数学系看了看，碰到了原来的图书馆管理员。

我在高等研究所的身份是所长的客人。一个月时间，研究所给了我3000美元，住房、吃饭都够了。临走的前一天，格里菲斯夫妇到食堂跟我一起吃了午饭，送了我一件普林斯顿的T-shirt作为纪念。

4月底，为了施旭东成立北加州北大校友会的事，我从普林斯顿到了旧金山。施旭东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是我国政府派到美国的工作人员。她想利用我在美国访问的机会，成立这个校友会。校友会成立那天来了100多人，其中有陈省身。朱德熙也坐着轮椅来了，我发现他的身体已经非常坏。看到他，我心里很难受，估计他将不久于人世。北加州北大校友会的第一任会长就是施旭东。她找了几个人当副会长，其中有马希文。我在成立会上做了简单的发言，主要意思是北大成立校友会非常困难，因为北大校风比较自由散漫，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意见办事。清华的校友会搞得比较多，管理也比较好，这跟校风有关。第二天早上我上飞机前，给朱德熙打了电话。他的情绪非常坏，我安慰他争取回国治疗。他大概也知道回不来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跟朱德熙通话。我回到北京不久，朱德熙就故去了。

访：您是什么时候回到北京的？

丁：5月初。为什么卡在这个时间回来呢？因为我要参加周培源90岁

生日祝寿宴会。宴会在北大勺园举行。当时周培源的身体还不错，而他夫人的身体不好。想不到他会先他夫人去世。

我还参加了数学系主办的祝贺江泽涵 90 岁生日的活动。江泽涵跟周培源都是 1902 年出生。数学系开了个座谈会，参加的人有陈省身，还有谷超豪夫妇。我在座谈会上的讲话主要谈了 4 点：

首先，1952 年北大、清华、燕京三校数学系合并成立北大数力系。清华数学系主任段学复的资历比江先生浅，可以说是他的学生辈。对组织上指定段先生当数力系主任，江先生没有任何意见。江先生的风格对三校数学系教师的团结起了非常好的作用。其次，江先生对数学的所有分支没有亲疏之分，认为所有分支都很重要。他自己搞拓扑，但并不说这个分支更重要。数力系各个分支都得到了发展，比较全面，这跟江先生有关系。第三，江先生给大家树立了一个比较高的学术标准，他很少夸奖某个人工作做得多么好。这也给我们这些年轻的人树立了榜样，不要稍微取得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第四，江先生对培养年轻人非常重视。我举了个例子：姜伯驹是江先生的得意门生。改革开放初期，数学系要派一些人到美国学习。当时对是否派姜伯驹出去，系里很犹豫，因为江先生的年纪已经大了，需要有助手在身边。江先生知道了系里的这个顾虑，就亲自登上我在 4 楼的家里，跟我说千万不要考虑他的因素，姜伯驹还是要派出去。这说明江先生的风格非常高。他为了培养年轻人，完全不考虑自己。

1994 年春，江先生夫妇相继去世，算是高龄了。中国有一个说法：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江先生夫妇去世的时间相差不到 10 天，可以认为达到了这个理想。“文革”后期，江先生为了完成他关于不动点的研究，差不多每天早上都到数学系办公室，先打一瓶开水，然后开始写他的不动点的书。当时江先生年龄很大了，他做学问的精神值

得敬佩。我还记得，当时上面给我们一个任务，翻译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 1818—1883）的数学手稿。在翻译过程中，我们还去请教过江先生，因为他德文比较好。江先生在北大很受尊重。他们夫妇二人的遗体告别仪式我都参加了。

另外，1992年我跟袁向东、张祖贵合作撰写了《北京大学数学系八十年》。写数学系史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北大数学系从1913年开始招生，1993年恰是80年系庆，需要回顾它的历史；一是从19世纪开始西方数学传到中国，在中国不断普及发展，这个过程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梳理。如果把北大数学系80年的历史搞清楚，对了解西方数学在中国的发展会有帮助。我们从1991年开始花了一年多时间把它写了出来。

步入政坛前的“预备”与踌躇

访：您说过，1986年底参加民盟召开的代表会议后，就跟民盟有了比较多的联系。那参加民盟的活动肯定也多起来了把！

丁：对。1988年我当上了民盟中央的兼职的副主席。1989年我不当校长后，高天认为可以多派我点活，让我多参加民盟的活动。大概这时候他就想把我调到民盟中央。记得1989年10月左右，民盟中南地区的片会在桂林召开，高天让我代表民盟中央去参加，还要我在会上讲话。当时我对民盟的情况很不了解，也没人告诉我讲什么，我都不知道该讲些什么。民盟中央机关跟我同去的是黄景钧。在那次会上，云南有个老盟员，年近90，散步时不当心摔成了骨折。我代表民盟中央到医院去看了他。我回到北京不久，民盟在西安开西北地区片会，也让我去了。

1990年初，民盟东北地区副主席关梦觉逝世，高天让我代表民盟中央到长春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当时我对吉林民盟组织的情况也是一无所知，去之前，也没人跟我讲到那里可能碰到的问题。民盟中央机关跟我去的是办公厅主任毕树林。关梦觉既是民盟中央副主席，还是民盟东北地区副主席、民盟吉林省委主委（主任委员）。我到长春后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后吉林民盟的工作由谁主持。关梦觉生前对这些事未做很好的安排。我去了以后，就发现副主委之间意见很不一致，搞得我很为难。为了避免引起矛盾，我就让年龄比较大的一个副主委暂时主持工作。当然，我也征求了当地统战部的意见，他们同意这样做。

1991年五六月份，民盟在上海召开盟务工作经验交流会，同时要为苏老（苏步青）祝90岁大寿，高天又让我代表民盟中央参加这两个活动。在苏老的祝寿会上，我代表民盟中央讲了话。陈至立是上海市委文教书记，也参加了这个会，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

访：上面提到您1992年去美国访问了三四个月。这一年参加民盟的活动了吗？

丁：这一年民盟省级组织换届。我从美国回来后代表民盟中央去了福建、河北、河南、四川等地。记得这一年民盟在京丰宾馆召开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副主席，我参加了。会上代表们对选举办法有分歧，分歧的实质是一些人不同意当时的秘书长吴修平当副主席。高天让我主持进行选举的会议。中央委员选出后，在选副主席时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当选一定要达到应到人数的半数以上；另一种认为达到实到人数的半数以上即可。持第一种意见的人实际是想要吴修平落选。当时我想这么争论下去，会越来越激烈，不好收拾。我说大家表决，按表决结果确定究竟该怎么办。表决结果，多数人同意按实到人数为准。这样吴修平就当选了。

访：1986年您当选政协委员后，除参加七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外，是否还参加过政协的其他活动？

丁：那一届政协每年都组织委员出去调研一次。1990年，调研的主题是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地点选在上海和南京。

1991年，调研的主题是民间的文化活动。我们这个调研组的组长是黄辛白，调研地点是福建。我们先到福州，再到南平、武夷山。武夷山的风景相当好，我们坐竹筏漂流，还参观了朱熹当年讲学的地方。从武夷山回到福州，然后沿海边到达莆田，又到仙游。记得仙游的县长是北大的毕业生。之后是崇安县，这是沿海的一个县城，在那里看到了惠安女，装束比较特别。然后到泉州，参观了开元寺，弘一法师就是在那里圆寂的。从泉州我们到厦门，到集美去参观了一趟。回北京后调研组开会，大家都认为地方政府对我们的调研完全是应付，很多所谓的民间文化活动，是专门演给我们看的。一些图书馆临时找了一些小孩在那里看书。从这里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下去调研要看到真实情况还相当难。

1993年全国政协换届，我被选为常委。这件事反映了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变得宽松了。

访：在某种意义上，参加调研是您步入政坛前的“准备活动”。1993年，您的工作关系由北大转到民盟中央，开始在民盟工作，正式步入了政坛。

丁：实际在1992年，有一次民盟开中常会的时候，费老（费孝通）就找我，要把我调到民盟中央。

访：费老为什么要把您调到民盟中央？

丁：道理很简单：他要找接班人。我是盟员，又当过北大校长，做接班人比较合适，但我有些犹豫。原因除了对民主党派有些看法外，我当时

还在北大数学系教课。

访：您当过北大校长，口碑不错，当民盟中央的头确实很合适。您从犹豫不决到决定调入民盟中央是什么因素促成的？

丁：费老跟我说要把我调到民盟中央后，我征询过民盟中央副主席冯之浚的意见。他劝我说，统战部既然要调我，不答应不好。为了把我调到民盟中央，刘延东还请我吃过一顿饭。实际上，这些对我下决心调入民盟中央基本没什么影响。从校长的位子上下来后，由于中央对我有特殊看法，我其实背着很大的包袱。而民盟调我去，说明中央还是信任我的，这对我很重要。这是我下决心调入民盟中央的一个主要原因。另外，调入民盟中央后，我的行政级别由当校长时的局级提到副部级。而且，我的住房条件也可以改善很多。当校长时，我家里住房很紧。因此，我大儿子丁诵青结婚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清华的单身宿舍。

访：您调入民盟中央后的住房有多大？

丁：大小差不多是我在北大的住房的3倍。政协给我分配的房子在翠微西里12号楼。当时给我挑的有两套房子，一个在5楼，一个在10楼。我选了5楼。我印象中12号楼住的主要是民主党派人士，比如李文宜住在4楼，叶老（叶笃义）、冯之浚都住在3楼。新房分到手后，我花了些时间买家具。北大的家具基本都没搬过来，因为没有好的家具。搬家花的时间，主要是搬书，要先把书捆起来，由搬家公司运到新房里，再打开捆，重新放到书架上。那时我的身体还可以，所有的书都是我自己整理的。搬家后就觉得房子大多了，开间也比较大。

访：调入民盟中央前，您提了一个要求：把您原来的研究生赵春来调入北大。能不能谈谈原因？

丁：调赵春来到北大，我早有打算。我之所以提出这个要求，是因为

当时北大数学系数论方面的研究力量很弱；我走了之后，就没有人搞了。刘延东好像通过汪家镠办成了赵春来调动的事。

从调入民盟中央到出任人大副委员长

访：调入民盟中央后，您先担任什么职务？

丁：由于高天身体越来越不好，统战部让我代理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虽然让我代理，但因为高天还在，我经常到北京医院征求高天的意见。当时我想：我对民盟工作还不熟悉，应该低调，不要管得太多；别人不来问我的事情，我很少发表意见。记得有一段时间吴修平对我很有意见，说我到民盟这么久，还没进入角色。我认为我处理问题的办法是对的，宁愿被人说没进入角色，过激了不好。

访：看来您刚调入民盟中央时比较谨慎。尽管吴修平说您还没进入角色，但也是做了些事的吧？

丁：当然。如1993年上半年，民盟中央在佛山召开教育研讨会，由费老主持，我参加了。会议内容好像跟民办教育有关，费老在会上有个发言。当时谢颂凯是民盟广东的主委，很多事情都由他安排。有一天晚上，他组织参会的人乘船夜游珠江。会议期间，我们还到顺德去参观，顺德的家电工业发展得比较好。会完了以后，组织者组织我们到深圳住了两天。民盟深圳市委举办了一场报告会，请费老讲了话，我也讲了话。我对民盟深圳市委的印象比较好，因为开会的时候，盟员出席率很高，说明盟市委向心力比较强。当时深圳盟员总数也就300多人，绝大多数都来了。记得民盟深圳市委的主委是胡政光。

1993年暑假前，我去兰州参加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评审会，当时我是基金委数学评审组成员。在兰州我也为民盟做了点事。我抽空看望了民盟甘肃省委的老主委朱宣人。他是老留学生，可能在西南联大待过。我还和盟省委和盟市委的干部开了个座谈会。当时甘肃盟省委驻会的副主席叫戚民，他和朱宣人都被打成右派。戚民跟我谈过他逃出劳改场所的经历。他说里边太苦，就偷了一只生羊腿，带着往外逃，走了很多路，饿了就吃一点，终于逃了出来。我听后觉得他真是死里逃生。

访：1993年全国政协换届，您被选为常委。调入民盟中央后，您更得参加政协的活动了吧。

丁：对，主要是关于民办教育的活动。1993年暑假后，按照政协的计划要调查民办学校。钱老（钱伟长）是文教组组长。我已是常委，相当于第一副组长。我们有个想法，认为中国的教育应该把民间力量调动起来，从长远看民办教育是条出路。这次考察我们选择的地点是重庆、成都和西昌。我印象中参观的民办学校有两类，一类是所谓收费很高的中学，称之为贵族学校；一类实质是高教自考的补习学校。这两类学校都还谈不上是民办学校的主体。对于收费的中学，我的印象不好，因为学校的出资人和主管者实际不懂教育。他们介绍的情况都很表面化。西昌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那里有民盟办的凉山大学。这个学校由重庆大学的退休老师鲁承宗当校长。我们发现办凉山大学的用意是好的，想在民族地区培养一批实用人才，修路修桥，但困难很大。

我们通过这次考察，感到民办大学没有政府的政策和财政支持，要办好是很难的。所谓政策是指老师的职称评定。民办学校无法评教师职称，而完全靠退休老师是支撑不起来的。财政主要是指经费，包括解决学校用地、建房及运转的费用。当时教育部对民办学校的有些要求提得过高，如

人均图书要有多少册，体育馆要多大等，这些民办学校都办不到。考察结束后我们把这些想法写到了建议书中。

1994年，全国政协教育文化委员会要调研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落实情况，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我们把调查地点选在贵州的贫困地区：一个叫安顺县，另一个叫紫云县。这次下去我受到很大的震动，因为农村贫困的情况，远远超出我的估计。我们下去以前，还拟了一个调查提纲，包括教室、图书设备、仪器的情况等等。等到我们接触了实际，原来提纲里的这些问题根本就无从谈起。

访：这是因为什么？

丁：因为那里的条件太差了。记得我们去了一所小学，楼梯摇摇晃晃，感到随时有塌的危险。教室里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门窗都不全，课桌椅完全用树干、树枝替代，学生趴在树干上写字。即使这样，每个教室还有一些学生连座位都没有。老师说只能让学生轮流站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事先设计的想了解教室、图书设备、仪器的情况等问题，还怎么提。这些学校也谈不上教员的休息室。我们甚至看到了个别老师上课时，背后背着个小孩。他说他妻子要种地、做饭，他只能背着孩子上课。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好几个村的小学情况。

再有，因为贵州农民住得比较分散，有些地方的学生要走很长的路才能到学校。有些住宿学校，一间八九平方米的房子要住十几个学生。住校学生要自己带粮食。个别走读的学生连干粮也带不起，只能等到晚上再跟家里人一起吃。在这些地方，家长送学生上学的积极性不高，因为上完学帮不了家里干活。老师因为待遇极低，也不能安心教学。

看了贫困地区教育的情况，我们觉得要普遍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标准提得太高了，有的地方达到四年制义务教育就已经很不容易。从贵州回

来，我们写了一个调查报告。我还在政协常委会上发言，讲了我的感受。这个发言有很大的影响。有个香港的政协常委叫张永珍，她听了我的发言，当场就说她每年捐20万，其中10万解决学校的问题，10万给贫困学生。她要求我把这个钱转给贵州省教育厅。当时贵州省教育厅厅长是北大生物系的一位毕业生，我知道他比较可靠，就把这事委托给他办。记得张永珍连续捐了两三年。

另外，1993年11月，我随李瑞环出访南亚三国：尼泊尔、印度和巴基斯坦。代表团成员中有唐家璇，有原驻美大使韩叙，还有原国家计委的房维中。这些国家卫生条件都很差，每个人都要带黄连素，防止拉肚子。当时印度和我们的关系不太好。访问印度时，李瑞环非常用心，每次和外宾接触前都仔细考虑。有一次他跟我们讲，他终于想起可以用邓小平讲的一些话作为对印谈话的基调。

访：您什么时候当了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这时，您开始进入角色了吗？

丁：1994年高天去世后当的。当了常务副主席，我开始进入角色。在工作方法上，我做了一些改变。过去差不多每天上午，高天都和几个专职副主席聚在一起讨论工作，一讨论就是一个上午。其实没那么多事，也没那么多话好说。我当了常务副主席后，就变成有事才开会，没事就不开，各人做各人的工作，我也不每天上班。

访：常务副主席参加民盟的活动必然很多了吧？

丁：比较多。1994年我到安徽六安地区慰问小学，民盟中央机关拿出一点钱，买了录音机和其他教学用品送给一所小学。

1995年四五月份，我跟费老考察了上海浦东。当时浦东刚开始建设。开发浦东是费老比较早提出的，他给中央写了信，建议以上海为龙头，发



1994年10月1日丁石孙与友人合影(左起:袁行霈、王选、罗豪才、唐有祺、丁石孙、吴树青、李克强)

展长三角。后来中央做出开发浦东的决定,但浦东开发后,就不提费老了。在浦东,我跟费老听了汇报。当地的同志讲浦东过去是农村,开发后成了城市,老百姓不适应。费老说,这是个社会学的问题。费老认为在开发浦东的过程中,需要社会学的研究。我觉得费老提出的问题是正确的,开发带来的变化太快了,在大转型的阶段,居民的心态需要转变,这不只是一个文化水平的问题。

1995年,我还跟香港的一些老盟员在深圳座谈过一次。这些老盟员是胡政光邀请的,他想让他们看看国内的发展情况,专门把我叫到了深圳。当时民盟不能作为一个组织在香港活动,香港老盟员的活动主要靠王丹凤。她开了一个素菜馆,叫功德林,过一段时间就请老盟员聚一下。这

些老盟员对民盟的感情很深，在座谈中希望为民盟多做点事。但有些话我不能讲得很直白，也不好明说有些事是不能做的。

值得一提的是，我当常务副主席后，参加过几次统战部组织的民主党派的调研活动。如1994年6月到山东的调研，先后去了青岛、烟台、威海、潍坊和济南。山东的公路修得比较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济南之后，我们又去了曲阜、泰安。这是第一次统战部组织的大规模的考察。

1996年春夏之交，统战部又组织各民主党派考察京九铁路沿线的发展，考察规模也比较大。我们乘坐专列沿京九线南下，那时北京西站刚刚启用。火车路经商丘、阜阳、麻城、井冈山，最后到达深圳。在深圳费老接见了盟员。这次考察，统战部安排的无党派人士是张恭庆夫妇。在火车上我跟张恭庆聊天，试探他是否愿意加入民主党派。他表示不愿意。回京时走的是京广线。这次考察沿途风景相当好。

访：在常务副主席任上，您有没有参加过民盟之外的重要活动？

丁：1994年10月，潘光旦的弟弟潘光炯邀请我到香港参加了潘光旦讲座。潘光炯在香港做生意，有点钱。为了纪念潘光旦，他搞了这个讲座，每年请一位学者到香港做个报告。据我所知，他请过费老和台湾的社会学家李亦园。李亦园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有点名气。1994年上半年潘光炯写信，邀请我去。我不懂社会学，想谈谈教育，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写完了讲稿。我想教育比较敏感，不要采取过分严肃的态度，就把讲稿的题目定为“谈谈教育”，副标题是“从社会发展的观点”。

我的报告有两个主要观点：一、因为教育培养的是为未来服务的人，我们不能只靠现成的知识培养学生，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解决新问题的能力，这样才能推动社会发展。我还提出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把一些现成的

东西让学生死记硬背。我认为学生成长不能有太多的框框，要因材施教。二、社会对人的影响很大，社会现实告诉学生该怎样做才对他有利，绝不应该是老师教学生怎么做他就怎么做。除此之外，我在报告中还讲了教育的规律。我讲得都比较有原则，没有触及敏感的东西。

去香港前，我征求了潘光旦的三女儿潘乃谷对我写好的讲稿的意见。潘乃谷是学畜牧兽医的，早年在内蒙古工作；改革开放后，为了整理潘光旦的文章，北大把她调来学校。北大恢复社会学系时，请她当过系主任。在香港的时候，清华的张维给我打电话，想请我当欧美同学会的副会长。我对欧美同学会完全不了解，猜想是个松散的组织，政治性也不强，就答应了。当时的会长是卢嘉锡。张维说换届后请吴阶平当会长，我和其他几个人当副会长；等接触同学会后，才发现它还相当复杂，而且一干就干了七八年。

在香港，我还接触到一些记者。当时香港媒体炒得最热闹的一件事，是究竟应不应该承认内地学历。香港记者让我谈谈对这件事的看法。我听了很生气，觉得不承认内地学历实在很荒唐；香港地方很小，商业气息浓，没什么好的大学。我当时说了一句：北大至少比香港中文大学强吧。媒体报道出来后，中文大学一些人就抓住我说的这句话，要和我辩论。因为我就要回北京了，没有理他们。看来我对付记者缺乏经验。从这里我得到一个教训：跟记者谈话不能生气，一生气说话就不谨慎。回答记者问题也不能太直接，可以拐个弯。我当时完全可以说两边情况差别很大，不能一概而论。

访：我们知道，您是1996年当选民盟中央主席的。能介绍一下当选的背景吗？

丁：1996年上半年，费老跟我提出他要提前退下来。当时民主党派领导还没有年龄的限制。民盟中央对费老退下来没有思想准备，盟内很多

老同志想不通。我就跟费老商量，怎么设计一系列的会，把这个风吹出去，取得盟员的支持。首先可从一些专职的同志入手，然后到兼职的副主席，再到常委。从下半年开始，我们按照计划逐步扩大盟员对情况的了解。费老比较聪明，想得也比较周到，提出他和钱老、谈老（谈家桢）一起退，但同时都当名誉主席。这样可以减少阻力。

1993年调人民盟中央时，我66岁，在民盟内还算比较年轻，资格也不老，加上又是半路杀进来的，当时不少人对我当民盟中央的头并不服气。但工作两三年后，大家对我的印象不错。1996年底民盟开中全会时，我顺利接任费老当了民盟中央的主席，并且几乎是全票当选。当然我当主席也会引起个别人的不满意，后来几年当中我碰到不少困难。记得在那年，在费老带动下，民建的孙起孟也退了，由成思危接任主席。统战部认为，在民主党派领导人新老交替的问题上，费老带了好头。

访：当选民盟中央主席后，您肯定希望在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多做些事。您最想做什么事？

丁：我想推动民办教育。因为经过几次调研，我发现中国民办教育的问题很大。但我的权力有限，有几个在民盟资格比我老的副主席还跟我捣乱，我不可能推动得很好。我也想改善民盟中央跟北京市民盟的关系：由于历史原因，民盟中央跟北京市民盟的关系一直不好。有人告诉我，从吴晗当北京市民盟主席起就是这样。吴晗很傲气，民盟中央根本指挥不动他。1997年北京市民盟换届，陶公（陶大镛）退下来，换王维城当主委。我趁这个机会，在换届大会上宣读了民盟中央宣传部写的贺词。此后，我就多参加他们的活动。比如他们办的中秋晚会，虽然不是很重要，但我还是要参加。王维城当主委后，民盟中央跟北京市民盟的关系改善了。

访：在民盟中央之下，全国很多城市都设有民盟组织。您当了主席

后，地方民盟请您参加的活动多吗？

丁：很多。地方民盟对民盟中央主席是否参加他们的活动看得很重，但要是哪个地方民盟邀请我都去，实在受不了。因此，我定了一些原则。根据这些原则，有些地方就不去了。比如，1997年民盟各省级组织都要换届。年初我就跟民盟中央副主席吴修平、冯之浚商定了一个原则：哪个省有当过民盟中央副主席的地方民盟主席退下来，我就去哪个省参加换届大会；省民盟一般的主委退下来，我就不去参加。但也有例外。如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要新成立民盟市委会。原重庆民盟的主委冯克熙的年龄已超过规定的在职年龄，但中共重庆市委提出要他破例担任新重庆民盟市委会主委。重庆强烈要求我去一趟。因为冯老的关系，我就破例去了一趟。那时我走路还可以，陪我去的是民盟中央宣传部的干部李勇。

访：新重庆民盟市委会成立大会隆重吗？您去了必定要在会上讲话，您还记得讲话的内容吗？对新重庆民盟市委会的印象如何？

丁：很隆重。重庆市委书记和市长都到了。由于冯老在西南威望比较高，中共重庆市委对民盟的事确实比较重视。在成立大会和闭幕会上，我都代表民盟中央讲了话。记得在闭幕会上，我主要说：民盟重庆市委会的风气比较好；在冯老领导下，机关形成了很好的民主作风，干部的积极性也比较高；每个同志对本职工作都非常认真负责。我的讲话不是空穴来风：我明显感到那里的干部工作积极，态度端正。我认为各地方的盟组织都应该有这样的风气，所以想号召全盟向重庆民盟市委会学习，就让李勇把我的讲话整理后发表在《中央盟讯》上。

访：当民盟中央主席后，您的政治和社会地位都提高了。您参加民盟之外的活动多吗？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

丁：比较多。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是1997年美国的三个北大校友会

(北加州校友会、波士顿校友会、纽约校友会)请我去介绍北大这些年的发展情况。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迎接1998年的北大百年校庆。

访：1998年3月，您当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后，有没有让您难忘的事情？

丁：有几件。一次是参加1998年5月北大百年校庆活动。中央这时强调科教兴国，对这件事非常重视。百年校庆的庆祝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北大只有一部分人参加，包括学生代表、老师代表和校友代表。江泽民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会上有一件事出乎我的意料。在介绍主席台上的人员时，念到我的名字，会场上响起了很热烈的掌声。掌声的热烈程度和提到江泽民时的差不多。这是我事先完全想不到的，因为我只是下台的校长。当然这样的掌声也使我得到一点安慰，表明我在北大工作的几年，给北大的师生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1999年12月9日丁石孙(左3)在
听季茂林(左2)发言(左1罗豪才)



记得江泽民在讲话中提出要在 中国办几所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不久，在江泽民讲话精神的影响下，全国形成了一种风气，有一部分学校提出了要办世界一流大学。我觉得并不是很多人都清楚一流大学的目标是什么，办一流大学需要哪些条件。特别是多数人想到的都是物质条件，而对于大学的管理和大学的学风，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水准想得比较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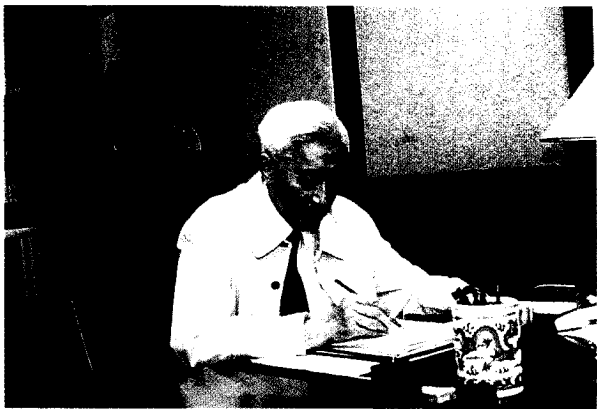
还有一次是参加 1999 年 12 月 20 日澳门回归的仪式。前一天，我坐江泽民的专机飞到澳门。仪式在午夜举行：先是回归仪式，然后是特区政府成立仪式，一直到凌晨 3 点才回到宾馆休息。我一夜未睡着，可能是因为喝了咖啡。第二天早饭后回到北京，坐的是朱镕基的专机。下午 3 点，我又到大会堂开人大常委会，会上成立了一个有关澳门的机构。会后在大会堂吃了晚饭，然后到首都体育馆参加庆祝澳门回归的文艺晚会，差不多 10 点才回到家里。去澳门前，我回北大参加了庆祝五四运动 80 周年的活动；在讲话时，我很婉转地说：五四运动的目标，即实现科学和民主，到现在也没有达到。

访：您是什么时候辞去

民盟主席职务的？辞职之后，您参加的活动还多吗？

丁：是在 2005 年 12 月民盟召开的九届四次全会上。这次全会选举蒋树声担任新的主席。我在会上念了辞职信。此后，我参加的活动就少了很多，特别是免去了参加统战部组织的征求意见的

2002 年丁石孙在民盟中央办公室



会，这样少了很多烦恼。当时我的眼睛已经很不好，无法念稿子；之前每次参加这种座谈会之前，我要记住所要提的几条意见，要能够背出来。这样的事情差不多干了一年多。贾庆林曾对我加以肯定，说我没有稿子也能讲得头头是道。这大概是因为我这些年一直说这类的话养成了习惯。

访：您当北大校长时讲话基本不念稿子。那时也要事先把要讲的主要内容背下来吗？

丁：我在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参加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跟我在北大当校长时的讲话不同。以前在北大，我讲话前很少提前准备稿子。这是因为很多事情装在我脑子里，讲的话都是我想说的。到民主党派讲话就不一样，我总是要说一些套话，我只有死记硬背才能把这些话记住。所以我辞去了民盟的工作，就免去了背这些套话的烦恼。

访：在官场讲套话，是常事。

2004年丁石孙全家在烟台合影(前排右起：丁石孙、丁小相、桂琳琳；后排右起：丁诵青、刘进、熊焱、丁千)



丁：由于我经常讲套话，我跟我的秘书说：“我到民盟后学坏了。”

访：您辞去民盟中央主席和不当人大副委员长后，是不是就退休了？

丁：我没有退休的问题。

访：谢谢您这么耐心地追忆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亲身经历，使我们受益匪浅。

附

关于辞去民盟中央主席职务的请求

民盟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由于年龄和身体原因，我请求辞去民盟中央主席职务，请审议批准。

我 1952 年在清华大学加入民盟，后随院系调整进入北京大学。当时，北大数力系和物理系的盟员合编为一个盟小组，由于盟员大多是我的老师，考虑到我比较年轻，让我担任小组长，由此，我开始接触民盟的工作。50 年代，民盟集中了很多知名教授，盟组织主要围绕学校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我们帮助党团结了一批知识分子。

“文革”结束以后，民盟重新恢复活动。1986 年，我正担任北京大学校长，高天同志找到我，希望我多参加民盟的工作，这一年，我当选民盟第五届中央常委。1988 年，我担任民盟第六届中央副主席，在盟中央的安排下，我做了一些具体工作。1993 年，我的行政关系转到民盟

中央。高天同志去世后，我就更多地协助费老处理盟中央的日常工作。1996年，费老提出从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来，民盟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费老的请求，选举我担任民盟中央主席。之后，我连续担任民盟第八届、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一直到现在。

从我1952年加入民盟到今天，过去了50多年的时间，我对民盟有很深的感情。在组织的关怀下，我为民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由于能力所限，有些工作没有做得很好，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我的身体不太好，在开展工作上有了一定的局限性。在我担任民盟中央的领导职务期间，尽管民盟的工作与广大盟员的希望有差距，但我自问还是尽心尽力的。为了不因个人的情况对今后民盟的工作造成影响，我恳请民盟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批准我的请求，选举合适的同志担任民盟中央主席。

辞去主席职务以后，我作为一名普通盟员将继续履行职责，做好分内的工作。我相信，今后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民盟的各项工作会开展得更好，民盟在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丁石孙

2005年11月30日

附 录

丁石孙年表

丁石孙主要著述目录

丁石孙文章、讲话选编

丁石孙遗嘱

人名索引

丁石孙年表

- 1927 年 9 月 5 日出生于上海西门路润安里 43 号。
- 1935 或 1936 年 在老家镇江入私塾，接受小学水平的教育。
- 1937 年 “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因镇江局势紧张，举家逃难。
- 1938 年 从汉口回上海居住，暑期考取南洋中学初中，一年后退学。
- 1939 年 考入上海光华大学附中，读初二。
- 1940 年 因身体原因，休学一年。
- 1941 年 未读初三，直接考入上海光华大学附中高中。
- 1942 年 上半年进入乐群中学读高中，至 1944 年毕业。
- 1944 年 考入上海大同大学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数学系。
- 1945 年 抗战胜利后半年，对国民党产生失望情绪。年底，参加学生组织的活动。
- 1946 年 参加乌托邦读书会。
- 1947 年 任大同大学学生会宣传委员。由于参加学生罢课，被国民党特务扣押八九天。
一个月后被学校开除。乌托邦读书会改组，成为负责人。
- 1948 年 考取清华大学转学生，入数学系。12 月下旬加入中国民主青年同盟。
- 1949 年 作为数学系学生分队成员，进城到竞存女中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入选清华大学学生会任副主席。

- 1950年 清华数学系毕业，留校任助教。
- 1951年 读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
- 1952年 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在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
- 1953年 暑假前在全校教员俄文测验中获一等奖。
- 1954年 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升任讲师。
- 1955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56年 3月10日与桂琳琳结婚。任数力系教学秘书。参加全国高考命题。8月，参加中国数学会论文宣读大会。
- 1957年 随段学复等和后来划为右派的张景中谈话，未能说服张改变态度。
- 1958年 下放至门头沟斋堂镇达摩村劳动。因被认为同情右派，受到严重警告处分。
- 1959年 领导系里学生学习程序自动化，开算法论课程。
- 1960年 下工厂搞超声波。被作为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
- 1961年 从暑假开始，恢复讲大课，继续讲授代数。
- 1962年 被甄别平反，恢复党籍。任60级学生的年级主任。在段学复组织的讨论班上讲同调代数的基础知识。
- 1963年 参加万哲先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组织的讨论班，研读1955年谢瓦莱发表的《李型单群》。
- 1964年 所撰《高等代数讲义》出版。被派往怀柔县张各庄公社搞“四清”。9月，到朝阳区三间房任工作队队长。
- 1965年 到石景山特殊钢厂联系实际。年底，接受写《高等代数简明教程》的任务。
- 1966年 《高等代数简明教程》完稿。“文革”初遭批斗、抄家，住学生宿舍，干体力劳动。
- 1967年 继续劳动，拆洗和缝制串联学生使用的被子。
- 1968年 被关进黑帮大院。
- 1969年 全家下放江西鲤鱼洲干校。
- 1970年 到德安干校与桂琳琳团聚，任三连司务长，买菜做饭。

- 1971 年 北大干校撤销，9 月返回北京。
- 1972 年 参加系里的应用数学组，到棉纺厂推广正交设计。
- 1973 年 赴新疆招收工农兵学员。年底，“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受到批判。
- 1974 年 给 73 级学生上代数课，从中学代数讲起，并带学生到温泉北京化学分析仪器厂联系实际。下半年，为总参三部办的短训班讲课。
- 1975 年 任系里 75 级学生的教学组长。
- 1976 年 参加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到洛阳了解总参三部学员的学习情况。
- 1977 年 任数学系揭批“四人帮”领导小组副组长。与钱敏接待美国中学数学教师代表团。年底前后北大恢复系主任制，出任数学系副主任。
- 1978 年 恢复数学系教学和科研秩序。与聂灵沼合招代数数论方向的研究生。
- 1979 年 晋升为教授。年底，到南京大学周伯勋在哈尔滨开办的代数讲习班讲课。
- 1980 年 与曹锡华、丁尔生、曾如阜等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参加美国教育协会的年会。
- 1981 年 任数学系主任。给研究生开交换代数课。反对评博士生导师的做法，但被评为博士生导师。
- 1982 年 11 月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1983 年 12 月回国）；出国前即免去系主任职务。
- 1983 年 回国前访问陈省身主持的美国国家数学科学研究所。
- 1984 年 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校长任上（1984—1989），改革食堂管理办法，给学生讲党课，讨论办校原则，改组学术委员会，力图严格职称评定工作，筹建北大方正公司，成立蔡元培研究会，建立经济管理中心等多个研究中心，多次应对校内学潮，出访多个国家。
- 1988 年 任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1991 年任满）。
- 1989 年 卸任北京大学校长，回数学系教书。
- 1990 年 到日本京都参加世界数学家大会。
- 1991 年 参加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庆祝陈省身 80 岁生日和研讨 21 世纪中国数学的活动。

- 1992年 应邀访问美国国家数学科学研究所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
- 1993年 人事关系由北大转到中国民主同盟，任代理常务副主席。当选全国政协常委。
- 1994年 任中国民主同盟常务副主席。
- 1996年 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
- 1998年 任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 2000年 连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
- 2003年 任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 2005年 辞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职务。

丁石孙主要著述目录

专著

- 1 吴光磊, 丁石孙, 姜伯驹, 田畴, 程庆民. 解析几何.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
- 2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几何代数教研室. 高等代数讲义.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64.
- 3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几何代数教研室代数小组. 高等代数简明教程.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66.
- 4 丁石孙. 线性移位寄存器序列.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2.
- 5 聂灵沼, 丁石孙. 代数学引论.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 (第2版, 2000).
- 6 丁石孙, 张祖贵. 数学与教育 (《数学·我们·数学》丛书之一).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9.

译著与译文

- 1 丁石孙, 聂灵沼, 王萼芳译 (B. И. 斯米尔诺夫著). 高等数学教程. 第3卷第1分册 (代数).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4.
- 2 丁石孙译 (H. H. 鲁辛著). 解析集合论及其应用讲义.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8.

- 3 江泽涵, 丁石孙, 程庆民, 姜伯驹译 (P. J. 希尔顿, S. 瓦里著). 同调论.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63.
- 4 丁石孙, 曾肯成, 郝炳新译 (B. L. 范德瓦尔登著). 代数学 I.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64.
- 5 丁石孙译 (Д. Я. 李本生著). 从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观点来看控制论. 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 1960, (1): 59 ~ 63.

文章

- 1 丁石孙. 数学思想的发展. 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 1956, 创刊号: 15 ~ 16.
- 2 丁石孙. 关于拓扑空间的正则性不具有可乘性的一个例子. 北京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 1956, (2): 159 ~ 162.
- 3 丁石孙. 关于全矩阵环的自同构与反自同构. 北京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 1957, 3 (1): 53 ~ 59.
- 4 丁石孙. 具有一巡回幂零微分的李代数. 北京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 1958, 4 (1): 71 ~ 87.
- 5 舒立 (邓东皋、孙小礼、吴光磊、丁石孙、刘西垣的集体笔名). 微积分的理论是怎么来的. 红旗, 1973, (1): 71 ~ 78.
- 6 丁石孙. 伽罗瓦扩张的一个算术刻画. 数学进展, 1983, 12 (4): 291 ~ 293.
- 7 丁石孙. 谈谈数学的研究对象问题. 刊于孙小礼, 楼格主编. 人·自然·社会.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8 ~ 19.
- 8 丁石孙, 袁向东, 张祖贵. 北京大学数学系八十年. 中国科技史料, 1993, 14 (1): 74 ~ 85.
- 9 丁石孙, 袁向东, 张祖贵. 几度沧桑两鬓斑, 桃李天下慰心田——段学复教授访谈录.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 1994, (4): 57 ~ 74.
- 10 Ding Shisun, Kang Ming-Chang, Tan Eng-Tjioe. Chiuntze C. Tsen (1898-1940) and tsen's theorems. Eocky Mountain J. Math., 1999, 29 (4): 1237 ~ 1269.

丁石孙文章、讲话选编

勾起的回忆

今年三月的一天晚上，我接到陈家鼎的电话，他告诉我北大数力系五四年入学的同学要在四月二十四号，也就是他们入学五十年的时候聚会一次。这个消息令我非常高兴，同时也勾起了我的回忆，让我想到五十年前的很多事情。

我和数力系五四级的同学联系较多，和他们的感情也较深。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北大、清华、燕京三校的文科和理科组成了新的北京大学，并把北大从城里搬到了原来燕京大学的校址。我就在这个时候，从清华大学调到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院系调整后，数学力学系招生的人数大大增加。我记得五二年大概招了一百多新生，五三年比五二年还要多一点，五四年招的就更多，达到二百四十人。一九五四年是给很多人都留下了美好记忆的年份。这一年，不仅广大知识分子，而且各行各业的人们都感到国家的未来和个人的前途充满了希望。解放不到三年，通货膨胀得到了抑制，国家实现了政治和社会稳定，而且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增长。当时我作为年轻教员，亲身感受到中国一年又一年的变化，对中国建设事业的发展满怀信心。五四年新招进来的大学生，多数才十七八岁，他们更是对未来

充满美好的憧憬，认为他们的一生将是大有作为的一生。五四级从老师到学生良好的精神状态，为克服工作和学习中碰到的困难增添了勇气和决心。

解放初期每年大学招生在政策上都有变化。我记得五三年比较强调考试成绩，而五四年就认为除去考试的成绩以外，还应该重视学生的出身。当时为了改变大学生的成分，国家办了工农速成中学，从工农兵当中选拔一些表现好的，在工农速成中学里进行培养，使他们能够考进大学。五四年进入数力系的二百四十人当中就有少部分工农速成中学的毕业生。在这种情况下，五四级的学生文化程度差距很大。当时系里决定这些学生一起大班上课，习题课则按入学成绩分成九个小班，每个小班大约二十几人。为了避免造成同学思想上的压力，我们在分班的编号上采取了些策略，成绩最好的是三、六、九班，二、五、八班是成绩中等的，一、四、七班是成绩差的。我除了给全年级讲高等代数课，还带一班和九班的习题课。有些同学基础比较差，听课和做习题都存在困难，我就对他们加大辅导的力量。还有个别同学，因为他们没有经过小学和中学的系统训练，不仅是数学方面的问题不能理解，而且阅读能力达不到看懂教科书的水平。我记得开始一段时间，每次讲完大课，晚上就把少数困难的学生找到办公室，领着他们像念语文课文一样念教科书。经过几年的努力，其中有一部分同学赶了上来。对于学习基础好的学生，我们也给他们特殊的培养。我记得从二年级开始，我们在全年级组织了两个小组，一个侧重于代数方面，一个侧重于分析方面。我负责代数方面的小组，已故的程民德教授负责分析小组。我们分别找些课外的文章指导这两个小组的同学学习，比较早地培养他们的科学研究能力。有的同学参加小组的时候，就写出了研究文章，为此我们出了自己的刊物，发表学生的研究成果。这个年级虽然入学时成绩参差不齐，但经过大家的努力，后来不但总体上学习是好的，而且思想极其活跃。这次聚会的时候，根据同学们的统计，这个年级出了七个院士，还有相当多的同学都在各自的工作中做出了突出成绩。

习题课是学习苏联之后才有的一种教学形式。当时数力系有个苏联专家，叫贝洛娃。她是系主任的顾问，由她跟全系教员讲习题课怎么上。一次习题课一般是两节，讲四到五个题，一道题大概做二十分钟。教员不能一下子就把几个题目全写出来，而

是做完一道再写出另一道。教员找一个学生在黑板上做，在他做的过程中不断提示，以此为全班做示范。教员在指导同学在黑板上做题的同时，还要在下面巡视，看到哪个学生做错了，或是不会做了，就进行指导。学生在上课前要把习题本放在座位边的小桌子上，教员在巡视时还要批改上次习题课留下的作业。我们严格按照苏联专家的方法来上习题课。数学系因为在这方面做得好，在全校受到表扬。现在看来，这套做法不一定就是最好的，但由于当年的教员对工作极端认真，习题课还是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我记得有一年元旦，学生给我写了封信，说在习题课上我虽然给了他们很多指导和提示，但同学们都感觉到题目是自己做出来的。这就说明当时的习题课在调动学生参与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教学上学习苏联还有一项内容，就是考试全部采取口试，做法是先出二十个考题，写在纸上，学生一个个进来，每人在这些题中抽一个题，抽完出去准备十分钟，进来向老师表示这个题怎么做，在黑板上写出来。我在看着学生做题的时候，还要提一些问题，范围可以超出这个题目，考查他们对概念理解得是否清楚。每个学生考试大体上要半个小时，二百四十个学生，就我一个助讲教员，每天八小时，考了十六天，这十六天考下来我累得大病一场。

除了讲大课和给两个班上习题课，我还负责全年级的答疑。一个礼拜大概抽半天时间，回答学生提出的各种学习上的问题。在一年半的上课过程中，我与学生关系搞得很好，给学生答疑时，除了学习上的问题，一些生活问题，包括恋爱方面也来征求我的意见。当时对他们的恋爱问题我也发表了很多看法，现在看来我发表的意见有些是很可笑的。因为我的年龄比他们大不了多少，并且也没有结婚。

五四级的同学后来经历了很多曲折，但是大多数在复杂的生活考验中走了过来。有一部分人并没有从事数学和力学方面的工作，完全改了行。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也做出了很好的成绩。这是令我感到特别高兴的一点。回想当年，我们这些教员的教学水平并不都是高的。学生后来事业上有很好的发展，主要是他们勤奋努力的结果。大家始终记住我们这些教员，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态度，大家对待工作都极端负责，都是尽最大的力量把工作做好。很多学生感到，他并不是从当时老师的学问中，

而是从老师的治学态度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今天，五四年级的同学都是近七十岁的人了，可以说即将走完他们人生的旅程。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觉得，我到了七十岁的时候，才真正懂得了孔子这句话的含义。

对于人的一生来讲，五十年是漫长的。我们有幸共同经历了这五十年的风风雨雨，进入了一个大有希望的新时代。同学们都有了很丰富的人生阅历，也有很多感慨。大家聚在一起，抚今追昔，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2004年5月

哭曾肯成

二〇〇四年五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朋友的电话，告诉我曾肯成已经去世。我和曾肯成在清华是同班同学，一直保持着较好的关系。我得到消息后，感到很悲伤。他生病已经近十年了，想到他十多年来的痛苦，这对他也是一种解脱。我与他是同龄人，按照现在的人的寿命，他还是较早地离开了人世。回想曾肯成的一生，我感到他一生极其坎坷。他一九四六年考进清华数学系，我一九四八年转学到清华数学系三年级，从那以后，我们就维系了近六十年的友谊。

同学几年来，我感觉到他的智力超群。他不但有很快的理解能力，而且有很强的记忆力，我认为这两者同时都强的人并不太多。在同学期间，曾肯成并不是非常用功，他看了很多闲书，花在数学上的时间并不是很多，但在全班同学当中是学得很好的，至少比我要好。在我们毕业前，华罗庚先生从美国回来，在数学系任教，开的课是他近年来正在进行工作的典型群方面的，课程的名称叫矩阵几何。当时我们的系主任段学复先生与华罗庚有较好的关系，他从我们毕业班向华罗庚先生推荐了几个人，让他挑选。因此曾肯成毕业后就到科学院，在华罗庚的指导下进行工作。我留在清华数学系当助教。不久我就听说他跟华先生关系相处得不是太好。也许是曾肯成自己的想法太多，很难严格在华罗庚先生的指导下进行工作。

大概在五四年前后，曾肯成到了科学院院部工作，后来又调到科学出版社做编辑工作。我记得有一天他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翻译一本俄文书。这本书是苏联新出的一部经典丛书中的一本，是鲁辛的，书名叫《解析集合论及其应用讲义》。当时我完全不懂这本书讲的是什么东西。但是，知道这是一本经典著作。曾肯成告诉我，鲁金就是用这本书培养了一批苏联的数学家。我就答应了下来，利用空余时间一边念一边翻，翻译完就出版了。而这个时候曾肯成又从科学出版社调出来学俄文，因为一九五六年我们国家要定十二年科学规划，苏联派了一个专家组帮助中国政府定这个规划。曾肯成因为俄文学得比较好，他就成了专家组组长的翻译。当时我们的工作都比较忙，所以他的工作细节我并不太清楚。他的工作完成以后，就是十二年科学规划制定完以后，他就被派到莫斯科大学留学。

五七年反右派开始，曾肯成被打成右派遣送回国。据说他的罪名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他在国内订了《文汇报》，留学生大都从他这里借《文汇报》看。第二条，他经常和苏联的学生在一起辩论，批评苏联的政治制度。在当时批评政治制度是很大的罪名，那就是反对苏联。在毛泽东提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之后，同学从他这里借《文汇报》看就变成他在宣传资产阶级方向。其实，据我了解，曾肯成并不太懂政治。反右前一段时间，《文汇报》是受到毛泽东表扬的。后来有其他留苏的同学告诉我，曾肯成俄文学得太好了，因为一般的留学生俄文还没有达到那种水平，与苏联学生来辩论政治问题。就在这些罪名下，他就中断了学习，回到国内，戴上右派的帽子。

一九五八年，科学院的各个研究所，有相当一批右派被分配到新成立的科技大学教书，而曾肯成是其中的一个。到了六二年，曾肯成终于结婚了。我记得那一天我和万哲先参加了他的婚礼。他的爱人是个大夫，姓龚。据朋友告诉我，他们婚后夫妻感情并不好。“文革”当中，他就随科技大学迁到了合肥，因为他们两人没有孩子，就领养了一个孩子。领养的孩子叫曾红。这个孩子小时候身体不好，很快就发现生了红斑狼疮，这是一种致命的病。这就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困难。到科技大学以后，他的生活情况还可以，因为他教书的才能逐渐被大学发现，所以他在科技大学得到较好

的待遇。打倒“四人帮”以后，他向学校提出要求，到北京来给女儿治病。那时候在北京成立了计算机学院，曾肯成就一边到计算机学院来兼课，一边给他女儿治病。他到北京以后，跟我接触就多起来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前后，解放军发现数学对密码有用，在北大办了短期训练班以后，又相继在科技大学、四川大学举办了一年到两年的训练班，而主要内容是代数。所以曾肯成从这时候就接触了密码。那个时候我们的任务主要是培养学生破译密码，而曾肯成就觉得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来建立密码。后来有很长时间他的研究就转移到密码，而且要造密码机。八十年代中期，曾肯成关于造密码机的想法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就成立了信息安全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的建立是我们国家有关部门对曾肯成工作的肯定。这个实验室一面做研究，一面培养学生，而且培养了好几位有杰出贡献的人才。正是在他的工作取得一定成绩的时候，他却病倒了，最后以至于生活不能自理。

我对曾肯成的一生的细节并不是很清楚。我刚才说的只不过是个体大的轮廓。从这个轮廓可以看出，曾肯成确实是极其有才能的一个数学家，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他没有得到很好的机会，发展他的才能。他有很好的记忆力，表现为中国的诗词他可以背诵很多，英文诗甚至俄文诗他也能背一些。曾肯成不但有很高的才能，而且为人耿直，不说假话。对于一些不公平的事件，极其气愤，这就使他得罪了很多人，在政治上也受到了不少不公平的待遇。所以他的死，我不但感到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朋友，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一个很有才能，应该给国家做出很重要的贡献的天才。我愿意借这个机会对他的一生做扼要的描述，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曾肯成这样一个人。

他本来应该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在曾肯成去世以后，他的女儿小红从美国赶回来，给我打了个电话，要求我担任曾肯成治丧委员会的主任。我很清楚她的目的是想让科学院比较重视，我就答应了。由于我当了治丧委员会的主任，科学院的副院长白春礼就当了副主任。我想这也就是我为老朋友最后做的一件事。他像一颗流星，穿过宇宙，很快就消失在黑暗之中。我衷心地希望今后为了后人的发展，我们要抓住一些闪亮的星星，为社会为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

2006年5月23日

怀念程民德先生

我与程民德先生交往有四十九年了，也就是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我记得很清楚，五〇年初，程先生和华罗庚先生一起从美国回来。那时我正在清华大学读书，是四年级的学生。程先生回来之后，在清华为我们开了一门课。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程先生。五〇年我毕业留校以后，与程先生的接触就多了起来，不少事情我们是在一起做的。对于当时我们一起经历的一些事情，现在我还记忆犹新。比如五一年，国家要求有一批优秀的工农兵代表上大学，为此，清华办了一个工农兵学习班，要用三个月的时间使这些人学完从初中到高中的主要知识，能够考上大学。程先生刚从美国回来不久，作为教授，担任了这个教学工作。尽管教的是中学课程，程先生仍然满怀热情，工作非常认真。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五二年院系调整，我们一起到了北大。北大的数学力学系是由三个学校的数学系合并而成的，从清华来的人数比较多。当时的情况是，全系二十八名教员，只有三名党员，北大、清华、燕京各一个。党要办好数学力学系，必须依靠教授。程民德先生从那时起，就是数学力学系起较大作用的人之一。当时为了学习苏联，要成立教研室。今天大家会以为，成立教研室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但那时我们是第一次听到教研室这个名字，谁也不知道教研室是干什么的。学校决定数学力学系成立一个分析教研室，作为试点。大概这个教研室也是北京大学最早成立的一个教研室。当时数学力学系主任是段学复先生，分析教研室主任是程民德先生。分析教研室相当大，像江泽培先生，许宝騄先生、庄圻泰先生等都属于这个教研室。教研室主任要管的事情相当多。数学力学系的主要教学工作大都集中在这个教研室。教研室不仅要负责摸索一条教学科研的路子，而且还要培养年轻教师。因为一些年轻教师，大学三年级就提前毕业了，他们自己说真正读书只有一年。所以，在这些年轻教师给学生做辅导之前，先要由老教师辅导他们。应该说，当时的教研室主任承担的工作量是很大的。

从担任教研室主任开始，程民德先生就是数学力学系的一位重要的领导成员。长

期以来，程民德为数学力学系的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数学力学系从只有二十几人，发展到近二百人的大系，建立了数学专业、力学专业、计算数学专业等，这其中凝聚着程先生的心血。我想特别提出的是，五四年我们招了二百四十个学生，有九个班。当时程先生教数学分析。这个年级的教学是很成功的，出了不少人才，现在有六个院士^①。程先生不但教大课，而且还对科学小组的同学进行特殊辅导。程先生对数学力学系的工作，从方针、计划的制订，到具体的教学科研都要亲自抓。从五四年开始，北大就强调科研工作。我们这些年轻教师，不知道科研怎样搞，主要靠一些老教师带。程先生是这些老教师中的一位。

一九五六年以后，程民德先生担任了副系主任。因为程先生身体比较好，系里的很多工作是他来做的。学校也非常重视数学力学系有这样一个干部。六十年代，程先生又参加了系总支的工作。作为一个从国外回来的教授，能够入党，并且愿意承担繁重的行政工作，这是很不容易的。他确实对全系有很大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面临着一个重新建立数学系的工作。摆在面前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确定数学系的发展框架。我记得很清楚，程民德先生极力坚持要成立数学研究所，而且他自己当所长。成立研究所在当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的印象是当时全校还没有一个研究所。数学研究所是在程先生坚持了两年之后，教育部才批准的。后来我们发现数学系和研究所互相配合是一个很好的体制，学校也充分肯定了这样的体制。现在回过头来看，刚打倒“四人帮”的时候，学校非常困难，整个工作全乱了，教学和科研都需要重新安排，重新设置。老一点的同志都很清楚，那一段时间，程民德同志花了很大的精力重建数学系，当然其他老先生也出了很多力。所以我觉得，数学系能够有今天，有今天的教师队伍，有今天好的风气，程民德先生作为一个系领导，他的贡献是不能忽视的。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我要讲的第二点是有关天元基金的事情。陈省身先生最早提出来，中国应该率先成为数学大国，要实现这个设想，首要的一个问题是，数学学科怎么设计，怎么规划，

^① 丁石孙先生写此文时，刘宝镛尚未当选院士。

怎么发展。天元基金是程民德先生和吴文俊先生一起，花了很大的力气搞起来的。第一步，他们做了很多工作把钱争到了手。第二步，把钱争到了之后怎么用，这就要规划，规划就涉及全国的数学界的协调。从这么多学科中挑选出对数学的发展起核心作用的学科，并不容易取得一致的意见。程民德先生在这方面也花了很大的功夫，以后一步步地发展，程先生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我至少记得有好几次是他亲自写报告，甚至在身体不太好的时候，还开夜车写。这些报告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所以我觉得，程民德先生不但对北大的数学发展，而且对整个的数学界，对中国的数学事业影响都非常之大。为什么在听到程先生逝世的噩耗之后全国的数学界会有如此大的反应，这不是偶然的。再有一点，程先生把中国的数学事业，当成自己的事情。他很乐于助人，特别是对年轻同志。我记得不止一次，当时的系里的领导和我商量怎么保护程先生的健康，有人提出来是不是在他的门上贴个条，写上不事先联系，请不要敲门一类的内容。后来听说，程先生得知我们要在他门上贴个字条，非常生气。他根本不考虑自己的身体，这一点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我了解到，程先生最后一次生病住院，还带了材料到医院去看。可以说，程先生是工作到生命的最后，这一点是非常感人的。

程先生不但重视学科规划和对年轻人的培养，他还在与国际数学界的联系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我记得八六年国际数学会年，程先生参加了。就是在那次会议上，与台湾的数学界达成协议。从此以后，组成了五人的中国数学代表团，大陆出三个，台湾出两个，九〇年、九四年、九八年我们都是以中国数学代表团的名义出席世界数学家大会的。这一点对我们争得二〇〇二年世界数学家大会在中国召开非常重要。

另外，程先生还非常重视数学的应用。北大在数学应用方面，从图像识别发展到后来的指纹鉴别，程先生花了很大的力气。至少就我了解，打倒“四人帮”以后，光讨论班就办了多期。程先生亲自主持讨论班，还出了书。程先生的工作不仅关系到怎么培养年轻人，而且对如何拓宽数学的应用范围也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我与程民德先生共事差不多五十年，在我们之间建立了很深的友谊。我们彼此也有很深的了解。对于他的过世，我感到非常悲痛。我们要继承程民德先生的遗志，学习他的为人和治学精神，把我们的数学事业推向新的高峰。

1998年12月4日

怀念曹锡华同志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上海来的电话，说曹锡华同志故去了。虽然曹锡华同志生病时间已经很长了，但这个消息对我还是有很大的震动。我感到失去一个老朋友的悲哀。我记得有一年我去上海，专门到华东医院去看望了曹锡华同志。当时他精神还相当好，我感到很欣慰。我认为他虽然得了癌症，但还可以控制。没想到终于由于癌症的转移，还是夺去了他的生命。

一九四八年八月我从上海转学到清华。那个时候从清华一些人的嘴里，我就知道了曹锡华的名字，但没有见到他。曹锡华是浙大毕业的，四八年初，他从浙大到了清华准备出国，年中他就去了美国，跟着群论专家 Brouwer 念博士。他解放后回国没有到清华，而是到浙大工作。五二年院系调整，浙大数学系的大部分人到了复旦，曹锡华被分配到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我第一次见到曹锡华大概是在一九六六年初。那个时候全国高等学校都在落实毛泽东春节讲话。我记得主要内容是毛泽东认为大学的课程可以砍掉三分之一。在当时的形势下，毛泽东的指示必须严格执行。所以六五年底我们就在上海开了一个会，研究如何落实砍掉三分之一的指示。在上海的会上，我就承担了把代数课砍三分之一的任务。回到北京，我花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把我原来写的《高等代数讲义》，用剪刀加糨糊的办法精简成《高等代数简明教程》，内容差不多减了三分之一。按当时教育部的要求，这本书必须在暑假前出版，作为下学期数学系的教材。六六年二月份左右，我带着《高等代数简明教程》初稿回到上海，在华东师大一边审查一边修改，一边进行编辑加工。我记得审查稿子的有曹锡华，还有北京师范大学的刘绍学，东北人民大学的谢邦杰，再加上高教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差不多花了两个星期，完成了这本教材。这次因为在一起工作，所以与曹锡华的接触就比较多，对他的为人了解得多一点。等打倒“四人帮”以后，我们受到美国中学数学教师协会的邀请，去美国伯克利大学参加数学协会的年会。这次由教育部组织了一个五人

代表团。这五个人有我，还有曹锡华，还有北师大的丁尔升，还有华南师范大学的曾如阜，还有高教出版社的一位姓曹的同志。我们在美国待了两个星期，这样我和曹锡华同志就接触很多了。我感觉到，曹锡华年龄虽比我大七岁，但他为人极其谦虚，我们相处得非常好。

“文革”结束以后，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都面临着重新选择科研方向的问题。曹锡华原来是搞有限群论的。他发现代数群的研究涉及的面更宽，更有发展前途。所以他选择了这一新的发展方向，带领一批年轻教员学习代数群的基础知识。我知道代数群是相当难懂的，对曹锡华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他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认真读一本新出的代数群基本知识的书。有一次我问他，这本书你念得懂吗？他很谦虚地告诉我说他念不懂，但是年轻的学生可以念懂，他要为他们理一条路。不久，他就培养出来了几个博士研究生，其中包括现在华东师大的校长王建磐，他在代数群方面做出了较好的工作成绩。曹锡华的精神令我钦佩。我一直认为，发展中国数学，需要有一批同志不考虑个人得失，为后来的人开创一条新的路子。我清楚地记得，一九八六年我和曹锡华同志受山东大学数学系的邀请，到烟台参加了一个代数讲习班。我和曹锡华同志分别讲了两门课。这个讲习班的学员是来自全国高等学校代数方面的教师。在那次讲课的最后，我对学员说曹锡华同志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为后来人闯一条新路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当时说这些话不是恭维曹锡华，而是发自肺腑之言。华东师大数学系后来在代数群和代数几何方面不断做出一些新的成绩，在全国的数学界取得了一定的地位，受到数学界同志的尊重。这其中包含着曹锡华同志付出的大量心血。

曹锡华同志真正是一个好人。现在他离开了我们，我更加深深地感到他为发展中国数学所做的工作的可贵。他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后来人学习。只有一批老的数学家能够像曹锡华同志那样，愿意为后来者开路，中国的数学才能不断得到发展。所以，在这篇文章结束的时候，我愿意再说一遍，曹锡华同志永远值得我们怀念，他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2006年1月

在吴光磊先生诞辰八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

今天我们在这里座谈，纪念吴光磊先生诞辰八十周年。同志们要我发言，我想我应该发言，而且考虑到我的年资，我还应该第一个发言。我一九四八年转学到清华，一九四九年就选了吴光磊先生的课——射影几何。我记得，那时清华教几何的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吴祖基先生，一个是吴光磊先生。吴祖基先生是讲师，吴光磊先生是教员。当时清华有个规矩，比助教高一点，还不到讲师的就叫教员。一九四九年听吴光磊先生的课是我与他最初的接触。再进一步的接触，应该说是我参加了吴光磊先生与张秋华先生的婚礼，那时我是四年级的学生。

吴光磊先生值得我们纪念，值得我们学习，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他的人品——他非常正直，为人和做学问都非常实在。有人告诉我，吴先生做学问有一个特点，他学一个东西，一定要学深；他懂一个东西，一定要懂透。我当学生的时候，大家谈论比较多的是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有人告诉我，清华园里真正懂得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的就是吴光磊先生。哲学系都请吴先生讲这个课。这件事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吴光磊先生一直扎扎实实地工作，从不宣扬、标榜自己。他发表的论文不多，但是他的论文都还是有分量的。一九七二年陈省身先生第一次回国访问，他就问起吴光磊先生在干什么。我发现陈先生对吴光磊先生印象很深。我后来了解，吴光磊先生就是一九四六年回到清华以后，跟陈先生学过半年。应该说，当时真正理解陈先生对几何的主要贡献的，吴光磊先生是一个。还可以举个例子，说明吴先生的学问。我们知道，复旦大学几何是很强的。六五年“文革”前夕，苏步青先生主动跟吴光磊先生提出，下半年能不能到复旦大学讲一学期课。那时候大概苏步青先生发现吴光磊先生懂的几何在当代几何中比较重要。因为“文化大革命”很快就发生了，这件事没有成功。

我和吴光磊先生接触是非常多的。院系调整以后我们在一个教研室，同时我们又都是民盟盟员，在一个盟小组，所以我们经常一起参加政治学习，一起讨论问题。从

政治学习我也感觉到吴先生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他把想的很多问题都坦率地说出来。一九五八年，我们一起下放到斋堂，在达摩村我们睡一个炕，差不多有半年时间。那时吴先生的年龄在我们几个人中比较大。老乡们也认为他年龄大，为了不让他做更多的体力劳动，就让他办小学，当小学校长。其实学校就他一个人，教什么课都是他。这样差不多有一年时间。这段时间吴光磊先生给老乡的感觉是他没有什么架子。虽然他是大知识分子，但他非常愿意为老乡做事。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吴先生为人的特点，就是非常实在。一九六〇年搞“教育革命”，要我们重新写《解析几何》。那时其实我对几何并不熟悉。我也参加了吴光磊先生的写作小组，最后一起完成了那本《解析几何》。

吴光磊先生讲课讲得非常好，可以这么说，他在数学系课讲得好是数一数二的。我一九四九年选吴先生的课，至今还记得他讲射影几何，如何从几条简单的公理，推出域的概念。那时我就发现吴光磊先生讲课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非常简练，思路非常清楚，学生很容易接受，也很容易记，而且记得很牢。一九六〇年学校组织批判所谓学术权威，经领导研究，批判的对象是吴光磊先生。一开始大家还不理解，为什么要批判他。当时有一个奇怪的逻辑，说吴光磊课讲得太好了，太好了就必须批判，批判了才能使他知道怎么再进一步更好。这个事情在座的大多数人可能不知道，少数人可能知道，也许张秋华还有印象。

吴光磊先生几乎是从来不谈自己做过什么工作。“文化大革命”当中，邓东皋组织一批人写一篇文章《微积分是怎样产生的？》，要在《红旗》杂志上发表。这里边主要的成员是吴光磊先生。为了写好这篇文章，大家讨论过好多次，学校里也派人参加了。考虑到当时政治形势非常复杂，要说明“微积分虽然从实际来，但必须有理论基础”这样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只能采用非常曲折的语言。吴光磊先生为此花费了很多精力。吴先生一九五二年到北大，在这里兢兢业业工作了一辈子。他对北大数学系做出了很大贡献，他培养了不少人，有些还是很优秀的。

我和吴光磊先生交往的时间很长。他是我的同事，是我的老师，也是朋友，我们之间有很深的友谊。陈维垣告诉我要召开纪念吴先生的座谈会，我说我一定要来。最

近我回想起前几十年的很多事情，应该说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吴光磊先生走得太早了。我还记得，在他病重期间，我去看过他，他住在玉泉路一个医院。当时他年纪不大，我根本没想到他一下子就走了。今天，我们一起回忆吴光磊先生，学习他的优秀品质，使全系的老师和学生对他有更多的了解。我相信，这不仅对于北大数学系，而且对于整个数学事业也是有好处的。

2002年9月

数学思想的发展^①

数学作为一门科学产生之后，随着也就产生了人们对于数学的看法。这些看法包括：数学在人类的知识体系中所占的地位，数学与生产实践的关系，数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以及数学发展的规律，数学研究方法的特点等。这些看法随着数学的发展在不断地发展，反过来这些看法在每一个时期对数学的进一步的发展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影

响。目前，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来系统整理、研究并分析批判关于数学思想的发展所做的工作很少。对这方面进行研究，特别是对于十七世纪以来的数学思想的发展的研究将有助于对今天数学的正确了解，从而能指出今后数学发展的方向。同时，数学作为一门以抽象性为其特征的科学，在人类的认识的发展上也有它的特殊的地位，因之对以上问题的研究也将丰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这个问题的研究虽然有别于数学史的研究，但是与数学史有紧密的关系。数学发展的历史应该是研究本问题的出发点。反过来这个问题的研究将使我们能更深刻地了解数学的发展。

对于本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以数学发展的各个阶段作为对象，研

① 本文刊于《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创刊号，1956年10月。

究在数学发展的各个阶段上，人们对数学有哪些主要的看法。这些看法与当时的数学发展的状况的关系，与当时的社会及一般的哲学观点的关系，以及这些看法对数学的发展所起的影响如何。对这些看法做分析、整理，指出其中正确的方面与错误的方面。研究应该一直到今天的数学的发展。最后应该依据数学发展的规律来研究在今天这个工业技术的新高涨的时代数学的发展方向。

第二，研究过去与近代的大数学家，突出的数学家在数学的发展中常常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研究他们的科学研究的方法，他们对数学的看法，以及他们的哲学观点。可以肯定，他们既然能对数学有大的贡献，在方法上和看法上一定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我们知道，有一些数学家，一方面在数学上有很大贡献，另一方面在一些地方表现出对数学的不正确的看法，有时甚至于这两方面是夹在一起的。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需要分析研究，而简单的肯定和否定都是没有好处的。在数学家中，特别是那些在当时开辟了新的领域，提出了新的概念的应该首先研究，因为正是这些标志了数学的发展。

第三，由于数学的概念标志着数学的发展，反映着人类对世界认识的深度，所以研究一些重要概念的发展是有很意义的。一般的数学概念，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包括的范围不断扩大，含义也逐渐明确，同时它与其他概念的关系也不断地被进一步揭发，从而内容日益丰富。了解这样的一个过程与每一步发展的原因及其影响能使我们进一步推动它的发展并提出新的概念。同时由于数学的概念反映着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因之对每个概念是如何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的某一个侧面进行哲学分析应作为研究的内容之一。

限于水平，现在还很难确切地提出研究的题目，下面就我们所想到的一些提出来供参考：

第一方面，（1）在数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时，数学知识是如何产生和如何积累的？数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的形成过程如何？《几何原本》产生的科学、历史、哲学的背景是什么，对数学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如何？（2）微积分的产生。微积分产生后一些争论的要点是什么？（3）十八、十九世纪是数学知识大量积累的时代。这

个时代的特点，积累的规律与其他方面的关系？（4）由近代数学的进一步抽象化所引起的对数学的各种看法、争论。（5）电子计算机对今天数学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第二方面，下列数学家我们想是值得研究的：笛卡儿、牛顿、莱布尼茨、欧拉、高斯、罗巴切夫斯基、黎曼、哥西、庞加莱、希尔伯特。

第三方面，我们想到的一些重要的数学概念有：数与数系，空间，集合，连续性，函数，变换，序，等价，运算，不变量，概率，公理化方法，证明论，能行性等。

在这方面，国内几乎还没有正式的工作，在苏联这方面的工作也不多。就所知道的文献看，对罗巴切夫斯基的研究较多，对少数的数学概念有些小册子式文章，此外所知道的就不多了。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关于这方面的文章零散地有一些，材料了解得还不够。

总之，在这里我们只是提出了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可以说是新的，因之主要的还有待于对这方面有兴趣的同志的共同努力。

要知科技人员的心^①

中年科技人员的主体，年龄在四五十岁之间。工作能否做好，主要看这些人。但是目前他们的待遇很低。1962年至1963年毕业的大学生，绝大多数工资62元。我们北大数学系就有3个62元的副教授，其中两个是教研室主任，有一个还是北京数学会秘书长。据张广厚同志讲，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有一位1955年大学毕业的，现在全家人只住一间房。科学院新宿舍楼旁边是海淀区的屠宰场。陈景润同志的宿舍窗口正对着这个屠宰场。这个问题虽经多次交涉，至今也没解决。张广厚同志希望科协给呼吁一下。关于生活与待遇方面的问题，现在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我只是提一下。

我建议把中年科技人员提到应有的岗位上来。这倒不是要他们做官，而是不到一

① 本文为丁石孙在北京市科协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时的发言，刊于《北京科协动态》，1982年7月30日。

定的岗位，他们得不到锻炼。其实像我们数学系四五十岁的人，他们大多数并不比解放初期四五十岁的人差，完全有能力承担学术与行政的领导工作。人年纪大了，不但身体和精力经不起白天工作夜里开车，而且思想自然也就不活跃了。我自己对此有深切的感觉。我认为在正常情况下，系主任应由四十多岁的人担任。科协能否在老年科学家中发起一个倡议，请他们为中年科学家创造条件、鸣锣开道，以便当自己不能工作时，可以放心地离开领导岗位。我们系段学复同志做得就很好。他当了30年系主任，现在虽然不当了，但工作并不少做，而且把难办的事都揽过去。有了段老，我这个系主任就很好当了。

应该向中央呼吁一下，让中年科技人员多参加一些决策性会议。现在这种会议，领导多是邀请年老的参加。中年人在下边做了很多实际工作，由于没有机会参加决策性的会议，他们的有价值的见解，很容易被忽略或否掉。这不利于国家事业的发展。

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中，还有个政策配套的问题。调整技术职称时，有些党政干部也提出自己的职称问题。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些同志很多也是优秀的科技人员。一个学校或科研机构总是要由几种人组成的，行政管理和后勤人员跟不上也搞不好。一个好科研处长比教授作用还要大。在美国，有些行政副校长比教授工资高得多。但是我们的行政人员起不了那么大作用。我们的办事员和秘书工作水平太低，所以谁当头谁就陷进事务圈子。要把管理工作和行政工作提到应有的重要地位。为此，我建议培养一批大学毕业的秘书和办事员，而且规定，他们的工资不应低于教学人员。

对知识分子写书、讲课得点稿费这件事有很多非议，说他们有利己思想。这是不了解知识分子的特点。知识分子当然不是一点名利思想没有，但是他们主要是想为国家多做点事。不要人家刚做点事，就问人家拿多少钱，这很容易伤他们的自尊心。希望各级领导多了解知识分子的特点，在精神上给他们以支持。

为了发扬知识分子的作用，还有个了解和信任他们的问题。我们数学系有一位60年代的毕业生，现在美国进修。由于他要求在美国多留一段时间，引起了很多非议。所在单位给他写去一封很不客气的信，竟说他再迟些回来就赶不上参加四化建设了。还出现了很多流言，说他可能去台湾。得知这一切，他非常难过，数夜不眠。为了澄

清事实真相，他搞了个汇报录音。我听了这个录音，很受感动。

他在录音中说，他所以要在美国多逗留一段时间，是因为他发现，我们的情况比原来估计的落后得多。当时他已经闯出一条国外没人走过的路，只需再有一段时间，即可取得国际上的承认，为祖国争得荣誉。现在这个目的已基本达到。在岩石力学方面，他已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学者。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土木系已有一门课，基本上讲的是他的成果。他在美国编了20个程序。美国科学家说，这20个程序如果美国国防部早几年得到，美国的地下工程可以提前很多年完成，可以少花很多钱。他说他这20个程序是给我们祖国编的，要送回祖国，让所有单位无偿使用。他说，他还打算再编几个非常实用的程序，通过这些程序，可以在挖一个隧洞之前就画出图来，说明哪里会塌方以及会怎样塌方。他表示他回国后还要回到工地去，因为他在工地上劳动过10年，对那里的一石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

他在美国多待了一段时间的真相就是如此（他在国外的真实情况，我驻美总领事馆是清楚的。他在谈话中表示，他非常感谢总领事馆一些负责同志对他的关怀、支持与安慰）。不料在国内的某些单位却引出这么多流言蜚语和责难，对此他非常气愤。他说，十年动乱他没留下什么毛病，这次却留下了头疼的病根。说他可能到台湾去，他觉得十分可笑。他说世界上有这么多国家，若是贪图享受，怎么也不会去台湾。

对于这么好的一位科技人员，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估计和处理，不是很值得我们深思吗？

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想得不多，就说这么点零碎意见。

高教工作面临新挑战——我们今天怎样做教师^①

今天的世界，一切都在发生变化，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世界形势有两个明显的特

^① 本文为人民日报教科文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联合举办“知识经济与教育观念研讨会”发言摘要，刊于《人民日报》，1998年5月22日，第5版。

点：从时间上来看，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大大加快；另一方面，整个世界也变得越来越小，相互渗透、相互联系越来越多。

这一切都会毫无疑问地影响我们，我们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究竟应当如何培养人才？要知道，我们培养的人才才是为未来工作的。现在的人培养为未来工作的人，其实是有很大难度的，因此以下两个问题不容忽视：

第一，我们虽然是做教育工作的，但千万不要把自己摆在教训人的位置上。这样做是很危险的，这就好像我们要替他们解决一系列他们将来要解决的问题，这是明显不可能的，而且他们将来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比我们强得多。

江泽民同志在北大百年校庆的讲话中说：“祖国和民族的希望寄托于青年。”当我们想到这一点时，我们所应该做、所能做的就只能是提供基础，使他们今后能够自我发展，碰到问题能自己找办法去解决，而不是等我们给他现成的答案。

现在又碰到科技发展速度如此之快，知识的量越来越大，况且性质也不大相同。量大好办，可以教给学生，让学生多掌握这些知识；可是速度快就很难办了，那将意味着我们今天教的知识也可能半年后就沒用了，我们应该预见到这一情况。

第二，世界变得如此之小，我们相互的了解就显得越来越重要。江泽民同志在北大开座谈会时，季羨林老先生就特别强调人文学科的重要性，这是有远见的。

世界是小了，所有的民族各自具有不同的文化，差别非常之大。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快地去了解别人，学习别人，这已经不是一种简单的照搬，首先应该是相互了解，相互比较，这样一来人文学科在这方面就大有作为了。

过去我们培养的是所谓专门人才，比较重视知识，花大量时间把人培养成了一进工厂就能开机器的人，可今天不行了。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我们必须打好基础，挑选一些基本的知识，年轻人掌握了这个法宝，在将来就可既能创新又能有较大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这是相当重要的。知识面太窄是不行的，需要宽一点，“通才”教育是必要的。

总之，学校培养人知识面要宽，但也需要处理好宽和专的关系。专有好处，它让我们懂得搞学问什么叫深入。现在的学校是大规模生产，这种生产方式在现代社会完

全必要，但也有缺点。如此大的学校没有一定的规则和约束就没法进行管理，可大学的产品是人，个人的特点又不相同，如果我们总用同一个模式去要求人，往往是不成功的，这就需要在大规模生产中给他们的成长提供一定的自由度。

北大的精神

前不久，香港北大校友会的朋友与我联系，约我写一篇祝贺香港北大校友会成立十周年的文章。我最初的反应是对时间流逝的迅疾感到惊异。十年前，校友会成立时我正好在香港。我参加了成立大会，还讲了话。回忆起当时热闹的局面，恍如昨日。待我抽出时间，坐下来要写这篇纪念文章时，我首先想到的是香港北大校友会能坚持十年，并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确实很不容易。说实在的，香港北大校友会成立时，我对其能否长期坚持活动并没有很大的信心。以我四十余年在北大教书的经验，北大的同学做事往往开头热情很高，但却不能持久。我这样说并不是批评北大人缺乏毅力和恒心，而是说，很多北大的同学有这样一个特点，他们热爱独立和自由胜于一切。他们最受不得组织和繁文缛节的束缚。校友会的工作是很烦琐的，时间久了会使人们失去耐心，更何况在香港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生活高速运转，人们难得有闲暇和兴趣叙谈旧事，交流感情。香港北大校友会靠什么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把广大校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开展了一系列有声有色的活动？我想仅靠大家都有在北大读书的经历，或者主持校友会的几个人细致踏实的工作是不够的，背后还应该有更深刻的东西在。这更深刻的东西使大家彼此之间产生一种亲和力，使大家不管生活经历、社会地位有多大的不同，在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息息相通的感觉。这种更深刻的东西就是“北大的精神”。

我是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到北大任教的。到北大之后，我从一些前辈学者的治学风格，从同事们为人处世的准则，从大家言谈中表现出的思想的自由与开阔，清楚地感觉到北大精神的存在。虽然我还不能一下子从理性上准确地把握她。近半个世纪以

来，北大精神对我思想的成长和学术品格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我也发现，在北大工作和学习过的人无不受到北大精神的陶冶。他们在对待世界的态度和思想方法上都打上了北大的印痕。

改革开放以后，我有比较多的机会到国外的高校去访问和交流，在那里接触到不少从北大去的学生。这些身在异国他乡的北大校友，无不对母校一往情深。校友们告诉我，北大虽然在科研、教学和管理上与欧美一些著名高校还存在着差距，但是，他们在北大学到的思想方法，受到的学术训练是他们终身受用不尽的财富，恢弘博大的北大精神是鼓舞他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强大动力。

北大百年校庆，使我再一次强烈地感受到北大精神的巨大感召力。毕业时间相差半个多世纪的北大校友，从千里万里之外来到北京，云集燕园。不论是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老者，还是生命与事业正值黄金时期的中年人，抑或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他们都带着孩子般真诚与激动的表情。年届九旬的老校友张中行亲切地称北大为“娘家”。也有人把毕业之后重返北大叫作“朝圣”。的确，北大是许多北大人的精神圣地。回到这里，年龄、地位、身份的差别都不那么重要了，彼此之间都可以无拘无碍地交流，甚至面红耳赤地争论。应该说在北大最突出地体现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有人说，北大没有权威；也有人说，在北大谁也管不了谁。这些都是北大精神的形象写照。

许多人对北大精神进行过概括，比如说“科学与民主”，“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等等，这些都是对的。我觉得北大精神最核心的东西是尊重人，尊重人的个性，尊重人的自由发展，其他方面都可以由此生发出来。北大精神从“五四”时期开始形成，蔡元培先生倡导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为北大精神奠定了始基。所谓“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也就是要承认每一个人，每一种治学方法乃至思想和学术派别，都有自己的特点，只有尊重各家各派的特点，不强求一律，开展百家争鸣，才能调动积极性，发挥创造性，也才能达到思想和学术的繁荣。蔡先生之后执掌北大者，大都继承了兼容并包的传统，使北大长期以来荟萃了海内外大批有不同思想倾向和学术观点的优秀学者。正是由于几代优秀人物的立言立行，

才使北大精神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使北大成为国内最为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北大给予学生的不仅是一些具体的知识，更主要的是心系天下的怀抱，独立思考的精神，为真理献身的勇气，开阔的学术视野，对多样性的宽容等。北大建校百年，培养出的高素质的人才之多，国内罕有高校能出其右，这也有力地证明了北大精神符合人才成长的规律。

北大精神虽然强调兼容并包，但传播新思潮，批判中国文化中阻碍社会发展的落后因素是其主流。北大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和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方，也是北大精神的必然体现。北大二十七年校庆时，鲁迅先生写了一篇短文《我观北大》。文中说，“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与北大精神最不能相容的是因循守旧。在面临知识经济挑战的今天，重视创新能力的培养，发扬和光大北大精神，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北大百年校庆时说：“北京大学的已有传统，说明上一辈人已走出了几步，打下了基础，但是这还不够，不能停留，百年庆典时应该回头总结一下，进一步肯定历代中国人在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和今后的责任……”我觉得，这是我们反思北大精神时应取的正确态度。北大与现代中国的教育事业，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所取得的成就及经历的曲折有着很深的联系。我们在反思北大精神时，不能仅仅陶醉于过去的辉煌，而是应该放眼未来，以自己踏踏实实的工作，使北大精神在新的世纪发出更璀璨的光芒。愿以此与香港的北大校友共勉。

1999年12月

丁石孙遗嘱^①

朋友们：

今天是我 65 岁的生日，似乎是应该想一下自己的身后事。没有人能准确地预见自己死的日子，因之话早说为好。

1. 我死后一切从简，不要任何仪式，尽快送火葬场，一切请他们按常规处理。不要骨灰。我来自自然，我愿意再回到自然。

在我死前或死后，凡是不在北京的亲属，绝对不要因为我的缘故来北京。对世界来说，我的死是一件极小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

2. 如果我有一段病重的时间，千万不要为了延长生命给我和大家造成不必要的痛苦。如何处理，请我的爱人做决定，她是了解我的。

3. 也许我死后还有一点现款，请把我的一份（依据法律）捐给北京大学数学系，如何使用由数学系决定。我对数学是有感情的。至于实物，由我的亲属处理。

4. 我死了以后，当然要发个通知，请按以下格式：

丁石孙，出生于 1927 年 9 月 5 日，已于 × 年 × 月 × 日去世，特此通知。下面由家

^① 这份遗嘱是丁石孙于 1992 年 9 月 5 日，即他 65 岁生日当天所写。丁石孙说，他之所以写遗嘱，是因为他觉得 65 岁已经算是年纪很大了，自己随时都有可能死。遗嘱的出发点是他死后一切从简。

属签名。至于发给哪些人，由你们决定。

5. 请不要为我的死悲痛。我衷心希望你们生活愉快。

丁石孙

1992年9月5日

人名索引

A

- 阿提亚 (M. F. Atiyah) 162
阿廷 (E. Artin) 46, 49, 50
艾尔 (Ayer) 50

B

- 白春礼 58
白居易 5
贝克尔 (Becker) 169
贝洛娃 75, 76
本尼 (Benny) 245, 246
毕树林 249
卞国琨 42, 58, 132, 165
伯克霍夫 (G. Birkhoff) 178, 179

C

- 蔡元培 16, 203, 237
蔡晔盎 16, 17

- 曹锡华 116, 170, 173
曹轶欧 119
车懋祺 17, 18, 30, 32, 220
陈宝馨 145
陈伯达 139
陈岱孙 41
陈德潢 72, 73
陈德问 42
陈独秀 237
陈广德 30
陈昊苏 221
陈佳洱 195, 196, 201, 231, 233
陈建功 88
陈杰 74, 78, 83
陈景润 87, 91, 183, 186
陈良焜 204, 205

- 陈敏中 16
- 陈纳德 20, 187
- 陈省身 15, 45, 47, 55, 56, 85, 174,
175, 188, 189, 196, 211,
212, 231, 240, 241, 243~247
- 陈香梅 187
- 陈燕美 184
- 陈耀松 70
- 陈永和 131
- 陈云 111
- 陈哲夫 237
- 陈至立 249
- 成思危 259
- 成素梅 99
- 程民德 47~49, 65, 73, 74, 79, 80,
93, 94, 104, 110, 126, 131,
135, 159, 242
- 程庆民 126
- 程毓淮 182
- 池田大作 207~209
- 迟群 151
- 崔秀全 34
- D**
- 戴新民 154, 155
- 戴宗铎 174
- 邓成光 99, 100, 102, 198, 202
- 邓东皋 142, 155, 157, 175
- 邓九平 93, 94
- 邓朴方 183
- 邓小平 114, 131, 151, 174, 196,
228, 229, 231, 245, 255
- 迪厄多内 (J. Dieudonné) 88
- 丁传科 2
- 丁尔生 170
- 丁干 139, 146, 150, 168, 200,
219, 263
- 丁家承 2
- 丁健 232
- 丁琴南 6
- 丁石樵 3
- 丁诵青 108, 111, 134, 136, 138,
139, 160, 177, 251, 263
- 丁永宏 2, 6
- 丁永宁 2, 4, 6, 8, 10, 26, 133
- 丁永容 2, 6, 7, 136
- 丁永宣 29
- 董怀允 41, 56, 74, 82, 88, 102, 122,
131
- 董铁宝 131
- 杜融融 16
- 段学复 41, 45, 46, 49, 55, 57, 60~
62, 70~72, 74~78, 80, 82,

87, 90, 91, 93, 94, 96,
116, 132, 141, 144, 149,
157, 164, 166, 167, 182,
246, 247

多德 (Dold) 216

F

Fine 11

法尔廷斯 (Gerd Faltings) 184, 185

樊 畿 173, 174, 190, 211, 233, 234

范德瓦尔登 (B. L. Van der Waerden)

162, 163

房维中 255

费孝通 50, 53, 226, 228, 250

费振刚 103

冯 康 59

冯克勤 242

冯克熙 260

冯绪宁 161, 174

冯友兰 36, 37

冯之浚 251, 260

冯志伟 241

弗勒利克 (Frölich) 182

福尔摩斯 144

傅 鹰 89, 90

傅种孙 46, 86

傅作义 52

G

高崇寿 171, 172

高景德 214, 225, 226

高 天 225, 230, 248, 249, 252,

255, 264, 265

高云鹏 119

哥德尔 (Kurt Gödel) 47

格里菲斯 (Philip Griffiths) 166, 175,

177, 179 ~ 181, 184 ~ 186,

243 ~ 246

谷超豪 87, 88, 243, 247

顾方颖 26

关梦觉 249

光未然 53

归有光 8

桂琳琳 74, 84, 108, 111, 119, 124 ~

126, 132, 136, 138 ~ 140, 146,

150, 151, 168, 219, 233, 236,

237, 263

桂璐璐 74, 124, 133

郭金海 56, 61, 63, 65, 90, 166, 172

郭悦成 109, 110, 131

郭仲衡 135

H

韩 叙 211, 255

郝 斌 223, 224, 231

- 郝鈊新 162, 163
- 何东昌 45, 61, 194, 196, 200, 219, 236
- 何广讷 45
- 何裕民 21, 22
- 何志强 101
- 洪加威 105, 106, 211
- 侯德封 69
- 胡潮华 42
- 胡敦复 15
- 胡 风 90
- 胡刚复 15
- 胡国定 196, 241
- 胡和生 243
- 胡明复 15
- 胡宁生 30, 31
- 胡启立 205, 221, 222
- 胡乔木 63, 197
- 胡寿文 130
- 胡文瑞 79
- 胡耀邦 156, 207, 220, 222, 224, 229
- 胡政光 15, 252, 256
- 胡祖炽 82, 83
- 胡作玄 241
- 华 岗 72
- 华国锋 151
- 华罗庚 45, 47, 48, 57, 60, 61, 79, 85, 142, 143, 166, 170 ~ 173, 183, 186, 243
- 华彤文 176
- 黄槐成 156, 224
- 黄汲清 69
- 黄景钧 226, 248
- 黄禄平 206
- 黄 敏 84, 85
- 黄辛白 152, 250
- 黄子卿 165
- 霍尔 (Hall) 11
- J**
- 季羨林 128, 237, 261
- 贾庆林 263
- 江隆基 91, 92, 96, 97, 105
- 江 青 143
- 江泽涵 62, 70, 71, 74, 79, 82, 87, 93, 94, 96, 164, 247
- 江泽坚 59, 62, 70
- 江泽民 261, 262
- 江泽培 74, 172
- 姜伯驹 15, 112, 113, 135, 143, 164, 175, 241, 243, 247
- 姜 丁 3

姜景熙 85

姜礼尚 147

姜立夫 15

姜子牙 3

蒋涵碧 26

蒋介石 28, 37, 45, 106

蒋树声 262

蒋 巍 79

K

卡纳普 (R. Carnap) 52

康 生 119

柯 召 55

科 尔 207, 208

肯尼迪 188

孔庆东 218, 219

孔 子 5, 9, 147

L

Ladany 18

蓝仲雄 64

雷洁琼 22

雷 垣 16

李承璋 34

李春昱 69

李福安 163

李克强 256

李克政 163

李 鹏 214, 221, 222

李瑞环 255

李舜伟 111, 147

李 滔 174

李铁映 236

李同孚 90

李文宜 251

李先念 147

李醒尘 119

李雪峰 119

李耀之 187

李亦园 257

李 勇 260

李政道 8, 190, 211

李 忠 238, 242

李卓宝 45

里姆 (Riehm) 182

厉以宁 201, 204, 205

梁凡初 41, 42

廖山涛 135

列 宁 63, 64, 217

林 彪 132, 139 ~ 141, 147

林家翘 246

林建祥 41, 61, 64, 70, 72, 82, 83,

98, 106, 156, 157, 160

林源渠 135

林振宝 112
刘宝镛 79
刘惠先 2
刘 沙 105 ~ 108
刘少奇 113, 121
刘绍学 116
刘世泽 70, 82
刘燧初 42
刘檀源 6
刘铁生 42
刘婉如 142
刘卫东 133
刘 迅 133
刘延东 251, 252
龙英华 95
楼滨龙 206, 207
卢崇飞 131
卢嘉锡 258
鲁承宗 253
陆定一 121
陆 果 233
陆 平 97, 98, 105, 113, 114, 118,
119, 122, 126, 128, 129
陆元灼 108, 126
吕俊民 27, 29
吕应中 54

吕正操 105
罗豪才 230, 256, 261
罗斯福 188
罗素 (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
23, 36, 50

M

马尔科夫 (A. A. Марков) 105
马 赫 (Ernst Mach) 63
马进爵 102
马克思 (Karl Heinrich Marx) 248
马适安 92
马适江 227
马树孚 199, 200
马希文 79, 135, 171, 245, 246
马星寒 27
马叙伦 22
马约翰 44
马云章 198
马祖尔 (Mazur) 180, 181
麦克达菲 (C. C. MacDuffee) 38
麦克唐纳 (I. G. MacDonald) 162
芒福德 (Mumford) 177
毛泽东 26, 90, 115, 119, 122, 131,
141, 147, 151, 193, 223
梅利萨 (Mellisa) 177, 178
梅贻琦 45, 46

孟广平 134
 孟惠荣 30
 孟实华 150, 241, 242
 孟宪振 124, 125
 孟昭英 125
 闵嗣鹤 45, 46, 56, 59, 65, 74, 86,
 90, 91, 172, 173

慕容婉儿 25

N

奈特 (Knight) 11
 尼克松 169
 倪维泉 18, 19
 聂灵沼 74, 88, 115, 161, 164, 168,
 176
 聂元梓 113, 118, 119, 122, 127, 128
 牛汉 93, 94

O

欧亚非 150

P

潘光旦 62, 130, 257, 258
 潘光炯 257
 潘乃谷 258
 潘毓刚 187
 彭珮云 118, 122, 128, 129
 彭真 107, 114, 193, 194

Q

戚民 253
 齐民友 241, 242
 千家驹 226, 228
 钱美丽 25, 29
 钱敏 42, 69, 165, 169
 钱宁 231
 钱伟长 53, 65, 166, 226, 253
 丘成桐 173, 210, 243

裘光明 41, 42, 74, 86

曲伟 228

屈原 20

S

沙健孙 195, 219
 申又枨 49
 沈鹤巢 24, 25, 28
 沈君山 186, 187
 沈鹏 202
 沈燮昌 167
 沈有鼎 51, 52
 盛森之 147, 155
 施惠同 90
 施祥林 55
 施旭东 246
 石青云 156
 石生明 116, 134, 143, 147, 161, 183

- 石钟慈 243
史梦兰 98, 146, 147
史树中 241
舒 适 25
斯米尔诺夫 (В. И. Смирнов) 88, 115
宋 硕 118
宋一秀 119
苏步青 47, 56, 88, 160, 168, 249
苏 武 20
苏志中 215
孙恩厚 70
孙公麟 228
孙良方 231
孙 楠 228
孙起孟 259
孙小礼 75, 241
孙以丰 90
孙 震 213
孙中山 213
- T**
- 泰特 (J. T. Tate) 181, 245
谈家桢 259
谭天荣 92, 95
汤一介 113
唐家璇 255
唐守文 245
- 唐有祺 256
陶大镛 259
陶 铸 121
滕 藤 236
田长霖 189
田方增 55, 90
田振邦 (林华轩) 30, 32, 34
- W**
- 万 里 147
万哲先 48, 60, 77, 86, 111, 112,
161 ~ 163, 174
汪 浩 241
汪家镠 229, 252
汪仁官 142, 147
汪永铨 129
汪志华 61
王丹凤 256
王萼芳 74, 88, 115, 116, 161
王恩涌 204, 205
王赓武 213
王 浩 176, 177
王鸿楨 69
王 力 84
王丽真 231
王明道 91
王 前 241

- 王庆仁 245
- 王善平 188
- 王维城 259
- 王宪钧 50, 51, 133
- 王湘浩 49, 50, 70
- 王效挺 214
- 王 选 79, 205, 206, 235, 256
- 王学珍 194, 201, 203, 220, 222 ~
225, 231
- 王 瑶 225, 226
- 王义道 204, 230
- 王 元 87, 242, 243
- 王肇明 202, 208
- 王 震 208
- 王竹溪 85
- 王姿月 184
- 韦斯费乐 (Weisfeiler) 179
- 文 重 171, 213
- 吴达元 51
- 吴 德 152, 221
- 吴光磊 46, 47, 74, 77, 82, 96, 99,
101
- 吴国祯 21
- 吴 晗 22, 259
- 吴 健 180
- 吴阶平 258
- 吴兰成 167
- 吴庆宝 79
- 吴树青 256
- 吴同瑞 216
- 吴望一 85
- 吴文达 70, 74, 82, 151
- 吴文俊 243
- 吴宪 177, 180, 193
- 吴修平 226, 249, 252, 260
- 吴允曾 105
- 吴祖基 47, 74
- 伍鸿熙 189, 194
- 伍卓群 243
- 武际可 113
- X**
- 西尔弗曼 (Silverman) 181
- 西门纪业 234
- 希特勒 185
- 夏道行 87, 88
- 夏剑矛 119
- 夏蔚霞 84
- 项武义 189, 194
- 项子明 193, 194
- 萧树铁 123, 160
- 谢邦杰 70, 116
- 谢大任 11

- 谢静宜 151
谢青 99, 100, 195
谢颂凯 252
谢瓦莱 (Claude Chevalley) 112
邢其毅 225
徐德钊 27, 29
徐靖方 37
徐利治 2, 11, 42, 48, 56, 61 ~ 63, 65, 66, 70, 90, 172, 241
徐守仁 6
徐献瑜 70, 82
徐子久 6
许宝騄 49, 55, 73, 172
许嘉璐 230
许以超 77
许忠勤 150
- Y**
- 雅各布森 (N. Jacobson) 183
严家炎 237
严士健 87, 243
严又光 42
阎明复 228 ~ 230
杨克明 119
杨乐 243
杨路 80, 93, 94
杨武之 45, 46, 166
- 杨振汉 45, 46
杨振宁 189
姚曼华 38
姚铭生 25
叶笃义 251
叶其孝 79
叶企孙 54, 58
叶庆澄 24
叶庆桐 24, 29
殷涌泉 57
尹文霖 87
应隆安 245
应制夷 42
尤承业 115
余屹正 184
俞建章 69
袁明 190
袁向东 56, 61, 63, 65, 90, 166, 172, 248
袁行霈 256
- Z**
- 曾繁辂 42
曾肯成 41 ~ 43, 57, 58, 60, 161 ~ 163, 166
曾如阜 170
曾远荣 45

20 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

The Oral History of Science in 20th Century China Series

- 曾昭抡 86
- 詹汉生 115
- 张楚廷 241
- 张奠宙 188
- 张东荪 25
- 张恭庆 79, 80, 107, 143, 164, 175, 243, 257
- 张海潮 180
- 张劲夫 124
- 张景德 99, 102
- 张景文 81
- 张景昭 70, 131
- 张景中 79, 80, 92 ~ 95, 241
- 张丽霞 215
- 张廉瑜 43, 54
- 张廉云 43
- 张良诚 161, 163, 164
- 张龙翔 194, 205
- 张乃武 221
- 张磐石 113
- 张启运 199
- 张铁生 146
- 张 维 258
- 张文佑 69
- 张孝文 136
- 张学书 103, 195, 201
- 张永珍 255
- 张毓茂 226
- 张肇泌 18
- 张之良 70
- 张自忠 43
- 张祖贵 241, 242, 248
- 章士钊 35
- 章学诚 85
- 章聿新 30
- 赵春来 145, 161 ~ 164, 186, 245, 251, 252
- 赵访熊 45, 65, 70, 166
- 赵嗣元 77, 110
- 赵正义 119
- 赵仲哲 69, 90
- 赵紫阳 147, 205, 228, 230, 231, 233
- 郑 昕 32
- 郑之蕃 45, 55, 61
- 中曾根 207
- 钟开莱 172, 173
- 钟善基 86
- 周巢尘 79
- 周 铎 129, 130
- 周恩来 62, 87
- 周景良 52

- | | | | |
|-----|---|-----|------------|
| 周 林 | 156 | 朱光潜 | 128 |
| 周民强 | 112 | 朱建士 | 79 |
| 周培源 | 51, 54, 58, 69, 127, 165,
166, 207, 208, 213, 227,
246, 247 | 朱开轩 | 236 |
| 周寿松 | 109 | 朱镕基 | 262 |
| 周一良 | 52 | 朱善璐 | 229 |
| 朱 德 | 151 | 朱 熹 | 250 |
| 朱德威 | 95, 126 | 朱宣人 | 253 |
| 朱德熙 | 195, 201, 203, 218, 245, 246 | 庄圻泰 | 49, 55, 73 |
| | | 祖冲之 | 217 |

后 记

我们和丁石孙先生的访谈开始于2009年11月29日。那时，他已年逾82岁。由于他腿脚不便，完全要靠坐轮椅行动，访谈就选在他家里进行。丁先生是一位温文尔雅、平易近人的长者。他虽然在官场行走多年，但身上没有任何官气和架子。无形之中，这拉近了我们和他的距离，也使我们在访谈中没有感到拘束。丁先生的精力较好，每次和我们访谈约一个半小时并不觉得疲惫。

2006年，丁先生把他发表过或未发表但留有底稿的一些文章和讲话整理编印成书，书名《有话可说》，本书附录中的“丁石孙文章、讲话选编”和“丁石孙遗嘱”就选自此书；2007年，即丁先生80岁那年，又编印过一本《丁石孙自述年谱》，对他“这一生是怎么过来的”做了较为全面的记录。丁先生编的这两本未公开发行的书，为我们的访谈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参考。这本《有话可说——丁石孙访谈录》中的大部分内容，就是我们通过访谈，充实和细化这两本书，尤其是《丁石孙自述年谱》的相关内容的结果。当然，我们没有完全局限于这两本书：我们根据所收集的其他文献资料询问了丁先生的其他经历；在访谈过程中丁先生有时会讲到一些新线索，

我们会紧追不舍，由此扩展了不少访谈内容。

丁先生希望这本访谈录能够如实地记述他的学术人生和从政之路。由于时隔长久，又没有记日记的习惯，他自知单凭记忆对有些事情可能记不准确，所谓“如实”只是一种理想。但在访谈中，他力图避免夹杂个人好恶，尽量做到客观。作为科学史工作者，我们怀有同样的理想和目标，毕竟求真史学著作的第一要义。我们也坚信，尊重历史真实的著作才有其持久的价值和生命力。因此在整理访谈的过程中，我们遵循如下原则：首先，我们述说史实时，均言必有据；其次，对口述内容尽可能找旁证材料予以证实，同时对所发现的不确切之处均以脚注说明；第三，不把我们的观点植入丁先生的口述内容，仅

2012年3月25日袁向东、郭金海与丁石孙夫妇合影
(前排左起桂琳琳、丁石孙，后排左起袁向东、郭金海)



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对其口述内容做必要的文字整理和编辑。

丁先生对我们很有耐心，也很信任。我们从开始访谈到最终完成访谈稿，前后用了大约两年半时间。其间，丁先生没有催促一次；他知道我们手头还有其他工作要做。丁先生视力不好，不能亲自阅读访谈稿。为了让他确认访谈稿，2012年3月我们到他家里把整理好的一章读给他听。他听后很满意，说：“我看以后不用逐章读了，你们整理得很客观，符合实际情况。”但为了慎重起见，后来我们又挑了几章读给他听。他听得十分仔细和认真，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根据这些意见，我们进一步完善了访谈稿。

通过访谈，我们获得了关于清华数学系和北大数学系的大量有价值的口述史料；了解到了先生颇具传奇式的成长历程，以及他当北大校长和从政背后的艰辛、磨砺、无奈以及愉快。在整理访谈内容时，我们得到了徐利治、林建祥、叶其孝、吴庆宝等先生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袁向东 郭金海

2012年6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话可说——丁石孙访谈录 / 丁石孙口述; 袁向东, 郭金海访问整理.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3. 7

(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

ISBN 978-7-5539-0708-6

I. ①有… II. ①丁… ②袁… ③郭… III. ①丁石孙—访问记 IV. ①K826.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45272 号

书 名	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 有话可说——丁石孙访谈录
作 者	丁石孙口述 袁向东 郭金海访问整理
责任编辑	李小娜
责任校对	周 晔
出版发行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
网 址	http://www.hnepb.com http://www.shoulai.cn
电子邮箱	228411705@qq.com
客 服	电话 0731-85486742 QQ 2284117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6开
印 张	20.75
字 数	250 000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39-0708-6
定 价	55.00元



已出版书目

袁隆平口述自传
施雅风口述自传
黄培云口述自传
王文采口述自传
席泽宗口述自传
杨承宗口述自传
凌鸿勋口述自传
陈梦熊口述自传
张直中口述自传
徐利治访谈录
彭瑞骢访谈录
李元访谈录
丁石孙访谈录
沈善炯自述
朱康福自述
杨纪珂自述
李先闻自述
李书华自述
伍连德自述（上）
伍连德自述（下）
方俊自述
涂光炽回忆与回忆涂光炽
一位苏联科学家在中国
从合成蛋白质到合成核酸
青藏高原科考访谈录（1973—1992）
中关村科学城的兴起（1963—1966）
民国时期机电技术
我的南极之旅
农业科技“黄淮海战役”
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

近期出版书目

干福熹口述自传
彭司勋口述自传
吴文俊口述自传
刘东生口述自传
亲历者说“引爆原子弹”
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的建设与发展
中宣部科学处与新中国早期科学事业

策 划：李小娜
组 稿：李小娜 曹卓卓
责任编辑：李小娜
装帧设计：虢 剑 杨发凯

丁石孙，一位自20世纪40年代步入中国数学界，后成为北大校长，投身政界的传奇数学家。

他说：我这一辈子不曾有过一个长远的奋斗目标，因而对自己的评价是胸无大志，但追求一定要把今天的事情做得最好。

他曾热衷学生运动，被国民党特务抓进监狱。转学到清华后，恶补数学，后因成绩出众，留校任教。

1957年后，他饱受政治运动冲击，几次被迫中止刚开始的研究工作。对此他痛心地说：“我这一生中很多事情都开了个头，但不等到有结果就不得不放弃。”

“文革”后，他走上北大数学系领导岗位，积极恢复教学和科研秩序。年过半百，他赴美进修，学习新知识，希望回国后推动中国数学的进步。

在校长任上，他从抓食堂的改革入手，推动成立管理科学中心和北大方正，经历了北大学子的4次学潮。季羨林称他和蔡元培是北大历史上值得记住的两位校长。1993年正式步入政界后，由于常讲套话，他曾自嘲：“我到民盟后学坏了。”

.....

凡此种种，本书都娓娓道来。它是一位传奇数学家的全景式传记，反映了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和社会变迁中的成长、悲喜、沉浮和无奈。

ISBN 978-7-5539-0708-6



9 787553 907086 >

定价：55.00元